

渤海国 及其俄罗斯 远东部落

● Э. В. 沙弗库诺夫 等著

● 宋 玉 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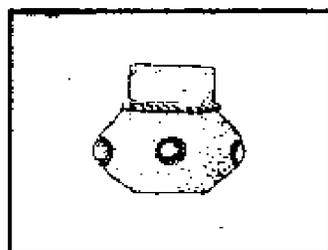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渤海国 及其俄罗斯 远东部落

●Э.В.沙弗里库诺夫 等著

● 宋 玉 彬 译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Ч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хай и племе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根据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翻译

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

BOHAIGUO JIQI ELUOSI YUANDONG BULUO

Э.В. 沙弗库诺夫等著 宋玉彬 译

责任编辑：包瑞峰	封面设计：王 昭	责任校对：包 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张：8.25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4 千	印数：0001—1100 册	

ISBN 7 - 5602 - 2031 - 2/K · 121 定价：18.00 元

序

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予厚望，俄罗斯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1994 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

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工

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 18 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 年 7 月 25 日于长春

目 录

序.....	王 侠	1
引 言.....		1
第一章 渤海国（698—926年）.....		27
第一节 渤海国建国前远东地区的民族政治状况.....		27
第二节 渤海国政治历史概述.....		40
第三节 渤海国的行政体制.....		47
第四节 渤海国的社会制度.....		55
第二章 渤海地区的渤海文化考古遗存及其评述.....		63
第一节 关于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分类.....		63
第二节 城址与村落址.....		65
第三节 墓地.....		86
第三章 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		89
第一节 房址与宗教设施.....		89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猎取业.....		111
第三节 手工业.....		120
第四节 交通工具与对外联系.....		189
第五节 武器.....		193
第四章 渤海文化.....		198
第一节 渤海文化的总体特征.....		198
第二节 装饰造型艺术 宗教观念.....		201
结 语.....		228
文献索引.....		233
后 记.....		255

引 言

渤海国（公元 698—926 年）的疆域包括现今滨海边疆区、北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它是由古代通古斯语族的姆克利部落创建的，该部落在中文史籍中被称为勿吉、靺鞨，这是基于它们社会经济的连贯发展（参考文献 200，第 60—61、68—69 页）。渤海国的历史与远东及中央亚细亚地区中世纪国家、部落联盟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述地区的许多事件中，渤海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

从这方面看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渤海国历史、文化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遗憾的是，中国、日本历史史籍中保存下来的有关渤海国的记载，比较片面且不完整。正因为此，考古学研究所揭示的发生在渤海国境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进程，以及渤海国对周邻国家、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渤海国的后继者渤海—女真人进一步发展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研究史，在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A. П. 杰列维扬科（参考文献 137，第 7—25 页；文献 143，第 44 页）、Э. В. 沙弗库诺夫（参考文献 197，第 6—15 页）、Л. Е. 谢缅尼契科（参考文献 163，第 2—3 页）的著述中得到了阐述。尚是在革命以前，研究者们就已经开始研究渤海史，揭示中世纪的考古遗存。最早的旅行者、考察者们注意到了滨海边疆区境内的城堡、城墙、濠沟、道路，M. 维纽科夫对此写道：“毫无疑问，在各种情况下，众多的城市借助于土筑的工事实现了防御”。（参考文献 45，第 154—155 页）这些阐述唤起了人们对遥远的、较少研

究的俄罗斯边陲的天然兴趣。

19世纪时期，特别是在其后半期，由于远东开始了繁忙的开发，人们对该地区考古学的兴趣明显增长。俄罗斯中心派往远东的考察团成员多半受过技术教育，他们对考古学遗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有关考古遗存位置、最初的原始状态的记述，为学术界留下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在矿业工程师И. А. 洛巴金有关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萨哈林岛考古遗存的手稿中，记载了上述地区考古遗存的位置，其中包括属于渤海时期的遗存（参考文献 220，第 3—32 页）。

1870—1871 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向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派遣了专业的历史—民族考察团，考察团由杰出的俄罗斯东方学家帕拉季·卡法罗夫率领。帕拉季·卡法罗夫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滨海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分期，其基本理论至今可信。按照 П. 卡法罗夫的观点，滨海地区中世纪考古遗存应该断代为渤海时代（8 至 10 世纪）、女真时代（12 至 13 世纪初期）、蒙古统治时期（13 至 14 世纪）（参考文献 146，第 91—92、94—96、124、326、364 页）。П. 卡法罗夫领导的考察团的工作成就，对远东而言意义是重大的。他们首次对边疆区进行了有计划的考察，这里发现的考古遗存和具体的时代建立了联系：“分散在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古代遗迹，主要是属于位于满洲的渤海王朝统治时期”。（参考文献 146，第 95 页）同时，П. 卡法罗夫广泛地参考了文献史料，因此他的著述为后来开展的远东地区有计划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根据文献记载，П. 卡法罗夫推测，在现今克拉斯基诺村附近存在一个海港遗址（参考文献 146，第 94 页），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文献的性质和名称。后来，在这一地区的确发现了一座不大的渤海城址，并且完全可能是一处海港，因为该城址位于埃克斯

佩季齐亚海湾楚卡诺夫卡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岸上（参考文献 195，第 141—144 页；参考文献 197，第 94—95 页）。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 П. 卡法罗夫是最早的渤海遗存研究者，根据实际材料他证明了在滨海边疆区境内存在渤海文化遗存。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П. 卡法罗夫和 В. 戈尔斯基一样，他们错误地认为，远东民族国家政权早期形式的确立受到了来自朝鲜、中国的影响（参考文献 55，第 24 页）。

俄罗斯东方学家们在远东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精选、翻译、综合中文、朝文、日文文献史料中有关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远东民族的记载方面，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应该注意到，史料的内容并不都是全面的、客观的记载，但对于研究渤海史、金史来说，它们是当时唯一的资料。

19 世纪中期，出现了 Н. Я. 比丘林（参考文献 18—20、81）、В. 戈尔斯基（参考文献 55）、В. П. 瓦西里耶夫（参考文献 42）的著作，根据文献史料，在著述中他们论述了远东及其毗邻地区民族的古代史、中世纪史。在他们的著述中，部分地涉及了渤海国的历史（参考文献 19，第 136 页；文献 42，第 31 页）。

由于俄罗斯东方学家们的工作，论据充分地解释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属性和出现的时间才成为可能，不过，由于缺少考古学材料，当时无法核查文献资料的可信性。

1884 年，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成立，它成为当地历史学家、方志学家、东方学家全面研究远东南部地区力量的组织者，Ф. Ф. 布谢主持了该研究会的工作，他和 Г. Д. 马尔科夫、В. П. 马尔加林托夫、Л. А. 克罗帕特金一起，按照学术团体的办法着手远东地区的考古学研究。

Ф. Ф. 布谢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边疆区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资料，这些工作使他得以对已知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并对滨海

的古代史进行了初步的分期。Ф.Ф. 布谢把中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 渤海国存在时期；2. 女真人金王朝统治边疆区时期；3. 蒙古人侵入和统治时期；4. 满洲人远征时期（参考文献 40，第 3—5 页）。

1908 年，Л. А. 克罗帕特金发表了《阿穆尔边疆区古代遗迹》（参考文献 41），为已有的资料补充了新的信息。在著作中，援引了一些首次发现并加以扼要的叙述，Л. А. 克罗帕特金对滨海地区考古遗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综合报道。

20 世纪初期，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对边疆区中世纪考古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他对 200 余处考古遗存进行了记述（参考文献 12，第 13—15 页），为远东地区组织考古学考察和历史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其所著的《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古代史资料》一文中（参考文献 12，第 15—66 页），他触及了一些中世纪考古遗存出现的时间及其用途的问题。不过，由于一系列原因，与 Ф. Ф. 布谢的分期相比，他提出的分期退步了。В. К. 阿尔谢尼耶夫认为，渤海国的存国时间为公元 668 年至 12 世纪，女真帝国的存国时间为 12 世纪至公元 1386 年（参考文献 14，第 313—318 页）。他认为契丹是靺鞨部落之一。中世纪时期远东民族国家政体的形成，按照他的观点，不是靺鞨部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来自更文明的邻邦的外界影响，В. К. 阿尔谢尼耶夫也是这样看待渤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参考文献 12，第 281、283 页；文献 197，第 8 页）。尽管暴露出某些不足，但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远东古代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对后来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А. З. 费多罗夫和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一起以极大的热情献身于滨海过去的学术研究，1916 年，他出版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及其周邻地区的古代遗存》一书（参考文献 183）。在

著作中，A.З. 费多罗夫记述了其本人在乌苏里斯克市及其周邻地区发现的中世纪遗存，并绘制了遗存的平面图。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对一些渤海遗存的认知得益于 A.З. 费多罗夫的研究，因为由于基本建设，这部分遗存现在已经荡然无存。A.З. 费多罗夫在市区里进行的发掘表明，市区内存在渤海时期的遗存（参考文献 183，第 11—14 页）。

1915 年，在庆祝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成立 25 周年大会上，东方研究院教授 A.В. 戈列别什科夫作了题为“依据考古学资料对阿穆尔边疆区的研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中国、日本的文献史料分析研究了远东民族的历史，并对考古学的基本工作进行了评述，其中他特别赞扬了 Ф.Ф. 布谢的工作（参考文献 56，第 50—75 页）。

综上所述，在革命以前人们已经开始了解远东地区的考古学遗存，对考古学遗存进行了最早的记述，并开始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概括尝试。考察者们研究了遗存的分类问题，并对遗存进行了分期。东方学家花费很大精力研究文献史籍，并解决了滨海边疆区曾作为渤海国组成部分的问题。同时，他们认为，渤海国的形成和渤海文化的形成一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来自更文明的邻国朝鲜、中国的强烈影响。

其实，在资产阶级文献中牵扯渤海国形成原因的这种解释，也存在于目前的著述之中。这些问题在 A.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参考文献 140，第 158—174 页；文献 139，第 44—57 页）、Э.В. 沙弗库诺夫（参考文献 197，第 13—14 页）和 Л.Е. 谢缅尼契科（参考文献 225）的著作中得到了足够充分的阐述。

进入苏联时期，1929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出版了 В.Н.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渤海》（参考文献 129）。在著作中，作者利用当时已知的中国、朝鲜、日本的文献史料对渤海国的地理位置、政

治历史、社会制度、文化，渤海国与周邻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在结语中，З.Н. 马特维耶夫强调指出，渤海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同时，他对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进行了论述。不过正如后来的研究所证明的，З.Н. 马特维耶夫对部分遗存的断代是错误的。正如З.В. 沙弗库诺夫指出的：“……З.Н. 马特维耶夫翻译的古代文献史料，许多地方不够准确，存在遗漏并缺少文献的出处。”（参考文献197，第9页）尽管如此，З.Н. 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是以往时期有关渤海国政治史最全面的著述。

1953年创建了以А.П. 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远东考古学考察团，195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成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历史、考古、民族部，从此之后，开始了苏联远东南部地区中世纪遗存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

在远东分部历史、考古、民族部科学研究员Э.В. 沙弗库诺夫的领导下，考察了夹皮沟河河谷（克罗乌诺夫卡河）的两处佛教寺庙址和几座渤海的墓葬（参考文献228—230）。随后发表的有关报告首次导致了对于渤海时期材料报道的学术转变。例如，屋顶瓦材料（参考文献191，第173—186页），在东京城材料发表以后（参考文献136，第198—214页），它成为渤海遗存确认和断代的标尺。中世纪时期的瓦曾进行过分类研究，同时进行了勾勒渤海城址特征的尝试（参考文献194，第105页）。在一些初步断代为渤海时期的中世纪城址里，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丘古耶夫斯克城址、萨因巴尔斯克城址、南乌苏里斯克城址，进行了勘测发掘，以便于对它们进行准确的断代（参考文献194，第102页）。П. 卡法罗夫预言的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被发现（参考文献211，第38—40页；文献195，第141—144页），近年来，该城址始终是远东考古工作者长期考察的客体（参考文献216、217）。

1968年出版了Э.В. 沙弗库诺夫的著作《渤海国及其滨海地

区的文化遗存》(参考文献 197),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作者分析研究了由姆克利(鞑鞑)部落到渤海国成立的历史。Э.В.沙弗库诺夫分析了独立国家渤海国的创建过程、渤海国的政治、渤海国与周邻的相互关系、渤海国的行政体制与居民、渤海的经济、渤海崇高独特的文化。该著作的大部分篇幅涉及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的评述,这些遗存是作者最初从 50 年代开始进行的研究。当时全面发掘了两处佛教寺庙址、五座墓葬,其中获得的主要遗物是瓦、容器、宗教用品。通过分析材料,并与中国东北类似遗存加以对照比较,确定了滨海城址在远东南部地区的分布范围。

苏联远东中世纪史问题在集体撰写的《西伯利亚史》中得到了阐述(参考文献 89,第 307—320 页),在 Э.В.沙弗库诺夫执笔的有关渤海国的章节里,分析了渤海国创建的先决条件,论述了渤海国的政治史和行政体制,同时强调,渤海国这个古代通古斯语族国家文化的形成渗透着与周邻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作者强调,渤海国这个独立王朝的存在,对苏联远东南部地区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89,第 320 页)。

60—70 年代对这样一些渤海遗存进行了考古学考察,如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参考文献 218、222、223、231、232、235、236)、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参考文献 233,)、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参考文献 212—214)。

70 年代,在汇编《考古发现》中,关于滨海地区渤海城址的报道发生了学术转变,发表了一批最有意义的材料,对已知的、明确断代的遗存中出土的陶器材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参考文献 30、31、158、159、166)。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参考文献 26,

第 17—21 页；文献 32，第 57—63 页），远东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街坊区和生产作坊址。导致了学术转变的考古学材料，使我们得以更准确、更充分地复原手工业者、农耕者、猎户、渔户的日常生活，重建滨海地区渤海城市、村落居民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

通过把考古学材料和周邻地区的材料加以广泛的对照比较，比较房址，运用文献史籍的记载，确立了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分期。根据发掘成果，把渤海文化划分为早、晚两期（参考文献 32），并细致地研究了渤海文化的地方性变异（参考文献 163，第 18—22 页），这种变异在渤海人房屋营建习俗方面表现得相当明显（参考文献 16，第 87—88 页）。

众所周知，陶器是种类最丰富的遗物，对渤海的陶器进行了显微镜、物理力学、岩石学的分析研究（参考文献 79，第 55—67 页）。Л. Е. 谢缅尼契科的文章论述了渤海人制陶业发展的问题（参考文献 164，第 47—57 页），在文章中她分析研究了手制陶器的纹饰，并按用途对其进行了分类。轮制陶器也进行了这样的分类研究。在 О. В. 吉亚科娃、В. И. 鲍日金的文章里，论述了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轮制陶器的纹饰（参考文献 72，第 114—118 页），将该城址的陶器同滨海地区其他渤海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以及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遗存中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纹饰、形制的比较，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遗存中出土的陶器不同于滨海地区女真人的陶器，发现了一些相似物。

很有意义的是，根据克拉斯基诺城址提供的发掘材料，В. И. 鲍日金、А. Л. 伊夫里耶夫撰写了渤海国制瓦生产的文章。在克拉斯基诺城址，与瓦顶的佛教寺庙址并排，发现了目前滨海地区唯一的制瓦窑。作者们发现该窑址和契丹时代（11 至 12 世纪）的窑址设施存在相似性，同时，他们还对 9 至 10 世纪初期渤海国制瓦生产的过程进行了模拟尝试（参考文献 29，第 142—151 页）。

近年来的考察为了解认识渤海人的陶器生产补充了材料，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揭露了三座陶窑遗迹，获得了展示滨海地区渤海人经济活动的独一无二的材料（参考文献 216）。按照构造结构，这些窑址接近克拉斯基诺城址的制瓦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发现的四座陶窑废墟是制陶综合体遗迹，它们属于上层建筑平面（参考文献 214，第 91—92 页）。

还有一种物品是用泥土制作的，它就是纺轮，几乎所有的渤海纺轮都是陶质的。需要指出的是，纺织在渤海人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献史籍记载证明了这一点。H. P. 阿尔杰米耶娃著文对纺轮进行了评述和分类，她认为，渤海的纺轮同以往时代的纺轮在形制上相近（参考文献 154，第 98—106 页）。

B. H. 鲍日金、Л. E. 谢缅尼契科的文章分析了渤海农业经济的问题（参考文献 22—24；文献 165，第 66—70 页），在发掘大多数渤海遗存的过程中，见有农业劳动工具，它们证明了渤海人农耕业的发展，农耕业的发展与饲养业处于紧密依存之中。随着材料的积累，B. H. 鲍日金在分析研究考古学资料、民族学材料的基础上重建了渤海人农业、饲养业的经营方式（参考文献 23）。除此之外，在分析骨学材料的过程中，鲍日金构拟了当时动物群的构成，并推测了哪些野生动物是渤海人的狩猎对象（参考文献 4）。复原渤海时期居民的经济、地理的工作开始了（参考文献 27，第 84—87 页）。

冶金业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参考文献 116，第 96—103 页），他们研究了有色金属制品生产的制作工艺问题（参考文献 101，第 40—41 页）。

Э. B. 沙弗库诺夫、Л. E. 谢缅尼契科的著述，牵扯到渤海人的民族文化联系问题（参考文献 197；文献 161，第 88—98

页)。他们分析研究了陶器、瓦、武器、装饰品，探索了滨海地区渤海人房址的结构特征，并把渤海的房址和靺鞨的房址加以对照比较。随着考古学材料的积累，我们得以揭示靺鞨人和渤海人物质文化中存在的共同因素，并深入研究渤海文化与高句丽国、回纥人、契丹人文化的联系。O. B. 吉亚科娃在自己的文章里，分析研究了渤海人制陶业中的靺鞨传统（参考文献 70）。

渤海人军事技能的发展问题同样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Л. E. 谢缅尼契科对渤海人的镞进行了评述（参考文献 162，第 98—117 页），揭示了 5—11 世纪时期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居民在文化上的相似性。不过，正如后来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进行考古学考察所判明的，Л. E. 谢缅尼契科对该城址中层堆积的断代是错误的，她认为中层堆积是渤海时期堆积，实际上应该把它断代为女真时期。结果，某些女真类型的镞被她当作渤海的镞而加以分类。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对待房址的问题上，H. Г. 阿尔杰米耶娃犯了类似的错误。

1982 年，Л. E. 谢缅尼契科进行了题为“渤海时期（8—10 世纪）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的副博士论文答辩，这是对渤海国时期滨海地区普通的手工业——农耕地居民的物质文化进行的首次尝试性研究（参考文献 163）。

研究者研究了渤海工匠的玻璃制品，分析了远东地区中世纪居民玻璃制品生产的发展水平（参考文献 170，第 116—129 页；文献 171，第 41—42 页）。

有关渤海的研究，还涉及了滨海地区渤海人的宗教观念问题（参考文献 141，第 47—52 页；文献 207，第 113—119 页）。

在分析研究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出土的源自中亚的考古学遗物的基础上，Э. B. 沙弗库诺夫得出结论，中世纪时期，滨海地区与中亚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贸联系（参考文献 203，第 146—

155页)。Э.В. 沙弗库诺夫还深入地研究了滨海地区中世纪的遗存，并做了缜密的分期和分类（参考文献199，第186—191页），他把中世纪遗存划分为四个历史文化时期，7—10世纪的遗存属于第一阶段，此时的滨海地区为渤海国的组成部分。

滨海边疆区境内开展的有计划的考古学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为重建渤海人的某些经济部门和他们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可能。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注意，生产力的发展是创建拥有崇高独特文化及政治独立性的早期封建国家渤海国的先决条件。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正确地阐释滨海地区中世纪的考古遗存，复原渤海人的经济与文化，尤其是重建渤海国的历史，要求研究者们应经常运用文献史料，并把它们同考古学研究成果加以对照比较。同时，不能不留意中国、日本、朝鲜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有关渤海历史、渤海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成果。基于此，下面我们将研究分析一下有关渤海国历史与文化的主要文献史料以及国外研究者的学术著述。

有关渤海国的文献记载，只是在与渤海国毗邻的中国、日本、朝鲜的文献史籍中得以保存下来。公元945年，刘昫主持编撰了《旧唐书》，公元1060年，欧阳修主持编撰了《新唐书》，在这两部中国朝代史中，保存了有关渤海国最丰富的记载。在这两部史书中，有单独的《渤海传》。同时，在《新唐书·渤海传》中，使用了未流传下来的张建章所著的《渤海记》的一些记述。张建章是瀛洲司马，他于833—835年出使渤海，据此，在《渤海记》中详细地记载了渤海国头十位执政王的年表、封号、执政年号、渤海国的行政区划、官制和等级制度。此外，还记载了渤海国的一些产品（参考文献290，卷19，第24页）。另外，11世纪初期，以王钦若为首的集体编撰了《册府元龟》，该书也汇集了有关渤海国

的记载。公元 1344—1345 年，元代的脱脱主持编撰了《辽史》、《宋史》，在这两部史书中，以及更早成书的洪皓的《松漠纪闻》、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中，记载了在契丹人的猛攻下渤海国灭亡以及渤海国灭亡后渤海人的命运。

日本官方的编年史《续日本纪》、《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以及公元 892 年编撰的《类聚国史》，11 世纪编撰的《日本纪略》，记载有渤海国的情况，但在材料方面它们比中国史籍的记载显得更加贫乏。日本史籍记载了渤海早期的居民点，渤海使团出使日本，日本与渤海的经济、文化联系等等真实情况。在我国的文献中，有关渤海的日本编年史材料最早反映在 3·H·马特维耶夫的著作《渤海》中（参考文献 129，第 21—28 页）。1950 年，在日本发现并发表了公元 841 年渤海使团出使日本的国书，国书中记载了使团成员及其职务名单，在签署国书的官员中提及一名显贵大虔晃，后来他成为渤海国的国王（公元 857—872 年）（参考文献 242）。

朝鲜中世纪时期的史籍《三国史记》（公元 1145 年）、《三国遗事》（13 世纪末）中有关渤海的记载，主要是从更早编撰的中国史籍中获得的资料。不过，这两部史籍中也有一些不见于其他文献的记载，所记载的一部分事情发生在朝鲜本土，涉及新罗与渤海、新罗与靺鞨之间的关系，以及契丹征服渤海后渤海人逃亡高丽等情况。另有一部分记载得之于未流传下来的中国史籍，记载的内容涉及渤海国的历史地理，以及渤海学者赴唐朝应考等情况（参考文献 276，第 24—25 页）。

需要指出的是，与渤海国毗邻国家的文献史籍是其自己时代的产物，这些史籍无法避免主宰这些国家的中国传统的帝国王权观念的影响，按照这一观念中心国的皇帝统治着全世界，而在这个中心世界周邻分布的“蛮夷”帝国，在良好的开化文明的影响

下，这些“蛮夷”帝国合乎道德的国王应该向中心国纳贡，从而表现出自己对中心国的顺服（参考文献 124，第 230—243 页）。中国、日本史籍描述的渤海与自己国家的关系，是宗主国中央王权与地方附属政权之间的关系。正如孙玉良针对日本编年史的记载所指出的，有时为了上述目的，史籍的编撰者歪曲了真实的外交文献（参考文献 276，第 24 页）。不过，即使是在用语方面的确正式表现出从属关系的渤海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具体深入地研究渤海国历史的基础上，许多历史学家证明，渤海国的真实地位是独立的（参考文献 129，第 29 页；文献 282，第 34 页；文献 238，第 482—483 页，第 514 页；文献 197，第 119—120 页）。

20 世纪，为上述文献史料补充了直接或间接涉及渤海国历史的碑刻遗存。其中之一，是公元 741 年唐朝鸿胪卿崔忻在旅顺口黄金山麓凿井刻石题文。该石碑记载的是，崔忻凿了两口井以纪念其作为使臣出使，替皇帝赏赐有功劳的靺鞨（参考文献 299，第 235 页），这是公元 713 年唐朝使团赐大祚荣渤海国王称号的实物证明。还有其他一些碑刻材料证明，中国使团曾出使渤海。不久以前在中国发现了张光祚墓志铭，从墓志铭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大历年间（公元 766—779 年）幽州副节度使曾派遣张光祚出使渤海（参考文献 299，第 79、237 页）。1956 年在北京发现了张建章墓志，墓志记述了他出使渤海并撰写《渤海记》等内容（参考文献 299，第 239—239 页）。

现在，经过考古学家的考察已知了两件渤海国自己的文献，它们是渤海贞惠公主、贞孝公主墓葬中出土的中文墓志铭。贞惠公主墓志铭于 1949 年出自吉林省敦化县六顶山渤海墓地贞惠公主墓中，墓志铭碑文总计 725 字，中国历史学家阎万章、金毓馥曾著文加以研究，在我国 E. И. 肯恰诺夫发表了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108，第 225—230 页）。尽管墓碑明显破损并有 234 个字无法辨

认(参考文献 240, 第 205 页), 但它使我们得以揭示一些新的史实, 其中包括, 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世时渤海人自己使用的渤海王称号; 前所不知的渤海统治称号——宝历; 皇陵珍陵的位置, 珍陵中完全可能埋葬有渤海的第二代王大武艺, 证实了距墓地 5 公里的敖东城即是渤海国的第一个国都旧国。

1980 年在吉林省和龙县龙头山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贞孝公主墓志碑(参考文献 308, 第 174—180 页), 由于这一发现, 使得贞惠公主墓志铭上的缺文得以添补。经过对照比较表明, 两座墓志铭上的文字只有六处不同, 它们涉及名字、时间、子女的性别、下葬的地点。在其他方面, 两座墓志铭记述了相同的内容, 显然它们是按相同的文体写就的。碑文由引言和祭文组成, 引言中有序, 援引了具备美德的妻子的例子, 接着讲述了公主高贵的出身、公主的性格、出嫁、丈夫死后对丈夫的忠贞, 公主谢世。此外, 还记载了公主的安葬过程。在祭文中采用了韵文形式, 撰文者精通中国的古典文学, 使用的是中国的骈文文体(参考文献 241, 第 195—200 页)。综上所述, 碑文中包含有一些有关渤海史的信息, 它们是仅存的渤海文献遗存。

最早的渤海国历史著作出现于本世纪初期, 中国、日本、朝鲜的历史学家进行了巨大的劳动, 收集散见于不同史籍中的有关渤海国的零星记载, 使其系统化并加以比较。

1919 年出版的四卷本《渤海国志》, 是唐宴按照典型的中国朝代史体例撰写的, 该书分为“纪”、“志”、“表”、“列传”等几个组成部分。“纪”记述了渤海人的先祖史、渤海国大事记、渤海国灭亡后事件的大事记。“志”包括下列内容: 地域、官职、等级、出行、服饰、礼仪、音乐、文学、姓氏、风俗、自然物产、产品。“表”为使团情况和军事行动大事记。书中附录有渤海国的版图(参考文献 238, 第 15—57 页)。不过, 许多材料未被收入于该书

之中，唐宴关于渤海国的地理构拟也没有经得住批评，但是他的著述成为渤海国历史新著结论的先决条件。

1929年黄维翰出版了三卷本的《渤海国记》，在体例上，该书与《渤海国志》有所不同，但保存了基本的类别，并按这些类别进行了叙述。作者叙述了渤海国的历史，对史料进行了注释，并由此获得了信息，指出由于依据这种结论或那种事实各种文献记载的分歧情况。在年代大事记中，黄维翰对照比较了渤海、中国、日本、契丹等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中与渤海相关的事件。在专门的章节里，作者论述了渤海居民的民族构成，同时指出，渤海的主要居民是粟末靺鞨。当时由于文献史料的贫乏以及缺少考古学材料，显然，导致了黄维翰对渤海国手工业发展水平估计不足。使他产生疑问的是，渤海使团赠送给中国、日本朝廷的金银佛像、玛瑙杯、紫瓷盆、玳瑁杯和其他一些渤海制造的物品，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参考文献288，卷2，第23页）。

仅仅是到了1933年，研究中国东北历史的著名中国学者金毓黻为黄维翰的《渤海国记》作了跋，在跋中金毓黻指出《渤海国记》存在一系列的错误和不当之处。稍后不久，金毓黻出版了自己的二十卷本的《渤海国志长编》。在这本书中，文献史料是按照中国朝代史的体例——“纪”、“表”、“传记”分类编排的，此外，头两章为“总略”、“考”。“考”包括“地理考”、“职官考”、“族俗考”、“食货考”等等。在最后一卷中，金毓黻收集了见诸于文献中的渤海古代遗存——城址、墓葬、雕像及其他一些物品。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渤海史料汇编，因此，若想在渤海领域里获得新的研究进展，只能依据于运用新的考古材料。

同一时期，在日本、朝鲜也开展了渤海的史料研究。1923年，朝鲜学者徐相雨发表了《渤海疆域考》，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徐相雨对渤海国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复原尝试。虽然

徐相雨的地理学构拟远未达到完美，与同一时期其他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往往有明显的分歧，但他的显著功绩在于，他证明，把辽代的府、州、县的位置跟与其同名的渤海的府、州、县位置相重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徐相雨揭示了《辽史》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或极端模棱两可性，以及后来以《辽史》为基础写成的《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等一些著述中的一系列不可信论点（参考文献 238，第 457—474 页）。

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的《渤海史考》是关于渤海史的重要著作，在著述中津田左右吉注意并参照了本世纪初期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还参考了欧洲旅行者的游记。

津田左右吉把整个渤海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 渤海国的创建时期；2. 大武艺、大钦茂执政时渤海国的发展期（公元 720—794 年）；3. 渤海国的鼎盛期（公元 795—871 年）；4. 渤海国的衰败及灭亡时期直到公元 926 年契丹征服渤海后，渤海人的迁徙。在研究中，津田左右吉特别注重对渤海文化的分析，他认为靺鞨文化、高句丽文化、中国唐代文化素来是渤海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些章节里，津田左右吉还论述了渤海文化对日本、高丽、女真的影响。

津田左右吉正确地把渤海国灭亡的原因看作是渤海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的过分疏远，当上层社会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雕梁画柱的宫殿里欣赏着诗歌、音乐时，普通的民众却穿着不能抵御严寒和雨水的鱼皮服装，目不识丁，生存于奴仆的境域之中。不过，津田左右吉把这种情况的起因仅仅看作是中国文明这一外来因素在渤海国的应用，中国文明的价值观在渤海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诱发出“新的愿望”，这种“新的愿望”导致了渤海人“军事特性”的丧失，导致了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忠诚、勇敢、坚韧、勤劳、正义等民族素质的沦丧（参考文献 238，第 591—593

页)。

在《渤海疆域考》一书的附录中，除了文献史料与其他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索引外，引录了一些古城址的首次报道。

17世纪60—70年代之际，张缙彦撰写了《宁古塔山水记》，该书中提及了今黑龙江省渤海镇（原名东京城）附近的渤海上京府遗址，这是对渤海考古学遗存的最早的著述。根据城址中出土的宋、金铜钱，张缙彦推测该城址使用于女真人的金帝国时期（金朝公元1115—1234年）。不过，这一错误的断代并没有降低他对城址所作描述的学术价值。正如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孙秀仁明确指出的，《宁古塔山水记》中有关该城城墙、宫殿、城内布局、佛像、“石灯塔”以及通往牡丹江东北部城市的古代桥梁等等记载，均为当代多年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所证实（参考文献273，第129—132页）。

17—18世纪时期，张贲所著的《白云集》、吴振臣所著的《宁古塔纪略》、杨宾所著的《柳边纪略》，均提到渤海上京城址。19世纪末，曹廷杰在其所著《东三省輿地图说》中，认定渤海的旧国是鄂多里城（今称敖东城）。中国当代的大多数研究者，恰恰也是把旧国界定在敖东城（参考文献289，第13页）。

20世纪20—40年代，日本以及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考察者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了中世纪遗存的考古学研究。靺鞨考古学遗存及其靺鞨人的物质文化遗存的最早确认者，是日本的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919年，鸟居龙藏沿黑龙江河谷、萨哈林岛旅行时进行了考古学考察。不过，鸟居龙藏得出的结论具有明显的假说性质，在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中，他的一部分结论得到证实，另有一部分结论则被否定（参考文献250，第25页）。日本考古学家鸟山喜一、斋藤甚兵卫、藤田亮策等人也进行了渤海考古遗存的调查与发掘（参考文献270—271、280—281、283—284），日本考

古学家考察了渤海上京遗址，其研究成果出版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它成为后来确定渤海考古遗存的标尺（参考文献 136、256、317）。确认琿春的八连城是渤海的东京龙原府、和龙的西古城是渤海的中京显德府，是日本考古学家的重要成就（参考文献 270、282、283）。

日本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在鸟山喜一的《渤海小史》中得到体现，鸟山喜一发表了渤海国都城城址的平面图，以及在这些城址中获取的瓦、砖、陶质佛像及其他一些遗物。该书用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日本与渤海的关系，以展示根源深厚的日满“友谊”。同时，书中记述了一些有价值的有关渤海经济、宗教的考察成果。比如说，在东京城以北的渤海墓葬上发现了建筑设施迹象，为有关渤海人中存在萨满教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同更早时代的勿吉人以及接受基督教以前的现代通古斯语族民族一样，渤海人有在墓葬封堆上设置小房子的习俗（参考文献 282，第 53—56 页）。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渤海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 1949 年在六顶山考察贞惠公主墓开始，中国考古学家在曾为渤海国所占据的东北地区逐步展开了自己的考察。

50—60 年代之际，在牡丹江流域进行了考古学调查，在牡丹江流域发现了 10 余座城址、一些墓地、三座中世纪桥梁址、以及“二十四块石”遗迹（参考文献 239、252、261、266、267）。

1963—1964 年，中朝联合考察队对东京城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确定了外城与宫城的布局，街道、住坊区、市场以及行政设施、宫殿、寺庙的分布。在宫城“禁城”东部城区进行的发掘，发现了属于不同时期的建筑址（参考文献 298）。1981—1984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继续对城址进行了发掘。他们发掘了禁城的南门，宫城南墙的 2 号、3 号、4 号门以及部分城墙，1 号宫殿址及其回廊。确认各种宫殿和设施是不同时期的建

筑，在 3 号门地区发现了带炕的房址（参考文献 297、298）。

还对其他的渤海遗存进行了考察和发掘，它们是，敖东城址，被推定为渤海国第一个都城遗址（参考文献 253）；东宁县的大城子城址，被认定为率宾府的治所或其建州治所（参考文献 295；文献 274，第 88 页）；镜泊湖地区的一些山城（参考文献 268）；北大墓地（参考文献 309）；东宁县大城子墓地（参考文献 247）；海林县北站墓地、二道河子墓地（参考文献 246、30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和龙县龙头山发掘的贞孝公主墓，该墓中首次发现了渤海壁画，壁画绘有 12 位武士、乐师形象（参考文献 309）。在东宁县团结渤海村落址发掘时，发现的带炕的半地穴式渤海房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参考文献 249，第 33 页）。距上京遗址 15 公里的杏山砖瓦窑址进行的发掘，足以阐明渤海国建筑材料的生产情况（参考文献 300）。

1974 年在黑龙江省绥滨县同仁发掘的断代为 6 世纪的遗址，对于区分渤海人物质文化中的靺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 303，第 9 页）。在中国，这个与靺鞨相关的遗存被称之为同仁文化。干志耿的文章基本上表明了中国的靺鞨文化研究状况（参考文献 250）。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靺鞨文化、渤海文化时，中国考古学家广泛涉猎了我国研究者 Е.И. 杰列维扬科、В.Е. 麦德维杰夫、Э.В. 沙弗库诺夫发表的材料及得出的结论。

随着考古学材料的积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了一些综合性著述，评述中国东北的考古学研究状态，其中包括渤海遗存的研究（参考文献 243、272），并有一些专门的渤海考古学著述：渤海城址、建筑址研究（参考文献 247、249、260、292）、渤海墓葬研究（参考文献 303）。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种学术观点，把渤海的城址和陶器分为两大时期，即以公元 755 年渤海国王迁都上京为界，分出前后两期（参考文献 243，第 4 页；文献 247）。

渤海的历史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历史学家魏国忠、孙玉良、刘晓东等人有关渤海的著述有数十篇之多。他们的研究涉及渤海史的各个方面:某些靺鞨部落加入渤海国的历史;突地稽、大武艺、大钦茂等人在渤海历史中卓越的个人作用;渤海国的文化;一些渤海史实的准确断代;渤海人中存在货币流通的问题;渤海的对外联系与渤海的地理。

在评定渤海文化方面,张钧的观点是饶有趣味的,他认为渤海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开放性。张钧指出,渤海文化是建立在与中国、朝鲜、日本、契丹、室韦等周邻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联系基础之上的,同时,渤海文化也给上述文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参考文献 296)。

有关渤海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建立在对照比较文献史料记载与考古学考察成果基础之上的。例如,1983年在吉林省汪清县对考古遗存进行的复查与调查,发现了七座渤海城址、两座城堡、十处孤单的建筑遗迹、两处墓地。根据这些发现,郑永振、朴润武构拟了途经汪清的,由渤海上京到东京并延续到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地区海滨的交通路线(即日本道),以及到率宾府的交通线。刘晓东、祖延龄根据牡丹江市地区考古遗存考察成果(边墙、南城子城址),并结合文献记载,尝试证明了渤海国的渤海(德里镇)是勃利部落的所在地,中国唐代曾在这里设黑水经略使,南城子城址是州治所址,城以北是渤海国与黑水靺鞨的边界(参考文献 263、264、286)。

现今的渤海地理构拟研究,在确定渤海京城位置的问题上分歧不大,分歧往往产生在确定渤海一些州城位置的问题上(参考文献 241,第72—82页;文献 299,第169—172页;文献 301,第78—79页),孙进己、刘晓东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其他的研究者(参考文献 262、274、275)。导致这种分歧的原因,是由于文献史籍

中有关渤海地理的记载比较贫乏且相互矛盾。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应该更加深入地考证文献史料，同时牵扯着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新的碑刻材料的出现。

1986年8月，在宁安县召开的“中国东北三省渤海史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对渤海历史、渤海考古研究兴趣的增长，会上成立了“中国渤海史研究会”（参考文献 291）。

1984年出版的王承礼所著的《渤海简史》、朱国忱、魏国忠合著的《渤海史稿》是中国渤海研究的重要事件，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渤海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王承礼在其《渤海简史》中，把渤海的史学材料与自己多年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两部专著均对渤海进行了全面考察：靺鞨的起源；渤海国的政治史；渤海国的社会制度（早期封建制性质）；渤海的经济；渤海的行政制度；渤海与唐、日本、新罗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渤海人后来的命运；渤海的文化。同时，朱国忱、魏国忠著作的特点是，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对渤海国进行了更充分的叙述、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注意到渤海国内各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朱国忱、魏国忠指出，融入渤海国之后，社会经济最落后的民族得到了明显的加速发展。基于此，从大仁秀执政开始（公元818—830年），渤海国得以在铁利、越喜、拂涅、虞娄之地设置州、县制度。朱国忱、魏国忠认为，存在大量的国家、私人奴隶并没有影响渤海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性质，因为奴隶被用于非生产领域。宫廷注册的“编户”是国家居民的主要成分，他们直接隶属于国家，被列入课税清单，向国家交纳实物税，除此之外，还要服劳役、兵役。宫廷注册制度的存在，使他们联想到，与同期的中国唐朝、新罗、日本一样，渤海国存在土地利用的国家分封制度（参考文献 299，第115—119页）。需要强调的是，更早之前，Э.В. 沙弗库诺夫已经

得出了这种结论（参考文献 197，第 71—72 页）。

在书的附录中，朱国忱、魏国忠收录了所有与渤海有关的碑刻材料。

概括中国所有的渤海文献的特点，必须注意到它们所特有的两个特征。第一，追随中世纪的传统，中国史学家认为，靺鞨是肃慎的后代，在历史中肃慎不断地改名为挈娄、勿吉、靺鞨（参考文献 241，第 1—15、20—21 页）。第二，把渤海国视为“隶属于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参考文献 299，第 1 页）。前文已经说过，渤海国的“附属国”情况纯粹是形式主义性质的。然而，中国的研究者在论述中国与渤海的关系时，不是将其作为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作为中央政权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中心论思想，它受到了我国东方学家的批评（参考文献 151，第 41—55 页）。

渤海国的历史也是朝鲜历史学家研究的客体，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渤海国的疆土曾经包括朝鲜的北部地区，高句丽国的居民后来成为渤海国人口的组成部分，渤海国灭亡后为了摆脱契丹人的压迫，相当一部分渤海人跑到了高丽国。但是，传统的朝鲜史学研究把渤海国视为朝鲜的北部国家，与其同时存在一个南部国家新罗（参考文献 88，第 106—108 页；文献 188，第 155—160 页；文献 118，第 62—65 页），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全永律（音译，Чон Ён Ньюль）这样写道：“在从前高句丽的土地上，当地居民同靺鞨部落一起，在高句丽将军大祚荣的统帅下创建了渤海国”。全永律由此得出结论，在我国的疆土上，在长达 230 年的时间里同时存在两个国家，北部的是渤海，南部的是新罗（参考文献 188，第 157 页）。

事实上原高句丽的国土仅仅是渤海国南部地区的组成部分，

渤海国的基本居民是靺鞨人，而不是高句丽的“当地居民”。证明大祚荣是高句丽将军，依据的只是《旧唐书》中一句非常含混的记载：“渤海大祚荣者，本高句丽别种也”。（参考文献 276，第 19 页）。不过，正如魏国忠、朱国忱指出的，《旧唐书》的这段记载同《新唐书》中“渤海，本粟末附高句丽者，姓大氏”的记载，在意思是相同的（参考文献 276，第 19 页）。这句话不是说大祚荣是高句丽人，而是说他是粟末靺鞨人，曾依附于高句丽。同时，魏国忠、朱国忱指出，所有早于《旧唐书》成书的史籍，以及朝鲜的所有中世纪时期史籍（《三国史记》、《高丽史》、《东国史略》）均称渤海人为靺鞨人，而不是高句丽人（参考文献 299，第 27—29、34 页）。据孙玉良考证，有关渤海与新罗是古代朝鲜同时存在的两个国家的观点，最早出自柳得恭于 13 世纪末编著的《渤海考》。这种观点的使命在于，为索回境外被侵占的领土提出依据，高丽的封建统治者希望借此走出困扰国家的社会危机（参考文献 276，第 25 页）。

正如上文所述，北朝鲜的考古工作者参加了 1963—1964 年在东京城进行的考古发掘，运用大部分是出自中国东北的渤海材料，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朝鲜考古学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朱荣宪的专著《渤海文化》（参考文献 304）。

大体上，经过苏联、中国、日本、朝鲜学者的努力，目前已经汇集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材料，完成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与假说。这一切有利于渤海文化、渤海政治史的研究，有利于弄清渤海在与其邻近的国家、民族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有利于以不同于我国及国外学者以往研究的完全崭新的角度研究渤海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

目前，由于拥有了充实的资料作为基础，解决与滨海地区逝

去的历史相关的，它曾作为渤海国组成部分的一系列课题已经成为可能。其中主要的课题是，详细评述滨海地区渤海人物质文化、经济、渤海人的装饰造型艺术。众所周知的是，渤海居民的民族成份相当复杂，其中，在这个古代通古斯语族国家的某些地区，占优势的是蒙古语系部落（中国东北的西部、西北部、北部地区）、高句丽人（朝鲜北部）。自然而然，这些地区的居民在经济形式以及物质文化、精神文明方面会显现出某种差异。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渤海国与周邻国家接壤地区的文化会受到来自这些周邻国家的一定影响。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会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渤海某些地区的居民的文化分支及其独特性、以及他们在经济形式、水平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并解决一系列的其他问题。否则，不可能获得发生在渤海国境内的民族文化、社会政治进程的客观情况。

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位置，是本书作者所面临的任务。

本书是计划出版的集体创作的三卷本的综合著作《俄罗斯远东地区及其邻近的亚洲地区民族的中世纪国家历史纲要（8—13世纪）》的第一卷。该书每一卷所涉及的是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居民在中世纪三大历史文化时期中其中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这三个历史时期是，渤海国时期（公元698—926年）、契丹辽帝国时期（公元916—1125年）、女真金帝国时期（公元1115—1234年）。

第一卷《渤海国（公元698—926年）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由下列作者编写。

引言：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史籍评述：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Т.А

· 瓦西里耶娃。

第一章，第一节，渤海国建国前（公元5—7世纪）远东地区的民族政治状况：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第二节，渤海国政治历史概述：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历史学副博士Н.Н. 克拉基。第三节，渤海国的行政体制：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第四节，渤海国的社会制度：历史学副博士Н.Н. 克拉基、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

第二章，滨海地区的渤海文化考古遗存及其评述。第一节，关于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分类：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第二节，城址与村落址：历史学副博士В.И. 鲍日金。第三节，墓地：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历史学副博士В.И. 鲍日金。

第三章，第一节，房址与宗教设施：历史学副博士Н.Г. 阿尔杰米耶娃、历史学副博士В.И. 鲍日金、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第二节，农业经济与猎取业：历史学副博士В.И. 鲍日金、Н.В. 列谢科。第三节，手工业：历史学副博士В.Д. 列尼科夫、历史学副博士И.В. 科尼科娃、历史学副博士О.В. 吉亚科娃、历史学副博士Г.И. 西兰捷夫、历史学副博士В.И. 鲍日金、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Е.И. 盖尔曼、Н.В. 列谢科。第四节，交通工具与对外联系：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第五节，武器：历史学副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

第四章及结语：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

索引：历史学博士Э.В. 沙弗库诺夫、历史学副博士А.Л. 伊夫里耶夫、Т.А. 瓦西里耶娃。

图例：И.К. 罗杰别尔格、И.Н. 库谢娃、И.П. 霍德杰维奇、И.А. 卡拉卡、Д.Г. 托米洛夫。

本书编委会对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曾给予重要指导的所有团体与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一章 渤海国（698—926年）

第一节 渤海国建国前（公元5—7世纪） 远东地区的民族政治状况

在远东民族的历史沿革中，公元一千纪下半期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时，在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及与其毗邻的外国境内的部落中间，由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普遍开始摧毁旧的多种情况下已属落后的原始社会关系，其中有些部落逐步向新的阶级本性关系过渡，7世纪末形成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处于这种变化的顶峰时刻。

根据中国、日本文献史料的记载，渤海国是由靺鞨部落建立的（参考文献19，第136页；文献153，第12、14页；文献197，第44—45页）。总的看来，该部落自称巴卡利（Бакари）或姆克利（Мукри），突厥人称之为彪克利（Бекли）（参考文献200，第60—61、68—69页；文献259，第185页）。

姆克利人分为七个大的种族部落联盟，其中最大最强盛的部落是粟末靺鞨部落、黑水靺鞨部落。这两个部落联盟各自占据的地域为幅员300—400里，即约150—200公里，而其他的五个部落联盟占据的地域为幅员200里，即约100公里（参考文献279，黑水靺鞨）。

称为粟末靺鞨的部落，居住在古代的粟末水沿岸，即现今松花江的上游地区。其南在长白山麓下生活着白山部落，其北为伯咄部落。如果注意到上文所说的各部落所占据的地域幅员，伯咄

部落应该生活在现今拉林河沿岸，即哈尔滨以南。伯咄部以东为拂涅部，再往东为号室部或窟说部。安车骨部或称之为安居骨部居住在伯咄部的东北部地区，即松花江右岸支流阿什河、蚂蚁河之间地区（参考文献197，第32—33页；文献204，第54页）。有趣的发现是，现今的阿什河满语称为阿尔丘卡（Алчука）（参考文献180，第19页），而按女真语在中国象形文字中的标音为阿德出改（Адэчугэ）、安出虎（Аньчуху）（参考文献120，第43页；文献208，第47页），与安车骨部落的名称非常谐音。正如最近几年的研究所展示的，黑水部生活在兴凯湖以东、松花江左岸以西、穆稜河可能还包括乌苏里江上游之间的地区（参考文献204，第56—58页）。

通过上文所述，显然，几乎所有姆克利部落均生活在满洲（今中国东北）的东部、东北部地区，即松花江上游、部分中游以东到滨海边疆区西部，长白山麓以南到牡丹江河口（古称仆干水）以北。这些部落中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包括窟说、拂涅，并且不排除部分黑水部曾生活在滨海地区的西部地区。

姆克利人南部的高句丽人（参考文献19，第69页）、契丹人（参考文献177，第163页），西部的室韦人，西北部的思慕人，北部的郡利人，东北部的库越人（参考文献279，第204页）是姆克利人最邻近的居民。除此之外，尽管没有提及其大致的居住位置，但姆克利还存在如下一些邻居：大莫卢、覆钟、莫多回、库娄、素和、郁羽陵、库伏真、羽真侯、具弗伏、鲁娄（参考文献19，第71页；文献279，第77页）。

契丹人，依据于释读它们的文献，表明他们属于古代蒙古语系（参考文献293，第365页）。室韦人同契丹人讲相同的语言（参考文献177，第135页；文献19，第76页），抑或，他们正确的称谓应该是室拜尔（Шибэры）（参考文献200，第58页）。豆莫娄人即大莫卢人或大乌尔人（Даурь）（参考文献204，第57、64

页)也讲这种语言。完全可能,大部分与姆克利人毗邻的上述部落,与契丹人、室韦人讲同一种语言,只是库越人除外,它们居住在黑水部东北,总的看来,是在黑龙江下游沿岸,15世纪时,这里生活着苦夷部落,即阿伊努人(参考文献197,第33页)

至于室韦人,额尔古纳河、几乎整个黑龙江流域、嫩江谷地、以及从与嫩江交汇处开始的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是其主要的居住分布区(参考文献204,第57页)。大莫卢生活在室韦人以东,姆克利人以北,其东濒临大海(参考文献19,第78页;文献177,第361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区域据文献记载是室韦人的领地(参考文献177,第135页),可见,古时的大莫卢人除了自己的名称,与室韦人没有什么差异,基于此,他们往往属于室韦人。

综上所述,公元5至7世纪时期,姆克利人处于其南、西南、西、西北、北部的古代蒙古语系的契丹部落、室韦部落、大莫卢部落的半环形包围之中,契丹、室韦、大莫卢生活在辽河、嫩江、额尔古纳河谷地,黑龙江上、中游到与松花江交汇处,以及松花江中、下游谷地。根据中国历史学家郑英德的研究成果,室韦的领地东部包括小兴安岭地区,西北为雅布洛诺夫山脉,南部达洮儿河谷地,北部是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参考文献302,第83—88页)。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所分析的这一历史阶段,黑龙江不是也不可能是E.И.杰列维扬科在自己的著作中断言的姆克利人(靺鞨人)的领地(参考文献62—64),E.И.杰列维扬科考察的考古遗存多半属于蒙古语系的室韦人、大莫卢人。基于上文所述,会有趣地发现,在随后的时代,即女真人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期,这一地区总体民族情况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世纪下半叶。

处于蒙古语系部落包围之中的姆克利人,起初与周围部落处于同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经常与他们保持着各个方面的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不能不影响到这个或那个部落民族文化进程的性

质。因此，一些文献主张室韦与契丹使用同一语言，室韦人是契丹人的北方旁支便不是偶然的了（参考文献177，第136页）。然而另一些文献则相反，表明室韦人和姆克利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参考文献177，第140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大概应该这样理解，有一部分室韦人已经很密切地与姆克利人混杂在一起，甚至于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有这样的报道，室韦人的饮食同姆克利人一样（参考文献177，第136页）。此外，文献记载，契丹人的习俗和姆克利人（参考文献177，第155页）、突厥人（参考文献177，第163页）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文献所指多半是所有上述部落生活方式的同一性，他们的精神文明、物质文化的某些同一性以此为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同一性在陶器材料上找到了自己的反映，尽管对于每一个别的列举出来的民族同一性来说，陶器材料的特点是自己民族的标识性特征，大体上陶器材料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一些研究者把它们归入冠之以“靺鞨类型陶器”的特殊器类（参考文献70，第9—10页）。

至于姆克利人的社会制度（参考文献103，第17—21页），需要强调的是，和其他任何社会群体一样，家庭是其最底层组织。

“将嫁娶，妇人则布裙，男人猪皮裘，头插豹尾。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其妻外淫有人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参考文献19，第70、92页；文献197，第36页）

从援引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姆克利人中存在父权制，毫无疑问，妇女处于家庭中无权利的社会地位。父权制的获胜，表明在姆克利人中间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参考文献197，第36页）。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姆克利人中是否存在多妻制，尽管这是完全可能的。E. И. 杰列维扬科援引有关女真人的记载推测，姆

克利人中存在夫兄弟婚（参考文献 64，第 276 页）。不过这种援引未必可信，女真人中存在夫兄弟婚，但女真人与姆克利人相隔好几百年，绝不意味着夫兄弟婚也应该存在于姆克利人中。

从文献记载中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姆克利人中是否存在氏族，或氏族是否已经解体，其职能已转化成了比邻公社。在这个问题上 E. И. 杰烈维扬科处于自相矛盾状态，一方面她推测：“靺鞨的社会结构立足于公社、氏族基础之上，加入公社的是两个氏族的代表，公社和氏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她又指出：“村落不外乎是比邻公社，它由单个的自主经济占主导的家庭构成，但因地域比邻关系以及牧场、能经营的土地共有制而联结在一起”（参考文献 64，第 171—172 页）。但问题在于，氏族公社（分为早晚阶段）和比邻公社（它也可以称为原始农民村社），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由一个彻底替代另一个的时代进化形式的社会组织。

全面分析考虑（大量出产农产品的经济，剩余产品的增长，掠夺性战争的拓展，私有制的存在，与早期国家制社会为邻等等），能够得出姆克利人存在原始农民村社的结论，不过，这也只能仅仅是推测。

这一历史时期的姆克利人社会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文献记载，猪“富人至数百口”（参考文献 197，第 35 页）。挹娄人中已经存在内部的等级制度，住房“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参考文献 19，第 24 页）。存在一定的不充分享受权利的居民阶层，关于这一点可以依据于这一事实来加以判断，姆克利人首领突地稽的儿子谨行统帅的部落约千户“其部落家僮数千人”（参考文献 197，第 37 页），尽管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一数字，但应该同意 D. B. 沙弗库诺夫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拥有“家僮”，他推测，那些不充分享受权利的居民阶层主要是受上层社会，首先是军事首领的剥削（参考文献 197，第 37 页）。

Е.И. 杰列维扬科明确断定这种依附于人的形式是奴隶制，她指出：“奴隶被用于家务及妇女活计”。“战俘奴隶容易变成平民……如果奴隶俘虏表现得好，有时二三年后就会放他回家”（参考文献 64，第 173 页）。很难说这是否的确是奴隶制，抑或这是某种或几种别的依附形式。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姆克利存在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社会分化大致分为三个阶层：贵族、普通的充分享受权利的村社社员、受上层社会剥削没有充分享受权利的居民。

此时的贵族已经拥有管理社会的继承权，例如，根据文献史料的记载，谨行继承了其父突地稽的“部落”（参考文献 197，第 37、42 页），乞乞仲象死后，他的儿子祚荣掌权（参考文献 197，第 45 页）。

贵族不仅仅是以剥削依附于他的不自由的人的方式而富裕起来，某些收入大概是得之于外贸，以及中国统治者的“礼物”（参考文献 197，第 42 页）。但姆克利上层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得之于战争，掠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重要的东西：珍宝、武器、奴隶、牲畜、土地。他们“于东夷最强”，编年史如是记载姆克利人（参考文献 19，第 69 页）。姆克利人基本上同其所有邻居进行了战争：契丹人（参考文献 19，第 72、85、92—93、118、119 页）、中国人（参考文献 57，第 231—233 页；文献 197，第 42、44 页）、朝鲜人（参考文献 19，第 69—70、91 页；文献 197，第 39—40、69—70 页）、突厥人（参考文献 197，第 39—40 页）及其他一些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首领具有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军事首领决定了军事行动的结果与后果。姆克利各个部落的首领在文献中均被称为军事长官，这不是偶然的。显然，在他们的手中还集中了其他权利（行政管理权、司法权等等），并且不排除，他们还担负着宗教职责。在原则上可能，在实际中也屡次发生了军事、行政、祭司职权在不同的种族部落贵族群体中的分工。

按照 Е.И. 杰列维扬科的观点，军事首领拥有胜兵，胜兵

“同普通的畜牧者、农耕者相比，处于特权地位”。不过，稍后她又指出：“部落的基本居民从事经济活动并参加军事战争”（参考文献 64，第 163 页）。然而，在编年史中没有任何有关胜兵的具体记载。已知的只是，姆克利人除了步兵还有骑兵（参考文献 197，第 33、42 页）。我们认为，公元 6—7 世纪时期，姆克利人形成了成立特殊的职业军人群体的趋向，但这种趋向不会出现得更早。军队的主要成份多半是由普通居民构成的。

部落是姆克利人最高层的社会组织，我们无需去争论这种部落组织它是不是社会组织进化所必须履行的阶段形式，我们注意到，完全可能，姆克利人正好处于 M·费立德所谓的那种最异乎寻常的情况，当时，迫于长期的对抗战争，兴起组建使单一的公社变成一体化的部落的动机（称为部落效应，ЭФФЕКТ ТРИБАЛИЗАЦИИ）。部落占据的地域“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参考文献 197，第 32 页），可以尝试着计算一下公元 6—7 世纪时期靺鞨人的大致数量，以及大致的人口密度。依据于这样一种情况，成年男人（即军人）最大限度为占人口的 20%，而靺鞨人军队人数的总数约为 3 万人—4 万人，根据这一文献记载，则靺鞨人的总数约为 15 万人—20 万人，每一个部落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0.5 人—4.7 人。不过，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数字，将来如果能够得以确定 5—7 世纪时期靺鞨人的居住界限，那么则可以按生态学来检验它们。

简略概述上文所述，我们得出下列结论：靺鞨人中存在不平等现象，出现了剥削制度的萌芽，社会结构很明显地具有三位一体性质即贵族、平民、没有充分享受权利的居民。社会组织最基层单位是家庭，但其具体情况不清楚。社会组织发展经历下列阶段，原始比邻公社，其后（不排除经过某些过渡）是部落。靺鞨人总共有七个种族部落联盟，它们的构成类似于联邦。

大体上，根据公元 6 至 7 世纪时期处于发展阶段的靺鞨的发

展水平，可以把它放入大的历史时期即通常被称为阶级形成时期来考察，其中有种意见认为此时的靺鞨处于阶级的初级阶段，另有一些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有时是完全不同的术语，大致相同地这样评价了靺鞨的发展阶段（参考文献 64，第 194 页；文献 8，第 187—208 页；文献 6，第 276 页；文献 66，第 29 页；文献 143，第 317—319 页；文献 197，第 37 页）。

需要指出的是，姆克利各个部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极不平衡性质。例如，粟末部、白山部，相对于同部族的其他部落，它们占据了最南部的地域，直接与古朝鲜高句丽国为邻，比较早地卷入了与高句丽的政治抵触之中，甚至于 5 世纪末时他们就得以从高句丽国掠夺了部分土地（参考文献 279，第 72 页）。这一时期，在远东地区姆克利人基本上已经显现出充分发育成熟的政治力量，以至于周围的部落甚至于国家不能不重视它。公元 6 世纪，姆克利人部落的势力更加强盛，这一点在文献史籍中得到了体现，文献中有大量有关姆克利人勇猛好战的记载，他们“每寇高丽”和其他邻国，“于东夷最强，诸国亦患之”（参考文献 279，第 75 页）。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导致中国皇帝的不安，他们利用许诺和贿赂渴望得到姆克利种族部落首领的友谊和结盟。姆克利军事首领突地稽和他的儿子谨行的传记是这种政策的鲜明的例子。他们由于站在中国一边参加了反对吐蕃、突厥的战争，被中国授予封号并赐大片土地（参考文献 197，第 42 页）。

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在姆克利人中，“战争与战争机构，现在是民族生活的经常性职能”。经常性的战争预示着胜利后的大量的卤获品，最大最好的一份受军事首领支配，由此明显地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和势力。这种权力后来成为继承性的合法化的习惯法。因此，到了公元 6 世纪，姆克利人已经具备“继承王权的基础”（参考文献 122，第 164 页）。

种族部落首领的权力革新为继承权的进程（其全部过程成为制约姆克利部落发展的条件），强有力地出现始于公元7世纪。和6世纪时期一样，在姆克利人中，首领统领部落或部落群体，每一个首领“自治”（参考文献197，第41页）。这种自治首先表现在每一个部落所拥有的胜兵的数量上，最大的部落联盟胜兵的数量达到七千人，小的部落胜兵为三千人（参考文献197，第41页）。最强大的姆克利部落联盟是粟末部和汨咄部，起初黑水部军队的人数不足三千人，后来由于一些小部落归附于自己，其中包括拂涅部，黑水部也开始跻身于最强大的部落联盟行列。

一些部落的强大迫使另外一些部落借助于与毗邻的部落甚至国家缔结军事联盟，以寻求庇护。例如，根据编年史记载，公元7世纪时，姆克利的一部分部落“附于”高句丽，另有一些部落“臣于突厥”（参考文献197，第41页）。姆克利种族部落首领缔结这样的联盟后，一般成为更强有力统治者的诸侯，这些强有力的统治者保障他们政权的存在及领地的完整，战时，姆克利首领应该给诸侯主以军事援助，胜利后，姆克利首领会得到丰厚的卤获品，诸侯王给予他们荣耀地位、封号、爵位，以提高他们在同部族人中的威望。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由于契丹人的濒繁侵扰，迫使姆克利人与高句丽缔结了军事联盟，高句丽也对此感兴趣，因为中国朝廷早就试图削落自己这个东北部邻居的势力，对高句丽实行了强制政策。削弱高句丽的势力符合另一个古朝鲜国家政权新罗的利益，基此目的，新罗急忙与中国隋朝缔结了军事联盟。

另一部分姆克利人，主要是粟末部，在公元6世纪末期，试图摆脱高句丽人的统治，他们曾帮助中国隋朝对抗高句丽，但没有成功。公元10世纪，中国宋朝文学家乐史援引了未流传下来的7世纪初的著作《北蕃风俗记》中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勾

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柳城位于今辽宁省西部朝阳市，燕郡地处今北京地区。

中国皇帝隋文帝没有错过利用高句丽国王婴阳王压制姆克利人这一借口，作为征讨高句丽的缘由，不过，许多姆克利部落，首先是白山部保持着与高句丽的联盟关系。这样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公元598年开始的最初的一些交战中，有一次，一万靺鞨骑兵站在高句丽一边，而使中国军队在辽西遭受巨大失败。

在隋炀帝时期，战争仍在持续。居住在柳城的突地稽积极参加了612—614年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战争，由此他得到了隋炀帝丰厚的礼物：红绶金印、辽西太守、夫余侯，同时兼守辽东疆界。总的看来，突地稽非常勤奋地履行了赋予他的职责，因为后来他被授予了很多封号，这些封号通常只有朝廷中身居高位的人才能荣获。

同高句丽的战争，必然导致大量的开销和损耗，没有取得这样或那样的胜利，便无法获得国内的拥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平民骚动，结果促使了隋朝的衰败。

公元618年，中国建立了唐朝，基于此，突地稽向朝廷派遣了使团，献上了礼物，努力博得新朝廷皇帝的好感，并顺便探询一下朝廷的一般情况，以确定自己的未来政策。

与此同时其他的姆克利部落也试图与新的中国王朝建立和平关系。例如，公元622、624年，姆克利部落的一个首领阿固朗到过唐朝。

公元628年，唐朝皇帝唐太宗宣布在突地稽领地设置燕州，任命阿固朗为该州总管。其后授予突地稽都督之职，不久又授予他为节度使“国公”。因为战胜突厥，突地稽获得了右卫将军封号，赐皇姓李。

突地稽死后，他的儿子谨行管掌了当地的行政权。由于战胜

吐蕃，他被封为燕国公、积石道经略大使、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死后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参考文献 197，第 43 页）。

综上，7 世纪时，姆克利人种族部落关系的解体进程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种族部落首领实际上已经成为自己部落的“公”。面对非常强大的邻居，迫使一些部落首领缔结军事联盟，使得较小的部落得以保存自己的完整性，而较大的种族部落联盟得以补充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有利于种族部落贵族威信和势力的增长，他们的政权实际上与王 或公国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姆克利部落的军事帮助对高句丽统治者有利害关系，因此高句丽统治者同样也慷慨地用高官厚禄收买姆克利的首领。姆克利种族部落首领也在高句丽统治者身上看到了在内部斗争中巩固自己政治地位，以及反击主要是来自突厥、契丹以及后来的中国唐朝的领土扩张的可靠支柱。

到了公元 7 世纪下半叶，中国唐朝成为对抗姆克利部落与高句丽王朝联盟的主要军事力量。不久，另一个朝鲜王朝百济站到了高句丽一边。公元 645 年，唐朝皇帝向高句丽边境派遣了大批精锐部队，基于此，高句丽人尝试缔结新的同盟者。例如，利用姆克利人作中介，高句丽人试图与突厥部落薛廷陀即敕勒塔尔杜什缔结军事同盟（参考文献 18，第 342 页）。不过，此时突厥可汗夷南不会出来反对中国。姆克利人同敕勒塔尔杜什接洽这一事实表明，姆克利人存在广泛的外界联系。

中国军队攻占了一些高句丽城池后，向安市（今辽宁省盖县）进发，安市是高句丽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姆克利人出动五万骑兵帮助安市居民，唐朝皇帝派出了最好的突厥骑兵迎战他们。在安市城下的交战中，高句丽军队由于部分将领叛节而战败。在这次交战中，姆克利人进行了特别顽强的抵抗，基于此，中国人遣放了所有高句丽人回家，却处死了三千姆克利士兵。

尽管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唐朝军队在安市城下的会战持续

了80余天，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迫使他们不久就退兵。公元647年、648年的两次讨伐战争，唐朝均告失败。公元650年，由于唐太宗去世，军事行动终于停止了。

高句丽利用这一喘息机会反击契丹人，契丹人曾利用方便的时机攻打高句丽及其结盟的姆克利。公元654年，高句丽、姆克利军队侵占了契丹的土地，并占领了新城，不过，由于天降大风雪，给运送军需带来困难，高句丽被迫中断军事行动返回。契丹人企图切断高句丽、姆克利的退路，结果以巨大失败告终。与此同时，高句丽、姆克利军队攻了中国同盟者朝鲜南部王朝新罗的一些土地，以索回以前新罗从高句丽掠去的土地。并且，高句丽夺取了新罗的36座城池。新罗王明白，单凭新罗自己不能遏止高句丽人的进攻，便向中国乞求帮助，中国新的皇帝唐高宗找到了重新对高句丽作战的借口，决心摧毁这个东北部邻居。结果，战争重新爆发了，这一次战争更加激烈和顽强，公元668年，高句丽国灭亡。姆克利部落“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文献如是记载（参考文献197，第44页）。

高句丽的领土被中国和新罗瓜分，大批高句丽人沦为奴隶，但也有许多高句丽人得以逃亡日本、突厥、契丹或北方的姆克利，姆克利仍然继续反击中国军队的强攻。不过，中国人不久便被迫中止了对姆克利的进攻，因为，公元696年，契丹人侵占了中国的北部地区。鉴于中国北部边境出现危机，则天皇帝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同契丹人的作战上，姆克利首领乞四比羽、乞乞仲象立即利用了这一形势。

在东牟山稳住脚后，乞四比羽、乞乞仲象开始积蓄力量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战争，以夺回被中国人掠去的姆克利土地。投奔姆克利人的高句丽人，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为了使姆克利人保持中立，或进一步促使他们站在中国一边反对契丹，则天皇帝授予乞四比羽、乞乞仲象爵位。不过此时契丹人的军事积

极性已经有些衰落了，于是则天皇帝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决定，派李楷固率兵攻打姆克利人。李楷固击溃乞四比羽的军队，乞四比羽本人则被斩首。此事不久，乞乞仲象去世，他的儿子大祚荣继承了政权。大祚荣善于用兵，他避开与中国军队正面作战，中国军队长期翻山越岭艰苦地寻找大祚荣，士气急剧下降。大祚荣利用这一机会，借助于姆克利——高句丽联合力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此后，“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在东牟山中“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

把曾归属于乞四比羽的势力合并以后，大祚荣于公元698年“建国，自号震国王”。他遣使突厥，希望与之确立友好关系（参考文献197，第45页）。大祚荣与第二东突厥汗国缔结了联盟，从而，在反对中国皇帝扩张主义政策的战斗中，姆克利拥有了强大的同盟者。中国皇帝则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向周邻的突厥、古代蒙古、古代通古斯语族部落扩张自己的领土。

综上所述，正如依据贫乏的文献史料可以判断的，姆克利部落的逐步发展，与邻近的东亚国家、民族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姆克利部落与高度发展的古代朝鲜、中国以及其他中央亚细亚国家有相当早的政治、经济联系，从而明显加快了他们原始公社制的解体与阶级关系的萌发，以及私有制至高无上的国家观念的出现、独特的姆克利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的产生。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远东总体政治形势的发展上姆克利部落一直积极地发挥作用。

随着震国王朝的建立，开始了远东古代通古斯语族民族历史的新时期——阶级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确定与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二节 渤海国政治历史概述

遗憾的是，文献史籍只是极其简短地记载了大祚荣在政权建立初期实现了内部政治地位的巩固，实现了自己王朝疆土的安全保障。同样简短的是，大祚荣确立了与突厥的友好关系，通过合并邻近部落扩展了疆土。大祚荣“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由此，国土达“五千里”，编户10万余人，军队万余人（参考文献197，第47页）。

年轻的震国的军事力量，很快便成为中国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现实力量。公元705年，中宗皇帝登基不久，便派遣御史张行岌出使震国，“招慰”大祚荣。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唐朝正式承认了大祚荣作为震国王朝执政者的合法性。公元713年，中国皇帝睿宗发布旨令，据此旨令，大祚荣被册封为渤海郡王。除此之外，大祚荣还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领忽汗州都督之职。中国皇帝的这种姿态追求两个目的，一方面，授予大祚荣爵位和封号，中国皇帝似乎承认了大祚荣作为一定土地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大祚荣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应该归功于中国皇帝的恩赐。

其实，是特殊的情况促使中国统治集团授予大祚荣渤海郡王，这种情况出自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统治者不愿点破而把它转化成有利于自己的形式。问题在于，渤海是一个不大的采邑的名称，它的中心位于今北京附近，即距姆克利部落的主要居住区域相当远。因而，授予大祚荣渤海郡王爵位，应该看作是中国被迫承认大祚荣对这片土地拥有的特殊权利。总的看来，这片土地是公元713年时从中国夺取的，当时大祚荣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战役对抗中国军队，以把中国军队从曾属于高句丽的疆土上驱逐出去（参考文献20，第585页）。同时，非常可能，在追击中国军队

时，大祚荣夺取了中国自身的一些土地。因此为了保全自己作为天子即普天之下统治者的名誉，睿宗皇帝被迫采取欺骗的手段，正式把事情转化成这样，大祚荣从中国掠去的土地变成了中国赐予他的封邑。后来，这个采邑名称转化成了姆克利国家的名称，众所周知，渤海国在中国文献史籍中被称之为“海东盛国”。

中国皇帝承认大祚荣是姆克利国家至高无上的元首，有利于两国之间睦邻关系的确定，从公元713年开始，两国开始定期互派使团。

公元719年，大祚荣死，他的儿子武艺继位，继位前武艺为桂娄郡王。武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示自己的统治，旨在扩大渤海在周邻部落中的影响。由于多次征讨，武艺“斥大土宇，东北诸夷臣畏之”，文献如是记载他的行动。下列信息是武艺的侵略政策的反映：除了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和官职外，武艺又领九姓燕然都督之职，九姓燕然的领地位于内蒙古的东北部地区。显然，这些领地后来又被侵占，成了回纥汗国（公元745—840年）的组成部分，回纥汗国的东界到达满洲。当时的情况是，部分回纥部落曾暂时依附于渤海，这也是武艺执政时期渤海国实力明显增强的证据之一。

武艺时期，渤海国作为主权国家其地位显然得到了一定的巩固，武艺采用立法的方式使用了执政年号“仁安”，他认为这是巩固政权可行的重要的政治行为，当时拥有这种特权的只有中国、日本的皇帝。渤海国是第一个敢于破坏这种约定俗成不过又被周邻国家严格遵守的规矩的国家，其实这种规矩是唐朝皇帝的直接要求和统治政策，结果由于屈从于渤海而导致了这一政策的衰败。

众所周知，中国皇帝一直关注着周邻国家的事态，觉察到渤海势力的增长，唐朝立即决定采取适宜措施以削弱渤海。遵循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唐朝花费了不小的精力，以离间渤海统治者与黑水部首领的关系。本着这一目的，公元723年，玄宗皇

帝赐封黑水部首领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勃利是黑水部的大本营。同时，玄宗宣布设立黑水府，黑水部所有种族首领被封为刺史。除此之外，设立“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公元728年，赐倪属利稽皇姓李氏，名献诚，以示厚遇。并且，授倪属利稽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之职（参考文献197，第48—49页）。

唐朝推行的以黑水种族部落贵族对抗渤海统治者的政策很快被渤海识破，武艺了解到以倪属利稽为首的分立主义行为后，对自己的属下说：“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

显然，渤海统治者早以把黑水部视为自己的臣属，这一事件成为渤海对黑水部进行军事行动的合适借口，武艺派自己的弟弟门艺、舅父任雅统兵征讨黑水部。门艺试图劝阻武艺放弃这次行动，他指出，攻打黑水部，唐朝会出动大批精锐部队站在黑水一边，这可能会导致渤海的毁灭。然而，他的劝导并没有动摇武艺的决定。当门艺第二次致函武艺请求他不要发动军事行动时，武艺派遣从兄壹夏到已经集结了渤海军队的渤海、黑水边境地区，以替代门艺，让门艺返京。意料到将会遭受惩罚，门艺逃亡中国，唐朝皇帝马上封他为左骁卫将军。得知门艺叛节，武节上书唐朝列举门艺的罪行，要求处死门艺。唐朝皇帝的答复是，出于公正不能杀死门艺，因为他是在困境中被迫寻求寻求庇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皇帝扣留了等回信的渤海使者，派遣自己的使者向武艺通报了一个假的门艺的住址。武艺知晓了骗局，他上书唐朝皇帝：“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但唐朝皇帝对此请求置之不理。

武艺忿恨此事，于公元733年派遣水军攻打当时唐朝在山东半岛上的最大港口登州。登州是通往高丽、渤海海上交通线的起点。唐朝皇帝派门艺征兵援助登州，同时，他派出大批军队前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打算和新罗军队联合攻打渤海国的南部地

区。不过，正如编年史所载：“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返”。

嗣后，武艺充分认为门艺是其政敌，派人刺杀门艺，门艺则“格之，得不死。后旋捕其贼，尽杀之”（参考文献 290，卷 1，第 1 页正面—第 2 页正面、第 6 页反面—第 7 页反面；文献 197，第 49—50 页）。

公元 727 年，武艺第一次谋求与日本建立联系，他派使团带着丰厚的礼物出使日本。然而，风浪把使团的船只吹到北海道，那里的阿伊努人袭击了使团。在同阿伊努人的搏斗中，使团成员只有七人保全了性命，他们继续航行，于 728 年初，他们在京都会见了日本皇帝，并向日本皇帝递交了大武艺的国书：“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支百世。武艺忝为列国，监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遮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参考文献 147）。

日本皇帝对渤海使团的来访感到非常高兴，设宴款待使团首领，并授其荣誉封号。随后日本向渤海派遣了回访使团，向武艺递交了国书。国书称：“敬问渤海郡王，聿修曩好，联地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波波虽隔，不断往来。”并向渤海赠以丰厚礼品（参考文献 129，第 21 页；文献 147）。

后来，渤海频繁遣使出访日本，并且使团的人数达百人，有时超过三百人。同样地，日本也向渤海派遣使团。并且，日本派往中国的使团，逐渐开辟了新的经过渤海境内的交通路线。由此可见，渤海国在周邻国家中威望的增长。

公元 738 年，武艺死，他的儿子大钦茂继承了王位，全国大赦以示庆贺。武艺执政时恶化了的渤海与中国的关系，钦茂即位后得到了广泛的改善，两国之间确定定期互遣使团，钦茂在位时

共向中国派遣了 29 次使团，通常使团成员中包括许多赴中国学习的学者。总之，需要指出的是，钦茂认为发展国内文化、教育有重大意义，难怪钦茂死后被谥为“文王”（参考文献 290，卷一；文献 197，第 51—52 页）。

公元 755 年，钦茂迁都上京，临死前又迁都东京。迁都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可能，钦茂的迁徙是由于公元 755 年安禄山起兵反唐引起的。

出自突厥—索格狄亚那人的安禄山（他的真名叫轧犍山，POKCAH），很快与突厥、契丹种族部落的首领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借助于他们的帮助和积极支持，安禄山得以攻占了唐朝的两个首都洛阳和长安。之后，安禄山称帝，不过，公元 757 年安禄山就被杀死，但他掀起的起义持续到 763 年。起义前，安禄山是与渤海毗邻的幽州、营州军使兼押渤海和黑水边境事态的平卢节度副使。由此可见，安禄山起兵的策源地直接毗邻渤海的边界，显然渤海的边境地区经常受到安禄山的骚扰，对渤海疆土的完整和中京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钦茂立即从中京迁都上京，远离来自安禄山的威胁。

8 世纪 70 年代，渤海与中国、日本帝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摩擦，这种摩擦表现为，中国、日本方面利用各种方式，旨在减少渤海派往这两个国家的使团数量。完全可能，这些限制是针对钦茂对外政策的某些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因为在公元 796 年，即钦茂死后，例行派往日本朝廷的渤海使团，他们递交的大嵩璘的国书同以往的国书相比，这封国书友善得多：日本政府认为这是渤海对日关系的吉兆，因此武士们来到皇宫向政府祝贺（参考文献 129，第 25 页；文献 198，第 52 页）。

公元 794 年，钦茂死，但他的儿子、王位继承者宏临在大钦茂在世时就已经死去，钦茂的族弟元艺即位。同年，由于元艺对自己的亲信残暴猜忌，其自己被杀死，宏临的儿子华屿即位。大

华屿把都城从东京迁至上京。大元艺被杀与大华屿即位表明，王权显然已经衰落，出现了一个由高层官吏、宫廷贵族构成的有势力的强大集团。这一集团试图把渤海国王拥有的王国土地的主要也是唯一拥有者的权力制约在自身狭隘的特权利益中，捍卫那些对现存封地制度不满的，仿佛是名义上实际多半已经成为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唐朝、新罗王朝、日本的大土地拥有者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参考文献 52，第 277—280、302—304 页；文献 88，第 116—119 页；文献 197，第 53 页）。

遗憾的是，文献史籍对随之而来的公元 795 年大华屿的死因避而不谈。不排除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样，也是被他的反对者残暴地杀死的。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璘被拥立为王，但他的在位时间也不长。公元 809 年大嵩璘的儿子大元瑜即位，但到公元 813 年时，王位又落入了他弟弟大言义手中。公元 817 年大言义的弟弟大明忠执政，他在位仅一年，他的“血亲”大仁秀取代了他，大仁秀是大祚荣弟弟野勃的第四代传人。不同于自己的前任们，大仁秀成功地巩固住了自己的政权，完全可能，大仁秀对北方部落的征讨也促进了政权的稳固。这些征讨的结果，还明显扩展了渤海的疆土，基于此，大仁秀死后被谥为“袭王”。后来，大仁秀的孙子大彝震也获得了这一封号。公元 830 年大彝震继位，显然，同他的祖父一样，大彝震对渤海的毗邻部落推行了相同的政策。

在文献史籍中没有找到有关渤海王大虔晃（公元 858—870 年在位）、大玄锡（公元 870—892 年在位）、大玮璿（公元 892—905 年在位）执政期间的记载，显然，这与下列事件有关，公元 9 世纪下半叶，渤海国发生了重要的内政事件。公元 840 年由于叶尼塞河的黠戛斯人灭亡了回纥汗国（参考文献 201，第 87—89 页），导致大批回纥部落迁往渤海境内。看来，回纥人在渤海人中安顿下来绝不是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的，渤海人不得不为此花费不小的努力，以保障在此之前他们成功地整顿下来的相对秩序与安宁。基

于此，渤海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中断了。

由于内部事件困扰着国家，渤海国往昔的威力完全动摇了。到了10世纪初，骚动的浪潮重新困扰国家，文献史籍中有此记载（参考文献77，第363页）。遗憾的是，文献中缺少任何有关这些骚乱性质、特点的具体记载。然而，有充分根据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多半意味着，高句丽人中间分裂情绪的增长，渤海国的南部地区大多数居民是高句丽人。下列理由导致了这种想法，众所周知，9世纪末至10世纪初，由于新罗的衰败，在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一系列小的国家政体，其中之一是于公元901年创建的后高丽国，按其创建者弓裔的意图，想必是想证明其继承于古高句丽，因为其领土包括部分从前高句丽的土地（参考文献90，第99、109页）。总的看来，这部分土地应该是后高句丽从渤海国掠取的。公元905年，渤海国溷谥即位，按顺序他应该是第十五代王，显然他采取了一些报复行动反击弓裔，这一点可以从弓裔屡次改变国家名称问题上得到解答。仅仅是到了公元918年，弓裔被王建推翻，这个国家最后定名为高丽。获得政权后，王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旨在从渤海收回原属他们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参考文献88，第136—137页），如果没有当地高句丽居民的积极支持，王建未必能顺利实现这一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事件发生于居住在渤海西、西南部地区的蒙古语系契丹人势力增强，政治活跃时期。契丹人首领耶律阿保机先是极大地向室韦部落拓展了自己的领地（参考文献77，第41页），然后兼并了渤海的西南部领土，这一切可以依据于这样一个事实来加以判断，即公元915年时，契丹领地的东界达到了鸭绿江（参考文献269，第86页）。

公元916年，随着耶律阿保机宣告大契丹国成立，渤海国来自契丹方面的压力更强了。基于此，渤海王大溷谥向契丹派遣了使团，以确立与契丹的睦邻关系。但是，和平的建议被拒绝。公

元 919 年，契丹占领了渤海国辽河沿岸的土地。924 年，契丹继续用兵旨在掠夺渤海的土地，不过，这次行动失败了。这种尝试于 925 年重演了，并且于 926 年初，契丹用强攻的方式夺取了扶余府，随后攻占了渤海上京，大逦谥被迫投降作了俘虏，许多渤海将领效法了他的样子，但绝大多数渤海上层官吏逃亡高丽，其军队放任自流，结果注定了渤海的灭亡。

第三节 渤海国的行政体制

渤海国建国初期，没有明确的国家行政区划，“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参考文献 290，卷 2，第 39 页正面）。

综上所述，尽管文献在提及种族部落首领的同时，也列举了一些服公职的官吏（都督、刺史），且这些官吏是王权在地方的官方代表，但渤海国发展的早期阶段，不特别需要复杂的行政官吏机构。不过，随着城市的增多，手工业的发展，供养大批军队（其中包括水军）的需要，渤海王朝也产生了建立复杂的管理机构的必然性，公元 737 年，钦茂替代武艺继承了王位，创建了管理机构。钦茂执政时，将渤海境内划分出 15 个府，其中有 5 个府为京城，府下共设有 62 个州，州的下面又总共设置了 125 个县。

一般，国家区划的实施要考虑到居民的民族构成，居民不一定是单一的种族。渤海国的构成不仅包含了大量的通古斯语族姆克利人种族部落联盟，还包括高句丽人，大部分高句丽人生活在渤海国南部的高句丽故地以及大的商业手工业中心。渤海国西部地区大部分居民是蒙古语系的室韦人、契丹人，以及回纥人和其他的突厥语系部落。渤海国的东北部，可能还包括于东部地区生活的库绍 (KYIHO) 或库越 (KYIOE) 部落，公元 15 世纪时，称之

为苦夷，即阿伊努人。

渤海国的基本居民是姆克利人的粟末部、黑水部、拂涅部、越喜部、白山部、汨咄部，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它们是远东现代那乃人、乌德改人、乌里奇人、满族人及其他一些通古斯语族民族的直接祖先。

证明渤海人是远东现代通古斯语族民族祖先的，不仅仅在于渤海人的种族部落成分以及他们直接参与了女真人种的构成，而且还包括记载于文献中的渤海词汇（参考文献 197，第 58 页）。

近年来，中国历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更准确地确定渤海国府、州的位置。在这方面饶有意思的是孙进己的著述（参考文献 274，第 82—88 页），他对一些府址的看法，有些观点与金毓黻（参考文献 290，卷 1）、Э. В. 沙弗库诺夫（参考文献 197，第 59—63 页）相同，另有一些则存在分歧。在这一点上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当新的材料成为学科的财富时，Э. В. 沙弗库诺夫在 60 年代末绘制的渤海国行政图，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某些修改。首先，涉及到的是渤海国的国界，渤海国的统辖范围正如目前所呈验的，没有伸展到滨海边疆区的东、东北部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沿岸。根据滨海边疆区揭示的渤海遗存，渤海国的东界应当到达了帕尔季赞斯克地区（即游击队地区—译者）帕尔季赞斯卡亚河（即游击队河—译者）谷地，然后从丘古耶夫卡地区的乌苏里江上游沿其河谷多半到达了比金河河口，国界从这里折向西南沿着穆稜河谷地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境内，接着国境大概到达了现今的勃利。在各种情况下，公元 8 世纪时，勃利是黑水部首领的大本营，后来，黑水部隶属于渤海。总的看来，渤海国界从这里转向西北，至现今的依兰、铁力，接着沿呼兰河到达松花江，又沿松花江河谷到达了嫩江河口，接着沿陆路向南到达长春，并延向鸭绿江下游，至此渤海国界向东进入北朝鲜境内，并且沿古代的泥河为界（图一）。孙进己认为，泥河即今天的龙兴江。可见，当初

渤海国的疆土包括了辽河谷地，并沿着渤海湾几乎到达了北京。

正如上文所述，渤海有五京，每一京同时又是大府的行政中心。

上京，是龙泉府的行政中心，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右岸距镜泊湖不远的东京城附近的一个同名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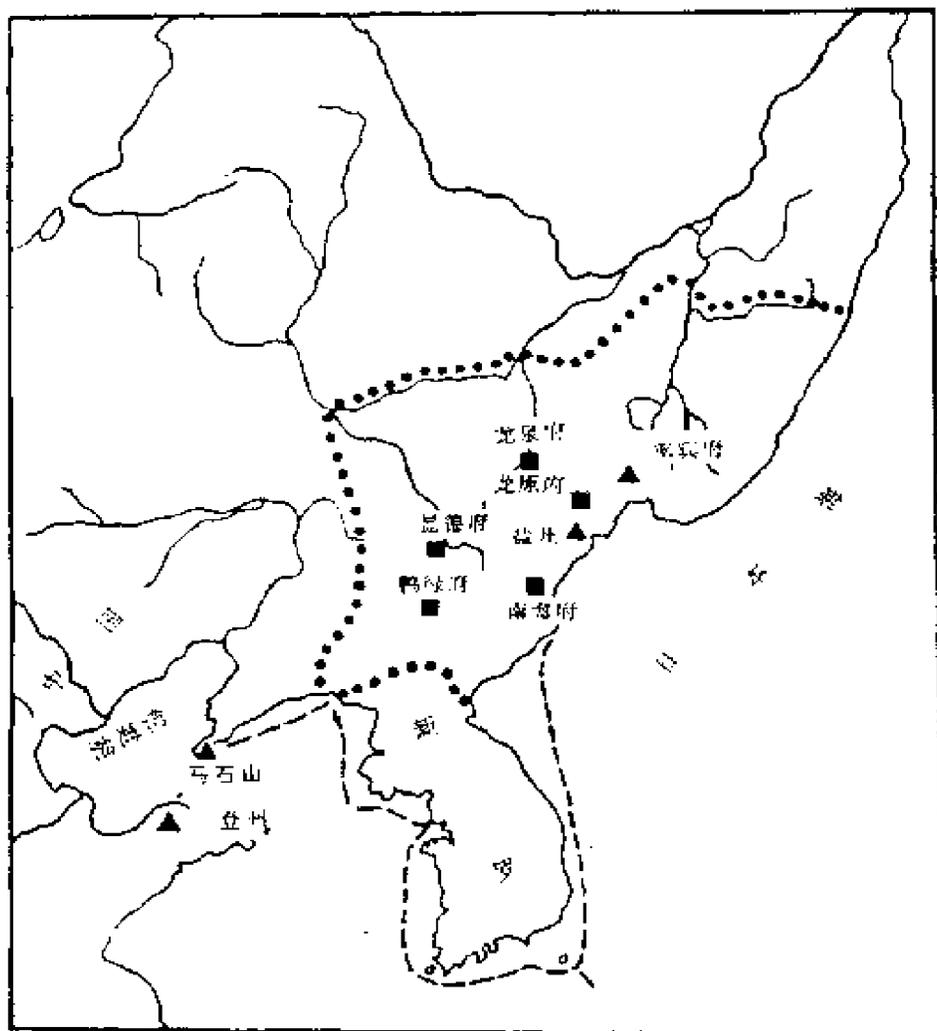
中京，是显德府的行政中心，按孙进己的观点，位于上京以南，今吉林省敦化大蒲柴河才浪河古城（参考文献 274，第 82、83 页）。

东京，是龙原府的行政中心，古时称栅城府，位于滨海边疆区哈桑地区克拉斯基诺村西侧，中国吉林省珲春八连城（参考文献 299，第 60 页）。

西京，是鸭绿府的行政中心，位于鸭绿江的西南岸，今吉林省临江。

南京，是南海府的行政中心，位于北朝鲜咸镜北道清津以南的镜城（参考文献 274，第 83、84 页）。

至于其他的府，在府址的问题上，孙进己表明自己不同意其他研究者的观点，但在自己的考证中他却完全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结果导致了其结论的一笔勾销。问题的实质在于，据文献记载，怀远府建立于越喜部落的土地上，该府领九州，其中有两个州词音一样，但是两个不同的汉字，即富州和福州。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福州位于上京东南 780 里，如果简单地计算一下，它应该位于滨海边疆区的帕尔季赞斯克地区。众所周知，这里有多层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耕作时该城址中经常出土渤海时期的遗物。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中，发现了渤海的鱼形青铜信符，根据该信符上的铭文得出结论，信符属于左骁卫将军聂利计。很显然，渤海国的东界到达了帕尔季赞斯卡亚河谷地，滨海的南部地区，即帕尔季赞斯克地区，可能还有什科托沃区应是渤海怀远府的组成部分。既然怀远府位于安远府东南，那么安远府



图一 渤海国行政区划图

就应该位于兴凯湖的西、西南部。不能忽略这样一事实，安远府的辖州包括郿州、慕州，郿州的郿与涓沱湖（兴凯湖）的涓，在汉字中相通。慕的语音与漠河的漠相通，漠河即滨海边疆区境内霍罗利区的梅利诺夫卡河。孙进己否认涓沱湖是兴凯湖，他认为涓沱湖是今查干泡湖。另一位中国研究者刘晓东认为，涓沱湖为今镜泊湖。孙正甲坚决不同意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涓沱湖是兴凯湖（参考文献 275，第 102—104 页）。

关于率宾府的所在地，学者中不存在分歧，他们一致认为率宾府位于吉林省绥芬河谷地（进入滨海边疆区称为拉兹多利纳亚河谷地），它的行政中心位于南—乌苏里斯克城址，即现今乌苏里斯克市的南部（参考文献 190，第 82—84 页）。

位于滨海边疆区境内的其他的渤海府的大致情况是，定理府位于龙泉府以东的虞娄部落所在地，不过，在分析安远府位置的问题上已经很清楚，安远府已经位于龙泉府的东部，故而定理府应该位于安远府东部，即毗邻兴凯湖东岸。定理府以南是安边府，它位于怀远府以北，显然，占据着现在的阿努钦诺区、切尔尼戈夫卡区。东平府位于拂涅部所在地，地处兴凯湖以北。引人注意的是，该府的下辖州中有的名称与一些水名相符，例如，伊州—伊曼河（今大乌苏尔卡河），比州—比金河，黑州（黑水）—穆梭河，从乌苏里江（参考文献 204，第 54—56 页）。所有这些只是证实一个事实，该府位于兴凯湖以北。

与东平府并排，分布着铁利府，该府辖有海州，按字面意识为海，故而，有理由认为，铁利府位于东平府以东，即滨海边疆区的长瓦列罗沃、达利涅戈尔斯克区境内，而不是以前推测的黑龙江下游（参考文献 197，第 60、61 页）。很难同意有些研究者的观点，这些研究者把铁利认定在今黑龙江省呼兰河谷地，那里至今有铁利县（参考文献 274，第 87、88 页）。完全可能，黑龙江省出现铁利地名应该与大武艺执政期间某一部分回纥部落融入渤海有关（参考文献 197，第 48 页），想必，其中包括特勒部落。起初特勒多半落户在今呼兰河流域，然而，公元 847 年叶尼塞河的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在灭亡了回纥汗国以后，针对跑到满洲的回纥部落派遣了七万骑兵加以追击（参考文献 201，第 87—89 页；文献 107，第 94 页）。结果，众所周知，特勒已经打着铁利的旗号被迫向东迁徙，到达滨海边疆区的沿海岸，并征服了当地部落。显然，从公元 830 年到 858 年期间，渤海王大彝震对其北部毗邻部

落实行侵略政策而由此获得了“袭王”称号，恰恰与这一事件有关（参考文献197，第53页）。

不排除一部分特勒部落在黠戛斯人的猛攻下，起初迁徙到滨海边疆区北部，然后通过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到达了雅库特。一个有趣的情况证明了特勒的这条迁徙路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回纥汗国灭亡以前，南西伯利亚是特勒部落居民的主要居住地之一。在南西伯利亚，迄今仍然存在着源自突厥的河名—尼曼河（参考文献69，第22、24页）。我们发现，在滨海地区，这种河名称作伊曼（今大乌苏尔卡河）；而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西北，布列亚河右岸支流有尼曼河。根据Э.К. 彼卡尔斯基的考证，雅库特南部的乌丘尔河谷地有地名和河名称为内曼（参考文献149）。联系上文所述，应该注意这一事实，在外贝加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南部，有相同的河流名称—基亚河。大概，这也反映了公元8—9世纪时期特勒部落迁徙路线的存在。

关于渤海郑颉府的位置，仍处于争议之中。孙进己把它界定在今长春地区，即渤海国的西部（参考文献274，第86页）。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郑颉府的名称实际上完全与莫曳皆部落的名称相符，该部落的故地应该是这个府的置地。不过，莫曳皆部落和其他一些较大的部落生活在渤海的北、东北部，即松花江、乌苏里江下游某地，有可能，位于滨海边疆区的捷尔涅伊区（参考文献197，第57页）。

至此，渤海的15个府中有9个府完全或部分地位于远东的南部地区，并且其中大多数府设置于这个或那个部落联盟的故地，而且有些府其中包括铁利府、郑颉府、率宾府还借用了部落自身的名称。虞娄部落的故地组建了两个府：定理府、安边府。安远府、怀远府建置于越喜部故地，东平府则置于拂涅故地。

其余的渤海府，其中包括京都不是按部落的地域特点建置的，而是分布于高句丽故地以及姆克利粟末靺鞨部落的主要居住地

区，即渤海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最发达地区。若这些府是渤海国的核心府的话，其余的府则属于渤海的外围府，渤海国的五京均位于核心府之中。从渤海的五京发端了渤海国连接外部世界一新罗、契丹、营州、日本以及中国唐朝的交通道。最后，核心府是主要的农业区和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区，大量定居于此的高句丽居民对渤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除了府和县，渤海国还有三个“独奏州”：郢州、铜州、涑州。其中，铜州的铜有“铜产品”的意思，其位于今苏密城（参考文献 274，第 84 页）。

至于地处现今滨海地区的府，则除了龙原府、率宾府外，属于渤海边陲地区的外围府，它们的组建时间较晚，这是渤海王朝侵略政策的结果。自然而然，与核心府的居民相比，外围府的居民其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处于更低的水平上，基于此，在较长时期里，他们保持着种族部落结构，不过，这并不妨碍渤海王朝利用部落的种族部落机构维护自己的利益。

文献史籍记载表明，核心府是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作为外围府，则是畜牧业、狩猎业、渔猎业地区。例如，隶属于显德府的铁州位城，以善于加工和生产铁而驰名；显州产麻布；卢州产稻米。南海府的沃州，其主要农产品是棉，南海府是海带的主要供应者。总的看来，丸都、乐游隶属于鸭绿府，产李、梨。栅城是渤海东京龙原府的治所，是驰名的鼓（乃鼓之误一译者）的生产中心。龙泉府的龙州，以产绸而驰名。铜的开采位于渤海的南部地区，即今北朝鲜境内。

至于渤海核心府以北、以东的外围府，它们是国家畜牧业、狩猎业发展的主要中心。其中，率宾府是最重要的马的产地，毗连绥芬河、拉兹多利纳亚河河谷平原的草原、森林草原景观适宜畜牧业的发展。在鄭颀府，养猪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夫余府居民的经济活动中，猎鹿占有重要的位置。生活在兴凯湖沿岸的居民，

从事捕鱼业，并且兴凯湖的鲫鱼拥有很大的需求量，这种需求，甚至包括渤海的境外地区（参考文献 197，第 63 页）。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居住在外围府的拂涅、越喜、铁利、黑水部落输往中国、日本等地作为交换物的产品种类，它们是虎皮、豹皮、貂皮、海豹皮、黑熊皮、棕熊皮、野狸皮、白兔皮、獾皮、犴皮、青鼠皮、银鼠皮，除了动物毛皮外，这些部落还向市场提供了苍鹰、鸽、鲸鱼睛、鲑鳟鱼、鲟、干文鱼、鲫鱼、人参、白附子根、松子、麝香、蜂蜜、螃蟹、水牛、雕羽、雉尾。黑水部还提供了这样一些商品：细麻布、六十综布、鸣镝（参考文献 197，第 63、64 页）。

综上所述，渤海人的经济大体上具有混和经济的特点。某些城市、州甚至于地区一些手工业、农业、狩猎业产品种类的生产，具有狭隘的专业性或专门化，这是渤海经济的独特性。国家的某些府甚至某些地区这种或那种产品的专门化的生产，可以解释为是地理因素，或历史形成的条件，渤海国形成以前，不同的姆克利部落便处于这种环境和条件之中。

例如，姆克利粟末部的阶级化进程，较之其他部落开始得比较早，进行得也比较激烈。毗邻高句丽这个阶级社会，粟末与高句丽、突厥、契丹以及其后的中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粟末部落原始公社关系的迅速瓦解和阶级的萌生，并最终产生了震国，后易名为渤海国。粟末部落的领地一直是最重要的农业区，到了渤海时代农业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渤海与外界联系的最重要的交通干线发端于这里；铁利部、越喜部、拂涅部及黑水部经由渤海的核心府实现了与中国、新罗、日本、突厥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全面发展；最后，公元 668 年中国灭亡高句丽以后，逃亡的高句丽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二家乡，他们为渤海

核心府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逃亡并定居于渤海的高句丽人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农耕者和手工业者。

至于渤海的外围府，它们并入渤海的时间比较晚，主要是大武艺（公元719—737年在位）、大仁秀（公元818—830年在位）执政时武力征讨的结果。同时，武力征讨追求的是完全具体的目的，从依附部落征收赋贡以扩大国库的来源。针对于类似的情况，马克思曾指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给被征服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参考文献121，第723、724页）。在这种情况下，归附于渤海王朝的各个部落，在一定时间内完全保持了它们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其固有的社会权利机构的生产关系。

大体上，渤海的核心府与外围府两种地区，由于定型的经济、政治条件形成了某些产品种类生产的专门化，这种专门化的生产产品大多不见于其他地区。所有这一切，自然而然，不能不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两种地区的逐渐一体化……。

第四节 渤海国的社会制度

研究者们给渤海国的社会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参考文献103，第22—36页），一部分人认为，渤海国存在封建制度（参考文献66，第290页；文献67，第85页；文献129，第16页；文献241，第88、91页）；一部人没有提出渤海社会具体发展阶段的特征，只是表明渤海存在封建制、奴隶制的经济（参考文献137，第200页；文献143，第342、343页）；另一部分人指出，渤海国与许多欧洲、非洲、亚洲的“早期国家”相似（参考文献84，第18页；文献85，第113页；文献114，第33、38页）。在唯一的

一部渤海史专著《渤海国及其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一书中，也认为渤海国与东方专制国家存在相似性，同时，补充道，渤海国存在封建制因素，以贡赋作为剥削的基本形式（参考文献197，第71、73页）。

通常习惯上把渤海国的建立和公元698年大祚荣宣告震国王朝成立，大祚荣就任王位联系在一起，原则上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必须提出的是，宣告王朝成立首先是法律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在政治上变换旧的政权机构。社会制度进化这种质的飞跃，可能产生于大祚荣就任王位以前，也可能是在其后。

上文已经说过，渤海居民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各种酋长，其中大的村里的首领称都督，其次是刺史，小的村里的首领即称首领，他们管理着普通民众。

从极其贫乏的文献记载中能够获取的信息可以归结为：第一，渤海人的“村里”有不同的规模，大概，史书的编撰者用“村里”这一术语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居民点：无防御设施的村落、有防御设施的居民点“城”（城市雏形？）；第二，社会划分为两个基本阶层：被统治者（普通民众）、统治者（酋长）；第三，官职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依据于各自管辖的社会职责。

除此之外，大祚荣执政时期军人是从民众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制度，文献记载，经营户数超过10万户，军队超过1万人（参考文献197，第47页），换句话说，每10户摊得一名军人。当然，这一数字应该谨慎看待，但应想到它们毕竟反映了这种趋向。

Э.В.沙弗库诺夫曾谈到自己的推测，刺史和都督是“王朝政权在地方的官方代表”（参考文献197，第58页）。不过，另一种解释看来更准确一些，它依据的是文献史籍中有关黑水部的记载：“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参考文献48，第19页；文献120，第42页；文献197，第49页）。从援引的片断得出结论，史书编撰者使用两个术语都督和刺史，用以区别地方首领的不同等级，这种等级区别依据于首领们

的权力、威望、管辖的社会机构的规模。显然，这一结论适用于渤海人。中国授予渤海人的官职反映了传统贵族的不同等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是国家机构。况且，正如Э.В.沙弗库诺夫指出的，渤海“早期阶段，尚不特别需要复杂的行政官吏机构”（参考文献197，第57、58页）。

这样，如果概括上文所述，则可以认为，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渤海王朝是一个劳动分工过于狭窄、政权制度化、社会分化、财富不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直接的生产者已经无缘于管理机构，不过尚缺少稳固的内部剥削制度，但适当地确立了专门的强制制度。只是军队分立出来，具有独特的战时掠夺制度。

渤海人早期国家的形成，很显然，是在大钦茂执政时期。遗憾的是，缺乏证明国家产生的绝对准则。恩格斯把国家体制的产生与纳税、脱离民众的公共政权、按照地域特征划分居民点等情况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参考文献122，第170—172页）。不过，正如当代研究所展示的，在热带非洲的许多国家里，地域划分的原则从未占据优势。纳税（这里的意思是纵向重新分配剩余产品）的出现，尚是国家体制形成久远以前的事。最后，在许多国家形成以前的政体中（古代苏美尔人的行省、西欧的野蛮国家、东部非洲的原始国家等等），公共政权、社会的管理已经脱离了直接的生产者。另外，不同于国家形成以前的政体，早期阶级社会的管理制度中还出现了一种职能，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制度，看来，这是主要的差异之一。

按照И.泽里诺夫的观点，只有政治制度完全脱离了平民群众，成为范围有限的体系，政权机构稳固而不可逆转时，才可以证明国家的存在（参考文献315，第39—40页）。H.J.M.克拉埃森和P.斯卡尼科描述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机构，其中，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者征收赋税以维持自己作为权威者、权力、恫吓力力量的统治，而且这些关系的合理性是奉为准则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参考文献310，第21

页；文献 311，第 639 页；文献 312，第 490 页；文献 44，第 40—49 页；文献 94，第 91 页；文献 102，第 14—17 页；文献 106）。国内、国外许多从事文明起源研究的考古学家描述的国家、阶级社会的特征是，雄伟的祭祀建筑、城市、文字、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社会层次化（参考文献 127；文献 128，第 50 页；文献 168，第 82—83 页；文献 144、145、186；文献 314，第 3—7 页）。不能不同意 M. C. 瓦西里耶夫的观点，他写道，国家形成以前的政体与早期国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实际上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要知道这是一个进程的对立面（参考文献 44，第 44、45、50 页）。渤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阶级、国家形成的时间及如何发生的已经无法确定，总的看来，从大钦茂执政开始，这一进程最为激化，到公元 8 世纪末时，早期国家制度的最终形式已经结束了。大量事实有利于说明这一点，第一，作为考古学的标准，如都市化、雄伟的祭祀建筑、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以及文字；第二，表示直接生产者的术语的变化，由“百姓”到“部曲”，间接证明了剥削制度的存在；第三，大钦茂执政期间进行了行政设施的改革；最后，即第四，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国家机构的确立，它超越了氏族公社的行政机构。

渤海的国家机构由左、右相府构成，它们相应地由左、右相及其助手主持。左相府由忠、仁、义三部，爵、仓、膳三司构成。右相府由智、礼、信三部，戒、计、水三司构成。“左相府制订计划，处理日常事务；右相府修记王言、历史事实、申诉军事”（参考文献 55，第 72 页）。大概，这些事务属于部的职责范围，司的职权归结为征税，集中、保存、重新分配（其中包括出售）各种形式的剩余产品，担负社会机构工作：外贸、军事等等。

区域（府）、地方（县）的行政机构不同于非氏族公社性质的高层官僚制度，显然，它们是建立在氏族关系基础上的。首领负责征收部落或村社委托给他们的赋税，呈报给刺史。刺史负责认真地处理委托给他的州的赋税，同样地，刺史呈报给都督，即府

的长官。都督除了其他的公务职责外，还要负责“本府”的贡赋。

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军队被划分成独立于民众的制度。渤海的军队由一些分队组成，称为“卫”。文献史籍传达给我们一些它们的名称：熊卫、黑卫、南左卫、南右卫、北左卫、北右卫，每“卫”由大将军、将军统领（参考文献 197，第 172 页）。

渤海王朝的社会机构具有明显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国王为首，多半，国王的手中集中了全部权务，他是巨大的民族政治结构的一官之长，国家决定的终裁者，“王命如法，非允莫行”（参考文献 129，第 17 页）。可见，统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以何种方式转让政权不十分明确，除了多数情况下是由儿子继承父亲的王位外，有些情况是哥哥把政权转给弟弟，叔叔传给侄儿，不排除后一种情况与王权的衰落以及宫廷倾轧有关（参考文献 197，第 52—53 页）。不过，十分明确的是，王位的继承权只限定于最高统治者最近的亲戚。文献载：“其王旧以大为姓”（参考文献 241，第 88 页；文献 290，卷 1，第 53 页正面；文献 77，第 335 页）。

多半，国王最亲近的亲戚在朝廷中担任着最高层最重要的职务。例如，统帅前往黑水部军队的依次为大武艺的兄弟门艺、壹夏（参考文献 55，第 49 页）。众所周知，国王的父亲称老王，母亲称太妃，妻子称贵妃，长子叫副王（参考文献 143，第 343 页）。有趣的是，高句丽人中存在类似的，国王最亲近的亲属分享特殊封号的习俗。

地位低一等级的是一些最著名姓氏的贵族，如叶隆礼所言：“右姓曰高、张、杨、窦、乌、李，不过数种”（参考文献 77，第 335 页）。

渤海国的初期阶段，所有居民分为贵族（酋长）、普通的村社成员（百姓）。管理机构尚不发达，行政岗位的数量有限，显赫姓氏的贵族代表（显然，他们是酋长）从事管理机构的工作。

随着王朝的拓展以及依靠征服其他民族而造成的国人数量的

增多，建立复杂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新的贵族阶层——官宦贵族开始形成，“六姓”以外的部落上层人物、与管理土地无关的人、以及因个人功劳达到很高地位的军人可以进入官宦贵族阶层。此外，还包括国王委任的非贵族阶层成员，他们可以是渤海人也可以是外族人，他们可能是国王最亲近的仆从，也可能是依附于国王进入朝廷的外族贵族。

编年史中，提及许多官宦贵族的姓氏，王承礼挑选出49个姓氏，其中大部分是靺鞨人，除此之外，见有汉人、高句丽人、新罗人姓氏（参考文献241，第88—89页）。

遗憾的是，文献中缺少世袭贵族、官宦贵族相互关系的记载。如果按照比较史学材料来加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明显对立的，并且，王朝政权通过支持官宦贵族可以削弱世袭贵族的阻碍，适宜于促进中央王权的稳固。不过，针对渤海而言，这种趋向只能视为假说，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相反，形成的印象是，渤海的高层贵族把管理机构的关键职务集中在自己手中，把官宦贵族排挤次要位置上（参考文献197，第69页；文献241，第88页）。

渤海逐渐形成了八个等级的官僚政治机构的等级制度，“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参考文献197，第72页）。

显然，贵族只是构成了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而官宦贵族有转变成特殊的社会力量——官吏的趋向，即“国家公职的全部官吏，在等级制度上处于一定的严格的地位，拥有自己地位的正式标志—官职、等级”（参考文献46，第220页）。

除了官宦贵族，官吏可能产生于地方首领、副首领这些不属于官宦贵族的人之中，以及没有显赫出身的人、部分普通的村民。

通过文献史籍能够划分出渤海人中存在两种直接的生产者，不过他们的依附性和承受的具体的剥削形式尚不明确。

《渤海国志长编》记载：“皆从其主的各种部曲、奴婢无姓者数不胜数”（参考文献 290，卷 26，第 53 页正面）。其他史籍中有类似的记载：“部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参考文献 77，第 355 页；文献 241，第 88 页）。

“部曲”一词源自中国，起初，该词的原意是指古代中国军事组织的名称。从公元一千纪中叶开始，大的贵族组成的私人军队中的村民称为“部曲”。他们从事农耕，并有义务参加纠纷以维护贵族的庄园财富。到了唐朝，“部曲”成为完全处于依赖地位的阶层的称谓，成为所有物。他们的地位沿袭给后代，有家庭，财产，从事份地耕作，但份地不允许变成买卖的客体（参考文献 95，第 13—14 页；文献 96，第 72 页）。

因此，“部曲”一词，王承礼认为是“指处于各种各样封建依附状态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说的”（参考文献 241，第 90 页）。其他一些研究者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渤海国存在封建制或封建方式（参考文献 66，第 290 页；文献 67，第 85 页；文献 137，第 200 页；文献 143，第 342—343 页）。然而，正如 Θ .B. 沙弗库诺夫注意到的，“部曲”并没有完全相符地反映出被描述阶层的社会地位。“部曲”一词被采用只是由于被评述者同中国的“部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对于中国人来讲，“部曲”最适宜也最容易理解）。正如 Θ .B. 沙弗库诺夫推测的，这部分人“显然，是种族部落联盟的成员，自由的村社成员，以及处于各种封建附属关系地位的手工业者、农民”（参考文献 197，第 70 页）。问题在于，大多数渤海王确立的府、州地处王朝的外围，它们成为渤海国的组成部分是大武艺、大仁秀执政期间推行侵略政策的结果。自然而然，在这些府中形成了早期阶级关系。一般，以前的“部落”联盟的中心，相对于渤海中心地区而言，十分落后，外围府的主要剥削形式是纳贡赋。基于这一原因，在评述北部、东北部诸府州的居民时，视其为封建附属农民是不可行的。

除此之外，董万峯认为，大仁秀执政期间，并入渤海的白山

部，全部隶属于王朝，成为“编户”（参考文献 255，第 62 页），换句话说对他们推行的是国有制而不是封建制的剥削关系。

“奴婢”译自中文，即奴隶。按照王承礼的意见，“是被封建主占有，毫无人身自由的男女奴隶”（参考文献 241，第 90 页）。Э.В.沙弗库诺夫认为，渤海人中存在的奴隶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在生产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 197，第 70 页）。看来，应该同意这种观点，要知道，所有关于奴婢的记载，通常只限于在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列举他们的人数（参考文献 197、241）。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方面有赖于更加充分地揭示已有的文献资料，对文献加以批评分析，同时与中世纪早期阶段中国、朝鲜非自由阶层居民加以对照比较。除此之外，把所有剥削方式只是想象地简化为奴隶制与封建依附性是不合理的。多半，“奴婢”应该理解成为广泛的非自由阶层：从没有充分享受权力的依附村民到奴隶本身。他们同国家农民“部曲”的主要差异在于，剥削他们的主体不是国家（或不仅仅是国家）而是某些个人：皇族成员、高层贵族、官宦贵族、富有的村民等等。

综上所述，渤海社会初期阶段分为两个基本的社会群体：统治者（酋长，包括皇族）、被统治者（民众）。约从 8 世纪起，社会结构开始有更复杂的等级制度：国王及皇族——官吏——直接生产者。直接生产者由部族村民（“部曲”）和各种依附种类阶层（“奴婢”）构成。

第二章 滨海地区的渤海文化 考古遗存及其评述

第一节 关于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分类

目前，在滨海地区发现了 55 处含有渤海时期堆积的考古遗存，并且已知有 10 种考古学集合和这一时期的一些偶然发现。滨海边疆区境内渤海遗存的分布，北起基洛夫斯克地区，南到哈桑地区，东起日本海海岸，西到中国边境（图二）。滨海地区渤海时期遗存的实际数量应当更多一些，因为有关渤海遗存的研究开展的比较晚，研究地域也未遍及滨海地区全境。对滨海地区的全境，尚未进行过旨在揭示考古遗存的全面考察。

已知的渤海遗存的研究程度也远不一致，尚没有一处遗存经历过全面的发掘，对 14 处遗存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其余的遗存则只是进行了钻探、清理暴露出来的文化层以及地表采集。大部分的渤海遗存已经确定了大致的分布范围与地理位置，据此可以对它们进行类型学的分类。

目前，对渤海遗存还没有进行过细致的分类研究。Э.В. 沙弗库诺夫在论述滨海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分期、分类的著作中，对渤海遗存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他把渤海遗存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分布于河流谷地的城址，第二种类型是位于山岗之上的城址，第三种类型是不大的没有筑城工事设施的宗教中心。依据于分析考古学考察材料，Э.В. 沙弗库诺夫认为，谷地城址属于行政中心，山地城址是渤海国的商业手工业中心，第三种类型是佛教

用考古学的鉴定要素，即手工业生产客体，雄伟的建筑，住房和日常活动建筑，建筑平面，文化层厚度等等作为评定遗存社会经济意义和遗存延续时间的辅助特征，并且利用自然科学手段揭示遗存的经济活动趋向。

综上所述，只是一些通过初步考察遗存可以认识的因素成为遗存分类的基础，在大多数遗存上不可能见到绝大多数的辅助特征，因为它们只能出现于考古发掘过程中。

滨海地区 8—10 世纪时期的遗存应该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城址、村落址、墓地。

第二节 城址与村落址

所有已知的遗存多分布于河流、大河支流、湖泊、旧河床、海岸附近，这样的遗存约占渤海时期遗存的 89%，按照遗存的地形地貌，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基本组群。

1. 地处河流谷地、海岸高耸地段的遗址，该类遗址约占遗址总量的 66%。

2. 位于突出于谷地的山岬之上或河流谷地孤立的山岗之上的遗址，以及洞穴遗址。

上述两个基本组群的所有遗址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带有防御设施的城址、不带防御设施的村落址。

按照地理位置和规模带有防御设施的城址可以分为三类：谷地城址、山城、不大的山地城堡。每一类遗址中在内部面积规模方面有明显的波动，在筑城工事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特征可以揭示谷地城堡、山地城堡类型。

谷地城址 谷地城址沿河岸或海岸分布，其形状和这样或那样的几何形轮廓相似，多半呈长方形或方形。城址的位置选择在河谷中汛期不至于被淹没的高耸地段，濒临难以逾越的天然防御

屏障（河流、河流交汇处、支流、湖泊、旧河床），以加强防御且避免修建高高的防御城墙。

按照筑城工事设施的复杂性和高度，有必要把谷地城址分为两种小型。

谷地城址的第一种类型，带有普通的防御体系的城址，如地处伊利斯塔亚河谷地的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维索科耶城址；位于拉兹多利纳亚河谷地的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位于埃克斯佩季齐亚湾楚卡诺夫卡河入海口海岸上的克拉斯基诺城址。所有这些城址均坐落在滨海边疆区南部地势最平坦的地区，城址的面积不大，一般 3.6 公顷—6.9 公顷，只有克拉斯基诺城址的面积达到 13 公顷。城墙不高，1 米—2 米—3 米，土筑，里面夹杂有河卵石层（参考文献 224，第 20 页，图四）。抑或是用石块垒砌墙体的内外面。

并不是所有的城址的四周都环绕有城墙，维索科耶城址东临湖岸，城的这一地段湖水屏障发挥了城墙的功能（图三，3）。同样的情况见于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的防御体系中，该城址的东北部地段凭借宽阔的旧河床进行防御。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的南角因有沼泽河泛地，此处的城墙高度只有 0.5 米，土筑。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在城墙的外面修筑了土筑的辅助城墙，以增加城市防卫的可靠性。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的东南部地段（图三，1）、维索科耶城址的东北角（图三，3）修筑有这样的城墙。在维索科耶城址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的辅助防御设施，短的侧面城墙，其长度 25 米—35 米，侧向突出于北墙。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在防御最薄弱的地段还环绕有濠沟，濠沟严重塌落，现深不超过 1 米，宽 2 米—3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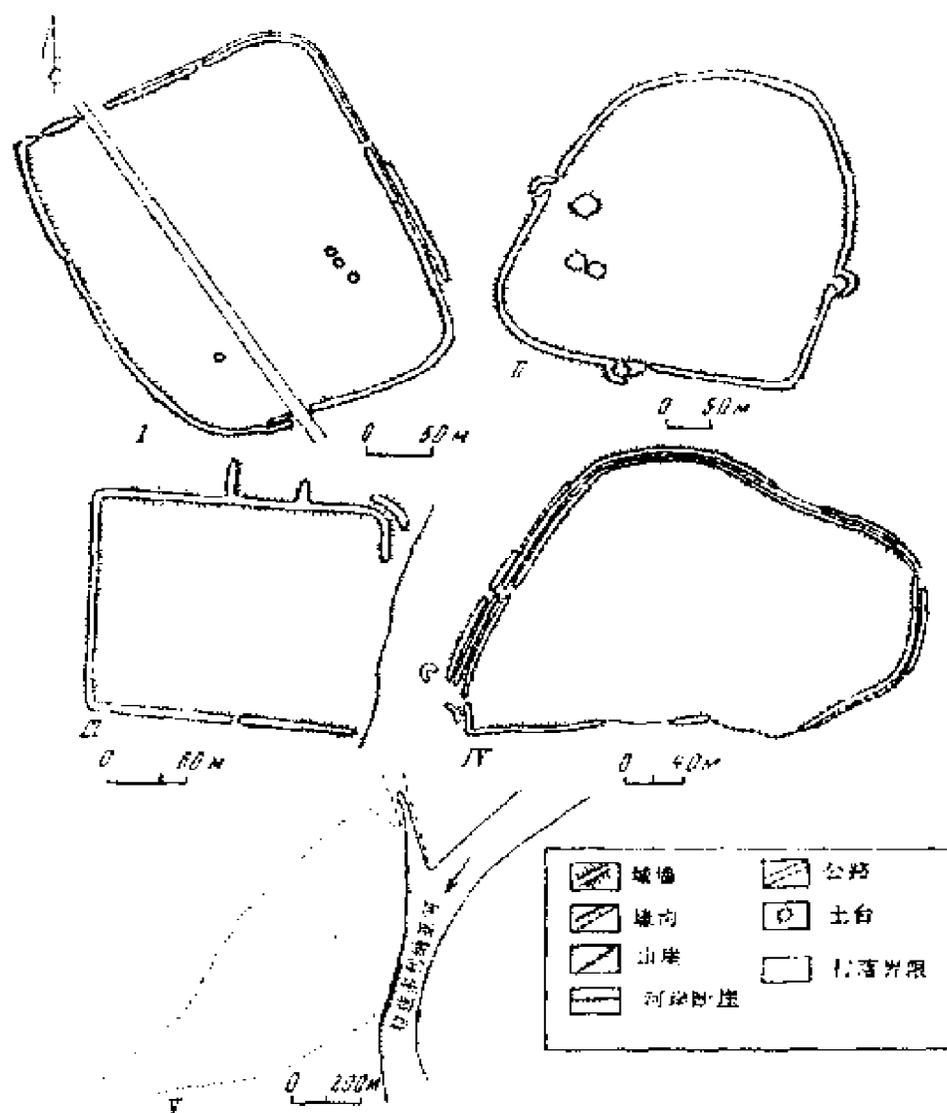
城门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维索科耶城址仅在南面设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南、西两面设门；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在

南、东北面各设一门；克拉斯基诺城址南、东、西三面设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四面均设门（图三，1、2）。一种情况是，城门直接辟于城墙之上，如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维索科耶城址的城门；而另外一种情况下，城门外用不同的筑城工事设施进行补充防御。例如，城门处补充有平行于主城墙的辅助城墙，这种情况见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的东北门；有的城门具有更重要的防御体系，对着城门的内外两侧修筑有不高的彼此平行的土筑墙，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的东北门以这种方式进行防御。克拉斯基诺城址的城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的东南门用 Γ 形或弓形墙进行防御，这样的墙体改变了主城墙方向，在城门前环绕出一块不大的空间。

城址的内部设施和它们的布局，即使是用工具测量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弄清楚的也只是其大致轮廓。例如，沿着克拉斯基诺城址中线观察出地势偏低，而且，这种迹象宽达 30 米，从南城门贯穿到北城墙，显然这是街道。它把城址分为两半：东部和西部。在城址的西半部见有四个接近长方形的土台，城址的西北部地区地势要高出其他地段 2 米—3 米。克拉斯基诺城址的整个内部布局与满洲东京城渤海上京址相似（参考文献 136，第 203 页）。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的残存部分，其东南角有一个高 1 米的椭圆形平面的高台，规格为 15 米×30 米，而在城址的北半部分观察到一段通往河床河岸的筑堤，规格 15 米×75 米。

在其他的城址中，肉眼观察不到这么全面的情况，因为城内的地表均已辟为耕地。只是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克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城墙附近，观察到不高的石堆，高 0.6 米，这些石堆的形成，显然是后世清理耕地地表的结果。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进行过广泛的发掘，而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只发掘了不大的面积。这些发掘得以揭示这些城址存在的年代跨度，弄清



图三 渤海遗迹平面图

- I. 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城址 II. 克拉斯基诺城址 III. 维索科耶城址
 IV. 奥特拉德涅斯克城址 V.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

了它们的建筑平面，在某种情况下，它们牵扯到渤海文化在滨海地区存在的历史时期。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考察了城址的西北部、东北部、中部。总共揭露了1511平方米的文化层，占城址面积的3.7%。城

址是单层堆积，区分出两个建筑时期，下层建筑平面断代为 8—9 世纪上半期，上层建筑平面断代为 9 世纪下半期至 10 世纪，即分属渤海文化的早、晚阶段。文化层的厚度证明了该城址存在的长期性，有些地方文化层厚达 2 米—3 米。在下层建筑平面，清理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冶炼坑遗迹，同时，观察到该平面较高的建筑密度。在上层建筑平面，除了房址，揭露了生产设施遗迹。生产设施遗迹多半位于城址的东北部地区，其中包括冶炼作坊遗迹，冶铁窑和锻铁炉。通过分析考古学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的早期居民主要从事耕作业和各种猎取业，以及饲养业和狩猎业，晚期阶段城市成为手工业中心，其他方面姑且不论，城市居民开始从事冶炼业，冶炼和加工金属。

获得了有关克拉斯基诺城址的有趣的信息，这是滨海地区为数不多的中世纪遗存之一，还是在 1871 年，帕拉季·卡法罗夫足够准确地把它断代为滨海地区渤海文化存在时期的遗存。И. 卡法罗夫“根据掌握的古代文献史料，……提出一种想法，这座城址是古代的渤海国的带有防御设施的海港遗迹”（参考文献 197，第 94 页）。1960 年，Э. В. 沙弗库诺夫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城址，根据收集到的材料，证明了城址的断代是正确的，通过分析文献史料，他认为克拉斯基诺城址“是渤海的盐州治所遗迹”，同时它是实现渤海与日本交往的海港（参考文献 197，第 94 页）。

80 年代初期，在克拉斯基诺城址的西北部城区发掘了佛教寺庙址，距寺庙址不远发掘了制瓦窑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材料，印证了在此之前 Э. В. 沙弗库诺夫提出的该城始建于 9 世纪的观点（参考文献 197，第 108 页）。发掘结果也认同了该城址是一处行政中心的观点，它的面积为 13 公顷，明显区别于同时期的其他城址。同时，克拉斯基诺城址的筑城工事特别是城门前的防御结构体系与渤海上京相似（参考文献 197，第 108 页）。而且，克拉斯基诺城址位于埃克斯佩季齐亚湾岸边，这种地理位置本身也证

明了其作为港口城市的功能。因为除了克拉斯基诺城址，在海岸线上不见其他的城址。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克拉斯基诺城址不仅是行政中心、港口，而且是手工业中心。至少，发掘结果证明，该城址制作了大量的屋顶瓦。

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的大部分区域为拉兹多利纳亚河河水所侵蚀，在残存城区内，有三处地点进行了不大的约 250 平方米的发掘，它们是靠近河岸的西部地段、南部的城墙附近、东北城门附近，清理出两层建筑平面。在上层建筑平面发现了带炕以及石台阶的地面式房址，在下层建筑平面发现了包含有动物骨骸和轮制陶器的灰坑，该城址被断代为 9—10 世纪（参考文献 224，第 16 页）。在城址靠近河岸地段发现了 12 级石阶，通过分析城址中收集到的人工制品，可以认定该城址的居民从事耕作业和饲养业。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南门附近进行了不大的发掘，表明该城址存在两种文化堆积，主要是渤海堆积。在东北部发掘区的生土面上见有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房址遗迹，渤海时期的文化层情况与上文所述遗存大体相同。

该城址揭露了两处窑洞址和一些灰坑，出土了骨器、金属器、陶器，采集到许多动物骨骸、鱼骨、贝壳。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居民从事饲养业、狩猎业和捕鱼业。城址被断代为 8—10 世纪。

在维索科耶城址，地表采集材料和钻探结果表明，可以把该城址断代为 8—10 世纪。和其他的城址一样，在维索科耶城址的文化层中见有许多动物骨骸、鱼骨、贝壳。在湖岸的文化层断面中采集到大量的带有造渣的陶器和炼渣，显然，该城的这部分城区分布有某种生产集合，该集合与金属加工有关。

综上所述，在滨海边疆区境内揭示了较全面的一组城址类型，它们可以明确地断代为渤海时期。这组城址的特点是，具有不高的城墙，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层较厚表明，这些城址延续使用

的时间较长。这些城址被区分出两层建筑平面，并且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 8 世纪。考古发掘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得以更加准确地确定这些城址的功能用途。大部分城址可以认定是手工业—耕作业遗址，不过，克拉斯基诺城址是盐州的行政中心，隶属于渤海东京，是海港和大型商业—手工业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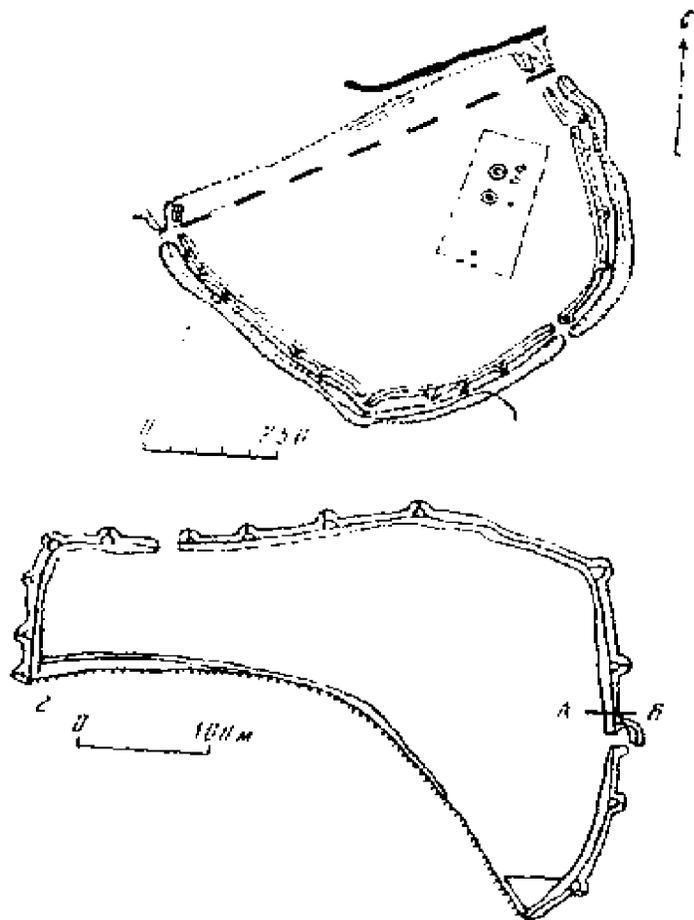
谷地城址的第二种类型包括八座城址，它们是，坐落在拉兹多利纳亚河谷地的南乌苏里斯克城址；位于什科托夫卡河谷地的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地处帕尔季赞斯卡亚河谷地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位于伊利斯塔亚河谷地的戈尔巴特科夫斯克城址；以及乌苏里江谷地的丘古耶夫斯克城址、科克萨罗夫卡 1 号城址、科克萨罗夫卡 2 号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这些城址的地理区域分布较为广阔，不仅仅见于滨海地区的南部，也见于滨海地区的中部。所有这些城址均为双层文化堆积，即公元 12 世纪时期女真人对城进行了明显的改建，基于此城址变得更加牢固，筑城工事更加趋于统一。城的防御城墙凸起，墙体的倾斜角为 45 度。墙体增高，高度达到 4 米—10 米。同时，墙体加宽，墙体的基础部分宽达 25 米。在研究该类型城址时发现，城墙的防御体系中见有外凸的军事塔楼（即我们称之为的马面——译者），它成为该类城址城市建筑的一个特点。各面城墙上塔楼的数量有所不同，在科克萨罗夫卡 1 号城址，只是在城址的西墙上见有一个塔楼；在科克萨罗夫卡 2 号城址，在其东北城墙的城门附近有两个塔楼；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丘古耶夫斯克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的防御体系中见有 12—14 个塔楼，这些塔楼的间距大致相等，一般为 60 米—80 米，有的为 40 米。

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的西北界以帕尔季赞斯卡亚河陡岸作为屏障，因为该处没有见到筑城工事（图四，1）。不过，由于城址濒临河岸的这部分地界的中部地段，地势较低，因此，在这一地区修筑了一段 3.25 米高的土墙。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也存在类似

的情况，该城址的南面濒临宽阔、纵深的旧河床河岸。城址的这

一地段只是沿着河岸修建了 0.5 米—1 米高的土墙（图四、2）。

对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南乌苏里斯克城址、丘古耶夫斯克城址的城墙进行了解剖，判明这些城址的城墙曾经修筑过两次。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初期阶段的城墙高度为 2.4 米，后来，它的高度增加到 4 米。古老的城墙是用黄土掺杂碎石子和小石块修筑而成，墙体表面用大石块垒砌饰面。底部的墙体修筑于渤海时期，用浅灰粘土夹杂砂土修建的墙体，墙体中见有渤海时期的陶片（参考文献 235，第 63



图四 渤海遗迹平面图

1. 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
2.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

页)。南乌苏里斯克城址，辟有 6 米的剖面，非常清楚地划分出两个部分。早期墙体的高度约为 4 米，是用黑色的岩层土修筑而成，晚期女真时期修筑的墙体使用了另外的材料，是用黄粘土夹层对墙体进行了增高加宽。在上下层墙体之间，见有瓦类夹层，由此证明，早期城墙的上面饰有瓦檐（参考文献 80，第 275 页）。在丘古耶夫斯克城址，也发现了两个建筑时期的墙体（参考文献 227，

第10页)。

该类型的谷地城址大多环绕有濠沟，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的濠沟宽20米—25米，深3米—4米(参考文献196，第287页)；科克萨罗夫卡1号城址的濠沟深1米—2米，宽5米—7米。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科克萨罗夫卡2号城址情况特殊，由于城址濒临旧河床、支流、沼泽地带，这些天然屏障发挥了濠沟的作用。

在城门前观察到相同方式的防御设施，城门前有拱形或“Г”形的土筑护墙掩体，城门入口处地势略微抬高。

该类城址的面积存在明显的差异，面积不大的一组城址，面积3公顷—9公顷，如丘古耶夫斯克城址、科克萨罗夫卡2号城址、戈尔巴特科夫斯克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另一组城址面积很大，16.5公顷—68公顷，如科克萨罗夫卡1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南乌苏里斯克城址。这些城址大部分的内部布局在女真时期进行了明显的改建，同时，现在城内已被辟为耕地。

南乌苏里斯克城址是当时最大的城址，城内发现有不深的凹坑形的建筑址遗迹，并见有用青砖垒砌的牢固的建筑址基座。基座内散见较多的瓦，它们是建筑物的房顶瓦残片。各个基座的规格有所不同，面积最大的达190平方米、350平方米，面积最小的不足2平方米(参考文献183，第11—12页)。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东部城区内观察到一个面积约785平方米的内城遗址，内城修筑有不高的土墙，高度约1米左右。内城的形状呈长方形，方向略偏离正方向。“禁城”的城门位于南面，城内有完整的土台综合体和建筑基址，它们按南北轴线分两排排列，地表散见大量的破碎砖瓦。内城城门往里北向30米处，还有一处对着城门的建筑址基座土台遗迹。防御城墙内侧见有一条几乎环绕一周的濠沟，沟宽3米—4米，有些地方沟的宽度达到15米，沟的深度0.2米—1.7米(参考文献196，第287—288页)。

在科克萨罗夫卡 1 号城址内，在距其北门不远处也发现了一处长方形的略微隆起的平台，规格 50 米×70 米，平台环绕有不高的墙体，东面的墙体上见有一个豁口。过去，在城址里曾发现有 5 段不高的横向城墙（参考文献 47，第 62 页）。

在其他城址中，建筑址的外在标志差不多全已毁于耕地，只有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保存有内部濠沟遗迹，同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一样，濠沟是修筑防御城墙时形成的。在丘古耶夫斯克城址城区的西北角处，见有一处古井遗迹，井壁石块垒砌而成（参考文献 83，第 297 页）。

第二种类型的谷地城址所开展的研究工作较少，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进行了不大面积的发掘，其他的城址则只是进行了钻探、清理已暴露的文化层以及地表调查。

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西南部城区发掘所获得的成果表明，该城址存在两种文化堆积，在厚 20 厘米—30 厘米的耕土层中见有 11—12 世纪的女真遗物；其下叠压着 8—10 世纪时期的渤海文化堆积，它是城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堆积厚达 100 厘米，为腐质土质，有些地方耕土层下有砂土层夹层。在腐质土层中，见有涂料晶状体、草木灰、木炭。在生土面上保存有半地穴式房址的基面，这些基坑南北向成排分布，揭露了三座房址和一些灰坑。在渤海文化层的上半部分，见有一些规模较大的草木灰圈和烧炼过的涂料堆积。草木灰圈附近见有坩锅残块、熔渣、造渣容器的器片。大体上渤海时期堆积揭示出两层建筑平面，下层建筑平面见有半地穴式房址和灰坑，上层建筑平面见有生产用途设施址（参考文献 163，第 8 页）。发掘材料使我们得以确定该城址 8—10 世纪时期居民的职业，他们的经济是综合性的，人们从事耕作业、饲养业、狩猎业、捕鱼业、手工业。晚期的渤海建筑平面表明，此期的城市开始成为制作陶器、生产金属制品的手工业中心。

在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揭露了两座带炕的房址，还有一些灰坑。该城址也存在两种文化堆积：女真文化堆积、渤海文化堆积。除此之外，该城址地表采集遗物中见有扬科夫斯基文化陶器，由此证明这里存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大体上，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的地层情况与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属于同一类型。在上部耕土层中见有12世纪时期的铜钱和陶器（参考文献233，第22页）。8—10世纪时期的文化堆积厚度超过1米，出土有陶器、动物骨骸、禽骨、鱼骨、软体动物贝壳。通过这些实物资料，使我们得以认定这座城址曾是手工业、行政中心。

在丘古耶夫斯克城址，见到了类似的地层情况，该城址上部耕土层的厚度达到30厘米，其中包含有12世纪的女真遗物，如管状口沿的轮制陶器、瓦、北宋铜钱等等。耕土层下存在一层5厘米—10厘米厚的夹层。夹层下叠压厚厚的渤海时期文化层，厚达60厘米。渤海堆积中见有半地穴式房址，房址填土中常常见有烧土、大量的骨骸、陶器。陶器上常常装饰有维夫饼干式纹饰（参考文献227，第11页）。这样的陶器也见于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发掘了内城的拱形正门，获得的材料使我们得出结论，“禁城”存在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女真人时期，是佛教寺庙的庙宇综合体（参考文献16，第293页）。该城址上层文化堆积较薄，鲜见遗物。总之，该城址有多层堆积，有很厚的渤海堆积层，但最底层堆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参考文献227，第20页）。

19世纪下半期，帕拉季·卡法罗夫考察了南乌苏里斯克城址，他认为该城址属于渤海时期。一些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城址是渤海国府的治所，或许是率宾府（参考文献137，第198页；文献197，第97页）。

正如考古学研究所展示的，第二种类型的谷地城址沿续存在

了较长的时期，即从 8 世纪沿用到 12 世纪初期。渤海之后这些城址的筑城工事得到了改建，增高了墙体，出现了防御塔楼，城内布局出现了新的设施。

这些城址在其使用的整个期限中没有发生改变的，显然是它们功能的定向性。一些城址始终是手工业—农业的中心，如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科克萨罗夫卡 2 号城址、戈尔巴特科夫斯克城址；另有一些城址则是渤海国府、县的行政中心，如南乌苏里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科克萨罗夫卡 1 号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可能，还有丘古耶夫斯克城址。

滨海地区的渤海国县的辖区范围，显然，有非常明确的地域界限，它们以地形地貌作为分界标志，即河谷之间的分水岭应该是县区的分界线。河谷地带是县的辖区，县的治所通常位于河的中游地区，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址、丘古耶夫斯克城址。

谷地城址应该是城市类型的居住地，它们规模大，有较好的防御设施。生产设施通常位于城区的一端，这一点可能是由于选择手工业作坊区所决定的。

山地城址 山地城址约占遗存总数的 33%，山城的结构布局非常多样化，它们完全取决于地形地貌，城址的形状常常依据于山岬或丘岗的轮廓线，但有圆形轮廓的趋向。利用地形作为军事目的需要，影响了山城城址位置的选择。山城地处山林地带、山地森林之间，较之谷地城址地势更加难以逾越。

为了区分出山城的普通特征和独特性，目前已知的所有山城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占据山岬的城址；另一种是座落在谷地中孤零丘岗之上的城址。

第一种岬地城址，它们占据着突出于谷地且与山峦连为一体的山岬，此类城址均选择险峻的高岬作为城址的位置，这种地势是重要的防御屏障。现在，在此类城址防御最薄弱的地方，即山

岬与山脉相接的鞍部，见有土筑的防御设施遗迹。完全可能，古代的时候山城四周曾经环绕有某些防御设施，因为缓坡地段以天然屏障作为防御设施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否存在这样的设施，只有借助于发掘才能揭示清楚。

例如，在发掘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西端城区时，沿着陡坡在生土层上揭示出两排柱坑，显然城址的这部分地段曾修建有防御性的木骨泥墙。许多城墙修筑有三道防御城墙，通常，它们呈拱形，并且内侧城墙最高。一般外墙高度不超过1米，中墙高1.5米，而内墙高度达到2米—3米。城墙防御设施的这种轮廓和结构，能够做到视野开阔，更有效地防御。城址中防御不十分薄弱的地段，修筑了一道或两道城墙，如奥特拉德涅斯克城址、莫诺马霍夫斯克城址。城墙的墙体土石混筑，在岬部未发现墙体。

在防御体系中，城址一般设有1—3个城门出口，城门多修建于地势最缓一面。有些城址城门处修筑有三道防御城墙，奥特拉德涅斯克城址的西南门有更复杂的防御体系，古代道路从两个方向进入城中，在城墙主要防御体系前修建有土筑的堡垒（图三，4）。在莫诺马霍夫斯克城址，通往南城门的古代道路，用脱离主要防御体系的0.5米高的墙体隔断于缓坡的山岗。在难以逾越的险要地段开设的城门，城门只是简单地辟于防御城墙之上，莫诺马霍夫斯克城址东侧的城墙上见有这样的城门。

目前已知6座山岬城址，在规模面积方面它们小于谷地城址，它们的面积0.2公顷—5公顷。山岬城址在面积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别，可以把它们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亚型：规模较大的山岬城址，面积为3公顷—5公顷；规模较小的山岬城址，面积为0.2公顷—0.5公顷。位于伊利斯塔亚河上游谷地的奥特拉德涅斯克城址、位于茹拉夫廖夫卡河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萨拉托夫斯克城址、位于鲁德纳亚河谷地的莫诺马霍夫斯克城址属于规模较大的山岬城址。

规模较大的山岬城址中，在奥特拉德涅斯克城址，清楚地观察到内部布局迹象，在经过人工平整的山岬坡地平台上，见有大量的建筑址遗迹。在城门附近有一些较大的石头堆，城内的古代道路中止于城门处。

在萨拉托夫斯克城址城区内，见有许多直径约 3 米的凹坑。

根据地表采集材料分析，这组山岬城址是单一堆积遗存，断代为 8—10 世纪。

规模较小的山岬城址仅见于滨海地区的东部，即坐落在一些注入日本海的不大的河流谷地之上。有两座城址位于阿瓦库莫夫卡河谷地，它们是米哈伊洛夫斯克城址、维特卡城址。另有一座城址位于泽尔卡利纳亚河谷地，即戈尔诺列契斯克 2 号城址。这三座城址均未进行过发掘，只是在戈尔诺列契斯克 2 号城址的四处地点进行了钻探，通过钻探弄清楚了该城址的地层关系。钻探获得了瓦、轮制灰陶、轮制褐陶（参考文献 130，第 237 页；文献 131，第 124 页）。在城区内观察到建筑遗迹，是一些不大且不规则形状的凹坑。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城址，未发现建筑址，只是在陡坡上见有保存得较好的古代道路遗迹，道路中止于河谷。维特卡城址由于被破坏得比较严重，该城址中未能发现任何内部布局标志。

这一组山岬城址多半是避难性城址，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它们的面积不大、难以逾越的防御体系（三道防御城墙、城墙前辟有濠沟），整个复杂的防御体系只有个别城门等情况加以判断。

第二种山城类型有另外的地形特点，它们占据难以逾越的高高的岗地，岗地的高度 40 米—100 米，这种岗地完全或部分地脱离山脉，明显区别于平原地貌。这样的地理位置在谷地中非常明显，因此自古以来一直有人类居住。在青石崖，最早的人类遗址出现于青铜时代。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最早的居民是扬科夫斯基文化的主人。而鲁达洛夫斯克城址、伊兹维斯特科沃耶城

址所处的位置上，最早的遗址出现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时期。目前，在四座此类城址中已知有渤海时期文化堆积，但在筑城工事方面，它们有明显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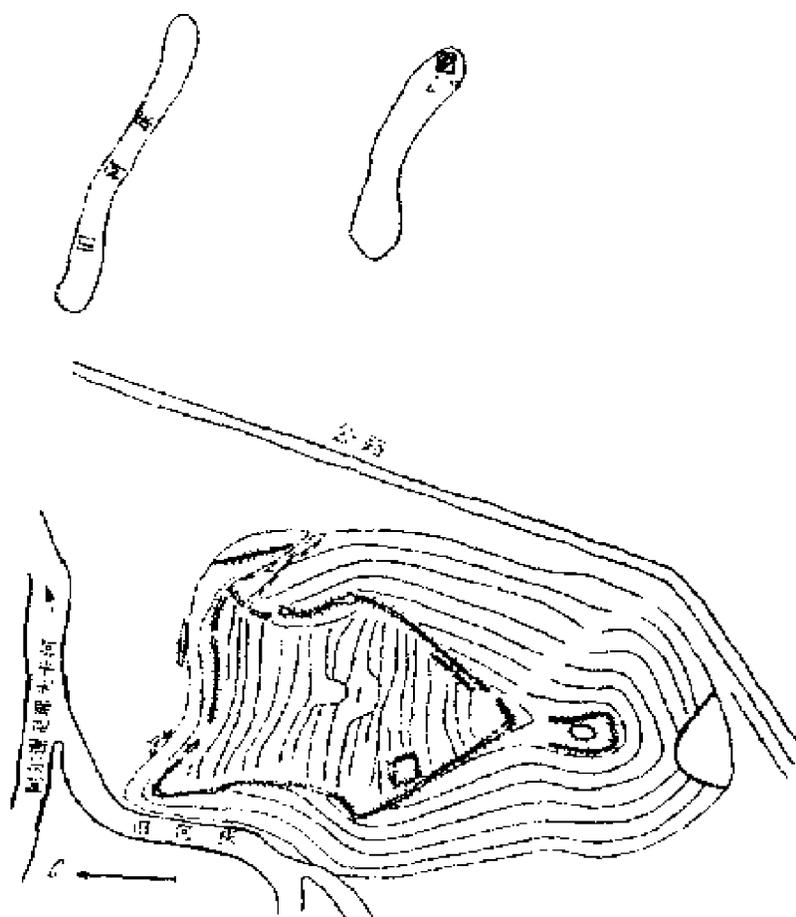
在鲁达诺夫斯克城址，其上层堆积断代为渤海时期，城址的筑城工事设施修建于平坦的岗顶，实际上它是模仿了山岬城址的防御体系，城址环绕着三道“半环形”城墙和濠沟，城址修建得极不寻常，门辟于城址东南向两道城墙之上，为此，道路在外墙、中墙的掩护下通向防御墙北界以外的山脊。在丘岗地势最平缓的北部、东南部坡地上平整出许多修建房屋用的平台。城址的这部分地段的地界自下而上用城墙隔断，古代的道路蜿蜒地通向城内的居住区（参考文献 39，第 183 页）。

在经过较好研究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图五，1），渤海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在 12—13 世纪的建筑平面之下，按照地层和设施遗迹在渤海堆积中划分出两个建筑平面。在下层建筑平面，发现了带有炕的长方形地面式房址；在上层建筑平面，在类似的房址中见有直形的、“Γ”形的炕，炕带有 2—3 条烟道（参考文献 163，第 5—6 页）。在北向城墙上的剖面（北处墙体的高度为 3 米—5 米），清楚地划分出四层建筑平面，两层建筑剖面的高度在 2 米以下，属于渤海时期；另外两层建筑平面属于 12 至 13 世纪，在山岗两侧陡坡处的城界位置，可以看到不长的木骨泥墙墙体遗迹。

谷地丘岗类山城址的面积一般为中等规模，面积在 3 公顷以内，城址周围分布有无防御设施的村落址。

综上所述，所有被分析研究的山城类城址，在构造上它们具有一定的固定特征，在基本地形特征和主要营建原则方面，它们从属于同样的要求。

还有一类山地遗址，它们是较小的城堡，其面积不大，0.076 公顷—1.3 公顷，此类城堡占据于高耸险峻的山岬之崖，或山岗突耸于谷地的顶部，地理位置视野开阔便于监视观察。



图五 渤海遗址平面图

1.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 2.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

山地城堡基本上属于未开展研究的遗存，它们为人所知的时间相对不长。1968年曾对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堡进行过部分考察（参考文献130，第237页），1985年，A. B. 亚历山大罗夫在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堡进行了不大面积的发掘。西尼洛夫斯克城堡、塔洛耶斯克城堡、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城堡发现于1986—1987年，这些城堡只是进行过调查钻探，收集到的材料包括铁镞、陶片，初步认为这些城堡属于渤海时期。

目前已知的城堡共有5座，其中拉兹多利纳亚河谷地见有3座，它们是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城堡、新盖奥尔戈耶夫斯克城堡、西

尼洛夫斯克城堡；1座位于什科托夫卡河和斯捷克良努欣赫河交汇处，即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堡；另有1座城堡位于泽尔卡利纳亚河谷地，即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堡。这些城堡的分布地域非常广泛，从滨海地区的西南部一直到东北部。

城堡的形状各种各样，大体上呈椭圆形，只有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堡接近长方形。一些城堡修筑有一周城墙，如斯捷克良努欣斯克城堡、康士坦丁诺夫斯克城堡、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堡；另有一些城堡只是在面向田野一向或缓坡地带修筑了城墙，如塔洛耶斯克城堡、西尼洛夫斯克城堡。城堡的城墙不高，1.5米—2米，土筑。有的墙体用石块饰面，如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址。新盖奥尔耶夫斯克城堡、戈尔诺列契斯克1号城堡城墙外见有濠沟。在城堡的防御设施中只辟一门，一种是墙体降低，一种表现为城墙上的断口。

毫无疑问，山地城堡是警戒所，修建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防护广阔的疆土，包括当敌人进犯时保障谷地遗址的安全。作为监视台或哨所，山城城堡之间应该存在相互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对境区进行监督，监视整个谷地以及山谷之间的山口。此类遗存目前开展的研究尚很不够，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现在可以确定这种防御体网络的修建时间，以及它们后来的发展。

如果加以概括，需要指出的是，在满洲的东部也曾见有这种类型的城堡，满洲的东部地区分布着渤海国的主要中心城市（参考文献249，第37页）。

村落址 第二种遗存类型是没有防御设施的村落址。其中大部分村落址，一般沿河谷分布，另有一些村落址沿海岸线分布，个别的居住地修建于不大的天然掩体洞穴之中。村落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多靠近河岸且属不至于被水淹没的地势较高的地段，地表上基本上看不出任何标志，只能根据河岸断崖露出的文化堆积才能发现它们。河岸断崖处不见文化堆积，表明村落的建筑密度小，

换句话说，村落址占据的地域有可能相当大，但生活区、日常活动区、生产作坊区只是分布于丘陵的顶部。在丘陵的顶部可以观察到厚厚的文化层，有的地方堆积深达 2 米。有些得以确定面积的村落址，面积达 3 公顷—50 公顷。

目前掌握的村落址共有 18 处，6 处位于拉兹多利纳亚河谷地；5 处位于阿尔谢尼耶夫卡河谷地；3 处位于伊利斯塔亚河谷地；巴夫洛夫卡河谷地、乌苏里江谷地、彼得罗夫卡河谷地、小乌萨奇河谷地各有 1 处。这些村落址分布于滨海地区的南部、西部、中部地区，即沿拉兹多利纳亚河、苏霍多尔河、乌苏里江谷地和兴凯湖地区分布。

村落址尚没有进行过广泛的考察，有 4 处村落址进行过小面积的发掘，它们是，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克鲁戈拉亚多利纳村落址、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2 号村落址。其他的村落址只是对已暴露的文化层进行过清理，或地表调查采集。

在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图五，2），已经判明，这是一处双层文化堆积的村落址。下层堆积中，见有青铜时代的房址基槽。上层堆积属于渤海时期，在渤海文化层中，不同种类的设施遗迹分布在不同深度里，这种情况使我们得以把渤海文化层划分出三个建筑平面。在下层建筑平面，存在带有灶址的房址，房址呈长方形，在生土层中见有不十分明显的基槽。该建筑平面上还见有带有单一烟道的地面式房址，与房址并排清理出一些灰坑和不大的锻铁炉等遗迹现象。在发掘区的中部地段，揭示了中层建筑平面，该平面上见有两处地面式生产设施址。在上层建筑平面，见有烧土圈。上层建筑平面已被破坏得比较严重，烧土圈中见有一些石块。在距地面 18 厘米—20 厘米深度处，揭露了一些坑体，粘土涂抹坑壁，坑内填充着烧土，它们应该是锻铁炉遗迹，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的文化堆积厚达 1.5 米，渤海文化堆积

被断代为 8—10 世纪（参考文献 163，第 6 页）。

在克鲁戈拉亚多利纳遗址，清理出地面式房址残迹，房址内见有炕。另外，还清理了锻铁炉坑，坑内填充有熔渣块。该村落址为单一文化堆积，属于渤海时期。

在位于克罗乌诺夫卡河河岸的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获得了有趣的材料，在该村落址中清理出 3 座陶窑址，带炕的地面式房址，3 座灰坑。文化堆积的厚度为 55 厘米—220 厘米，该遗址属于单一文化堆积的村落址，断代为 9—10 世纪。

在毗邻的克罗乌诺夫卡河上游的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2 号村落址，清理了一座大型灰坑，在灰坑堆积中，出土了许多轮制陶器、动物骨骸、铁器残块。该村落址具有双层文化堆积：上层文化堆积属于渤海时期，下层文化堆积属于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时期，见有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房址遗迹。

在许多村落址中，对已暴露的文化层进行过清理，从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在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图三，5），揭示出双层文化堆积：上层即主要堆积属于渤海时期，堆积厚达 180 厘米；在该堆积下面有两处地点发现了厚度不超过 24 厘米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堆积。在村落址的某些地段，渤海时期堆积划分出两层建筑平面：下层建筑平面，划分出很深的房址基槽，还有陶窑遗迹；而在上层建筑平面，见有瓦顶的建筑址废墟。

在乌杰斯纳耶村落址，该遗址所濒临的拉兹多利纳亚河河岸断面上可以观察到基坑和陶窑轮廓线，有些地方文化层的厚度达到 1.5 米，该村落址是单一文化堆积，断代为 8—10 世纪（参考文献 226，第 99 页）。

阿尔谢尼耶夫卡河谷地分布有两处属于渤海早期阶段的村落址，它们是鲁达诺夫卡 1 号村落址、鲁达诺夫卡 2 号村落址。两处村落址的文化堆积均较厚，达到 85 厘米，堆积中密布陶器、动

物骨骼、鱼骨，河生软体动物贝壳，观察到一处长 130 厘米、深 30 厘米的基槽。

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在建筑工人挖掘的距生土面 18 厘米—20 厘米深度处，在黑色腐质土层中可以看到直径 100 厘米—150 厘米的橙黄色烧土圈，烧土圈从东向西按两排排布，烧土圈附近见有青铜装饰品、铁质武器、陶器（参考文献 222，第 35 页）。

在杏山村落址，地表采集材料中见有铜钱、轮制陶片、手制陶片、金属制品、骨器，根据采集到的遗物可以确认这是一处双层文化堆积村落址。下层堆积属于渤海时期；上层堆积属于女真文化堆积，但已基本毁于耕地。

总之，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谷地村落址的材料来看，和谷地城址一样，它们属于长期延续存在的遗址。其中有些村落址属于多层文化堆积，并且渤海文化层下往往叠压有更古老的遗存。在有些情况下，如杏山村落址，渤海文化层为女真时期堆积所叠压。区分出一些渤海早期村落址，时间为 8—9 世纪；一些渤海晚期村落址，时间为 9—10 世纪；有些村落址存在于渤海文化的整个阶段，即 8—10 世纪。在一些村落址中，渤海文化堆积清楚地区分出两层（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甚至是三层（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建筑平面。最大的一些村落址分布于拉兹多利纳亚河流域，另外一些较小的村落址分布于山林地带，并且这些较小的村落址距离城址较近，如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周邻便分布有一些这样的村落址。鲁达诺夫斯克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附近均分布有一些村落址。通过考察村落址遗存获得的材料表明，村落址的居民不仅从事耕作业、饲养业、猎取业，而且也从事手工业。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的居民专门从事青铜铸造业（参考文献 163，第 14 页），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乌杰斯纳耶村落址的居民从事陶器制作。

在上文中我们介绍了谷地类型村落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处日本海河湾、海湾沿岸的村落址，此类村落址的面积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们均未进行过发掘。只有处于鲁德纳亚河河口附近的斯梅奇科村落址得以确定了面积，为1公顷。在该村落址中，获得了地表采集材料。显然，这种村落址在规模上明显小于谷地村落址，它们分布于砂碛丘岗，如斯梅奇科遗址。有些遗址地处不高的海岸台地，地势一般高出海平面2米—4米，如别列戈沃遗址、斯巴谢尼耶2号遗址。

此类村落址所处的地理位置缺少明确的文化层堆积，并且遗物也比较稀少，见有陶片、砾石网坠、海生软体动物贝壳。可以推测，它们是渔民的季节性遗址，这里的渔民向大陆地区提供海产品。经发掘的大陆地区遗址中或多或少地出土有海生软体动物贝壳，证明了上述推测。

在一些不大的洞穴中，见有渤海时期的文化堆积。这样的洞穴分布于偏远的森林区，如斯维尔奇科夫洞穴。此外，也见于海岸上，如波谢特斯卡亚洞穴。

斯维尔奇科夫洞穴位于泽尔卡利纳亚河支流杰涅瓦亚河上游地区，洞口距山脚高度为700米，洞穴贴近洞口处发现了不大的轮制陶罐的器片以及该器物的器盖，另见铁镞、骨镞、刀。这些器物完全可能是猎户随身携带之物。洞穴中采集到很多猪骨、熊骨、狼骨、斑羚骨（参考文献225，第152页），该洞穴，显然是狩猎季节猎户的过冬场所。

波谢特斯卡亚洞穴位于埃克斯佩季齐亚湾河岸上，洞口高出海平面2米—3米。这是一处拥有足够生活空间的天然避护场所，长9米，宽5米—6米，高4米—5米。经钻探，堆积厚达1米。自上而下，在25厘米深处，见有夹杂碎石子的黑土层；其下为含炭的浅灰土层，厚20厘米；再往下为夹杂有碎石子、石块、海带、桦树皮的黑灰亚粘土，厚50厘米—60厘米；洞穴底层堆积中采集

到的遗物有青铜环、贝壳装饰品、骨质饰物、陶网坠、瓦、轮制陶器（参考文献 178，第 37 页）。洞穴可能是渔户的天然掩体。

第三节 墓 地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墓地是最缺少研究的遗存种类。目前已知的墓地共有三处，两处位于克罗乌诺夫卡河谷地，一处位于大乌苏尔卡河谷地。克罗乌诺夫卡河谷地的两处墓地位于杏山、马蹄山寺庙址附近的不高的山岗坡地与岗顶之上，另外的一处墓地，即新巴克罗夫斯克墓地直接坐落在河流谷地，它已经遭到破坏。

马蹄山墓地、杏山墓地是一些不高的封土墓，墓堆是用大石块垒砌而成。新巴克罗夫斯克墓地则显然是一片土坑墓地，因为在墓地的地表看不到任何标志。

马蹄山墓地、杏山墓地进行过发掘，共清理了 5 座封土墓。

马蹄山墓地清理了 1 座墓葬，该墓位于马蹄山东麓山脚，为封土墓，墓堆直径 12 米，高 1.4 米。在墓堆的不同位置中，出土了手制的陶器残片、铁镞、铁质牌饰、鏃式鏃或斧的残块、大粒砂岩质石料制作的箭杆取直器，大量的碎骨等等。该墓曾被盗掘，在墓堆的中部，清理出一不规则长方形墓穴，长 3.7 米，宽 1 米。墓内填充黑色腐质土，墓穴纵轴呈南北向（参考文献 197，第 92 页）。

在杏山西坡山脊上清理了 4 座墓葬，墓葬的墓堆规模不大并已遭受了严重的破坏。1 座墓中出土了一些手制陶片，16 枚圆柱形、扇形串珠，并见有大量的碎骨。另外三座墓葬中基本上不见随葬品，有 1 座墓葬中出土了一把不大的铁刀和大量的碎骨块，另外两座墓，1 座墓中仅见碎骨，另 1 座是空墓。

墓葬的墓堆为玄武岩石板构成，使用的大石块上有修整痕迹，根据缺少墓穴这一情况来判断，墓葬是地面式的，在形制上它们

与满洲牡丹江河谷地的渤海墓葬一样，用玄武岩石板垒砌边框作为墓室，安葬方式实行的是火葬，因为碎骨见有火烧痕迹（参考文献 197，第 92—93 页）。

在新巴克罗夫斯克墓地，在 1 米深的冲沟里采集到长方形的青铜牌饰、铁镞、铁刀、玻璃串珠、手制陶器。

满洲境内的渤海墓葬得到了更好的研究，中国考古学家对渤海墓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把渤海墓葬分为三大种类，每一种类又进一步分型。渤海墓葬被分为 9 种类型，它们分属于渤海历史时期的早、晚两期（参考文献 303，第 3—14 页）。不排除这样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考古学家对渤海墓葬的分类，完全适用于滨海边疆区境内渤海墓葬的划分。

评述滨海边疆区境内渤海遗存的分布，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各种遗存集中分布于河流谷地的中部地段，这里有最肥沃的土壤。同时，谷地地区的城址在规模上大于其他地区的城址，显然，它们是与众不同的行政中心。

第二，拉兹多利纳亚河的中游地区以及它的支流即靠近渤海国率宾府治所地区，分布着密度很高的无防御设施的村落址。并且，这里汇集有不同种类的渤海遗存：城址、村落址、墓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接近渤海国的京城府区，这种情况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一地区拥有滨海边疆区最肥沃的土地，最适宜的气候条件，它们成为获得高产量的生物产品的先决条件，特别有利于农耕地、饲养业的发展。它们成为渤海人积极开发拉兹多利纳亚河流域的主要原因。

第三，滨海的东部地区基本上不见谷地城址，以及无防御设施的村落址，这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域是渤海国的国界区域，人们只是在这里修建了山城和山地城堡来守护国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区的居住密度非常低。

第四，大体上在滨海南部地区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一组遗存，

其中大多数是不大的渔业遗址，只有克拉斯基诺城址具有其他的功能。

第五，各个地区在经济潜力方面的差异多半是它们遗址密度不同的原因之一，同时，这种差异也决定了各地居民从事不同的经济行业。再有一点，不能不注意到，滨海的北部、东北部地区基本上不见渤海遗存，这是由于上述地区考古学研究薄弱的结果。尽管目前在这一地区已经知道了许多中世纪遗存，但由于缺少实物材料，很难把它们同具体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第三章 渤海时代滨海地区 居民的物质文化

第一节 房址与宗教设施

与某些研究者的观点相反（参考文献 71，第 51、64 页），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近二十年来，在滨海地区境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而有趣的有关古代渤海人房址的材料。这种情况不仅是导致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居民物质文化研究学术转变的因素之一，而且通过它们可以确定古代通古斯语族部落在远东民族房屋建筑业发展中所做的贡献。

按照结构特征，渤海人的房址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半地穴式房址、地面式房址。

半地穴式房址见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以及马蹄山寺庙址附近。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发掘了 2 座半地穴式房址（参考文献 214），房址遗迹表现为长方形轮廓基槽，基槽外侧见有柱洞以及烧焦了的对劈开的圆木，这种圆木用于房屋的墙壁。其中 1 座房址，在靠近房址中央的位置有一个椭圆形的灶址（图六，1）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揭露了两层建筑平面。在下层建筑平面，清理出 32 座半地穴式房址，其中大部分房址已经遭到破坏，因此，得以确定房址轮廓的总共只有 8 座（参考文献 212—214）。这些房址的特征是，门道呈门斗形结构（图六，4），门斗形门道有不同的规模。门道与房屋的连接处见有土台或不大的石

块砌体，显然，这种设施是为了防止土块塌落屋中。灶址位于门址附近，其中有些灶址是用石块垒砌的。

该城址上层建筑平面的房址与下层建筑平面的房址相似，它们均呈长方形轮廓，不过，未见到门斗形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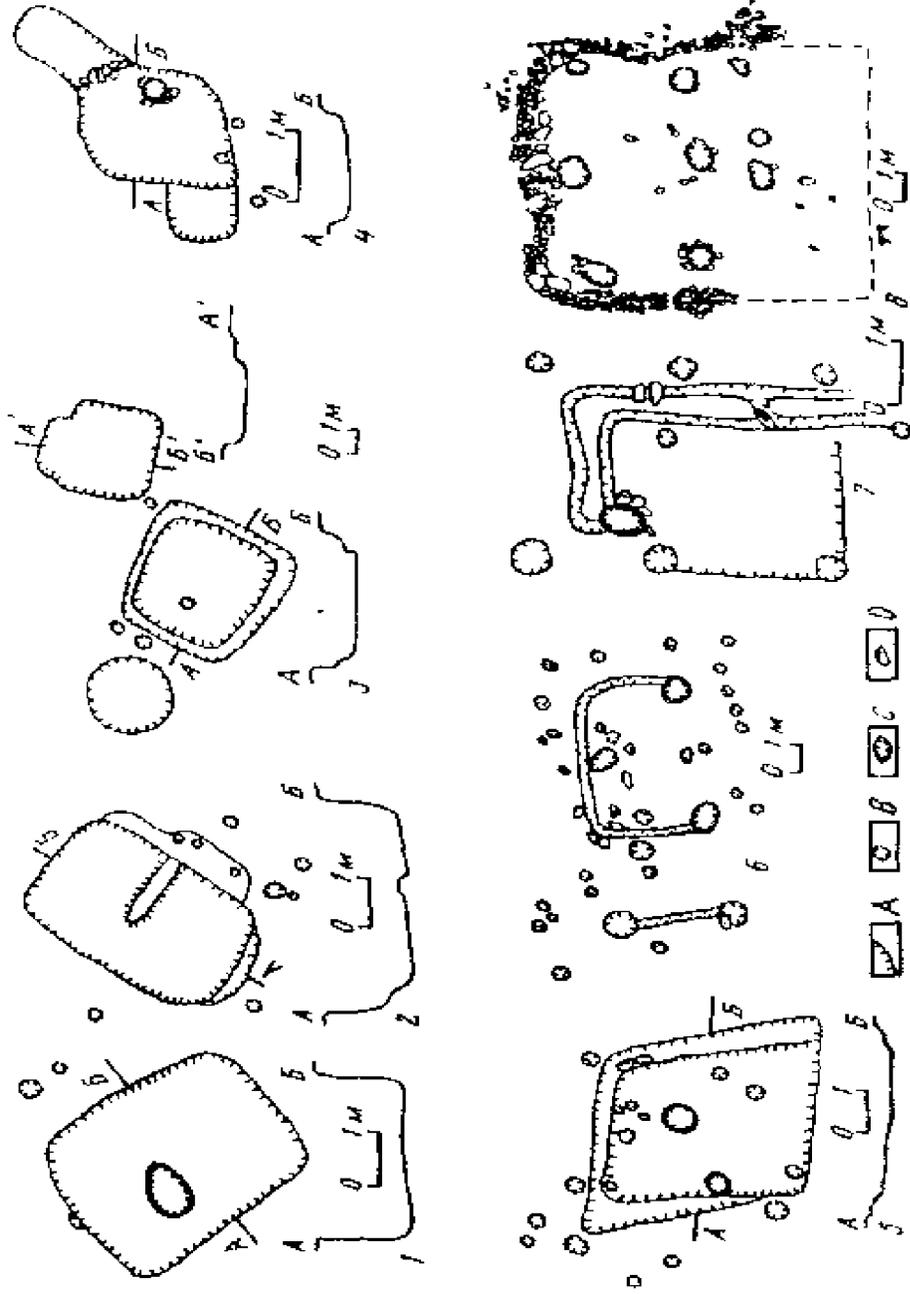
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在层位上区分出两层渤海时期的建筑平面：下层建筑平面见有半地穴式房址，上层建筑平面见有生产设施用途的遗迹（参考文献 233，第 45—47 页；文献 234，第 47—53 页；文献 235，第 60—68 页）。房址的保存情况不好，轮廓呈圆角长方形，基槽深 0.3 米—0.4 米，纵向呈正方向。

在发掘马蹄山寺庙址时，在围墙的外侧清理了 1 座不大的半地穴式房址，房址的东北角处见有灶址。房址的地面铺有玄武岩石板，房址的地上部分，按照 Э. В. 沙弗库诺夫的观点是用芦苇捆扎而成，其外表涂抹有泥浆（参考文献 197，第 76—78 页；文献 228）。

在渤海遗存中清理出的半地穴式房址具有共同的特点，这种房址均呈圆角长方形轮廓，其面积平均约 10 平方米，房址的基槽平均深约 1 米（清理的房址中，基槽最浅者 0.4 米，最深者 1.35 米）。灶址用石块垒砌而成，位于门址附近。基槽的外面常常见有柱洞。

按照门道的结构特征，渤海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墙壁上辟门的半地穴式房址（参考文献 77，第 321 页）、带有门斗形门道的半地穴式房址。需要指出的是，带有门斗形门道的房址目前仅见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门道面向河流。根据发掘地段的情况判断，这种房址是成排分布的。类似类型的房址，最早发现于扬科夫斯基文化遗存之中，如奥列尼 1 号遗址（参考文献 37，第 73 页）。

在滨海边疆区十月地区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的发掘过程中，В. И. 鲍日金发现了渤海半地穴式房址的有趣变体，在该



图六 渤海房址平、剖面图

1, 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起码址 2, 3, 4, 8,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 5, 6, 新戈
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 7,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

图例: A, 基槽界限 B, 柱洞 C, 灶址 D, 石块

村落址中，清理出 1 座半地穴式房址，规格为 7.9 米×6.2 米，基槽深达 1 米。房址基槽的纵向呈南北向，房址的东部已经被拉兹多利纳亚河河水冲刷破坏，推测房址的门道位于东侧。沿着房址的穴壁得以清理出 14 个柱洞，柱洞的直径 25 厘米—50 厘米，深度为 40 厘米—65 厘米。根据柱洞底部的规格来进行判断，立柱的直径不超过 20 厘米。立柱的间距为 0.8 米—1.2 米，有些立柱的间距为 0.4 米。在房址的中部，地面上还见有 6 个坑体，其直径为 15 厘米—28 厘米，深度为 15 厘米—20 厘米，完全可能，这些坑体是支撑屋顶立柱的柱洞，不过，未能确定这些坑体的排列秩序，大体上可以指出的是这是一座立柱构架结构的房址（参考文献 219，第 20—30 页）。

根据房址基槽北部残存的烧焦了的对劈开的圆木残迹来看，房址的墙体是用对劈开的圆木隼槽相接而成。屋顶铺盖有瓦，瓦砾堆积分布于房址立柱柱线之外，这一点显然表明房址是四坡顶屋顶结构。

瓦质粗糙，多半是家庭手工业式生产的。发现了两种形制的瓦：覆瓦、仰瓦。覆瓦通长 44 厘米，宽 17.5 厘米—19.5 厘米，厚 0.7 厘米—1.2 厘米。仰瓦通长 44 厘米—46 厘米，宽 27 厘米—29 厘米，厚 2 厘米—2.2 厘米。

在房址的北半部分见有保存较好的带有炉膛和通风管的“Γ”形单道烟道的炕体，炕宽 1 米—1.2 米，炉膛位于东墙的中部附近，炉膛口朝向屋内，石拱的炉膛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是两块沿着侧壁立放的石块，石块高 40 厘米。其余的石块，其中包括用于铺砌炉膛上部的石块，混杂着大量的粘泥涂块无序地散布于炉膛的内部和周围。炉膛的底部为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坑体，规格为 0.8 米×1.8 米，坑深 25 厘米，坑底已烧烤成橙黄色颜色，坑内填充着草木灰，草木灰中出土了 1 件底朝上的陶器。

发端于炉膛的炕体烟道，沿着东墙延伸了 2.8 米，然后在房

址的东北角处直角折向西侧，沿着北墙延伸到房址的西北角，在该处烟道空心向上上升了2米，结束于通风管的底部。通风管是用大石块垒砌而成的箱形结构，规格60厘米×60厘米，深85厘米。在房址内部，烟道距墙壁的距离为20厘米。烟道的壁体先是在房址的地面垂直下挖15厘米—20厘米，然后用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形近长方形的扁平砂岩石板密实垒砌而成。烟道平均宽约50厘米，深30厘米—35厘米，内壁明显熏黑。室内一侧的烟道壁体在距室内地面40厘米—45厘米高度处，加固垒砌了3—4行宽、高约20厘米—30厘米的砾石块，并用草拌泥泥浆加以固结。砾石砌体的外面以及炕体上层的石质砌体上也仔细涂抹了一层这样的泥浆面。

沿着炕体的内侧线，清理出5个柱洞，柱洞的间距为0.7米—1.4米，完全可能，这些柱洞的立柱是用于支撑护墙板，以防止炕的壁面遭到损坏。

房址的北半部还存在一个与炕无任何联系的灶址，灶的直径85厘米，深30厘米，灶底烧烤痕迹明显。

此前，在滨海地区的中世纪时代遗存中尚未见到过带有单道烟道炕体的房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滨海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中，见到过类似的房址（参考文献37，第74—78页；文献51，第60—61页）。同时，类似种类的炕广泛普及于高句丽人中间（参考文献254，第17页），想必，这种炕是渤海人借用于高句丽人。

地面式房址见于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团山）、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以及鲍里索夫斯科耶村落址、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

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揭露了两层渤海时期的建筑平面（参考文献28、218、221—223）。两层建筑平面上的房址，均修建于在山丘坡地上平整出来的不大的平台上，因此，房址门道的方

向取决于地形位置。在发掘下层建筑平面时，得以清理出 6 座房址遗迹，它们均保存得不好，因为更晚时期的房址破坏了它们。在上层建筑平面，清理出 8 座建筑址。

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所有房址均为地面式四边形轮廓，立柱构架结构，房址的墙体呈正方向，从东向西成排分布。上、下层建筑平面房址的主要差异在于，下层建筑平面的房址有一个浅基槽，基槽深 5 厘米—10 厘米，房址的面积 12 平方米—30 平方米，灶址位于门道附近；上层建筑平面的房址修建于平台表面上，它们的面积超过 30 平方米，室内有取暖设施——炕，炕表现出各种形状：“Π”形、“Γ”形、直线形，炕具有单道或双道的烟道（图六，6、7）。与上层建筑平面的房址并排，见有灰坑。

在团山北侧的遗址中进行的试掘，清理出 1 座房址，该房址保存有“Γ”形双道式烟道的炕（参考文献 223）。这座房址与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上层建筑平面的房址相似，房址为地面式建筑，墙体呈正方向。

与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并排分布的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揭露出三层建筑平面，在中层建筑平面见有房址遗迹，清理出 5 座立柱构架结构的房址，它们的平面轮廓呈长方形。一些房址有不深的基槽，基槽深 7 厘米—15 厘米，室内中部有灶址（图六，5）；另一些房址是地面式的，室内有炕（图六，6）。

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有两层渤海时期的建筑平面（参考文献 224），在上层建筑平面发现了 1 座房址，房址为地面式建筑，其形状未能得以确定，因为没有观察到立柱的柱洞，不过其形状多半是长方形的。房址内部发现了一段带有两道烟道的炕，炕体呈东西向延伸。

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也发现了 1 座房址遗迹（参考文献 216，第 16 页），该房址受到了河水的冲刷破坏。根据残存下来的房址遗迹，可以确定房址是长方形的，在房址内部西北墙附近

得以观察到一段双道烟道炕体。

渤海时期的所有地面式房址均为立柱构架结构，四边形轮廓，房址的横向或纵向呈正方向。地面式房址根据取暖设施的不同可以分出两种类型：带灶的地面式房址、带炕的地面式房址。

需要指出的是，带有灶址的地面式房址有一个浅基槽，基槽深5厘米—10厘米。带炕的房址，按照段的数量可以分为一段（直线形）一道、两道或三道烟道炕体；两段（“Г”形）两道或三道烟道炕体；三段（“П”形）一道或两道烟道炕体。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上层建筑平面发现的修建于基座之上的房址，也可以视为地面式建筑（参考文献163，第7页；文献212，第67页）。这样的房址是四边形轮廓，沿着房址的四周观察到基座是用3行—4行河卵石密实铺垫而成，河卵石高50厘米、宽20厘米—35厘米，基座的长方向呈西南—东北向。这种建筑址的面积达到35平方米—70平方米，它们与居住址的差异在于其规模较大（图六，8）。根据出土物判断，它们是生产设施址。

综上所述，滨海地区的渤海房址按照分类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半地穴式房址、地面式房址。每一种类型的房址对于鉴别考古遗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曾经作为Л.Е. 谢缅尼契科解释渤海文化中存在地方性差异的依据（参考文献163，第20—21页）。

不过，如果赞同Л.Е. 谢缅尼契科的观点，则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组遗存，遗存中存在半地穴式房址，包括米哈伊洛夫斯克地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基洛夫斯克地区的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乌苏里斯克地区带有半地穴式房址的马蹄山寺庙址；第二组遗存，其特点是存在地面式房址，包括阿努奇地区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乌苏里斯克地区的克罗乌诺夫卡村落址、鲍里索夫斯科村落址，十月地区的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不难发现，

一种情况下，两组遗存成排分布：克罗乌诺夫卡河谷地的马蹄山寺庙址、克罗乌诺夫卡遗址、鲍里索夫斯科村落址；另一种情况下：不知为什么第二组遗存把第一组遗存分割成两个部分即北部的基洛夫斯克地区、南部的米哈伊洛夫斯克地区。据此显而易见，两组遗存不代表渤海文化的两种地方性变体，而是属于渤海文化发展的早、晚两个阶段。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Л.Е. 谢缅尼契科对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断代，第一组遗存属于渤海文化的早期阶段，第二组遗存属于渤海文化的晚期阶段（参考文献163，第18—19页）。

为了证实上文所述，不妨指出的是，马蹄山上的佛教寺庙址遗迹，断代为公元8世纪（参考文献197，第78页），该寺庙址发现了属于第一组遗存特征的半地穴式房址。

渤海人的半地穴式房址与滨海地区更早时代的房址具有相似性，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偶然的情况（参考文献8，第39—46页；文献37，第65、79页；文献138，第7—9、20—21、157—158页）。例如，在扬科夫斯基文化遗存中（公元前7—公元前5世纪），发现有长方形轮廓内部有灶的半地穴式结构的房址，地形条件决定着房址的方向。该文化一些房址和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的房址一样，具有有趣的特征：房址带有门斗形门道。渤海人的房址与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公元前1—公元3世纪）的房址在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特征：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平方米—32平方米，基槽深0.6米—1米，长方形轮廓，门道均朝向河流。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房址也见有门斗形门道。至于渤海的周邻地区，则渤海的半地穴式房址与黑龙江中游所谓的靺鞨文化遗存的房址存在相似性（参考文献62，第42—87页）。

在黑龙江沿岸，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直到中世纪时代晚期均见有半地穴式房址（参考文献64，第75、93页）。从波尔采文化开始（公元前一千纪），黑龙江中、下游遗存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房址，

即以通烟口作为出口的房址、以狭长的地沟作为出口的房址（参考文献 61，第 130 页）。靺鞨文化替代了波尔采文化以后，房址类型依然是从前的样子，四边形轮廓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 12 平方米，基槽深 0.6 米—0.7 米，灶址位于室内的中央。E. И. 杰列维扬科把靺鞨的房址分成两种类型：1. 以通烟口作为出口的房址；2. 壁坑形门道或门斗形门道的房址。

综上所述，渤海早期阶段的房址在结构上同先于它们的房址有些类似。

第二组遗存形成于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以及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克罗乌诺夫卡村落址、鲍里索夫斯科耶村落址。这组遗存的特征是，具有地面式房址，其早期阶段的房址带有灶址，晚朝阶段的房址带有炕。

滨海地区境内在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炕，Д. П. 勃罗江斯基仔细研究了炕这种设施产生的全部过程，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由石块垒砌的灶是如何演变出炕的（参考文献 35，第 98—104 页；文献 37，第 75—77 页）。箱式灶是供暖的炕的雏形。有趣的是，在克罗乌诺夫卡文化的房址中，炕是在半地穴式房址中发现的（参考文献 36，第 117—119 页）。

有一种意见认为，炕是匈奴人发明的，然后由匈奴人传播到东南亚全境（参考文献 59，第 263—272 页）。在伊沃尔加城址（公元前 2—公元前 1 世纪，伊沃尔加河流域），匈奴人房址中炕是沿着墙壁分布，同时烟道的石板立放。在一些情况下，烟道的一侧壁体利用了房基的生土壁面。房址本身是四边形轮廓，半地穴式立柱构架结构，面积 8 平方米—36 平方米。有些房址有门廊。A. B. 达维多娃认为，伊沃尔加城址的房址是独立起源的，只有部分结构特征是借用于远东民族（参考文献 59，第 262—300 页；文献 60，第 14—22 页）。

如果留意到匈奴文化是形成于一系列文化的衔接点上，其中

包括东部的黑龙江沿岸部落文化（参考文献 60，第 65 页）、滨海地区部落文化（参考文献 38，第 46—50 页），那么就可以找到匈奴人、克罗乌诺夫卡人在房屋建筑业方面存在相似因素的缘由。众所周知，除了滨海边疆区的南部地区，克罗乌诺夫卡文化还分布于与滨海地区相毗邻的中国境内以及北朝鲜的北部（参考文献 38，第 46—50 页）。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存在时期，适逢匈奴强盛于中央亚细亚。П. П. 勃罗江斯基依据于分析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匈奴遗存材料得出结论，炕产生于远东地区这样一些考古学文化之中，如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朝鲜的泰松里文化、中国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炕产生初期的某一阶段传入了外贝加尔地区（参考文献 38，第 49 页）。

带有炕的渤海房址，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均为地面式建筑或略微有一个浅基槽。曾经有人主张，受渤海人的影响契丹人使用了炕（参考文献 179，第 259—260 页），这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证明渤海文化继承于高句丽文化，朝鲜的研究者以高句丽的房址和渤海的房址相似作为例证，同时断言，长长的保暖的居住面是高句丽人发明的（参考文献 254，第 15—24 页）。中国研究者认为，炕最早出现于中国汉代的东北地区（参考文献 237，第 98 页）。不管怎样，显然，炕是早期铁器时代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民族发明的（参考文献 155，第 51—53 页）。

后来，在房屋建筑业中出现了取暖设施更完善的结构方式系统，房屋开始立柱构架结构，房屋的墙体使用了木杆，并涂以泥浆，这样一来足以保持室内温暖。有些研究者认为，渤海流行炕的原因是由于渤海地域内冬季漫长、气候寒冷的缘故（参考文献 249，第 39 页）。

在黑龙江沿岸的萨卡奇—阿梁城址，发掘清理出带炕的中世纪时期的房址（参考文献 76，第 159—162 页；文献 235，第 2—8 页）。研究者们将该城址断代为靺鞨晚期阶段，并称在该城址中

发现了带有炕的半地穴式房址。不过事实多半不是这样，得出上述错误的结论是由于，原报告者对待该类房址一面墙壁所利用的从山坡平整出的平台基槽的态度。的确，用于修建房屋的平台，其一侧台体对山坡进行了下挖（采用这种方式，是由于房址修建于山坡之上），但房址本身是地面式建筑。至于该城址的断代，根据对考古学材料加以分析，它应该属于早期中世纪时代。E. H. 杰列维扬科指出，即使是到了鞑靼的晚期阶段，房址中也没有出现炕（参考文献 64，第 93 页）。

到了女真时代，带炕的房址在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参考文献 65，第 152—161 页；文献 135，第 229—301 页；文献 199，第 72—89 页）。在房屋建筑业方面，炕的结构更趋复杂并初具标准化。所有的房址均为地面式建筑，立柱构架结构，室内有炕。换句话说，渤海时期产生的建筑方式，依然存在于女真时代，并沿续存在到 20 世纪。

目前，在滨海地区境内考察了四座宗教设施—佛教寺庙址，更准确地说，是渤海时期的庙宇，这些庙宇可以归入柱廊结构建筑类型。四座寺庙址中有三座位于乌苏里斯克地区，它们是马蹄山寺庙址、杏山寺庙址、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乌苏里斯克地区渤海时代是率宾府的辖区（参考文献 197，第 60 页）。第四座寺庙址发现于哈桑地区的克拉斯基诺城址之中，克拉斯基诺城址是隶属于龙原府的盐州治所（参考文献 197，第 59 页）。

最早的有关寺庙址类型遗存的研究，是 Э. В. 沙弗库诺夫于 1958—1959 年间开展的工作（参考文献 192，第 173—186 页；文献 197，第 74—80 页；文献 228—230）。有一座寺庙址之所以称之为马蹄山寺庙址，是因为该寺庙址发现于马蹄山平坦的山顶之上，马蹄山矗立于克罗乌诺夫卡河右岸河流谷地。

马蹄山寺庙址的轮廓接近正方形，面积 30 平方米（6 米×5 米），庙宇呈正方向，寺庙的基座保存下四边形轮廓的石堆废墟，

石堆宽约 1.5 米，高达 0.6 米。起初，该石堆废墟被解释为寺庙外围环绕的装饰墙（参考文献 197，第 75 页）。

经过仔细分析寺庙发掘平面图和地层剖面图，表明，石堆的性质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加以解释。最初，在山石基岩上修建了四边形的墙基，墙基是用玄武岩石块密实垒砌而成，只是在门址处留有缺口，四边形墙基内填充了厚约 0.4 米的红粘土，红粘土和石墙砌体成为一体，这就形成了一个规格为 9 米×9 米的平台，平台外侧用石质砌体加固，并用陶砖饰面。在平台的东北部，是平坦的薄层砂岩。在平台的表面上发现了一些扁平的石块，它们是寺庙的柱廊础石，础石分为三排，每排 3 块础石，础石的相互间距为 1.5 米—2 米。

寺庙的门址位于北面，门址保存下三块扁平的玄武岩石板，石板长 1.2 米，宽 0.45 米，垒砌成台阶形状。台阶的侧面加固有玄武岩圆石。多半，寺庙存在另外一个门，该门应该位于南面，南面的石质基础上见有一个缺口。

有趣的发现是，在石质基础的陶质饰面砖上见有堆塑纹饰（参考文献 197，图 X V I，1）。

在寺庙址区域内清理出大量的屋顶瓦，屋顶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仰瓦、覆瓦、帽檐瓦。瓦具有不同规格的凹槽，槽内有粗糙的布纹拍印。

仰瓦，通长 40 厘米—43 厘米，宽 14.5 厘米—15 厘米，厚 1.5 厘米—2 厘米。仰瓦的正面施纹（参考文献 197，图 V I）。

覆瓦，具有半筒形槽，瓦通长 40 厘米—43 厘米，宽 26 厘米—28 厘米，厚 2 厘米—2.5 厘米，并且瓦的正面下端连接有瓦当，瓦当上装饰有模压莲花纹（参考文献 197，图 X）。

帽檐瓦，长条形的挡板瓦，其一端侧棱向一侧延长，内面略弯曲成半圆形的帽檐状。

综上所述，马蹄山寺庙址是修建于平台之上的瓦顶柱廊类型

的建筑物。

寺庙址外侧，从北向东在13米—18米长的距离内，寺庙以石质围墙护防，观察到的围墙呈土堤状。南面、西面没有围墙，因为此处的山体往下是悬崖。寺庙有一个面积约0.12公顷的庭院，庭院的大部分地段尚未进行过发掘。寺庙院落的门址位于北面，门址表现为围墙上简单的豁口，豁口宽15米，两端见有玄武岩石板，显然，这些石板是瓦檐的木质拱门的基础石。

寺庙的院落中，门址往西2米，发现了1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址的南壁与石质围墙的外缘紧密衔接在一起，房址的面积约4平方米（2米×2米），房址基槽南侧的深度约0.6米，北侧的深度为0.2米。房址基槽的壁体为垒砌的玄武岩石块。房址的东北角处有一个不大的灰土圈，灰土圈中包含有木炭块和烧过的果核。完全可能，这座房址是寺庙看门人的住所。

1960年，在距马蹄山寺庙址不远的地方，发掘了香山寺庙址，该寺庙址地处克罗乌诺夫卡河对岸，位于不大的香山山岗的北侧缓坡上（参考文献194，第105页；文献197，第81—91页；文献230）。

香山寺庙址呈正方形轮廓，面积约49平方米（7米×7米），建筑址的对角线呈正方向，它修建于一个面积约95平方米的人工平台上（10米×9.5米），平台四周加固有修整过的玄武岩石板砌体。该砌体的基础是在平台四周下挖了宽约0.6米的地沟，平台为亚粘土夯实而成，高约0.5米—0.8米。

寺庙的中门位于西北面，是用修整过的玄武岩石板形成的三级台阶，石板长0.6米—1米，宽0.4米—0.6米。大概，另一个门位于相对的东南面，在那里也见有类似的石块垒砌的台阶。

在平台上，见有木质柱廊的石质础脚石，总共发现了15块，但础石的总数多半应该是25块，即5排础石，每排5块础石。

在平台的四周清理了瓦砾堆积，寺庙址位置本身则未见到瓦

片。这一情况意味着，庙宇的屋顶多半是四坡顶。按照 $\Theta. B.$ 沙弗库诺夫的推测，庙宇的屋顶是双重顶结构。发生火灾时，顶棚部分的梁木先于其他部分的构件燃烧尽净，因此，瓦和鸱吻一起从上层往下塌落，鸱吻装饰在屋顶顶层主要的横脊上，基于此，鸱吻的碎片处于瓦砾的最底层（参考文献 197，第 84 页）。

在寺庙址内发现了一些烧烤过的带有芦苇印痕的泥块，它们无疑是墙体的残存物。可见，在石质的基础上有木质的柱子，有的立柱用于支撑屋脊，有的则是墙体柱石。墙体本身使用的材料大概是芦苇，芦苇的里外两面涂抹有草拌泥。在此之后，在墙面上又涂抹了薄薄的一层经仔细研磨过的灰泥，最后，在灰泥面上又涂抹了一层象牙色涂料，并且在涂料层上画有几何形图案，图案下绘有红色的带纹（参考文献 197，第 82 页，图 X X V I）。

杏山寺庙址发现的屋顶瓦，按其形制及用途可以划分出几种类型：板瓦、帽檐瓦、仰瓦、覆瓦、角瓦。

板瓦的形状类似扁平的条石（参考文献 197，图 X I），板瓦下端宽 11 厘米，上端宽 9 厘米，厚 1.5 厘米—2 厘米，该类板瓦的通长未能得以确定，板瓦用于铺盖屋顶的屋脊。

帽檐瓦（参考文献 197，图 X X），与马蹄山寺庙址出土的帽檐瓦形制相似，通长 20 厘米—23.8 厘米，宽 10.5 厘米—12.5 厘米。帽檐瓦沿着屋脊的基线铺盖，同时，用瓦的“帽檐”遮住仰瓦的沟槽。

覆瓦（参考文献 197，图 X X I V、X X V），具有半筒形的槽，用覆瓦的凹面压合在纵向排列的仰瓦凹面衔接点空隙处的上面。覆瓦的正面下端有堆塑装饰造型的瓦当，覆瓦的通长介于 37 厘米—41 厘米之间，上端宽 9 厘米—10.5 厘米，下端宽 12 厘米—16.5 厘米，下端的宽度与瓦当的直径基本相符。

花样瓦应该是覆瓦的变体，花样瓦的瓦身不是直线形的，呈曲线轮廓，其下端带有瓦当（参考文献 197，图 X X V）。花样瓦

的尺寸和普通的覆瓦的规格相似，花样瓦被用于铺盖四坡形屋顶的两坡交界角的空隙处。

覆瓦的瓦当上观察到几种花纹图案：1. 瓦当中央有一个半球形凸体，该凸体环绕有两条同心圆凸线，凸线之间装饰有带状的珍珠纹，外圈凸线外侧分布有8朵莲花瓣纹饰，其中有4朵花瓣纹饰装饰有模仿花叶的椭圆形凸出，8朵花瓣的外侧也环绕有同心圆凸线，圆凸线之间饰有带状珍珠纹；2. 瓦当中央的半球形凸体周围环绕有莲花瓣纹饰，花瓣纹之间存在半卵形的浮雕线纹；3. 纹饰图案与第二种纹饰相近，只是在半卵形线纹的两侧端点处见有珍珠纹（参考文献197，图X XI）。

仰瓦（参考文献，图X XI），也具有凹槽，瓦的通长为40厘米—45厘米，下端宽25厘米—32厘米，上端宽21.5厘米—25厘米。

角瓦也属于仰瓦，形制近似于切去了仰瓦的下端一角，形状呈直角梯形或截头的长方形。角瓦的尺寸：下端宽23厘米，侧棱长37厘米、16厘米，切口长33.5厘米。角瓦的用法与仰瓦相同，但只用于屋顶两坡的交界处，角瓦的存在正如花样瓦的存在一样，它们证明了一点，庙宇的屋顶不是双坡式，而是四坡顶。

角瓦的下端切口上施的纹饰与马蹄山寺庙址仰瓦上的纹饰相同，除此之外，角瓦上见有云杉纹，这是用棒状物压印出来的斜线纹。有些瓦装饰了两道压印的平行线纹，平行线纹之间有压印的带状圆圈纹，并且，圆圈纹的排列按下列方式交替：两个圆圈纹相互叠压，然后有一个圆圈纹位于线纹的中心，图案如此重复。在有些个体上，见有简单的由圆圈纹构成的带状纹，瓦的外端两侧饰有斜刻划纹（参考文献197，图VII、VIII、XI X）。

条带纹有另外一种变体，即压印的沟槽替代了压印的嵌线，沟槽上见有圆圈纹。除此之外，有些瓦的下端边沿饰有手指印纹。

杏山庙宇的屋顶装饰有龙的立体造型—鸱吻（参考文献197，

图 X X VI), 鸱吻被固定在庙宇屋脊的横端。鸱吻的残块发现于庙宇东南向、东北向墙体附近。只是部分地收集到了一件鸱吻的残块, 该鸱吻呈厚壁空心的陶质龙头造型, 器高 0.8 米, 宽 0.3 米, 长 0.75 米, 壁厚 1.5 厘米—3 厘米。鸱吻的器身呈半圆柱形, 并且这个半圆柱形的前部被直角削去, 而切口本身被平面的陶塑所覆盖, 鸱吻头部的大部分饰件为浮雕堆塑造型。

在寺庙区域内发现了陶质佛像残块。最小的佛像器高仅 5 厘米, 该佛像的造型屈膝团坐, 双手交叉于胸前, 身后有一个不大的护板, 护板仅残存下不大的部分(参考文献 197, 图 X X VII, 1)。类似的佛像, 在发掘东京城渤海上京遗址时曾有大量出土(参考文献 317, 图 CVIII)。

第二件佛像仅残存下脸部, 残高 4.5 厘米(参考文献 197, 图 X X VII, 2)。

除了上述佛像, 还发现了另外一些佛像的残块, 首先, 是两块耳部残块, 一块是左耳残块, 一块是带有大耳垂的右耳残块; 另见有下颏残块、右手小指残块、右脚趾残块(参考文献 197, 图 X X VII, 2)。

在该寺庙址中, 还发现了一件陶质的高浮雕造型的护法神的脸部残块, 残存高度 8.5 厘米, 脸部造型毗牙咧嘴, 稀牙利齿, 阔鼻斜眼, 有意思的是, 瞳仁处位置上嵌镶了两颗深褐色的小石子, 额头处则镶嵌了一颗不大的粉红色的石子, 这就是所谓的“白毫”, 即智慧的象征, 由该石子向两边散射出一些深沟状的皱纹(参考文献 197, 图 X X VII, 1)。

杏山庙宇的四周围有石质围墙, 庙宇庭院的面积约 0.12 公顷。庭院四周的围墙迄今仍然残存有宽约 0.1 米的石堆废墟, 其门址未能确定, 门址多半位于庙宇西北面中门的对面, 需要指出的是, 在发掘石质围墙时, 发现了一些瓦的残片, 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推测, 围墙的上部建造有瓦檐的木栅栏。

距杏山寺庙址不远，在邻近山岗的山坡上和岗顶清理了一些墓葬，墓葬的规模不大，玄武岩的墓堆明显地被扰动过，有5座墓葬进行了发掘，这些墓经受过严重的扰乱（参考文献100，第100页；文献194）。很显然，这些墓葬和杏山寺庙、马蹄山寺庙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座寺庙址也发现于乌苏里斯克地区，被称之为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1971年，B. E. 麦德维杰夫对该寺庙址进行了发掘。不过，从未发表过有关该寺庙址的论述，目前已知的仅是，庙宇是瓦顶的柱廊类型建筑，屋顶装饰有渤海类型的瓦当（参考文献141，第49页，图一）。

在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内，发现了两尊青铜铸像，第一尊铸像为全身造型，双手交叉于腹部，器高11.3厘米（参考文献141，第51页，图二；文献143，第352页）。

第二尊铸像略小于第一尊，器高7.8厘米，该铸像的头部未能保存下来，从残存部分看，它也是全身造型，同样地双手交叉于腹部，该铸像清晰可辨佛教袈裟式法衣服饰（参考文献141，第52页，图三）。

两尊铸像均为单面造型，即前面是可视面。铸像的底部有一个不大的插脚，借此插脚使铸像固定在供台之上。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指出，这两尊铸像表现的是祖先官吏崇拜，它与家族、种族的先人祭祀有关（参考文献141，第52页）。

第四座佛教庙宇是B. И. 鲍日金在克拉斯基诺城址的西北部城区中发掘出来的（参考文献25，第189—190页；文献215—216），该庙宇修建于高约0.1米，面积约132平方米（12米×11米）的平台之上，平台是用灰色砂壤土夯实而成，平台周围砌有两排玄武岩石块，石块的规格为0.85米×0.6米，厚度约0.35米。石块的外侧，似乎涂抹有厚约0.1米的泥层。平台的大部分表层平面上，夯有砾石，中间是小石子和砂土层，石质砌面是庙

宇地面的基础。

在平台上观察到寺庙的 25 个木柱的础石，以及 5 个安放础石的础坑。据此，庙宇的屋顶是由 30 个立柱支撑着：5 排立柱，每排 6 个立柱，立柱的间距约为 1 米。

庙宇的面积为 72 平方米（9 米×8 米），庙宇的对角线呈正方向，庙宇的门道位于西南面，因为恰恰是在该处，于平台上观察到规格为 1.3 米×1.3 米的台阶，台阶的三面加固垒砌有两层石块。

在平台的外围，沿着平台的四周见有碎瓦堆积，瓦堆中出土有铁钉，大量的碎瓦见于平台外面的东南部、西北部。

根据瓦的分布情况以及存在角瓦等因素来看，庙宇应为四坡顶。寺庙屋顶的坡面伸展到了平台的边缘，即从墙体到坡檐的伸展距离约为 1 米，庙宇的屋脊显然是按西北—东南走向贯穿建筑物的屋顶中央。在平台上，门址前出土的瓦砾中发现了手制的赤陶器残块，这是一块装饰物的残存物，该装饰物呈猫头鹰尾巴状造型，用于装饰屋脊。

在门址对面，在第二排、第三排础石的第三块和第四块柱础石之间，观察到一个高台，高台高出地面约 0.1 米—0.2 米，该高台的面积约 1.5 平方米。该处出土了一尊青铜铸造的佛像，大概，这里应该是供台的处所，其上摆放神像。

庙宇屋顶铺瓦，使用的瓦可以分为四种形制：仰瓦、覆瓦、角瓦、帽檐瓦。

仰瓦，按其尺寸有两种规格：一种仰瓦，通长 41.5 厘米—46 厘米，前端切口宽 28 厘米—35 厘米，后端切口宽 24 厘米—28 厘米，瓦厚 2 厘米—2.2 厘米；另一种仰瓦，通长 36 厘米—38 厘米，前端切口宽 15.2 厘米—24 厘米，后端切口宽 14.6 厘米—18 厘米，瓦厚 1.6 厘米—1.8 厘米。仰瓦有沟槽，沟槽的上沿变窄，折沿的折角呈 90°。

只有装饰屋顶底沿的仰瓦在其正面装饰有纹饰，见到四种纹饰图案：第一种，沿着仰瓦正面切口的边沿压印有宽宽的斜向指状纹；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纹饰彼此相似，它们表现为，在两道平行线纹内填充有压印的链状环纹或半环纹，在切口的边沿上则见有斜向细刻划纹。

覆瓦，此类瓦也具有沟槽，沟槽的折角呈 180° 。按照覆瓦的后沿造型，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种形制：一种情况下，瓦的后沿平缓变窄；另一种情况是，瓦的后沿呈阶梯状，阶梯长1.7厘米。在覆瓦的背面中部，见有铁钉穿孔。覆瓦的规格，瓦通长32.5厘米—37.5厘米，下沿宽48厘米—51厘米，上沿宽30厘米，上沿瓦厚1.5厘米—2厘米，下沿瓦厚1.1厘米—1.4厘米。

覆瓦的正面装饰有瓦当，当面装饰有莲花纹，花纹存在几种变体。

第一种变体：当面中央有一个半球形凸体，凸体外侧环绕着一个由5颗珍珠纹构成的环圈，该环圈外环绕有一周凸线浮雕圆圈，该线圈以外散布着5个浮雕花瓣纹，这些花瓣纹被伸长的菱形凸体交替分隔开，当面的外缘有凸出边框（图七，1；参考文献197，图IX）。

第二种变体：当面中央有半球形凸体，该凸体环绕有一个六角形凸体，六角形凸体的每一个角散布开一个凸起的莲花瓣纹，莲花瓣纹被包含在凸线圆框内，莲花瓣纹之间分布有凸线的三叶草纹，当面的外缘也有凸出边框。

其他的莲花造型变体纹饰发现的只是一些残块，无法复原其完整图案。

寺庙址也发现了角瓦的残片，角瓦厚1.8厘米，瓦上见有铁钉穿孔。

除了瓦片，寺庙址内还出土了一些与木构件有关的器物，其中包括16枚铁钉，铁钉长10厘米—14厘米，剖面呈方形且多半



图七 渤海瓦当

1.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2. 鲍里索夫斯克城址出土

铃铛为六棱形，器高 14.5 厘米，直径 9.5 厘米，在其三侧棱上见有半月形透孔。铃铛的顶部有一个用于联结吊挂细绳的透孔。

是长方形；此外，见有 4 根长方形截面的铁棒。

庙宇地面的中央，在推测为供台的处所，出土了一些佛像。其中有一件是鎏金青铜佛像，佛像呈屈膝状团坐于台座之上，双手交叉于腹部，台座有一个长 4.5 厘米的插杆，借助于此插杆将佛像固定到供台上（图八；图九，9）。

这里还出土了一件用灰黄色小粒砂岩研磨而成的坐式佛雕，佛像有光环背衬，双手交叉于腹部，佛像残高 9.6 厘米（图九，8）。该佛像附近，还出土了一些石质浮雕佛像的残块（图九，10—12）。

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三件生铁质的铃铛，形状类似风铃草形（图九，5—6），其中有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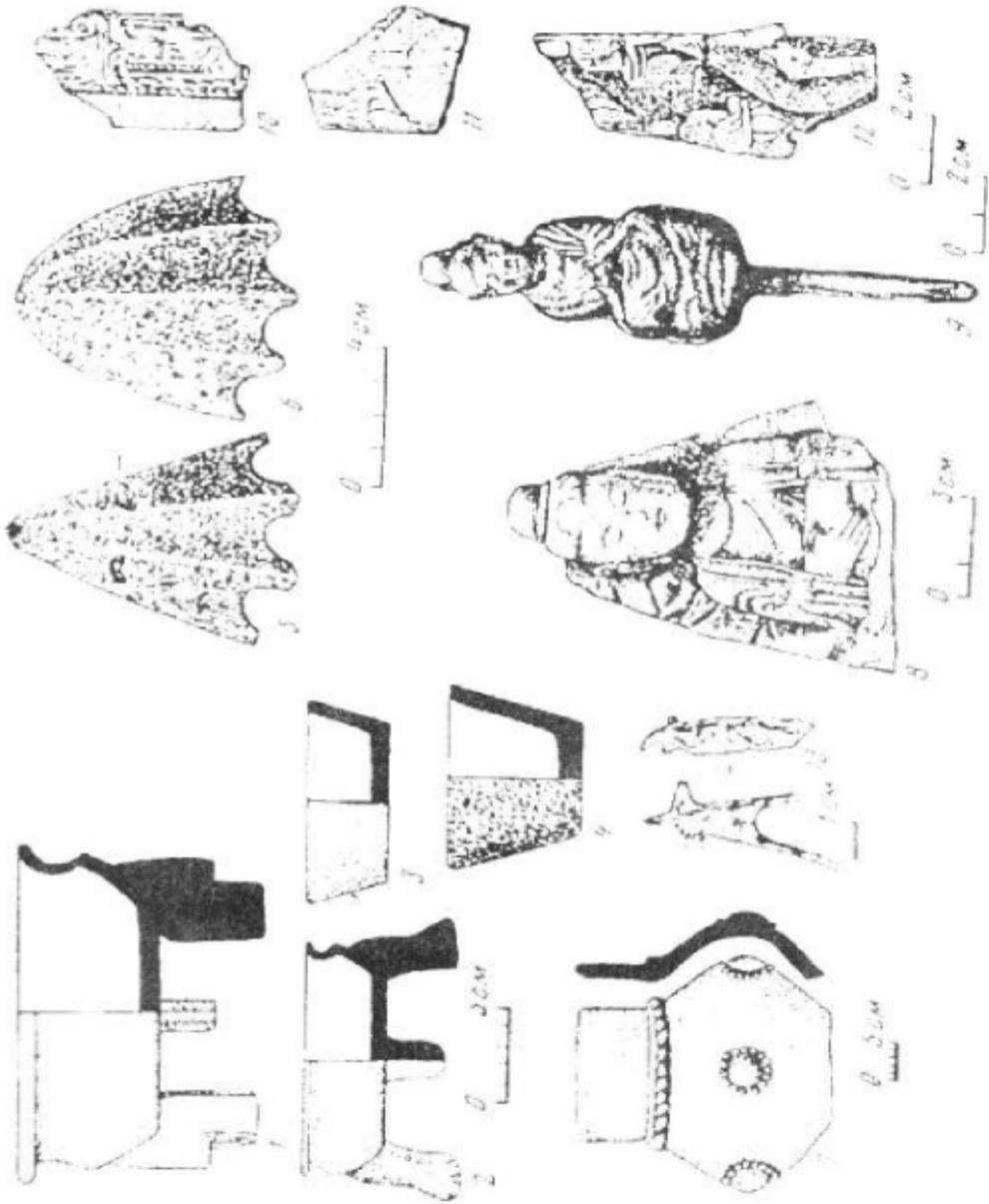
图八 克拉斯基
诺城址出
土的鎏金
青铜佛像

另外两个铃铛呈八棱形,顶部也见有透孔。其中1件的器高为12.3厘米,直径11.9厘米;另1件器高13厘米,直径11.5厘米。

在远东的国家里,佛教寺庙、庙宇的屋檐装饰有铃铛(参考文献53,第354页,图一六),按照古代的迷信传说,铃铛的叮咚之声能够吓跑恶魔。

仔细分析上述三座经过充分发掘,断代为渤海时代的佛教庙宇,可以发现它们具备一系列的共同因素:它们均修建于人工形成的平台上,平台的周围加固有石质砌体;庙宇的门道是借助于台阶完成的,门通常位于建筑物长方向的平台中部(参考文献87,图三三一三五);在平台上矗立起柱廊结构的庙宇,柱子是木构的,其基础是础石,有些情况下础石的大部分石体埋入土中,有的础石则是简单地成排平铺于地表,础石的间距约1米;庙宇的平面呈长方形,屋脊的走向同于建筑物的长方向,屋脊上装饰有雕塑的鸱吻,屋顶为四坡顶,铺瓦,房檐悬挂有铃铛。

依据Э.В.沙弗库诺夫的发掘材料,日本的研究者对杏山寺庙址进行了复原尝试,他们提出了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1.寺庙建筑是方形的;2.雕塑装饰物不是装饰在建筑物的最上部,而是位于倾斜脊上(参考文献258,第128—132页)。的确,按照庙宇的面积来看,建筑物是方形的(7米×7米),不过在此处完全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柱础石明显地被扰动过。至于雕塑装饰物鸱吻,它的位置只能是位于屋顶的横脊之上(参考文献17,图57)。



图九 陶、石、金属制品

1-12.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13. 查山村落址出土。

上文已经说过，庙里对着庙门的位置是摆放佛教诸神的供台处所，该处还发现了一些宗教器皿的残片。

滨海边疆区维佳兹海湾出土的佛教庙宇造型的青铜牌饰，对于构拟佛教庙宇具有特殊的意义。牌饰侧向高约 7.5 厘米，宽约 4.3 厘米。庙宇的屋顶造型，其侧檐明显伸长，檐角飞翘，屋顶铺



图一〇 维佳兹湾出土的青铜牌饰

瓦。屋顶上部展现有两个鸱吻，鸱吻张嘴状仿佛支撑着屋顶横脊。

寺庙内侧中部为团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造型，佛的双手交叉于腹部（图一〇）。

需要强调的是，马蹄山寺庙址、杏山寺庙址修筑有围墙院落，并且地处村落之外。而且，按照Э.В.沙弗库诺夫的观点，马蹄山寺庙址在时间上要早于杏山寺庙址（参考文献197，第91页）。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与上述寺庙址一样，有相同的地理位置。克拉斯基诺庙宇修建于城内，大概，该寺庙的社会地位要比前三者高得多。

尽管佛教的祭祀建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建筑方式的所有基本准则恪守了好几百年。日本研究者认为，在形式上，滨海地区的渤海寺庙与在印度、中央亚细亚看到的寺庙有许多的共同相似之处，而渤海的文化则明显继承了高句丽文化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地处东亚文化公共交往的中心，是主要的史料来源地（参考文献258，第127、132页）。

第二节 农业经济与猎取业

编年史资料表明，渤海国的东北部疆域包含了滨海地区，当

时当地的居民从事畜牧业、狩猎业、捕鱼业（参考文献 197，第 63—65 页）。然而，考古发掘材料则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滨海地区渤海居民的经济生活活动情况，它们比编年史所反映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全面得多。

公元 8—10 世纪，耕作业在滨海地区居民的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耕作业起源于更早的时代（参考文献 142，第 3—13 页）。无论是以稳固的定居生活为前提的遗存的地理位置，还是遗存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耕产品、畜牧产品均已证明了这一点。遗址所处的地区，一般为腐质性土壤，土质疏松，土质好又较少受潮湿的影响，非常适宜于耕作。看来，渤海人在选择生活区域时非常留意环境因素，因为疏松的冲积土壤最适宜于用犁耕耘（参考文献 168，第 216—217 页）。除此之外，这样的土质非常肥沃。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中，获取了碳化的大豆和荞麦；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的渤海堆积中，见有狗尾草籽、灰菜籽、同时还出土了耕作的大麦、黍，但这些尚不足以充分说明滨海地区 8—10 世纪时期培育出来的作物。不过，在发掘更早的遗存时，曾出土过粟粒、大麦粒、黍（参考文献 7，第 224 页、267 页；文献 119，第 148 页），毫无疑问，渤海人也培育出了这些作物。文献史籍证明，渤海国培育出了各种各样的作物，如旱稻、几种麦类、粟、黍、荞麦（参考文献 48，第 84 页）。

关于园艺业的发展以及经济作物的栽培等情况，可以根据渤海遗址所在地见到的荒芜的杏类、乌苏里李树、日本樱桃、桑树、大麻等植物来加以判断，显然，在 8—10 世纪时期，这里就已经开始栽培它们。泥质纺轮和瓦能够间接证明经济作物的栽培，在瓦的内面清楚地观察到粗糙的织物拍纹。

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农耕工具证明了耕作业的存在，而遗存中出土的农业经济遗物组合基本上可以分析从春耕开

始到贮藏收获为止的耕作的全部工作周期。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残断的生铁质的犁铧、犁镜。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的灰坑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犁铧，该犁铧的形状类似没有鞋后帮的尖头矮靰皮鞋，平面形状则近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图一一，4）。犁铧的上面平坦，靠近上面的基线有一个近三角形的透孔，借助于此透孔把犁铧固定在耕具的头部。朝向陇沟的下面为凸面，凸面的底线有一个椭圆形的大凹槽。铧通长 32.5 厘米，底边宽 27 厘米，重 3.4 公斤。该犁铧的形状与女真时代同类器物几乎完全相同，在结构上与高句丽、新罗、中世纪时期日本的犁铧接近（参考文献 23，第 9 页），类似的犁铧见于满洲的渤海遗存之中（参考文献 241，第 97 页，图 25）。

生铁质犁镜的残块已无法复原其原貌，可以认定的是，借助于环扣凸体，犁镜固定在耕具的前端支架上。有 1 件犁镜的残片上，曾见到这样的凸体。高句丽人、女真人使用犁镜。

耕作工具只是用于土地的粗耕，耕地进入播种状态进行的一系列其他农业技术措施必须借助于辅助工具。在青石崖遗址的早期中世纪时代堆积中发现了一件铁锹残片，铁锹为略显凹面的宽宽的扇形，锹的套筒不密合（参考文献 6，第 161 页）。类似的铁锹曾见于滨海地区的女真遗存之中（参考文献 33，第 128—129 页）。

在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一件铁杵头，它也可以列入土壤耕耘的辅助工具之中。铁杵头的工作面即角锥形的尖部，横剖面呈长方形。杵头通长 17.5 厘米，尖头长 8.2 厘米，宽 2.4 厘米，厚 1.8 厘米，套筒直径 3.8 厘米。青石崖遗址中，出土了 5 件铁杵头（参考文献 8，第 163 页）。女真人使用铁杵头。

众所周知，使用耕具的农户应该对这样一些辅助工具有所了解，如耙，翻耕时用耙捣碎土块，平整田地里收割物的残存物，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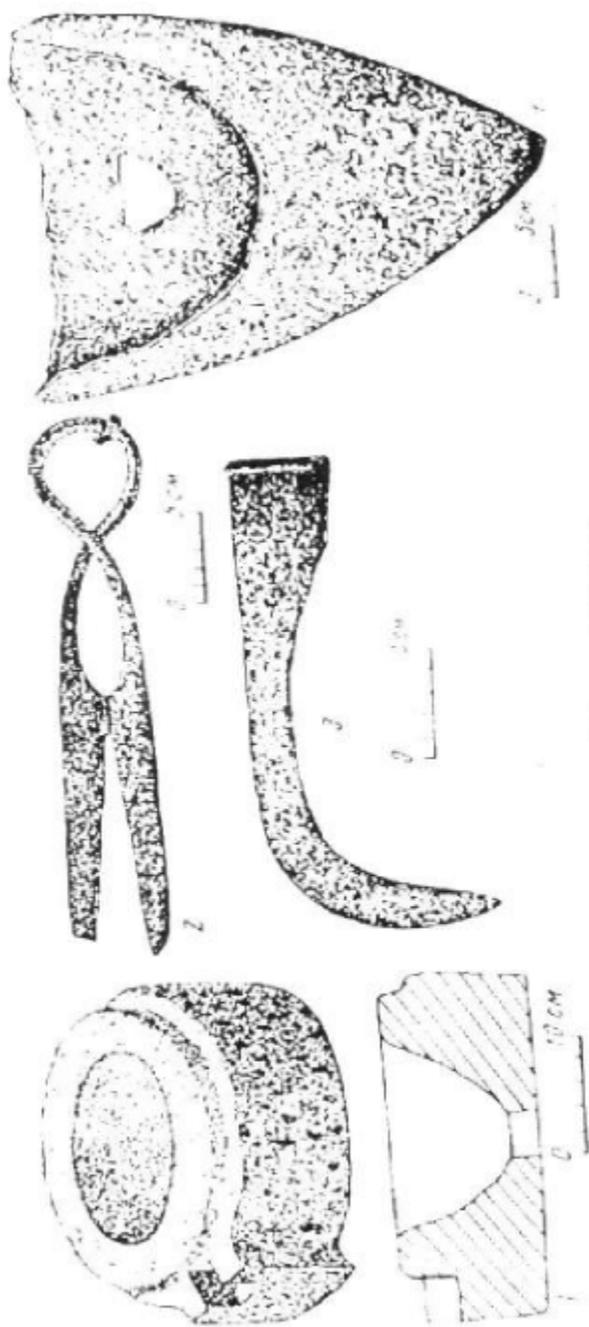
除杂草。想必渤海人了解耙，不过目前尚没有发现任何耙的部件。这种情况或许可以推断为，耙完全是使用木料制作的。不太久远以前，满洲的农民曾制作木质的耙（参考文献 174，第 146 页）

在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青石崖、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了专门用于收割庄稼的工具—铁镰（参考文献 8，第 163 页；文献 165，第 66 页），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镰（图一一，3）。这件完整的镰，器身略微弯曲，刃部平缓伸直，喙状刃端削尖，按照背部尺寸镰长 19 厘米，靠近柄部的最小宽度 3.5 厘米，刃部呈楔状剖面。镰没有柄，借助于几乎折成直角的平坦的镰身后端，把手和镰成直角固定在一起。女真人继续使用这种类型的铁镰（参考文献 23，第 10 页）。

在渤海遗存中出土了这样一些工具，它们能够证明禾谷作物、豆类作物脱壳变成米、面粉的方式。例如，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臼，臼的用途是使薄壳谷类作物脱壳，把谷物加工成米。臼是用大块的玄武岩或砂岩凿制而成，臼的漏斗剖面呈锥形，其直径 18 厘米—20 厘米，深 20 厘米。

除了臼，渤海人还利用了手使小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杏山村落址出土了手使小磨的磨盘。杏山村落址出土了用玄武岩制作的碗形磨具，磨具直径 30 厘米，器高 11 厘米（图一一，1）。该磨具漏斗本身的直径为 12 厘米，下部中央的漏口其直径为 4 厘米，往该漏口里安装枢轴以固定磨。磨具碗形漏斗器壁外面完好地保存下一个凸出部，在凸出部的上面凿制出一个不大的手柄凹口。手使小磨的出现证明，耕作业在渤海人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增长。

在发掘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时，发现了粮仓，粮仓是一个长方形的坑体，规格 50 厘米×100 厘米，深 50 厘米。坑体的底



图一 农业工具

1. 杏山村遗址出土 2, 4.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3.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部填充有一层碳化的大豆，剩下的坑体空间为草木灰、木炭块所占据。显然，它们是烧焦了的粮食与安装在坑内的木箱的遗迹。滨海地区女真时代存在这种方式的贮粮方法（参考文献 33，第 118—124 页）。

几乎在所有的渤海遗存中均遇见了大量的家畜骨骸，但并非所有的骨骸均进行了骨学收集。只有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骨骸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该城址得以确定了动物种类的个体数量以及家畜的年龄构成，并对该城址 8—9 世纪上半叶文化层与 9 世纪下半叶至 10 世纪文化层动物群的构成进行了比较鉴定。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

科耶村落址出土的动物骨骸能够阐明的只是动物种类的构成以及一定程度上家畜的年龄指数。

文献史料中缺少滨海地区的渤海人养牛的信息，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骨骸中，牛占家畜数量的 11.8%；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下层堆积中，牛占家畜数量的 16%；在该城址的上层堆积中，牛的比例已经达到 19.6%；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的渤海堆积层中，牛占的比例达到 29.3%；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牛所占的比例增长到 37.5%（参考文献 4，第 81 页）。尽管有相当多的牛的幼年、未成年个体，但占优势的是成年、老年的牛的个体。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如果说在其早期阶段即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上半叶堆积中，未成年牛的比例占牛类的 42.3%；那么到了公元 9 世纪下半叶及 10 世纪时期，即在该城址的上层堆积中，未成年牛的比例已经减少到了 32.2%。作为肉食品，被屠宰的幼年、未成年牛的个体份额的减少，可以视为是家畜饲养条件的改善以及牛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范围的拓展。骨学材料揭示的牛在动物群中数量的增长，与其说是以满足肉食需要为前提，还不如说是牛被利用于繁重劳动的需要。遗存中出土的遗物材料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与生铁质耕具并排，出土了车的构件——生铁质的销栓、轂（图一二，17、18）。

文献史料提供了有趣的渤海人养马业的信息，渤海国时期，现在的兴凯湖—乌苏里平原地区隶属于率宾府，这里作为最著名的养马业中心而闻名于世（参考文献 197，第 63 页）。渤海人用马同中国唐朝进行贸易，晚些时期曾把 1000 匹马作为贡品献给了契丹（参考文献 197，第 55 页）。编年史、考古学材料表明，马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之中。渤海人的一些习俗与军事训练有关，如骑马射箭比赛、玩马球等等（参考文献 197，第 111 页）。与利用马作为骑具相关连的物品，见有鞅具饰品构件——骨质的饰件（图一三，4）、铁质的马勒环、马肚带扣环（图一四，5—9）。和靺鞨人一样，渤海人利用马作为耕作畜力。

所有已发掘过的渤海遗存中均出土有马骨，在新戈尔杰耶夫

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马骨占所有家畜总量的 6.5%；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马骨所占的比例为 10.2%；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下层堆积中，马骨所占的比例为 13.7%；在该城址的上层堆积中，马骨所占的比例为 15.6%；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马骨所占的比例为 22.5%。上述材料表明，马肉曾被食用，屠宰的主要是成年、老年马匹，这一点多半可以证明，马这种家畜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军事领域（参考文献 5，第 75、78 页）。

养猪业在渤海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处现今滨海地区境内的郑颌府其经济以养猪业而驰名于世（参考文献 197，第 163 页）。因此，在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中经常且大量地出土猪骨便不是偶然的了。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在其出土的家畜骨骸中，猪骨占有优势。在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中，猪骨在家畜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67.9%；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中，猪骨所占的比例为 63.3%；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中，猪骨所占的比例约为 42.4%。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的骨学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情况，该城址属于滨海地区渤海遗存的北部遗存之一，在该城址中，猪骨所占的比例仅为 27.5%（参考文献 4，第 81 页）。

骨学材料证明，公元 8—10 世纪时期，在滨海地区居民的畜牧经济中，养猪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自然气候条件适宜于养猪业的发展，饲养大批的猪主要依靠牧草，不需要特殊的开支。

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渤海房址中埋藏有猪头，这种情况大概具有祭祀性质。不排除一点，和高句丽人一样，渤海人把猪视为生殖力的象征，猪与祭祀用畜有关（参考文献 68，第 166 页）。

在骨学材料中，见有许多狗的骨骸。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骨学材料中，见有大量的狗骨。在该城址的上、下建筑平面中总共清理出 246 只狗个体的 860 块骨块，它们占家畜总量的 25.8%。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中，狗骨占家畜总量的 12.6%；在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中，狗骨所占的比例为 13.8%，而

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的渤海堆积中，狗骨所占的比例仅为7.1%。大多数情况下，狗骨属于未成年、成年个体，未发现狗的老年个体（参考文献4，第81页）。按其生物学特征，狗的饲养需要与猪基本上差别不大，因此，养狗在经济中收益颇大。

滨海地区发达的铁器时代的遗存中，曾出土过羊的骨骸（参考文献7，第239、241页）。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与羊骨类似的骨片，它们仅占家畜各类骨骸总量的0.04%。一些考古学器物证明了羊的存在，例如，厚重的纺轮，借助于纺轮把羊毛加工成毛线（参考文献154，第100、101、105页），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中，出土了用于剪羊毛的弹性剪刀（图一一，2）。显然，由于极不适宜的气候条件，滨海地区渤海人的养羊业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

在渤海遗存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数量不多但富于表现力的农业经济遗物，大体上提供了反映公元8—10世纪时期滨海地区耕作业高度发展的足够令人信服的情况。手使小磨的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耕作业其中首先是谷类作物的培育在经济中作用的增长。与此同时，耕作业的发展与畜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畜牧业中，养猪业起着主导作用。

同以往的时代一样，滨海地区的渤海居民在发展耕作业、畜牧业的同时，还广泛地从事于攫取性经济——狩猎、捕鱼、采集、森林与海洋猎取业。在这方面，文献史料记载有渤海人供应国外市场的产品清单：虎皮、豹皮、貂皮、海豹皮、黑熊皮、白熊皮、野狸皮、白兔皮、獾皮、獾皮、青鼠皮、银鼠皮、鲸鱼睛、苍鹰、鸽子、大马哈鱼、鲑鱼、干鲤鱼（干文鱼）、鲫鱼、人参、白附子根、松子、麝香、蜂蜜、蟹、雕羽、雉尾（参考文献197，第63页）。

考古发掘过程中收集到的骨学材料表明，在滨海地区渤海时代居民的经济活动中，猎取野生动物占据重要的地位，通过分析骨学材料，得以确定这样一些野生动物的骨骸占据着比较高的比

例：狼、狐狸、貉、黑熊、白熊、獾、青鼬、狼獾、虎、野猪、麂、梅花鹿、马鹿、驼鹿、斑羚、野兔、海狸、远东鼯鼠以及一些其他小啮齿动物，还有一些禽类。在这些动物中，占优势的是大型有蹄类凶猛的哺乳动物（参考文献4，第78页；文献165，第69页）。

弓箭是渤海猎户所使用的武器中主要的器物，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大量出土的骨质、铁质的镞，以及复合式弓箭的构件来加以判断（图一五—一七）。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渤海遗存中大量出土的镞，多数只是用于狩猎（参考文献162，第98—111页）。

和狩猎一样，在渤海人的经济中，捕鱼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常有出土的钓具部件、捕鱼网具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首先是鱼钩（图一二，5—10），在发掘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时曾出土有鱼钩。所有鱼钩均为铁质，器长4厘米—7.2厘米。鱼钩钩身剖面通常为圆形，鱼钩尖部带有单面或双面的钩齿。有这样一种形制的鱼钩，钩的颈部无论是否带有用以固定钩线的刻纹线，但都带有压扁的环圈。此外，见有带铅坠的鱼钩，铅坠牢固地卡在钩的颈部，铅坠近似三角形或锥形，这种鱼钩颈部带有刻纹，钩尖不大，朝向颈部（图一二，8—9）。

网坠是比较常见的遗物，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以及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乌德斯纳耶村落址均出土过网坠（图一二，11—16）。

渤海的网坠具有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网坠的剖面呈长方形，横侧器身接近边沿处有宽0.2厘米—0.5厘米的粗糙的槽形夹口。网坠通长3厘米—4厘米，宽1.7厘米—3厘米，厚0.6厘米—1.5厘米，重12克—31.4克。该型网坠所使用的材料是泥土或砂岩（图一二，12—14）。

第二种类型，网坠的剖面呈长方形，网坠的边角处有2个或

4个直径为0.3厘米—0.5厘米的穿孔。网坠的通长3厘米—6.7厘米，宽2厘米—3.6厘米，厚0.75厘米—2厘米，重16.4克—70.4克。该类网坠所使用的材料是砂岩。

第三种类型，网坠的剖面呈厚重的球缺形，网坠为砂岩质，有横向或纵向的槽形夹口，夹口宽0.35厘米。见到一件该类型网坠的完整个体，通长8.3厘米，厚1.7厘米—3.1厘米，重74.1克，网坠一面是平面，另一面是凸面。另见一些该型网坠的残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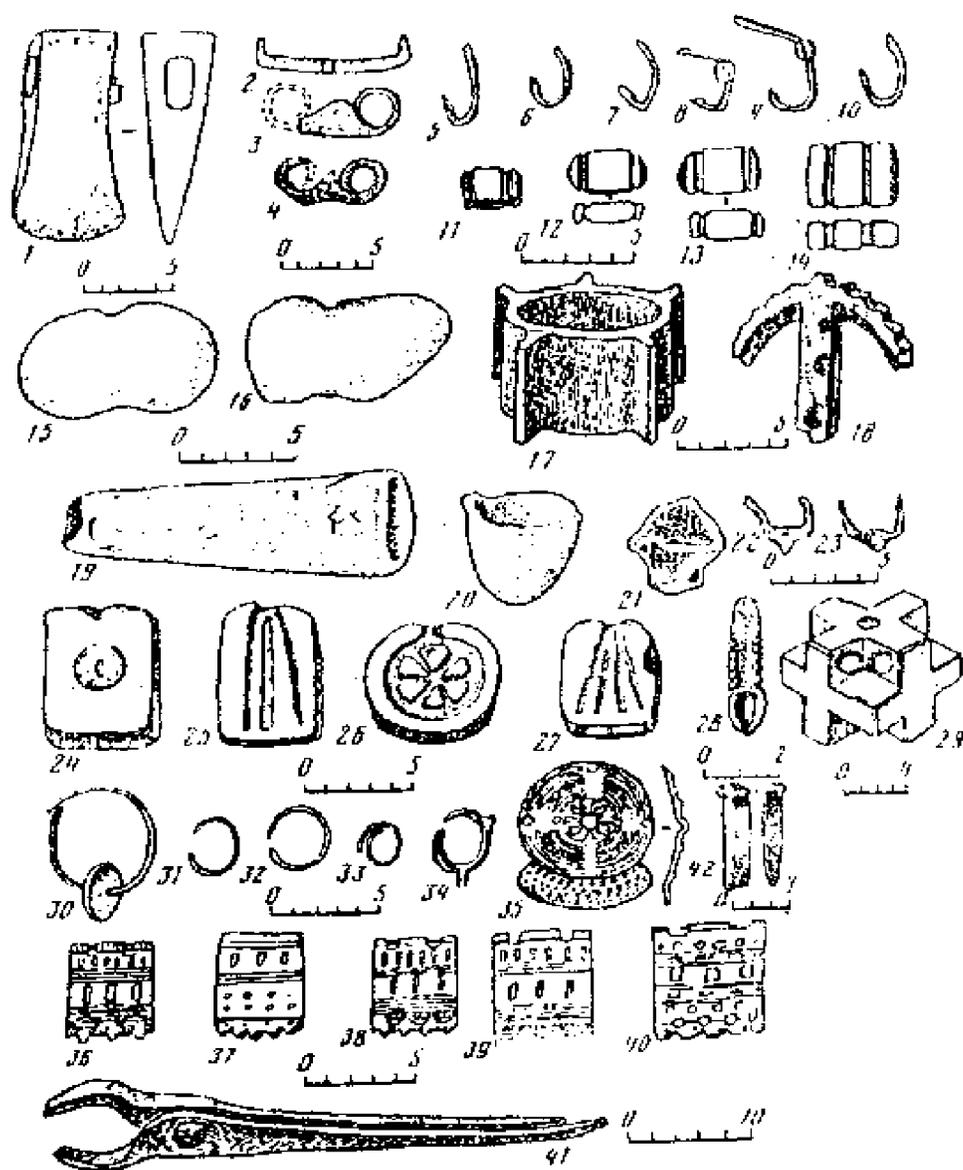
第四种类型，为不大的椭圆形的泥质网坠，侧面有较深的槽形夹口。网坠厚0.6厘米，通长3.8厘米，重7.6克。

网坠运用于不同规格网眼的网具上，与其相应使用了不同规格的网坠。没有诱饵的滚网，靠近网底部位使用的网坠应该是重量较轻的网坠（参考文献174，第195页）。渔猎工具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依据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一年中的季节，河岸特点（陡岸、平缓河岸），水体情况（山间小溪、湖泊、带有潮流的河湾）。必须注意的是，同一种水体根据水流对河底的冲刷、水质条件、冰期等情况也会发生变化。

劳动工具中，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与森林采掘有关的工具，如用于剔取人参根须的骨质挖掘工具（图一三，9—11，13）。工具是用动物的肋骨加工而成，器身扁平略有弧度，有些器物上端带有直径0.3厘米的穿孔，工作端面呈尖状或椭圆形轮廓。器身通长13厘米—34厘米，宽0.9厘米—1.7厘米，厚不超过0.5厘米。类似的挖取人参的工具，不久以前尚比较广泛的为兀的改人（参考文献15，第238—245页；文献34，第85页；文献110，第141页）以及与滨海地区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居民所使用（参考文献173，第42页）。

第三节 手工业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获取的考古学材料，意义特殊的是与铁



图一二 陶、石、金属制品

1-4, 7-10, 12-13, 22-23, 29, 31-34,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5-6, 11, 14-15, 19-21, 24-28, 36, 42, 新戈尔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16, 斯梅奇科村落址出土 30,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35, 阿姆古河流域采集品 37-40, 新巴克罗夫斯克墓葬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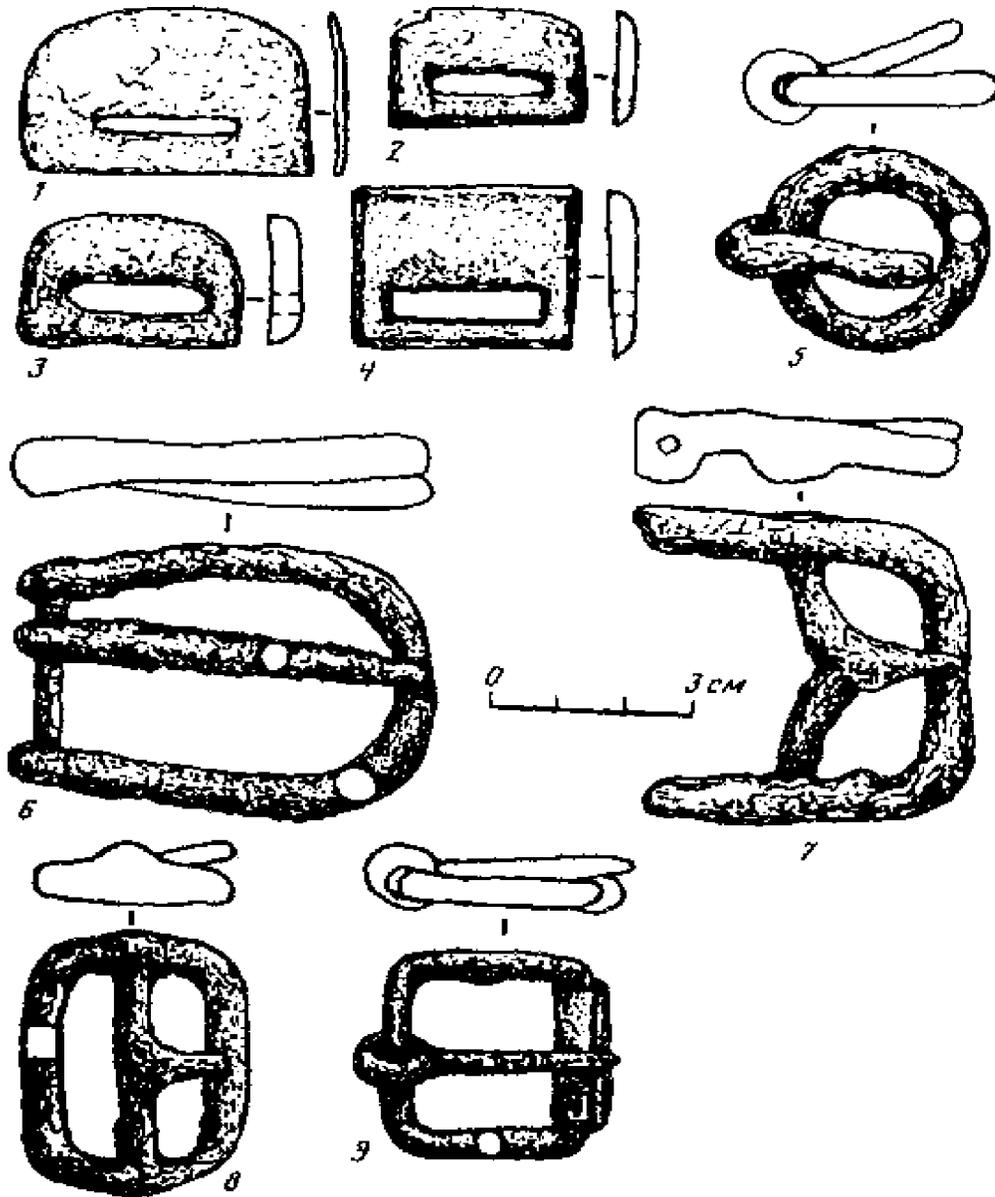
器制作业有直接联系的遗物种类, 在某种程度上, 铁器制作业是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指数(参考文献 122, 第 63 页; 文献 123, 第



图一三 骨器

1. 杏山村落址出土 2, 5, 8, 12, 13,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3, 4, 6, 7, 9, 11, 14,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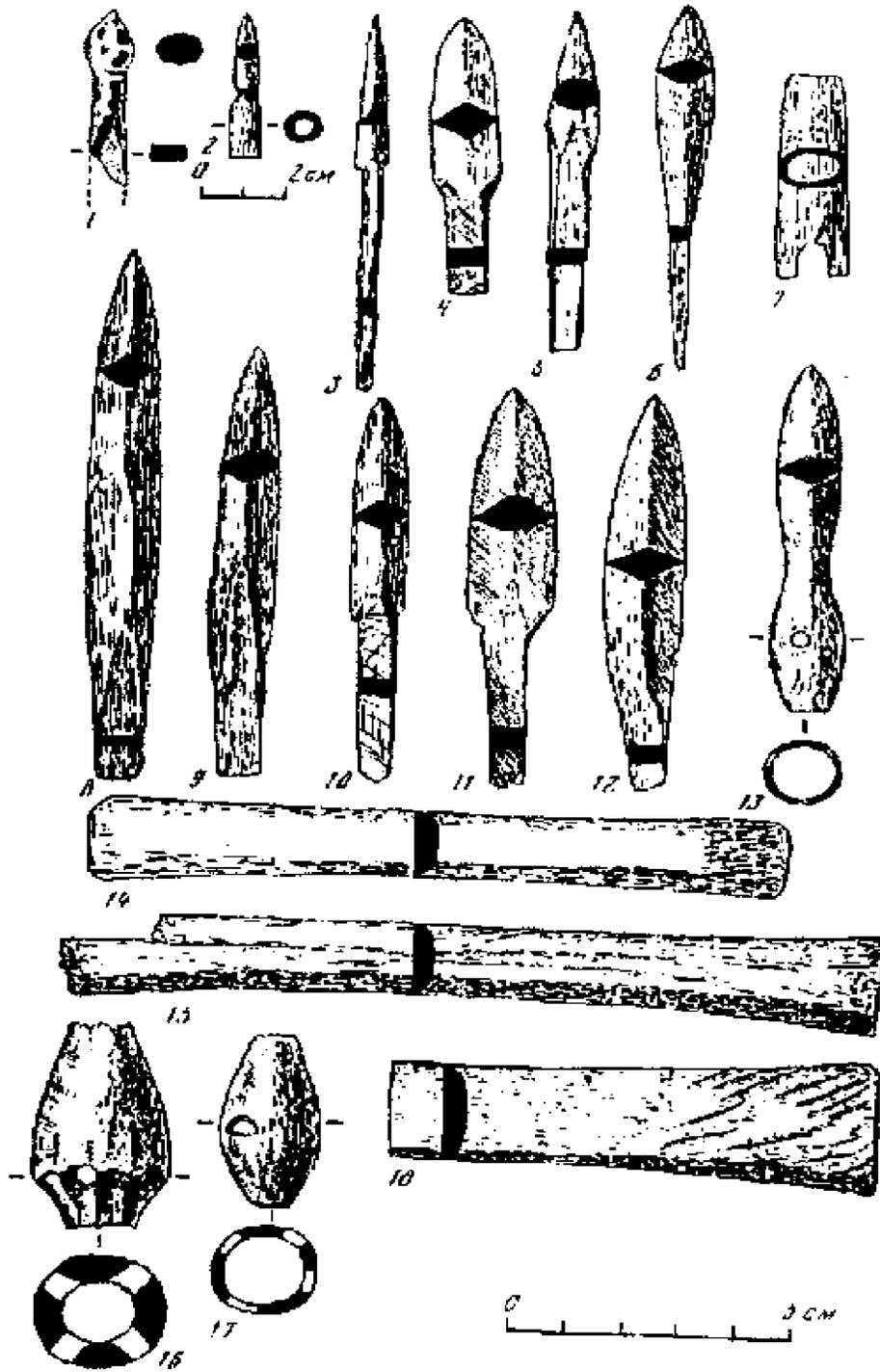
383页)。渤海遗存中出土的大量的生产剩余物如熟铁块、需要进一步加工的铁锭、溶渣、生铁铸件残块、碎铁片等等，它们证明了渤海人曾从事冶炼、加工黑色金属的活动。目前已知的生产性质的设施是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发现的锻铁炉、熔化炉以及与它们工艺过程有关的炼渣坑等遗迹，此外，这两处城址中还观察到熔化铁矿石的迹象。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城墙外侧，发现有熔炼造坑，坑内填充有炼渣。坑壁、坑体底部用石块密实铺砌而成，石块受到了焙烧和造渣的高温影



图一四 铁质腰带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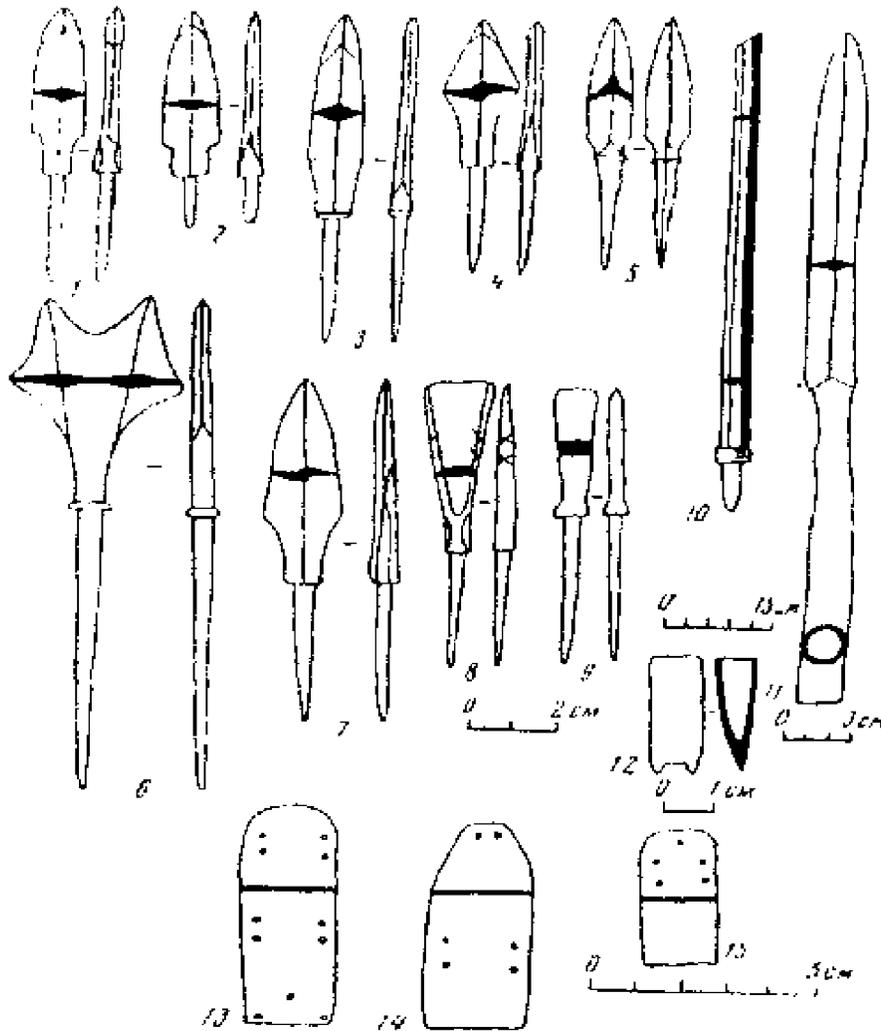
1, 2, 9,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3, 4, 6,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出土
5, 7, 8,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响。遗憾的是，无法对生产设施的结构进行充分的复原，但通过大量的明显烧烤过的涂块、壁体石块上的挂渣、大量的溶渣，可以把该遗迹视为熟铁吹炼炉。



图一五 骨镞、复合式弓的骨质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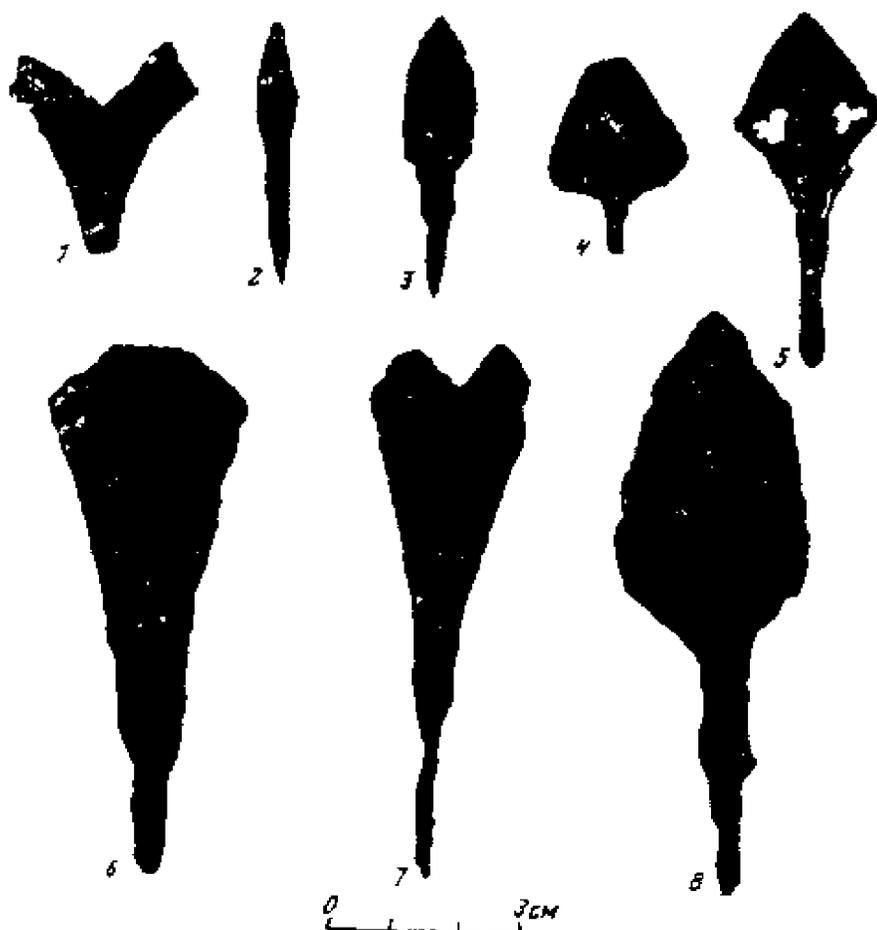
1, 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城址出土 2, 4, 5, 8—12, 14, 15, 18,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3, 17,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6, 7, 13, 16,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



图一六 武器

1—4, 6—9,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5, 鲁达诺夫斯科耶2号村落址出土 10—11,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13, 14,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15,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 12, 杏山村落址出土

渤海主要的手工业地区，即与金属加工有关的地区分布于中



图一七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铁镞

心府区域，例如，铁州位城以产铁而驰名（参考文献 197，第 63、125 页）。滨海地区最早的考察者们著录了渤海国外围府区与金属加工有关的迹象，例如，③。阿涅尔特在滨海地区进行地质勘查时，注意到了古代的采矿坑道和熔炼遗迹，并把它们归入了渤海时代。他写道：“……渤海人时……已经能冶炼铁、铜、铅银矿石，开采黄金，而且，在奥尔加湾区域出土的铸制的铁锅，大概，是渤海人的杰作。”（参考文献 9，第 11 页）。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缺少可靠的有关渤海人采矿的考古学材料，不过，正如分析渤海城址出土的矿石所展示的，出土的矿石与目前已知的附近的呈矿

现象相近。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矿石按其地球化学特征，接近新雅罗斯拉夫斯克矿产地的矿石，该矿产地距城址 60 公里，开采矿石始于古代（参考文献 117，第 199 页）。同时，地区间的地质构造非常接近，可以推测，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附近存在类似于新雅罗斯拉夫斯克矿产地的小的呈矿现象，这样的呈矿现象非常适宜于渤海工匠开采。完全可能，渤海的冶金工作者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能够利用褐铁矿、铁夕卡岩（变质矿床群），后者是富含铁的磁铁矿。

引起学者极大兴趣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作为锻铁炉遗迹的生产集合，该类遗迹保存下来的只是掘入生土的容积为 0.06 立方米—0.23 立方米的坑体，里面填充有由拱顶塌落的石块和泥质涂块（参考文献 163，第 13 页）。城址内共清理出 7 个锻铁坑体，其中有些坑填充着炼渣；其他坑体的附近发现了凝结有青铜滴的坩锅，通风管残片、变形的陶器，矿石块（参考文献 214）。锻铁炉附近发现的矿石块、熟铁块、石砧，为我们提供了推测依据，这些遗迹是用于加热熟铁，然后进行锻打，再用石砧去掉炉渣。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见有比锻铁炉保存得更好的炼铁炉，炉呈长方形，规格 1.3 米×3 米。炉的墙壁是用石块立砌而成，墙壁上、塌落的拱顶上、炉底涂抹了一层烧烤过的涂料。炉内堆积为草木灰，其中混杂有炭、涂块。炉的东墙上有一个宽 28 厘米的缺口，缺口附近多半是炉口，其附近发现有生铁水、坩锅残块、未使用过的小浇桶，一些大石块。炉的南壁上，见有两个透口，显然，是炉的吹风口。众所周知，没有吹风口，不能完成冶炼过程（参考文献 97，第 32 页）。

炼铁炉的东侧，与通风口直接毗连有一个宽大的坑体，坑内填充有灰壤土、涂块、大量的炉渣。堆积中还见有轮制、手制的陶器残片，坩锅残块，生铁块，生铁水，各种铁制品。按其填充

物来看，该坑是一个炼渣坑，用于倾倒冶炼废渣。炉口前直接存在渣坑这种情况，是滨海地区女真时代赛加城址、拉佐城址、斯卡里斯塔耶城址修建熔铁炉的工艺特征（参考文献 112，第 81 页；文献 114，第 79 页），这一点表明，大概与金属加工相关的生产设施存在继承性。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还揭露了锻造作坊遗迹，作坊修建于基座之上，作坊的面积 70 平方米。作坊的生产客体是 9 个呈直线分布的锻造坑，坑深 40 厘米—60 厘米，直径 60 厘米—90 厘米，坑内堆积有一层压实的草木灰，草木灰上部覆盖有涂块。锻造坑堆积的特点是，草木灰中不见炼渣和金属，结合作坊里出土的 27 块磨刀石、铁矿石块、镞、刀、卡钳，以及作坊址附近出土的镞、刀的坯料，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锉刀的坯料，这些情况为我们把这些坑体视为锻造作坊客体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在作坊里，利用锻铁炉加热需进一步锻造加工的坯料。

需要指出的是，在发掘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过程中，考察者们在该城址揭示了两层建筑平面。下层建筑平面属于渤海国形成时期，上层建筑平面属于渤海国的繁荣期（参考文献 214，第 90 页）。与金属加工相关的生产客体多数属于上层建筑平面，可以说此时的城址是发达的冶铁手工业中心。

目前，渤海金属加工手工业者专业工具的出土种类尚不是很多，首先属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熟铁钳（图一二，41），这种钳的特点是长把，有一个用于夹熟铁的大大的圆形钳口，钳器身通长 50 厘米，钳口长 10 厘米。毫无疑问，渤海的锻工匠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使用了锻造钳，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多是一些残器。用于金属冷加工处理的凿，其特点是尺寸不大。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凿（图一二，42），通长 5 厘米，刃宽 1 厘米，凿的背部明显铆平，表明在工作中凿使用的比较频繁。

大量的渤海铁器上有不同规格和形状的穿孔，只有借助于专门的工具——冲子，才能做出这些穿孔。渤海工匠有大量的冲子，在工作中使用了圆形或长方形截面的冲子，冲子的长度 4.4 厘米—11 厘米，在发掘克拉斯基诺城址的过程中曾有出土。

渤海工匠加工金属使用的最复杂的工具之一是锉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锉刀的残片，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则出土了一把完整的锉刀，这把锉刀通长 17 厘米，长条形截面，锉刀带有一个安装把手的短柄，锉刀的平面上有简单的单排刻划纹，纹饰是手工刻划的，垂直于背轴，纹饰的齿距 0.3 毫米—0.4 毫米。

几乎每一座经过发掘的渤海时期的城址或村落址都大量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铁器：劳动工具、武器、日常用品、马具、装饰品和祭祀用品。必须指出的是，倒塌的锻铁炉址、熔铁炉址，以及冶金工匠的工具确凿地证明了渤海遗存出土的黑色金属制品是当地工匠制作的。

为了研究渤海手工业者冶金生产的水平，对大量的各种制品进行了分析研究。被考察的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刀，14 把；其次是火镰、镰刀及 16 枚各式铍。生铁制品包括 11 件锅和不大的容器的残片，4 件板车车毂残片，犁铧残片，犁镜，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生铁铸块。

研究结果表明，渤海的锻铁匠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了熟铁，并且在锻铁炉中获得了含碳不均匀的低碳钢、中碳钢。所有黑色金属制品的化学成分彼此差异不大，也可以说它们几乎完全一致。磷的含量不超过 0.07%—0.029%，硫，硅的含量也很低，这是利用直接炼铁法获得的铁的特点。被测试的标本几乎完全不含锰，表明炼铁所使用的矿石不含锰。铁一般均锻造得比较好，仅含有少量的炼渣夹杂物，显示出渤海工匠相当高的职业水准。在加工不是很大的各种规格的锻制品时，他们能够正确地调配温度状态，这

一切表明了当时的锻造生产工艺具备的发达水平。

被测试的铁器制品绝大多数是刀，按照柄和背的连接方式，刀可以分为两型：一型，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71%，柄和背平缓相接；二型，刃和柄的中间阶段有突节。

研究表明，大多数刀的刃部组织锻造时使用了中碳、低碳钢。仅有两件个体测试出铁素体组织含有炼渣夹杂物，表明制作这种刀时使用了普通技术的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把刀出自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的下层建筑平面。

大多数被测试的刀，它们的钢质能够进行淬火处理，是热处理。它们使用的是固体淬火处理（马氏体结构），或淬火后高温回火处理（索氏体、屈氏体结构）。它们既使工匠加强了刃部的硬度、强度，同时又保持了刃部的可塑性，这对于刀的下一步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分析结果能够证明，渤海工匠的热处理工艺已经相当完善。未能揭示出证明金属热处理时过热状态的组织，想必，根据不同的制品工匠选择了不同的淬火处理方式：水、油、脂肪，或简单地在空气中冷却。

制作刀时最复杂的工艺，是不同含碳量的坯料的熔接工序，它要求锻工有高超的职业技能、技巧，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刀的测试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制作刀的过程中，熔接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淬火后回火，刀的索氏体组织证明了此。

农业经济劳动工具和日常用品的生产工艺情况，测试分析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一把镰（图一一，3）、2 把火镰（图一二，2、4），以及一些钉子和条形铁。镰是用钢使用锻造工艺制作的，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了用含碳钢制作的括号形、挂锁形火镰，其中，括号形火镰有相当高的碳含量，达到了 0.63%，2 把火镰进行了热处理——淬火。

对于生产用途的普通铁制品的生产制作，不要求特殊的改善其制作质量的工序，但钉子、挂锁环、铁环、角铁等经济生活必

须品的制作，工匠运用了普通的工业用铁的锻造方法。

渤海镞的微观组织成分的测试结果表明，按照工艺制作特征，镞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型，此型镞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62.2%，该型镞用铁、低碳钢制作而成，未进行补充热处理。它们的特点是呈铁素体组织或含有部分珠光体的铁素体组织，显微硬度为 119—180 公斤/平方毫米。

二型，所占比例为 37.5%，它们是用中碳半成钢制作而成，制作时工匠使用了专门的工艺方法以获得高质量的制品。在微观组织分析过程中，4 件索氏体组织镞个体的显微硬度为 320—380 公斤/平方毫米，表明该类镞的最后制作工序是淬火后高温回火，温度为 500—700℃（参考文献 97，第 13 页）。

引人注意的是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梯形头的穿甲镞，对其焊缝进行的显微测试发现，该镞为含有索氏体状的珠光体铁素体组织，这种结构是半成品在空气中冷却形成的，这是获得具有较好力学功能的细粒结构的先决条件。两种质地的坯料—铁和钢熔接在一起后，工匠将其锻制成镞，淬火后在空气中慢慢冷却，进行所谓的正火，这是制品加工方式选择的最佳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焊接的质量不高，熔点缝隙较宽，里面填充有炼渣。通常，这种缺点导致了制品的熔接处分层，非常不利于镞的进一步使用。鉴于被测试的标本较少，很难确定渤海工匠使用钢、铁熔接方式制作镞达到了何等广泛的程度，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较好地了解了不同质地成分金属的熔接过程。考虑到镞的一次性使用，可能，质量更好的金属、更复杂的锻造工艺未用于镞的制作。不过，在制作某些种类的镞时，渤海工匠不仅仅运用了普通的铁、半成钢的锻造方法，而且利用了专业的淬火技术手法，甚至可能，使用锻造焊接以改善其质量。由于较好地掌握了金属的锻造工序，渤海工匠赋予镞以各种形状（参考文献 162，第 98—

112页)。为了这些工序使用了各种铸模，没有这些铸模，不可能锻造出精确成型的镞。

渤海工匠善于用艺术的手法锻造各种形状牌饰和火镰。

用相当复杂的工艺制作的不同用途的各种生铁铸品，证明了渤海人生铁铸造业的水平。目前已知有下列生铁制品：锅、容量不大的碗、铃铛（图九，5、6）、带有犁镜的铍（图一一，4）、车轮的销栓、轂（图一二，17、18）。

渤海工匠铸造的生铁锅，带有器足，直沿，口部上大下小。公元12—13世纪时期，这种铁锅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女真人铁锅与渤海人铁锅的差异在于，一般表现为平底，而不是圆底。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不大的铁碗，尺寸相近，它们的器高4.1厘米—4.8厘米，口径8.9厘米—9.2厘米，壁厚0.6厘米。

渤海人的农业生产工具见有生铁质的铍和犁镜，同时有趣的发现是，类似形状的铍和犁镜持续使用到公元12世纪。按照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完整的铍的形状来看，它与滨海地区女真时代的铍完全相同，与中国的铍则明显不同，但与高句丽的铍极其相似（参考文献21，第129—135页）。

引人注意的是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铸造的六棱角锥形铃铛，其中的三个棱上有半月形透孔。铃铛的上部也有一个透孔，用于系结悬挂绳（图九，5）。

生铁铸造的销栓，借助于销栓把车轮固定在马车的轴上。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1件销栓，长9厘米，带有一个半圆形帽状突棱。类似的销栓见于青石崖遗址（参考文献8，第168页，图19）以及滨海地区的女真时代遗存之中（参考文献114，第83页，图一，7—9）。

马车车轮的轂呈圆柱形，直径8厘米，宽5厘米，厚0.6厘米，外面有侧向的卡栓。这种轂见于青石崖遗址（参考文献8，第

168页,图8)、东京城(参考文献136,第205页,图六,6),并且广泛使用于滨海地区女真时代的经济生活中(参考文献112,第133—134页)。

想必,渤海工匠的生铁铸器的种类很多,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只是渤海人在经济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部分,但即使是相对较少的这部分发现也足以证明渤海手工业者相当发达的生铁铸造技能。

在化学成分方面多数生铁铸器的差异不大,可以说它们大致相同。生铁铸器的碳含量为4.1%—4.4%,未发现合金元素对合金性质的影响。个别情况下,硅的含量介于0.20%—0.27%,大部分情况硅的含量是微量的。硫的含量很低为0.04%—0.09%,而磷含量为0.09%—0.19%。这些情况使我们得以认定,生铁是从褐铁矿类矿石中提取的,提取时用含有硫的木炭作为燃料。生铁的化学成分表明,得到液态融体的生铁温度需为1150℃—1250℃,按当时的工艺水平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下层建筑平面出土了一组数量不多但化学成分特殊的生铁制品,无论是化学成分还是铸造质量这组制品明显不同于其他的生铁制品。这组制品碳的含量达到2.3%—3.6%,表明其工艺过程尚不够完善。与更晚时期的铁器相比,它们含有更多的有害杂质:硫和磷;铸造质量较低,经考察的标本有大量的气孔和空隙,归根到底,这是由于铸器是用准备不充分没有烧透的土质模具制作的。铸器的质量如此之低应该解释为,这是因为渤海国初创时期冶金水平较低。众所周知,渤海国初创时期经济领域迫切需求金属和金属制品,金属制品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用骨器加以弥补。

渤海工匠制作的生铁制品经微观组织研究表明,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铸工使用的主要是白口铁和马口铁,某些标本表现为灰口铁。铸器是按照简单的样式制作出来的,大概,土质铸范迅

速冷却，一方面导致铸铁白口化，另一方面使铸器产生气孔气泡。锅、铍等复杂铸器的铸造，完全可能，使用了可拆卸的模具，模具是经历一定时期的使用并进行各种改造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渤海人铁器制造业所做的分析研究表明，渤海铸工使用熟铁、生铁、钢制作了简单的、复杂的各种类型的器物。他们掌握了一系列工艺工序：生铁铸造，锻造全钢、全铁器物，锻造焊接，热处理加工，冷凿热凿，艺术造型锻造，用锉刀、磨刀车削金属。上述各种各样的工艺方式和大量制品证明了渤海铁器制作手工业的可观发展，而专业化的固定规格的产品则表明，在铁匠中间有很细的专业划分，当很细的专业分工产生、形成后，专业化的手工业也就形成了。完全可能，为邻近地区的居民服务时，手工业者们已经按订单制作器物。

渤海冶金业的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注意，众所周知的如，“在渤海国，贵族的地位与其拥有的铁的数量有直接的关系”（参考文献 48，第 92 页）。显然，这是因为，渤海国繁荣时期黑色金属制品种类的明显增多，以及金属加工水平的发展。中国灭亡高句丽王朝以后，在渤海国找到栖身之地的高句丽手工业者对渤海冶金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 197，第 65 页）。这种情况使得渤海的手工业者把渤海的金属加工手工业，甚至于包括分布于现今滨海地区的渤海府州的加工业发展到相对高于同期其他地区的水平。渤海时期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渤海国同中世纪的其他地区一样，青铜铸造生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利用青铜即铜和它的合金制作的多半是各种装饰品、腰带饰件、马具、器皿、小型家庭用具、祭祀用品。在渤海国，与其他远东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软弱，缺少消耗铜和铜的合金制作铜钱的部门（参考文献 197，第 67 页）。同时，毫无疑问，可能流通一些货币，它们首先应该是唐朝货币。这些

铜钱用于作为辟邪物、装饰品，或者只是作为异国器物，与经济没有直接的联系。

文献史料中缺少有关渤海开采铜矿以及铜的价钱、青铜铸造业机构的详细记载，因此使历史构拟大大地复杂化了。保存下来的文献记载表明，渤海开采铜矿安排在国土的南部地区即现今北朝鲜境内（参考文献 197，第 63 页），同时文献记载有，渤海从日本获取了铜和汞（参考文献 129，第 25 页；文献 197，第 66 页）。渤海国南部地区的铜矿场归属于谁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时期可能存在国有领地和私人领地，公元 7 世纪时期日本的铜矿场可以作为其例证。此时，根据“大宝律令”，允许在未设置国家机构的地区自由开采铜矿。政府对矿工和熔炼工积极推行关税保护政策，向他们提供贷款降低课税，官员发现金属矿藏给予奖励（参考文献 50，第 44 页）。

至于包括现今滨海地区在内的渤海东北部州府，如果不计较有关怀远府（滨海边疆区游击队地区）组织开采金银的记载的话（参考文献 197，第 66 页），文献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矿业发展的记载。这里没有发现渤海时期的矿井或铜矿坑洞，根据间接材料（滨海的中部地区探明大量含金属成分的矿藏，其附近存在大量的考古遗存）可以推测，这里曾开采过矿石，但可能完全是手工业式开采，规模不大且属于表面式开采。由于远离渤海国最发达的手工业中心地区，妨碍了滨海地区矿业的发展。此地的州属城市向本地供应部落内流行的器物和装饰品，考古遗存中发现的各种装饰品证实了这一点。

任何编年史史料均缺少滨海地区渤海居民这方面的生活记载，毫无疑问，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是唯一的信息。

通过对渤海青铜制品进行专业的光谱分析和金属图解分析（参考文献 100，第 51—55 页），得出一系列初步结论，它们首先涉及到合金的配方和金属加工工艺。遗憾的是，现有的材料尚不

够充分，无法勾勒出渤海青铜铸造业的机构。发现的一些滨海地区制作的青铜器很有意义，使我们得以判断其青铜铸造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的大致规模，但尚不足以完整地揭示其历史情况。

众所周知，金属中细小夹质是提取铜使用的矿石类型及其工艺发展的指数之一。大多数情况下，古代、中世纪的工匠还无法控制这些夹质，这些夹质影响了金属的质量，提高了金属在铸器时的流动性并降低了熔化温度。纯度非常高的金属是专业精选矿石和高超的熔炼工艺的结果，为此可以获得所需性能的金属。但我们所遇到的多半是含有夹质的金属，渤海的青铜器即是如此。渤海的青铜器的成分中含有锑、砷、铋、钴及一些其他元素。这样的青铜是用多金属矿石炼取的，多金属矿石是包括滨海地区、朝鲜、日本在内的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矿体特点。这种青铜的优点在于，它天然的熔点较低并有一定的防锈性能，锑、砷含量使铜具有防锈性。

为了制作青铜，往铜里补充了铅、锡等中间合金，渤海时期青铜铸造作坊里出土了带有金属溶滴的坩锅，经研究表明，合金的差异是明显的。中世纪时代，经常使用的是混合中间合金，因为不是所有的工匠通过目测就能区分开锡和铅，中间合金的成分中可能还有其他的组分。

得以确定了七种类型的合金：“纯铜”、含锡青铜、铅锡青铜、含铅青铜、铅锡砷青铜、铅砷青铜、含砷青铜。目前，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合金中砷的含量。众所周知，从7世纪末起，日本开始往合金里补充砂、雄黄，在伊塞（ИСЭ），往合金里补充了包含有锑、砷、铋元素的特殊的矿石种类（参考文献50，第22页）。目前还不清楚渤海工匠掌握了何种砷合金，可能是现成的合金或中间合金。要知道，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金属是从不同的地方输入渤海的，其中包括日本。除此之外，还有旧器物的回炉，旧器物中包含一些外来的器物。

上述所有合金大部分适于铸造，它们能很好地灌满铸范，有低于铜的熔点。况且，正如已经判明的，渤海工匠不仅仅运用了铸造技术，他们还使用了各种规程的锻造技术，用雕刻技术、镀金技术、镀银技术可能还有镀锡技术加工器表。铸造器物时使用了石范、泥范，还使用了蜡范。众多的工艺方式和这些工艺方式在一些器物种类上使用的不确定性，表明这里融合了不同的工艺传统。

同时应该注意到，渤海没有同外部世界隔绝，它与中国唐朝、新罗国、日本、突厥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外国青铜器物进入渤海。青铜器进入渤海的途径是不同的，可能是“交换礼物”，用毛皮、贵重物品换取青铜品，以及在发生军事冲突时按照惯例对财物的掠夺。

突厥式腰带饰件大概是输入渤海的器物，公元一千纪下半叶时期这种腰带饰件广泛流行于辽阔的欧亚大陆。这种透孔的、密实的四边形、多边形的镶贴牌饰几乎见于所有的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之中，所有这种牌饰均为双面范铸造而成，但它们的生产地点未能确定，因为这种牌饰见于整个草原世界，同一式样的牌饰发现于中国、日本。

公元9世纪时期，在现今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产生并得以传播自身类型的腰带牌饰种类，这种牌饰不曾见于其他地区。此类牌饰为大型长方形透孔薄片（图一二，36—40），有的腰带上带有圆形的透孔牌饰（图一二，35）。此类腰带上可能附加装饰有铃铛（参考文献132，第147页）。

薄片形牌饰是用石范、泥范制作的（图一二，24—27），黑龙江沿岸见到的牌饰多是这种技术制作的，器表运用了镀锡、镀银技术。滨海地区境内的腰带牌饰使用了另外的铸造技术——蜡范铸造。

毫无疑问，所有这类牌饰是本地的某一作坊制作的，但存在

几个铸造中心，它们分布于何处，现在只能进行推测，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一件这种牌饰的范。在相当大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为，铸造牌饰时使用的是蜡范。如果没有进行专门的烧造，泥范同样会保存不好。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石范出土。

除了青铜质腰带饰件，本地还制作了各种小型的青铜装饰品：环、耳环（图一二，30—34）、手镯。

环是用锻造、铸造技术的条形或片形铜制作的。

耳环是用锻制或拉制的金属丝线弯曲成的不闭合的环，耳环上带有不大的玉质或玉髓质的盘形饰物（图一二，30）。

渤海工匠铸造了呈扁平形、圆形、晶状体形剖面的手镯。

利用青铜还制作了其他一些装饰品：项链、钮扣、铃铛，它们均为铸造。这些小器物，看来是用现成材料制作的，青铜铸造工匠没有赋予这些材料特殊的意义，因此金属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

容器是很有意思的青铜制品种类，大概它们非常贵重，因为在发现的一片器片上有修补透孔，这片器片的器型未能确定，残存下来的只是一小片带有突棱纹的器壁残片，该器物是用青铜铸造而成，金属成分中含有2%的铅、2%的锡。

另有一件青铜容器的器片，器片残存有口沿，器身部分有两道镌刻纹饰。有趣的是这件器物的制作工艺，它是高温锻造而成，因合金中含有铅从而导致了裂纹的出现，这是明显的工艺失误。不过，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现出来的，因为器表进行了镀金处理，这一点可以根据合金中有较高的含金量来判断。

这两件器物的原产地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们仅为器片，无法复原器型，至于判断其是否存在工艺传统，材料又太少。

根据两座城址即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以及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的材料，显然，在装饰品的利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传统。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的

青铜制品中，见有青铜线制作的耳环，耳环上带有圆盘形玉坠，这样的耳环大量见于黑龙江沿岸。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发现了渤海时期的青铜铸造生产遗迹，研究表明，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是索格狄亚那人（中国史籍中所称的康居国人或粟特国人——译者）青铜铸造工匠的居民点（参考文献 205，第 100—10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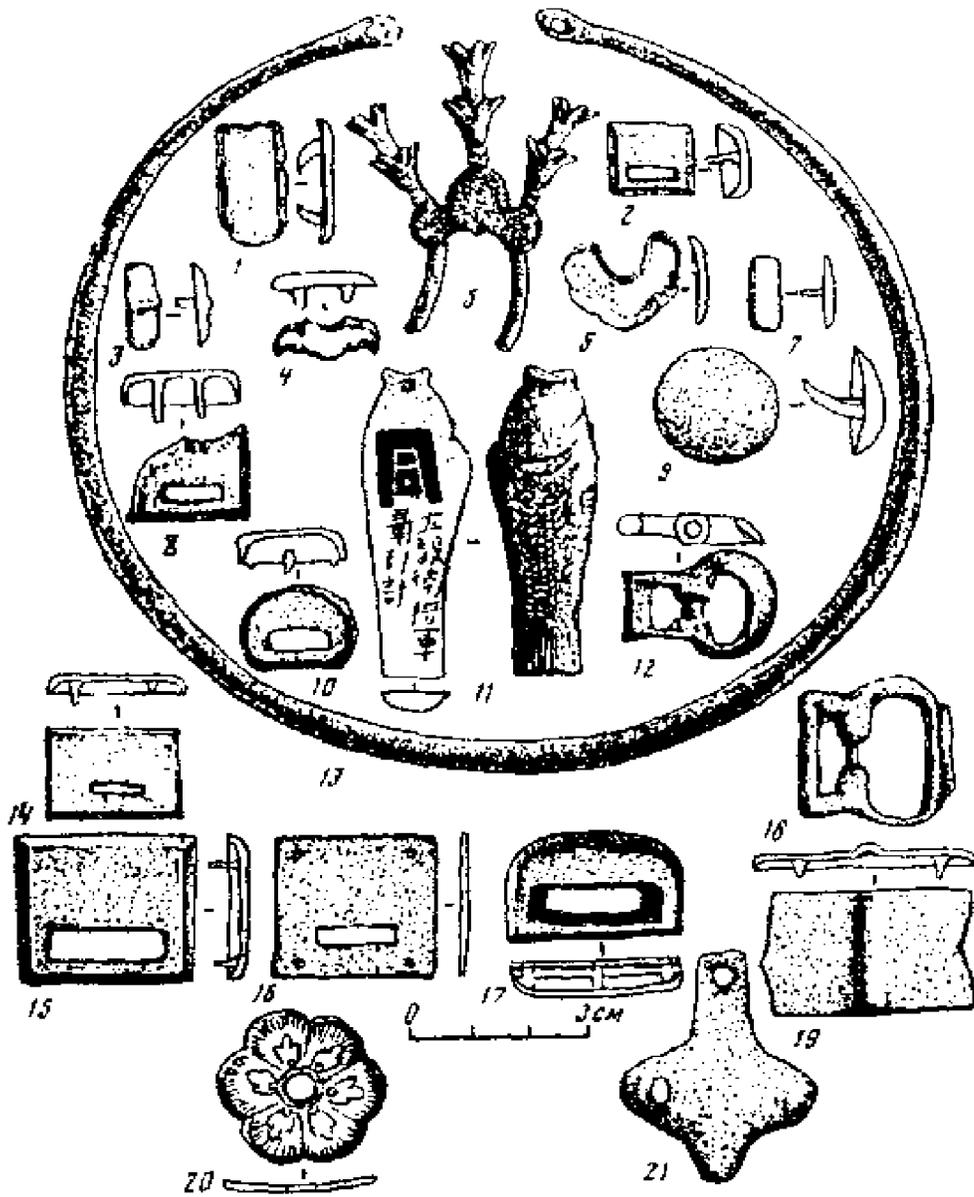
在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了同一类型的带有金属痕迹的坩锅（图一二，20、21；参考文献 160，第 116、123 页），这种器物表明，城址中存在某些作坊。金属加工生产联系着火和水，因此，通常它们不建于城址内，而是与城并排位于河岸边。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是这种城市手工业商区的例证，村落址地处城址东北，与城址并排分布于阿尔谢尼耶夫卡河岸边，距城址 300—400 米，有道路通往城址。遗憾的是，遗址的表面被排水沟割断或遭到耕作的破坏（参考文献 116，第 96 页）。基于这一原因，已经无法弄清村落址的规划和作坊建筑址的布局，但出土的一些有趣的器物，毫无疑问它们可以表明，金属加工业在村落址居民的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村落址里出土了一件锥形陶质喷嘴（图一二，19），器长 155 毫米，口径 15 毫米、40 毫米，这件器物表明，锻工炉在使用时需强制通气（参考文献 116，第 98 页，图 2）。在遗址的剖面上，观察到很厚的一层鲜红色的烧透的含有碳质、草木灰夹杂物的土层，土层中还见有炼渣。除此之外，发现了大量的圈足小浇桶（图一二，21），以及泥质铸范（图一二，24—27）。这些器物均有繁重的使用痕迹。坩锅的容量不大为 7 立方厘米，它符合铸工制作小型装饰品的需要，并且这里发现了装饰品的范。范为夹砂陶质，烧制较好，经仔细磨光（参考文献 116，第 96—103 页，图 4）。范有两种形制：单面范、双面合范。单面范有范盖，并见有范盖出土。

利用单面范铸造扁平的透孔装饰品，用双面合范铸造半球形带有扣眼的纽扣形式的缝附物（图一二，24）。双面合范其一面范上的凹槽，作为缝附物的上面，另一面范上的凹槽用于铸造扣眼。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有类似的缝附物。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太阳形牌饰的铸范（图一二，26），但这种牌饰标本却未曾出土过。范和范盖上有专门的来复线，以便于使它们扣合。

遗址中出土的铸造产品的数量使我们有根据推测，村落址中存在市场，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的青铜铸工使市场的需要得到满足。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这个铸造中心熔化的金属，其化学指数非常接近，但合金掺入物有所差异，证明该铸造中心直接得到了不同成分的合金。

在揭示现成制品类型组合的研究过程中，目前尚不能确定其他的生产中心，因为数量不多的一组器物，不是都能得以按照遗址来确定制品类型的分布区域。不过，已有的金属器物的分布呈现出有趣的现象。例如，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的比较丰富的有色金属制品中，不见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铸造的器物类型（太阳形牌饰、坠饰），却出土了许多靺鞨文化类型的耳环（图一二，31—33）。这种现象可以证实这两处遗址具有不同的民族属性的结论（参考文献205，第100—105页），因为装饰品属于比较稳定的民族指数之一。看来，在金属制品方面，反映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民族构成中含有靺鞨民族成分，这一结论已经得到该城址陶器工艺学研究成果的证实（参考文献70，第118页）。在大多数遗存中，见有突厥类型腰带牌饰（图一四，1—4；图一八，7，10，14—17）、黑龙江类型透孔、镂孔牌饰（图一二，35—40），以及大量形制相近的青铜制品，表明在同一年代跨度内黑龙江沿岸与滨海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



图一八 青铜制品

1, 3, 7, 19,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2, 6, 15, 新巴克罗夫斯克墓地出土
 4, 8, 12, 14, 16, 18,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5, 9, 10, 21,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11, 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13, 17,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20, 斯塔罗夫斯克城址出土

揭示制品类型、它们的制作工艺、合金成分相互关系的尝试表明，大体上，作为联盟时期的特点，不同的居民群体加工金属习俗方面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一种工艺的形成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它的完善看来是发生在下一个历史时期。

与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加工和生产一样，在渤海国，用于铺盖宫殿、行政设施、庙宇屋顶的屋顶瓦的生产得到了大力发展。在滨海地区，目前已知的屋顶瓦是发掘寺庙址获得的。瓦有两种基本形制：覆瓦和仰瓦。另见有少量的帽檐瓦、长条形瓦、板瓦、花样瓦（参考文献 29，第 42 页；文献 197，第 86 页），瓦的颜色多半是灰蓝色，有些呈褐色、橙黄色，这取决于焙烧程度。在瓦的凹面上有粗糙的拍印织纹，而在表面上常见没有十分仔细擦掉的，用木槌敲打软草席遗留下的痕迹。覆瓦和仰瓦有较宽的前沿和相对较窄的后沿，这是依据于瓦在屋顶上的铺盖特点：较宽的前沿铺盖在屋顶斜坡下排瓦的较窄的后沿上。

上文列举的变异瓦大量发现于瓦窑之中，该瓦窑址位于克拉斯基诺城址西北部城区庙宇址附近。窑址表现为一个长方形的基坑，基坑挖于沉积砂岩土质的缓坡之上，纵轴呈西北—东南向且略偏向北（图一九）。窑的纵向壁体的下部加固有瓦，加固部分以上壁体的砂质基岩已被烧烤熔结住，形成 10 厘米厚的板结层，瓦和板结的砂岩上面涂抹有一层 4 厘米—8 厘米厚的涂料。窑的横向壁体是垒砌的大石块，内面抹有草拌泥。窑内发现有厚 6 厘米—10 厘米的泥质拱顶残块。

窑由三部分构成：燃烧室、焙烧室、烟囱。燃烧室位于窑体的西北部，规格为 66 厘米×100 厘米×160 厘米，基岩的燃烧室地面上堆积有 6—8 厘米厚的一层木炭和烟灰。燃料通过一个不大的通口进入燃烧室，通口位于西北侧横壁的中部，残存的壁体下部，通口表现为长方形的凹口，深 36 厘米，宽 85 厘米。

焙烧室占据窑的中部、东南部，平均高度 65 厘米，长 220 厘

米，宽 150 厘米。焙烧室的底部堆满了废瓦，废瓦的下面分布有一层 2 厘米—4 厘米厚的夯实的碎瓦。这种碎瓦铺垫层多半是作为独特的绝缘体，以保持室内的恒温。本着这一目的，焙烧室上部的拱顶涂抹有一层砂土，由于高温，泥质拱顶和其砂土涂抹层明显烧红烘透。焙烧室和燃烧室用厚 10 厘米的土墙隔开，拱顶下壁体上有一个规格为 38 厘米×52 厘米的长方形通口，作为热风口，由此口从燃烧室向焙烧室充入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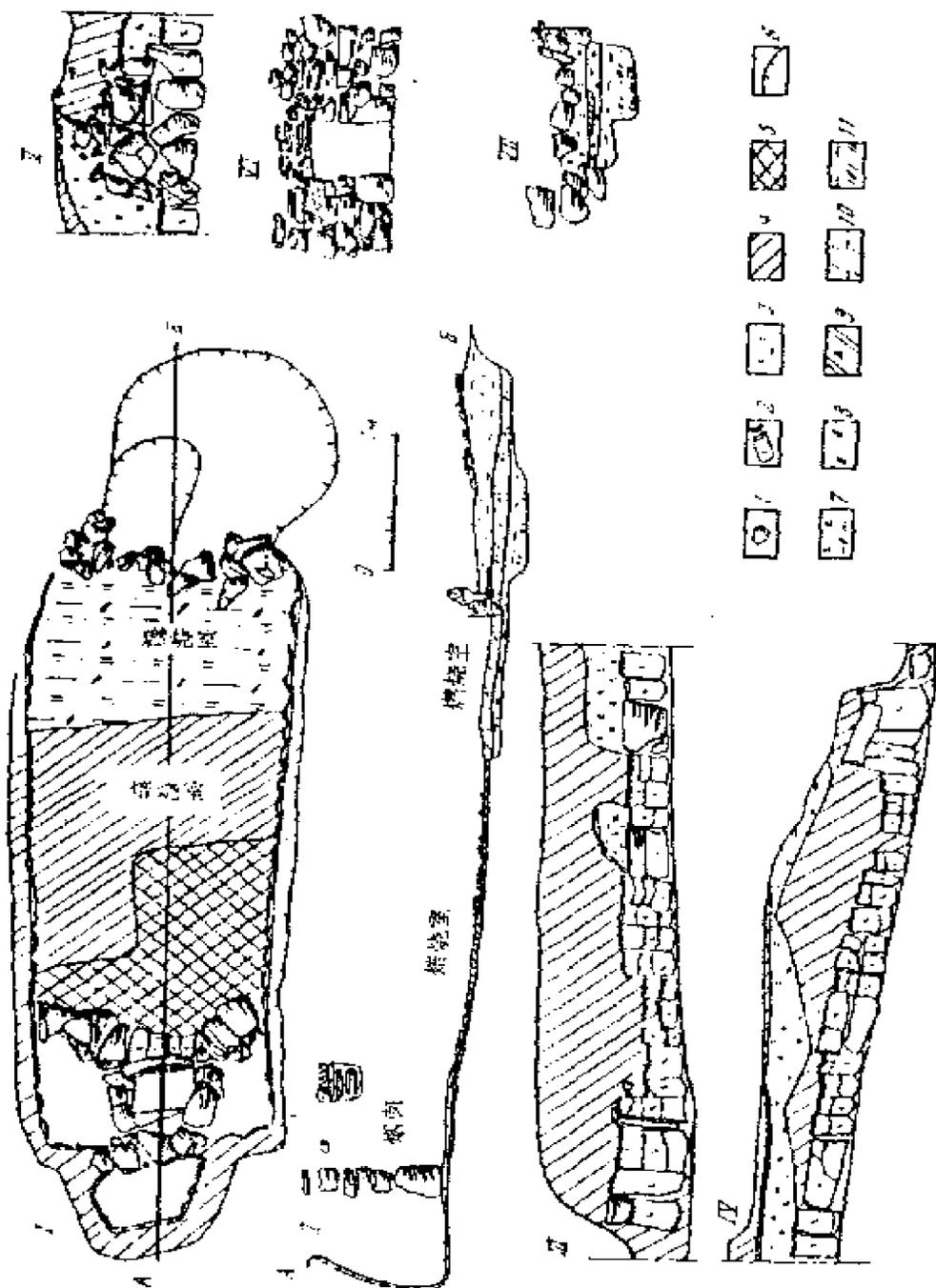
烟囱与窑体东南向壁体连接在一起，壁体的中部有一个规格为 38 厘米×50 厘米的长方形通口，通过这个通口从焙烧室沿着烟囱向外排烟。烟囱是用石块垒砌而成，烟囱的底部涂有涂料，烟囱的规格为 35 厘米×50 厘米，残存高度 90 厘米，因而烟囱略高于窑的拱顶。多半是通过烟囱向焙烧室内装瓦和取瓦。

窑的燃烧口邻接有一个深 30 厘米、直径 142 厘米的坑，显然，它是看管窑的烧炉工工作的地方。坑内堆满燃烧过的燃料—木炭和烟炱。此外，坑内还发现有烧过的褐煤块，它也应该是作为燃料而燃烧过的。

大体上，该窑是一个相当牢固的设施，窑体长 390 厘米，宽 140 厘米—160 厘米。引人注意的是，窑底基槽的基岩平面呈西北向倾斜，纵轴端点的高度差达到 55 厘米。窑的这种坡面，无疑，是为了使窑内形成好的通风力，因为当地占优势的是西北风，西北风在这种地势情况下可以造成通风力。

根据全面考察，窑使用了较长的时间，无论是窑的改建痕迹还是窑壁明显的烧烤痕迹都使我们深信这一点。除此之外，窑的周围见有大量的废弃物：燃烧过的燃料、烧烤过的涂块、废瓦。

在克拉斯基诺城址，发现了滨海地区目前唯一的一座中世纪时代瓦窑址。除了这座瓦窑，在中国辽宁省发现了两座公元 11—12 世纪初期的窑址，窑址位于鹅房，属于契丹人的辽帝国。鹅房窑址同克拉斯基诺窑址有基本相似的结构，并具备一系列更加完



图一九 克拉斯诺诺城址瓦器平面剖面图

1, 5,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出土 2,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出土 3, 4, 15, 16,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 6-14, 17, 18,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善的构造设置(参考文献 256, 第 19—21 页)。中国唐朝有类似结构的瓦窑(参考文献 277, 第 57、59 页)。

大概, 克拉斯基诺城址发现的窑址与其附近的瓦顶的佛教寺庙址有直接的关系。寺庙址使用的瓦和窑址中、窑址附近发现的瓦一样, 但窑址加固墙体使用的瓦在规格和质量方面明显不同于寺庙址用瓦。显然, 窑址设施使用的瓦来自其他的作坊。

在某种程度上, 根据克拉斯基诺城址发现的瓦窑和出土的瓦可以复原渤海国 9—10 世纪时期瓦业生产的进程。

瓦的模具 仰瓦成形于截锥形模具中, 模具上蒙盖有粗糙的织物, 模具本身有四个纵棱, 根据瓦上的印痕判断, 纵棱高 0.3 厘米—0.4 厘米, 边缘厚 0.2 厘米。制瓦时, 往模具里放入泥条, 压实后的泥条宽 2.5 厘米—4 厘米。泥条间的缝痕, 连同包裹模具的织物的印痕, 清楚地见于仰瓦的凹面上。用泥条充填模具后, 在模具里形成泥圈形瓦坯, 借助木槌敲打夯实。

覆瓦是用类似的蒙有织物的模具制作的, 模具上有两个而不是四个棱线, 覆瓦的模具适宜于有两个纵棱。覆瓦上抚平木槌的敲打痕迹是呈纵向分布, 而仰瓦上的抚平痕迹则是呈横向分布, 抚平痕迹均遍布模具之内。在制作角瓦时, 模具上除了纵向分隔棱外, 还有斜向棱, 以保障模具上的泥条瓦坯能被裁成适宜的瓦的形状。

关于借助于模具上的侧棱把泥条瓦坯切割成方块形, 可以根据瓦侧壁上的切口痕迹, 即贴靠模具一面泥条内面的泥圈断口线来判断。根据这些痕迹, 确定了侧棱的高度。从模具上取下瓦坯后, 瓦坯本身往往没有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从内侧沿着残存的棱线把没用的泥条切割下去, 在瓦的侧壁上有时能观察到刀的切割痕迹。

装饰 仰瓦正面端面的纹饰, 显然, 是把瓦从模具上取下之前实施的, 关于这一点, 可以根据与瓦的施纹端面相接的瓦的侧

棱没有变形这种情况来加以判断。瓦从模具上取下后，如果在端面上施纹，瓦侧棱的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是在模具上加工制作了瓦的端面，为此，把瓦坯的上端有时是下端略微从模具面上挽起，并仔细抚平其内外面，是把端面挽起后用施纹工具在瓦的端面上施纹的。

从模具上取下后，对覆瓦的正面进行了补充加工，在宽端附加了瓦当，而在瓦的窄端中部则进行了穿孔处理，以便于用钉子将其固定在屋顶。沿着两个槽形瓦的侧向分隔线进行了仔细的抚平处理，只是在带有瓦当的覆瓦上使用了这道工序。借助于专门的模具制作了瓦当上的纹饰。

瓦当晒干后入窑烧造。

在渤海社会分化增长的条件下，此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已经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例如，官吏、宗教人士、军人等等），但他们对不同种类的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强了，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现在首先是定位于对它需求的满足，并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需要产生某些狭隘的手工业生产的专业部门。这种情况在陶器生产方面得到了特别明显的反映，在陶器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并逐渐地分化出单独的制瓦生产部门、制砖生产部门、宗教建筑装饰面砖的生产部门等等。

至于直接的制陶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向专业的轮制生产、釉陶生产、瓷器生产发展的趋势。大量见于渤海遗存中的手制陶器，多半是家庭制作的，而不属于手工业式生产。

就是在不久以前，关于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制陶生产的发展问题，由于缺少具体的证据，能够谈论的只是某种推论。B.И. 鲍日金发掘了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在该遗址他发现了陶器作坊遗迹，它可以作为讨论渤海时代滨海地区制陶生产的证据。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位于鲍里索夫卡河左岸，南距乌苏里斯克地区科尔萨科夫卡村约 1 公里。根据地表遗物判断，村

落址的范围约几百平方米，占据着较高不至于淹没的河滩地。村落址的部分地段在河水汛期时遭到了破坏，在 600 米长的河岸断面上根据包含物可以观察到，文化层厚度为 0.5 米—1 米，堆积中见有陶器、动物骨骸、不同的设施遗迹。遗迹中，包含 3 座陶窑。

一号陶窑 窑址发现于褐色砂壤土层下，距古代地表 0.95 米—1 米深度处。窑基槽的下挖深度为 0.6 米，窑的纵轴呈西北—东南向。按其结构，窑为单层窑。燃烧口位于西北部，宽 0.34 米，因遭破坏其高度未能确定。燃烧室高 0.42 米，长 0.7 米，宽 0.34 米—0.73 米。窑的东南部遭受了河水的破坏，保存下来的焙烧室残长 1.3 米，残宽 0.8 米—1.55 米，高 0.7 米。

窑内填充着褐色砂壤土，堆积中到处可见较长、较大的浅灰色涂块（它们应是拱顶残存物）和大小不一的石块。窑西北部的砂壤土堆积中混杂有木炭，在西南部砂壤土堆积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烧烤过的土块。

窑呈圆形拱顶，拱顶的上部塌落到了窑内。拱顶是用草拌泥修建的，窑壁涂抹了一层厚 3 厘米—7 厘米的粘土，由于高温，涂层变成了灰蓝色。涂层里面的土烘透出 5 厘米—10 厘米厚的红色结层。燃烧室的墙壁加固有扁平的石块。

窑的炉底涂抹有粘土，粘土涂层厚 5 厘米—7 厘米，涂层下的土有烘透痕迹。地面上观察到燃烧室和焙烧室的界限：燃烧室覆盖在烟灶下，底部见有木炭堆积（未燃尽的燃料）。

二号陶窑 基本上保持了原貌，不过，圆形拱顶的北半部分塌落到了窑中，南部拱顶只是略微压坏。窑址发现于距古代地表 0.7 米—1.3 米的深度处，位于一号陶窑东北部，相距约 1 米。窑址的基槽呈椭圆形，座落在冲积层上，深度 1 米。陶窑纵轴呈南北向，为单层窑室。燃烧口宽 0.3 米，位于西北面，燃烧室长 0.6 米，宽 0.3 米—0.85 米，残存高度为 0.7 米。窑内填充着褐色砂壤土，里面夹杂有炭块。堆积中发现了拱顶的残块（烧烤过的草

拌泥块)，靠近底部见有碳质层。

焙烧室的高度达到了1米，长2.28米，宽0.9米—1.65米，里面填充着包含有炭和红色烧土块的褐色砂壤土。

烟囱，规格0.29米×0.33米，高1.45米，位于焙烧室内，接邻窑的南壁。烟囱遗迹高出窑室0.34米，烟囱的上半部填充着小石粒，下半部分堆积着褐色砂壤土。和拱顶一样，烟囱是用涂料修建的，壁厚不超过8厘米。长方形通烟口的规格为10厘米×18厘米，连接着烟囱和焙烧室。通烟口位于烟囱北壁的底线处，烟囱内侧涂层表面由于火的影响，熔结成类似透明的糊状物。

窑的炉底和墙壁涂抹了一层厚5厘米—8厘米的粘土，由于高温墙壁呈灰蓝色，炉底朝燃烧室倾斜，燃烧室底部渗透烟炱。

三号陶窑 位于二号陶窑东北部，相距2.4米，揭露于0.7米深度处。窑的东南部为河水破坏，窑内填充褐色砂壤土，其中夹杂有少量烧土。

窑址保存下燃烧口、燃烧室和部分焙烧室。燃烧口加固有石块，口宽0.4米，高0.24米。燃烧室上部已遭破坏，残长0.6米，高0.5米，宽0.4米。焙烧室的残存部分，长1米，宽0.7米—1.15米，残高不超过0.5米。

和另外两个窑址一样，通过炉底可以观察到燃烧室、焙烧室的界限。草拌泥的炉底厚3厘米—5厘米，草拌泥层下的砂壤土有6厘米厚的烘透层。窑的内部壁体呈曲线形，表面涂抹了一层厚5厘米—10厘米的粘土层，烘烤成浅灰蓝色。

3座窑址内均未发现完整的陶器，在三号陶窑的焙烧室内出土了2件轮制陶器的器片；在二号陶窑内出土了5件轮制陶器的器片，在燃烧口附近的拱顶上出土了压碎的罐形器。该罐形器，轮制，黑色，焙烧质量不高，陶片的断口有灰色夹层，陶片厚实，敲击时没有特有的叮咣声，器高20.3厘米，底径29厘米，口径19厘米，壁厚1.2厘米，底厚0.5厘米。

在二号窑址燃烧口附近，有一个深 1.5 米的大坑，坑内砂质堆积在距坑底 0.8 米深度处，有一夹层，夹层中含有涂块、炭、陶片、粘土沉淀晶状体。根据坑内堆积来看，坑是用于倾倒燃料废弃物、窑的废弃构件、陶器废品。

坑内出土的所有陶器，均为不合格陶器残片，它们抑或烧制火候过头，烧坏、爆裂、变形；抑或烧制不好，后者通常为大型器、厚胎器。坑内出土了 436 片轮制陶片、4 片手制陶片。手制陶器是罐头形容器，含有食物积渣痕迹。轮制陶器按照陶色可以分为两组：灰陶、黑陶。灰陶占有优势，厚胎，壁厚 1 厘米—2 厘米，质地坚硬，为夹砂陶质。黑陶陶片的断口呈灰色或褐色，厚 0.6 厘米—1.4 厘米，黑陶中见有大型罐的残片。轮制陶器有罐、碗、球形器等器型，以及带有横桥状耳的器物。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揭露的陶窑和窑前坑构成一个生产集合—陶器作坊。修建于基槽中的窑址设施能够控制热能消耗，以便于使陶器获得最好的烧制效果。不过，对于大型厚胎器物的烧制，这种窑效果不好。大型厚胎器物的烧制，窑内不能保证提供充分的温度，因此见到的陶器废品中有三分之一是厚胎器物。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的陶窑与克拉斯基诺城址的瓦窑（参考文献 29，第 145—146 页）、中国东北东京城的砖瓦窑在结构上相似（参考文献 300，第 34—36 页）。它们均修建于基槽中，单层窑室，由三部分构成：燃烧室、焙烧室、烟囱，它们沿同一轴线排列。

类似的窑址设施见于高丽国（公元 10—14 世纪），这种窑在朝鲜半岛沿用到 20 世纪，窑分布在山坡的斜坡上，以便于使燃烧口低于烟囱的底线。整个窑体好像是沿着躯干裂开的竹子，窑室间以间壁隔开（参考文献 105，第 60—61 页）。

需要指出的是，单层焙烧室窑是远东民族建窑的普遍特征。中世纪时代，这样的窑见于中国的宋朝（参考文献 305，第 23—24

页)、辽帝国(参考文献 256, 第 19—21 页)、女真帝国(参考文献 115, 第 23—24 页)。这一时期的窑与渤海、高丽窑的差异在于,它们在结构上更趋于复杂,其中,炉底、壁体与生土之间有隔热层。

至于制陶生产的产品陶器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滨海地区渤海时代考古遗存中遇到的陶器多半是器片,并且器型种类繁多(图二〇)。

按照制作技术,渤海的陶器分为三种类型:手制陶器、慢轮加工陶器、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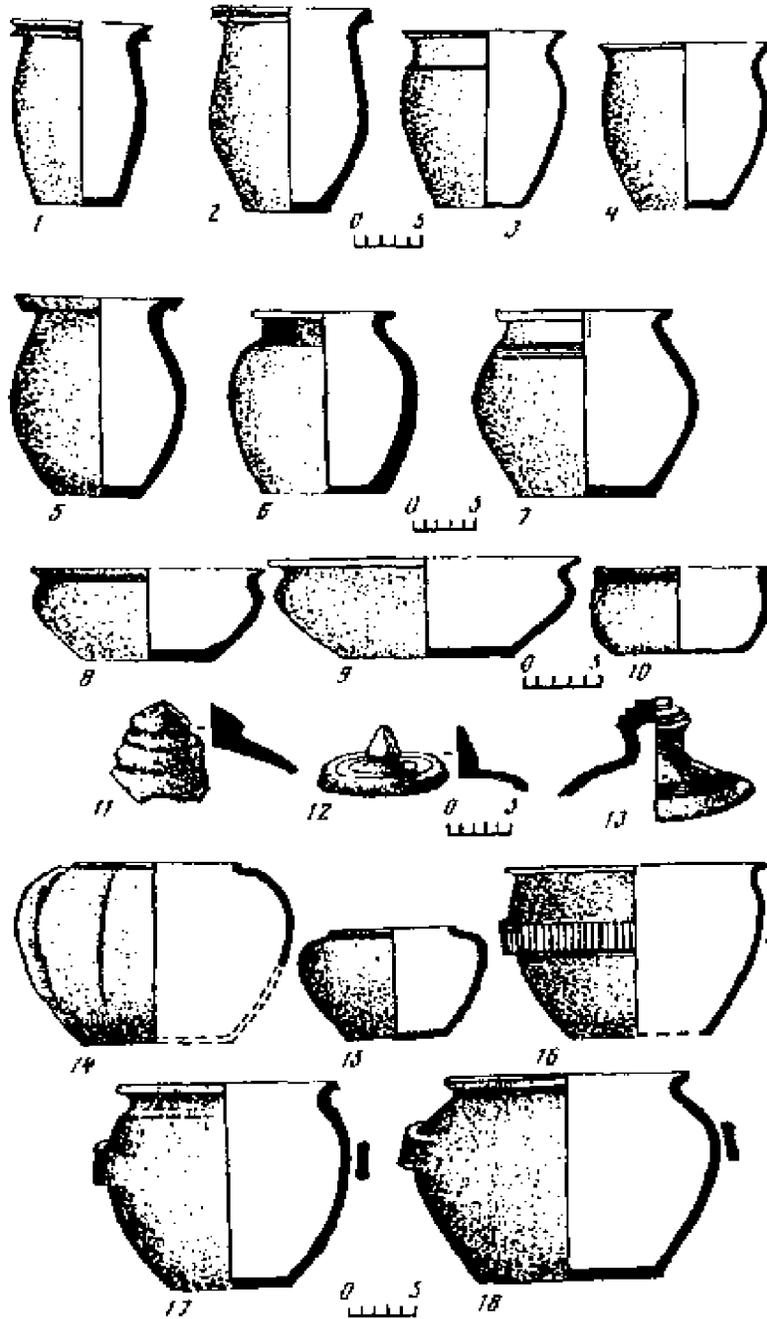
(一) 手制陶器

约 80% 的手制陶器为瓶形器、罐形器、罐头形器,它们的口沿下有附加堆纹。余下的 20% 包括器盖、碗,及一些特殊的器型(参考文献 62, 第 186 页;文献 70, 第 39 页;文献 73, 第 61—70 页)。

瓶形器 (图二一, 2、4; 图二二, 1、3; 图二三, 3、6)
这种制品平底,微鼓腹,腹身平缓过渡到底部,同时,腹身平缓收缩到颈部,再略外侈使口部有所膨胀。口沿外部附加有泥条堆纹。底径小于口径的二分之一,腹径则不到器高的二分之一。

有 15 件标本进行了岩石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作瓶形器这类陶器时使用了不同的土质:水解云母质土、高岭土、高岭石—水解云母质土。所有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土质饱含铁质氧化物,这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土质的地域性特点。按照土质的性能,含铁土质更具可塑性。陶土的夹杂物包括:砂、晶石、长石,个别情况下含有熟土和碧石,这些夹杂物的规格为 0.5 毫米—2 毫米。

根据夹杂物在陶土中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来看,陶土的搅拌是速成的,但陶土的配方本身是相当标准和稳定的,经过长期使用并具有传统性。陶土和掺杂物的比例关系是不同的,例如,有 14



图二〇 渤海陶器的基本种类

1, 5,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2,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3, 4, 15, 16,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 6—14, 17, 18,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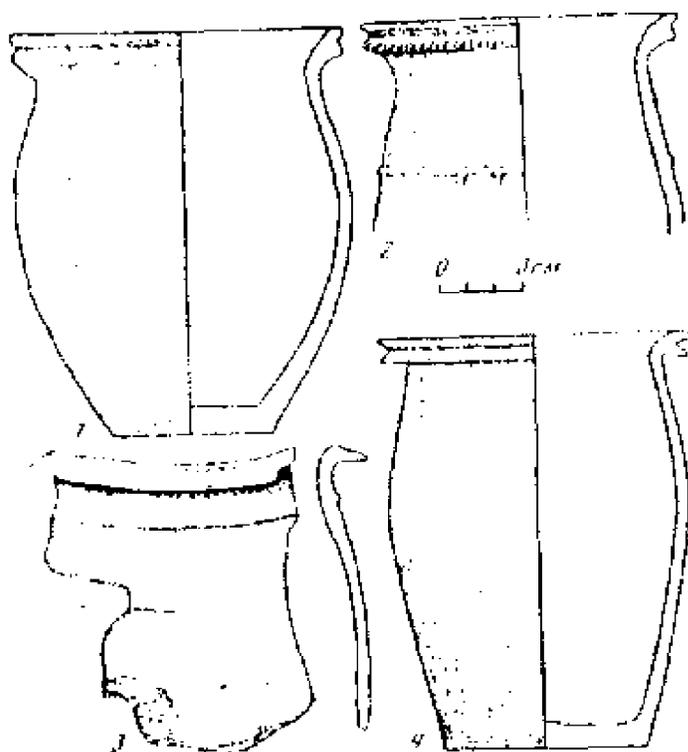
件标本陶土所占的比例为 70%—80%，有 1 件标本陶土所占的比例则为 60%，掺杂物所占的比例相应地介于 20%—30% 及 40%。计算陶器不同部位 1 平方厘米中掺杂物的含量证明了陶土进行了速成搅拌，因为不同部位其掺杂物的含量也是不同的。

陶器制作采用了泥条盘筑法，陶片和完整的陶器个体均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制作痕迹，陶器的内壁证实了这种制作方法。在陶器的内壁可以观察到未抹平的泥条下边接痕，它们形成了两端封闭的平行粗棱。

泥条的边缘有专门的斜面，在制作陶器时，斜面朝向内壁，通常能够观察到的只是斜面的外缘。泥条的宽度达到了 3 厘米—4 厘米，有的达到了 5 厘米。口沿的斜面上有专门贴附的泥条，这一位置的贴附泥条最容易剥落，由此而裸落出泥条的接合点（图二四）。陶器成型用了 4—5 条泥条，有些器物使用了 6 条或 8 条泥条。陶器是分部位制作的：颈部、腹部、底部。陶器往往在这些部位的接合处断裂，大概，器物各个部位的装配是在足够干的状态下完成的，因为这些部位的边缘保持了最初的状态。

习惯上，器底是用整块的饼状泥片制作的，不过，约有 15%—20% 的瓶形器的器底是用泥条盘卷而成，器底呈盘卷的瓣状饼。从器底的残断处可以观察到这种痕迹，断口处明显可见彼此接合的泥条。

器底和腹身的接合采用了三种方式：1. 接合处折角接合，外缘用手指捏合而成，形成独特的边缘；2. 腹身器片下缘内侧有一个不大的小领，由此使器身安装在器底上；3. 接合处外缘没有捏



图二一 渤海的手制陶器

1. “克鲁戈拉亚谷地”遗址出土
2.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地出土
3.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4.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合痕迹，为普通的折角接合。在大多数情况下，器底和腹身接合处从内侧用梳状工具或抹子抹平，留下沟痕或凹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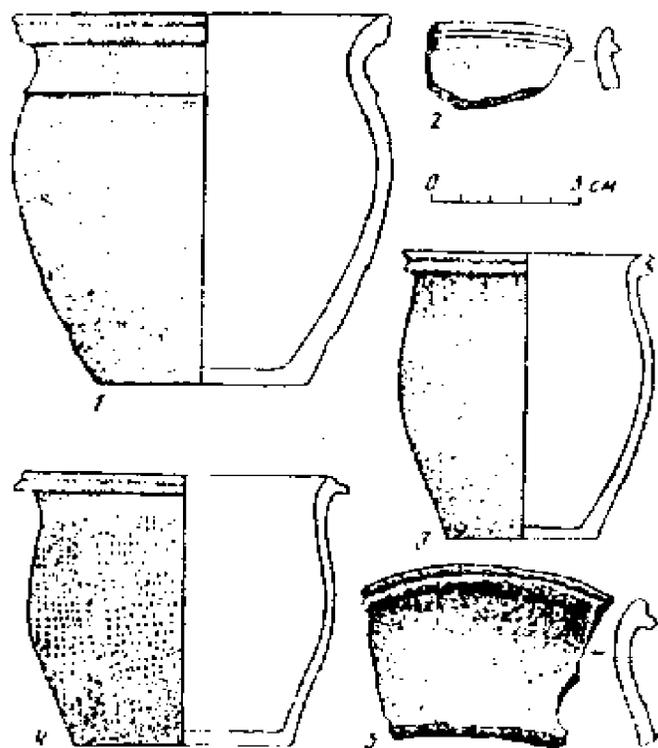
器底和腹身的接合最常见的是第三种方式，即折角接合处外缘没有捏合痕迹。

颈部和腹身是独立制作的，并且颈部器片既有从口部开始盘筑的，也有从下往上盘筑的。在从口部开始盘筑的情况下，口沿的边沿加厚，即使是抹平后也保持着其厚度。

瓶形器是拍打成型的，大概，这道工序是

在各个部位接合在一起之前完成的，拍打痕迹证明了这一点，通常，这种拍痕见于器底往上 1 毫米—3 毫米处，少数拍痕接近颈部或在颈上。拍痕是横向的，器物内壁形成了链状凹痕（铁砧痕迹）。一般，这种凹痕横向环绕着泥条的接合处，自然而然，这道工序明显地使泥条最初的尺寸和形状失真，它们变得 longer、更宽。拍打工具的表面有方形蜂窝状螺纹，由此在器表形成了维夫饼干形纹饰（或类似纺织纹）。单个纹饰的规格为 0.2 厘米—0.5 厘米，极少数器物见有更大一些的印纹。

泥条盘筑形器底的瓶形器由颈部、腹身两部分装配而成，器



图二二 渤海的手制陶器

1. 马利亚诺夫斯克墓葬出土 2, 5.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3. 新巴克罗夫斯克城址出土 4. 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城址出土

稀泥涂掉了蜂窝，这道工序形成了不平滑的器表。因此，相当多的器物（达到了70%），器表进行了磨光处理，这是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陶器的通常作法。磨光工具的工作面一般较窄，2毫米—3毫米，根据器物的部位，呈斜向、纵向、横向磨光（口部、接近底部—呈横向，颈部呈纵向，腹身为斜向）。不过，好像有意地不抹去“维夫饼干形”痕迹，它们的痕迹仍然见于器物的近底部、颈部附近，有时见于口沿下。抹平拍打痕迹这种特点，是黑龙江沿岸特罗伊茨基类型、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遗存陶器的特征。

物恰恰是在它们的接合点处断裂。

个别情况下，是在完全装配好的器物上进行拍打造型工序的，在这种情况下，器底形成了一个凸起来的圆形物，然后把它抚平。器底和腹身的相接部位保存有接合痕迹，其表现为凸起来的圆形物或“维夫饼干”拍打痕迹（图二二，4；图二三，2.6，图三三，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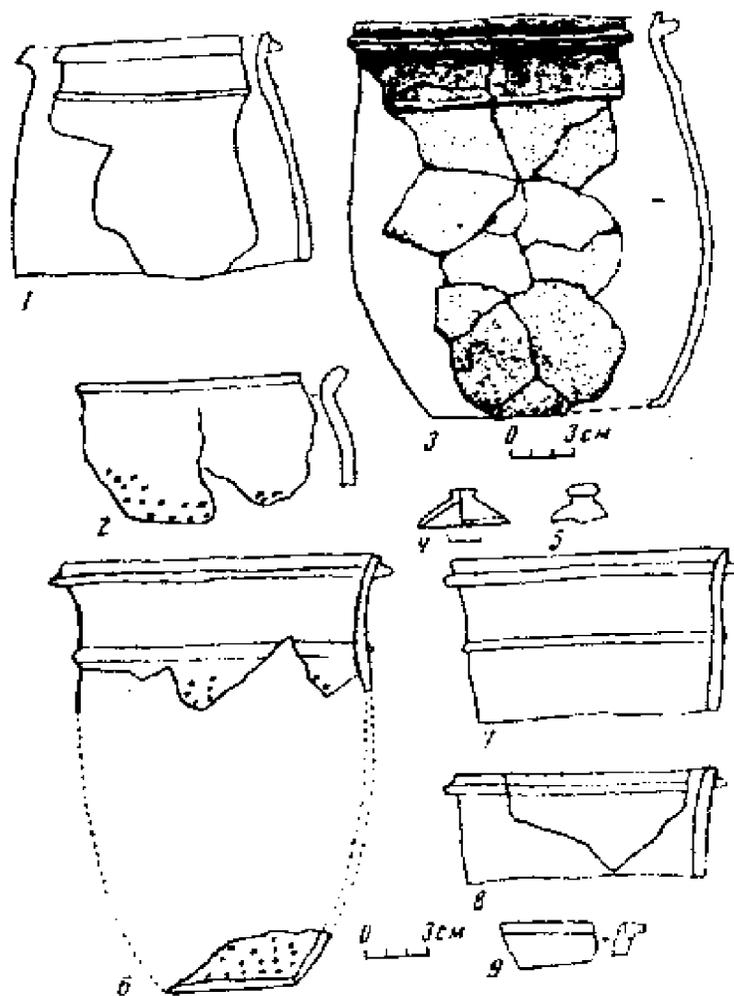
瓶形器拍打成型的特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尽量使器表的“维夫饼干”痕迹消失，为了做到这一点，使用了

在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以及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遗物中，见有一些完整的陶器个体，在陶器的器表特意留下了窄带形“维夫饼干形”拍痕，带宽 2 厘米—3 厘米，其分布略低于肩部。毫无疑问，起初蜂窝拍纹是布满器身的，其后，器表涂以稀泥并进行了磨光处理。有些部位的“维夫饼干形”拍纹在抹平时被涂掉了，但对它们进行了补充修整，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同一位置上有重复的重叠拍纹。这种情况表明，渤海的手制陶器开始受到了轮制灰陶陶器造型风格的影响，其中包括装饰，重复拍纹这种风格是轮制陶器纹饰的特点，这种纹饰位于轮制陶器的肩下。对于渤海的手制陶器而言，这种纹饰属于外来因素。

凸面纹饰限制于两个纹饰带内，第一，位于口沿下（图二一，3）；第二，位于肩部（图二一，2）。凸面纹饰表现为贴附的泥条纹，位于第一纹饰带口沿下的贴附泥条纹，是渤海手制陶器的指征性特性。贴附泥条纹见有各种变体：突檐纹，檐体朝上或朝下（图二六，1、3、7）；三角形剖面的突棱（图二七，10）；中间用横向沟槽分开的突棱纹（图二六，5，6）；B 形剖面，上部或下部加厚的突棱纹，得之于口沿泥条的外折（图二六，2、4）；带有外伸的小凸起的突檐纹。占优势的是突檐纹，以及三角形剖面的突棱纹。其他纹饰所占的比例大体上约为 40%。

在大多数情况下（约占 80%），口沿下的突棱上是不施纹的，不过，有些器物在这种突棱上装饰了嵌入的纹饰。不同种类的凹纹表现为：用圆形施纹工具的侧面完面的纹饰；用抹子完成的或窄或宽的刻纹；突棱中央的椭圆形凹纹；横向链状延伸的三角形、菱形印纹。

根据突棱的定位、扁平的口沿、施纹时在口沿上用力按压施纹工具等情况判断，在器物口沿上施纹时施纹工具处于翻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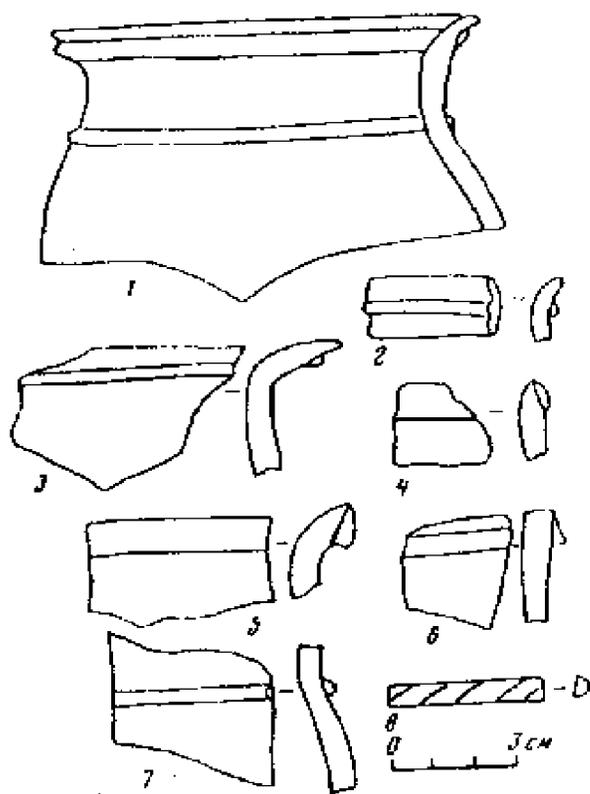


图二三 渤海的手制陶器

1—3, 6—9,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4.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5.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达到 30%，因而，它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充分贯彻于制陶方式之中。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一些瓶形器个体具有独特的造型。传统陶器贴附的突棱，为在口沿下贴附较窄的 0.3 厘米—0.4 厘米宽的附加泥条所替代，泥条



图二四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渤海手制陶器

的表面用直刃施纹工具施向右倾斜的凹纹，纹饰的长度0.5厘米—0.6厘米。类似的情况见于靺鞨文化奈伊费利德类型的陶器上（参考文献70，第45页）。

第二即肩部纹饰带内的突棱纹少于口沿下纹饰带内的突棱纹（图二一，2），器身多半施有类似织物纹饰的压印纹或它们的痕迹。第二纹饰带内见到的突棱纹，形状与口沿下的突棱纹一样，占优势的是圆形剖面、三角形剖面的突棱纹。通常，第二纹饰带内只有一道突棱纹，突棱纹表现为：横向封闭形；疏散形，构成一个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圆圈；疏

散形，棱线上带有向下的“胡须”形突棱（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闭合的水平突棱环圈，带有一对向下的“胡须”形突棱，突棱的间距为6厘米（图二一，2）。

大多数情况下，位于第二纹饰带的突棱上不施纹。另有2%—3%的陶器的突棱上有斜向、菱形凹纹（图二六，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瓶形器，其突棱处于早已成形的凹槽里，而不是处于平坦的器物腹身表面上，突棱是镶嵌的。

器物各个部位接合到一起后，下一步加工工序是进行无光泽

磨光。窄窄的磨光工具工作面在器表留下了不深的凹槽，且彼此距离较低。这道工序完成以后，器表仿佛是起棱的。有一些情况，在器物未干透时进行了磨光，造成了磨光薄层剥落，个别地方形成了一些不大的“秃处”。

陶器制作结束阶段工序是焙烧，渤海手制瓶形器的陶色占绝对优势的是黑色、黑褐色、黑灰色，少量是红色、红褐色。从陶片的断口可以看出，陶胎颜色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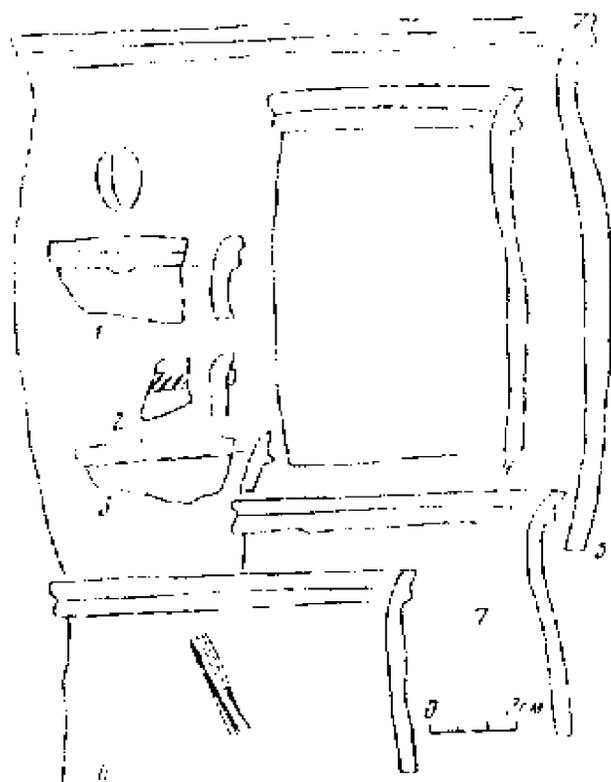
根据获得的岩石学研究成果，陶器的焙烧温度不超过 800°C ，因为石英颗粒保持了原有的样子。焙烧多半是在还原状态下完成的，为此，为了完成这种工序运用了某种专门的焙烧性能类型的窑。部分瓶形器存在氧化焙烧，即焙烧过程中发生了自由渗透状态的氧。类似的情况见于靺鞨文化特罗伊茨基类型陶器以及黑龙江沿岸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陶器。

差不多所有的瓶形器的内外壁上均残存有植物类食物积渣，常常见有烧焦的颗粒。按其性能，瓶形器应该是食具。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在于，瓶形器的内壁都进行了专门的磨光或抚平处理，即明显地注定是用于接触食物。

罐形器（图二一，1；二二，1.4） 该类陶器与瓶形器的差异在于，腹径与器高的比例关系不同。罐形器的腹径超过器高的二分之一，即瓶形器比罐形器细长。

罐形器的工艺特点与瓶形器相似，无须进行专门的研究。需要指出的只是，罐形器的内壁多半使用了梳状工具进行加工处理，内壁留下斜向凹槽，这是匈奴遗址、墓地陶器的固有特征（参考文献74，第23页）。

罐头形器（图二三，7、8；图二五，4—7） 罐头形器基本定型为直壁或斜壁，无肩，窄底，口沿外侧附加有突棱，或专门变扁。在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陶器中，罐头形陶器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占手制陶器的



图二五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的渤海手制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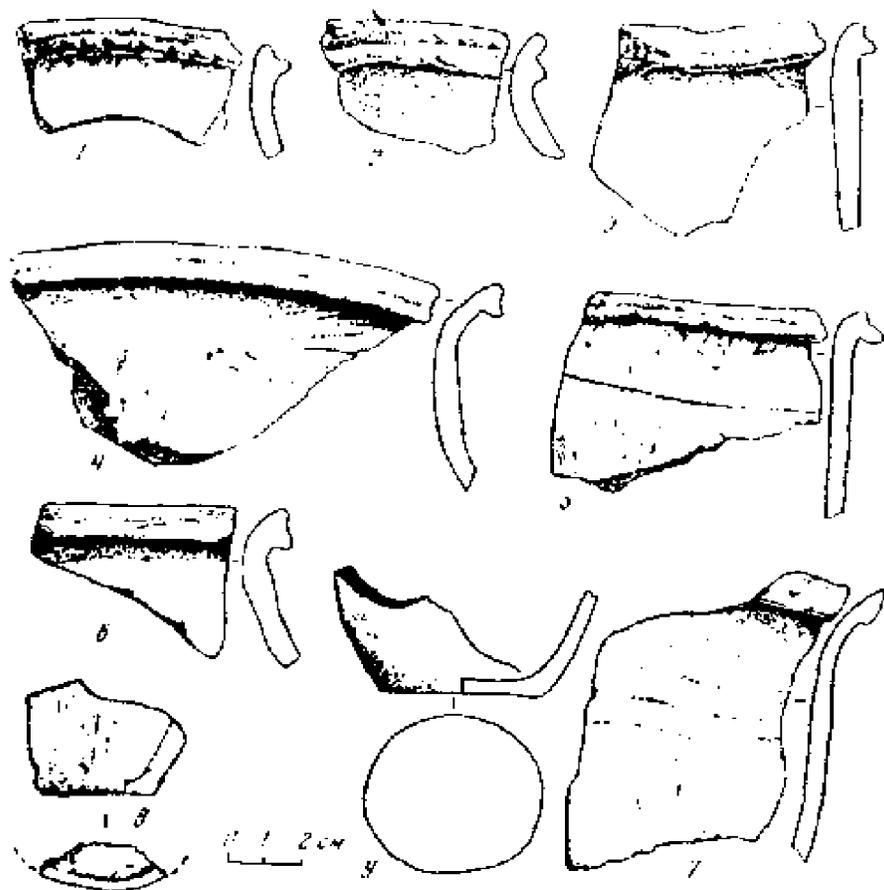
30%。罐头形陶器的制作工艺与瓶形器、罐形器基本一致，不过，其造型往往偏离传统，首先，表现在口部造型上，口沿呈“Γ”形，并且，附加的泥条更加厚重，有时，罐头形器的口沿则完全没有附加的突棱。

大多数罐头形器器表光滑没有纹饰，与瓶形器、罐形器相比，它们更多地是在氧化状态烧制的。

准确地说，这种现象是黑龙江沿岸靺鞨文化特罗伊茨基类型遗存罐头形器的特点（参考文献 70，第 67—70 页）。

碗 该类陶器几乎见于滨海地区所有的渤海文化遗存之中。平底，有时带有不大的小圈足（2 毫米—3 毫米），弧壁或斜壁，圆唇或方唇。碗均为素面，器高 5 厘米—7 厘米。烧制方式即有还原烧制，也有氧化烧制。黑龙江沿岸的靺鞨文化、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参考文献 133，第 189 页，图五），以及满洲的渤海遗存存在类似的陶器（参考文献 285，第 24 页图六）。按其性能，碗是个人用具，作用和器盖一样。

器盖（图二三，4、5）和碗一样，但以环状或菌柄状把手替代了器底。见于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黑龙江沿岸巴克罗夫斯卡亚



图二六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的渤海手制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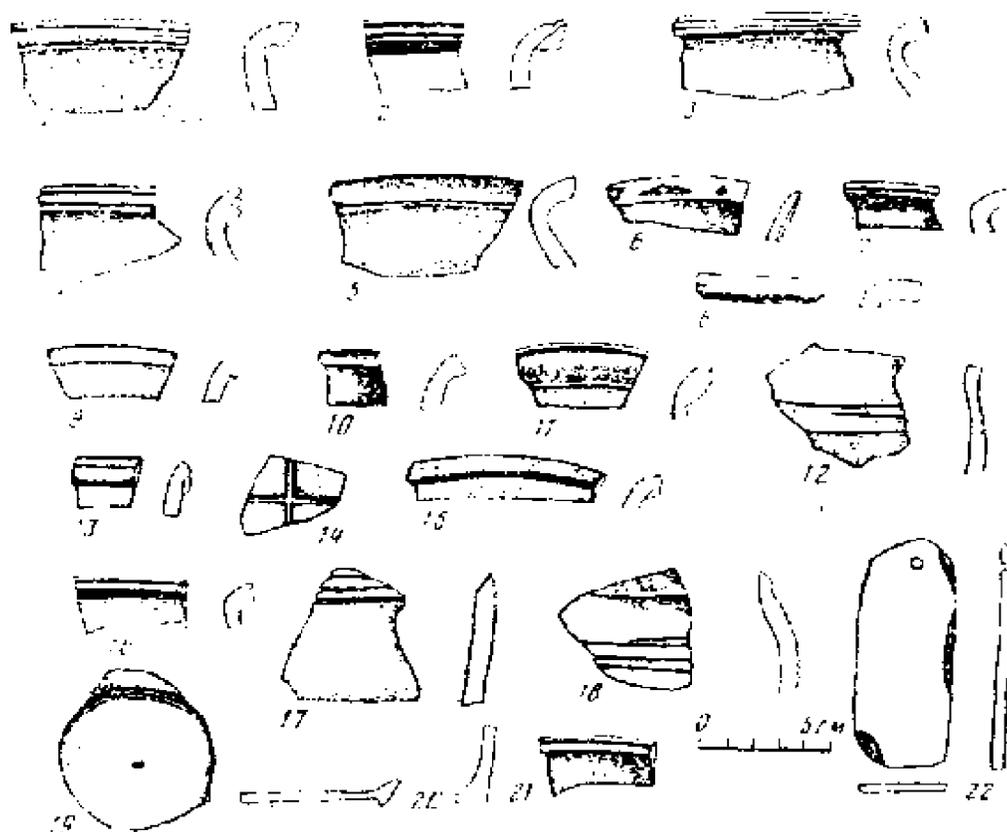
文化存在类似器物。

综上所述，手制陶器是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本地成分。手制陶器见于所有渤海遗存之中，并存在于不同的建筑平面。需要指出的是，罐头形器更多地出自上层建筑平面，而瓶形器、罐形器通常出自中层、下层建筑平面，但也见于上层建筑平面。

(二) 慢轮加工陶器

见于滨海地区所有渤海文化遗存之中，慢轮加工陶器在陶器总量中占 3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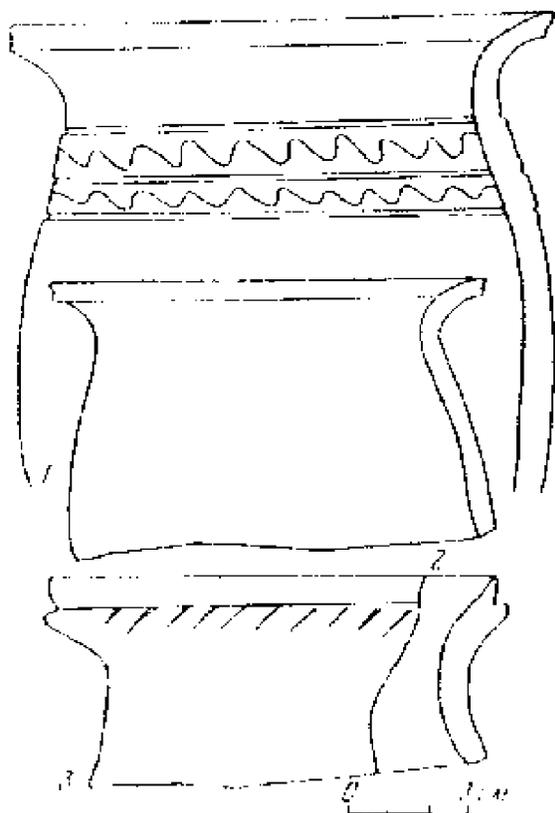
慢轮加工陶器有两种类型：1. 瓶形器、罐形器、罐头形器；2. 罐形器的变体。



图二七 马尼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的渤海陶器器片

第一类型的慢轮加工陶器重复手制陶器的形制，但在数量上不超过手制陶器的十分之一，陶质与手制陶器相同（图二八、图二九 1，5）。

陶器在制作时，更准确地说，在加工器表和施纹时使用了转盘或某种转动装置，下列一些特征是其证据：借助于转动装置口沿下附加了多道突棱，由于转动装置器表留下了连续不断的平行的不明显的槽痕；某些纹饰主题具有环形结构，例如，波浪纹（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或梳状施纹工具实施的水平锯齿纹（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除此之外，约有 10%—15% 的此类陶器的器底有细小的圆洞，它们是由于转盘上撒有砂子而形成的，撒砂子是为了便于取下器物。这些现象见于奈伊费利德类型遗存，及



图二八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的渤海慢轮加工陶器

黑龙江沿岸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陶器。在中国的制陶业中，这种制陶方式被认为是传统的方式，即使用于古代，也运用于现代（参考文献307，第848—852页）。除了上述方式，有些器物的器底，似乎和腹部一样采用了泥条堆塑法，无疑，这是受到了转盘技术的影响。该种类型的某些器物从转盘上取下时，是用绳子切断的，留下平行的圆圈槽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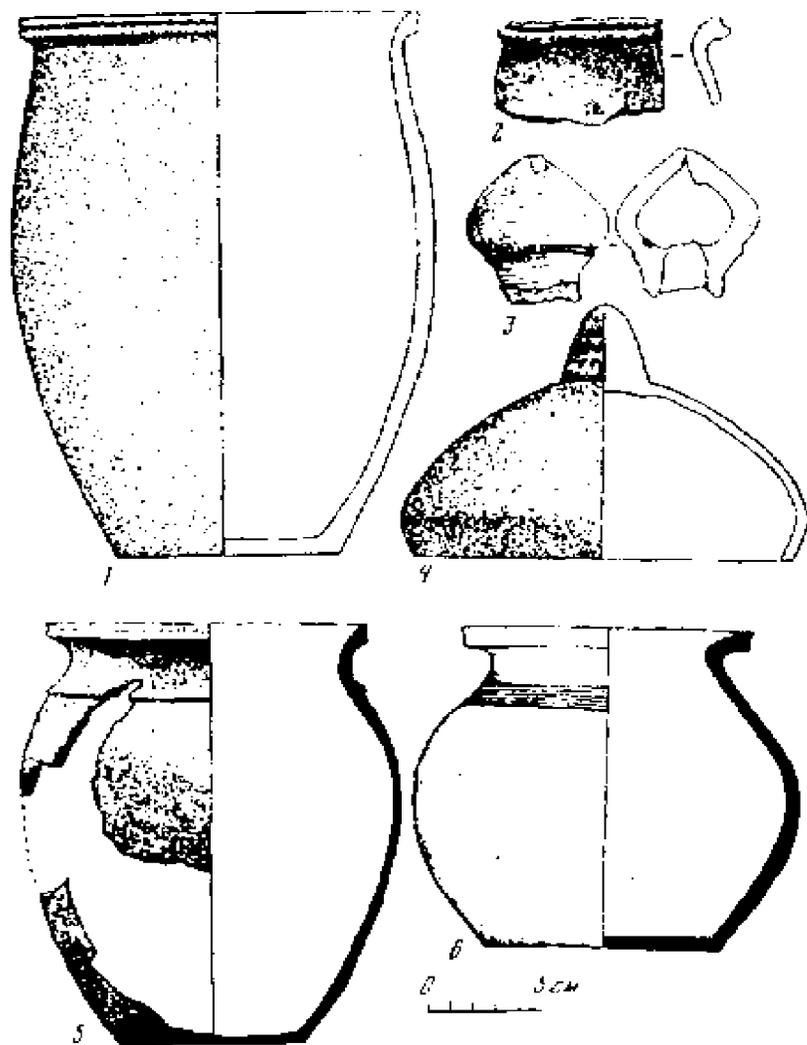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使用转盘技术加工制作的陶器产生了一系列的外形变化：突棱更趋前后一致，改变了以往的凸凹不平；出现了新的纹饰主题：波浪纹、刻划纹；开始

脱离以往的制作技术，其中包括泥条盘筑法。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象不仅仅是渤海文化陶器的特征，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陶器存在类似的情况。

罐形器（二九，5、6；图三〇） 这是一种粗矮敦实的器物，黑褐色，平底，鼓腹，斜肩不明显，颈向外弯曲，突棱形口沿，器高16厘米—18厘米，底径11厘米，口径12厘米—13.5厘米。

该类陶器几乎见于滨海地区所有的渤海文化遗存之中，主要是依据口部造型特征，将其划分出六种变体。

1. 翻沿，口沿的突棱使口沿外缘表面形成凹面，或突棱伸长



图二九 渤海的轮制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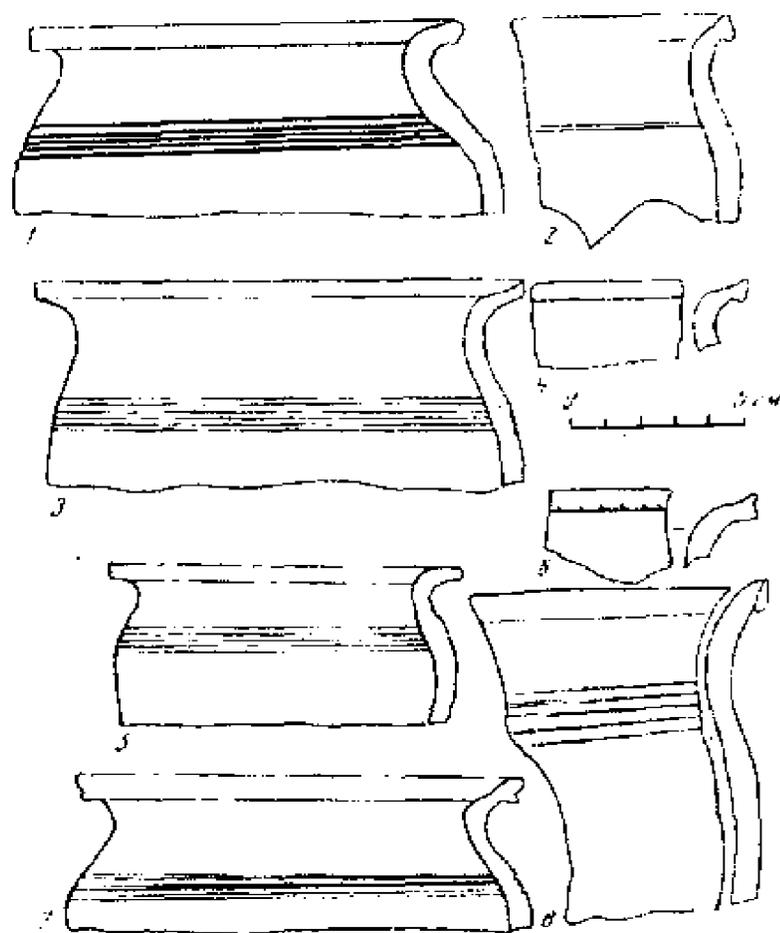
1, 2, 廉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 3. 尼古拉耶夫斯克 1 号城址出土 4.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5, 6,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时直接依据突棱泥条形状造型（图二九，6）。

2. 口沿突棱为外折的泥条造型（图二七，1-4），有些器物的贴附泥条密实贴附在器壁之上，转盘转动时沿泥条中线形成了水平的槽痕，把突棱分隔成两部分。大多数器物的贴附泥条只是部分地贴附于器壁之上，泥条的下部呈檐状造型。有时，在这种口

沿上有水平刻纹，为两道平行的凹纹。

3. 口沿突棱是从口部泥条定型的（图三〇，2），口沿的外部造型与手制陶器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着原则上的差异：手制陶器的突棱是贴附上去的，而慢轮加工陶器的突棱则是口部泥条外翻的结果。寻求类似的器物造型方式，把我们引导到黑龙江沿岸奈伊费利德类型遗存慢轮加工的瓶形器上面。



图三〇 渤海陶器

1, 3, 5, 7,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2, 4, 6, 8,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

4. 带有突棱的口沿在转盘转动时，形成内凹的口部造型（图三〇，4、7），口沿内侧有一个凹面，侧面轮廓形成角度，外表造型和手制陶器口沿相似。不过，这种造型的运用常常是环形的。这种造型也见于器物的肩部，在转盘上形成的内凹面替代了附加突棱。必须指出的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往的考古学文化中，未曾见到过突棱造型的这种方式，它只是在渤海文化时才出现，这是因为用新的、更

型的这种方式，它只是在渤海文化时才出现，这是因为用新的、更

快的方式制作器物时保存传统风格的必要性。

5. 口沿外侧有附加突棱，口沿内侧有横向的凹槽（图二七，2）。靺鞨陶器上没有见过这种口沿，不过，见于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科尔萨科沃墓地、纳扎伊契夫斯克墓地）以及滨海女真（拉佐城址）的同类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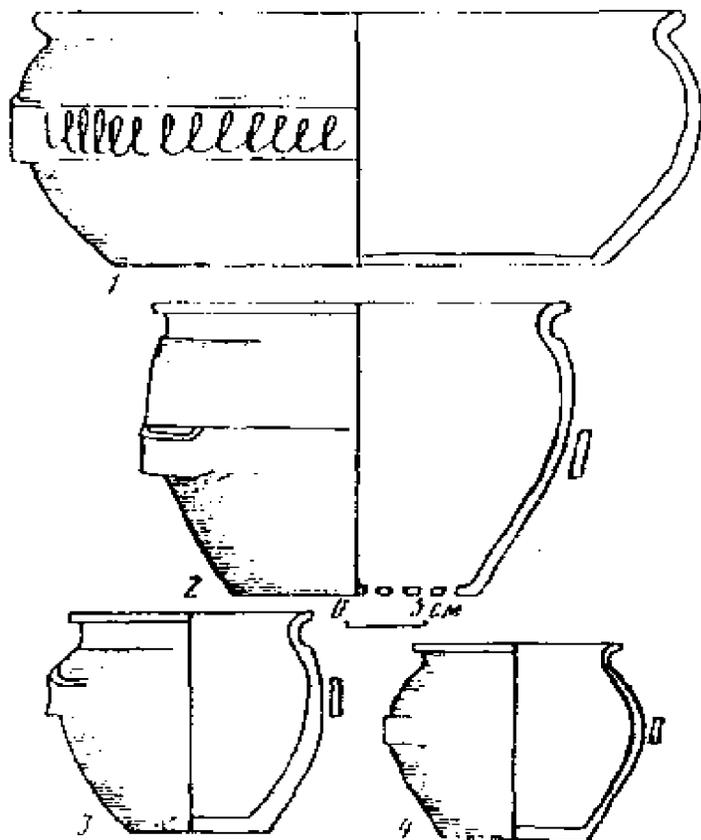
6. 罐形器的腹身中部有横向桥状耳（图三一，4），对它们应该单独加以区分。通常，桥状耳上有纵向磨光纹饰。口沿平缓外侈，口沿上有水平凹纹。除了滨海地区的渤海文化，这种类型的器物也见于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

根据岩石学分析，慢轮加工陶器制作时使用了两种物质：A，3—4份的一种陶土（高岭土，有时是水解云母土）；1—2份的筛选过的石英粒，有时是植物补充物，由此在器表留下大的燃尽的棒状物的痕迹；B，3—4份的两种陶土（高岭土和水解云母土）；1份筛选过的石英粒。通常，后一种比份成分关系用于4、5、6类罐形器。

在转盘上制作时，器物的堆塑从底开始，其中一部分器物器底为一整块泥饼，而有些器物（4、5、6类罐形器）的器底是盘瓣式堆塑。大多数个体上存留有从转盘上取下时的切口，器底和腹身连接的侧面轮廓有角度，因为靠近器底的腹身器片的泥条是转盘转动时贴附到器底泥饼的侧缘上去的。在转盘上泥条只是堆塑到口部，口部单独加工，然后再与腹身相接。因此，在器物上能够观察到的接缝只有一道，即腹身和口部的接合缝。显然，两者是接近晒干后接合在一起的。

通过抚摸器物内壁痕迹，使我们得以确定腹身器片是泥条堆塑而成的（内壁横向圆周有相同间隔的厚处），因为内壁的泥条没有进行很好的涂抹抚平。

器物的腹身造型是在转盘上完成的，有些器物的整个器表（从底到口）均有转盘加工痕迹—细细的同心槽纹。大多数的罐形



图三一 渤海的快轮加工陶器

1,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2-4,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成的，在器物的表面留下了细细的深凹纹。少数情况下，凹纹呈螺旋形分布，它们往往是用多齿工具完成的，因为纹饰是相互平行的。

罐形器是采用还原法烧制的，器物的颜色证明了这一点，陶片断口呈单一颜色，烧制温度相当高，超过 800℃。

大部分慢轮加工的罐形器保存有植物类食物积渣，由此可以确定它们是食具。

按照数量和质量特征，第 2 类慢轮加工的罐形器，属于渤海

器只是在口部、肩部有转盘加工痕迹，即在转盘上只是进行了器物上部的加工，腹身下部用木片或抹布斜向擦拭。

一小部分罐形器（4、6 类）从口沿到器底，均为盘辘式堆塑而成。

罐形器有两种类型的纹饰主题：嵌入纹、凸出纹。纹饰分布于器物的两个部位：口部、肩部。器物上的嵌入纹是在转盘上完成的 2—6 道水平封闭的凹纹，有些纹饰是用单齿工具且多半是金属工具完

文化文化意义上的标识器,这种器物即是满洲渤海文化的标识器,也是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标识器。它们也见于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渤海文化陶器具备的特征,也为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所拥有。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慢轮加工陶器在不同遗存中的埋藏层位。例如,在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慢轮加工陶器见于三个建筑平面,但前三种罐形器主要见于下、中层平面,第4种罐形器,即突棱口沿内侧有凹面的罐形器,在数量关系上主要出自上层平面。需要补充的是,在下层建筑平面发现的主要是罐形器和瓶形器,而在上层建筑平面发现的主要是罐头形器。由此得出结论,慢轮加工的第4种罐形器,显然,出现的时间较晚。

这种情况也见于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在该村落址,B.И.鲍日金考察了三座渤海房址堆积。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慢轮加工陶器的所有种类,但绝非每种器物都能按照地层和埋藏深度进行明确的统计,可以指出的只是,在文化层的上部发现的多是第4、第5种罐形器的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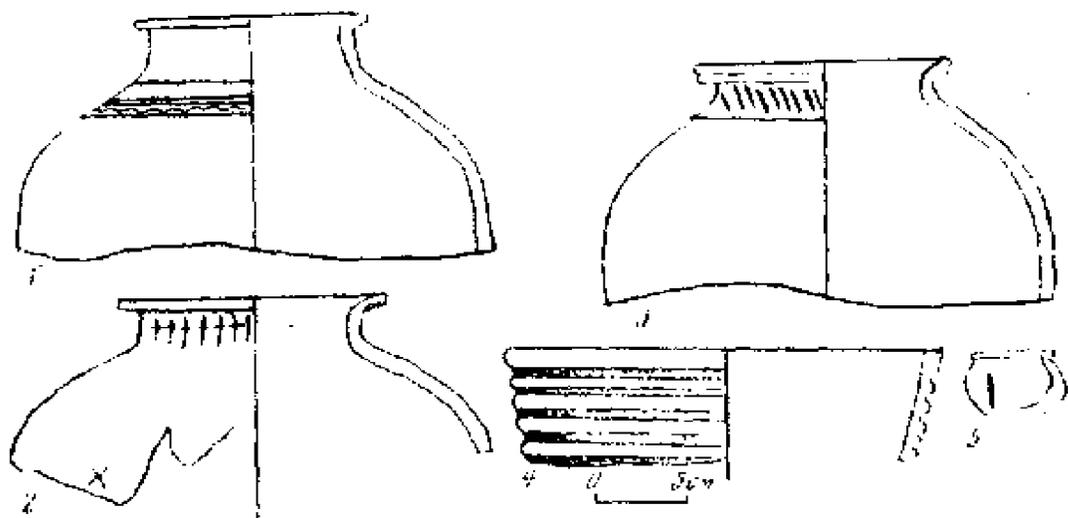
(三) 快轮加工陶器

渤海遗存出土的快轮加工陶器占优势的是灰陶器物,少数器物呈黄色、浅红色。通过器片可以确定的器型有罐形器、瓶形器、壶、罐、小罐、碗、钵、器盖、锅、球形器。

罐形器的特征是,平底,由底平缓地过渡到鼓腹,宽短颈,口外侈或明显地翻沿(图三二,1—3)。该类器物的腹径均超过器高,器物的尺寸不一,器高15厘米—20厘米—50厘米。

罐形器的口部造型存在几种变体:1.普通的椭圆形边口的瓣形带状口沿(图三二,1);2.口沿外侧附加有突棱(图三二,3);3.口沿带有从器壁伸出的突棱(图三二,2)。

罐形器的纹饰布局非常规范,有三个纹饰分布区域:口沿外



图三二 渤海的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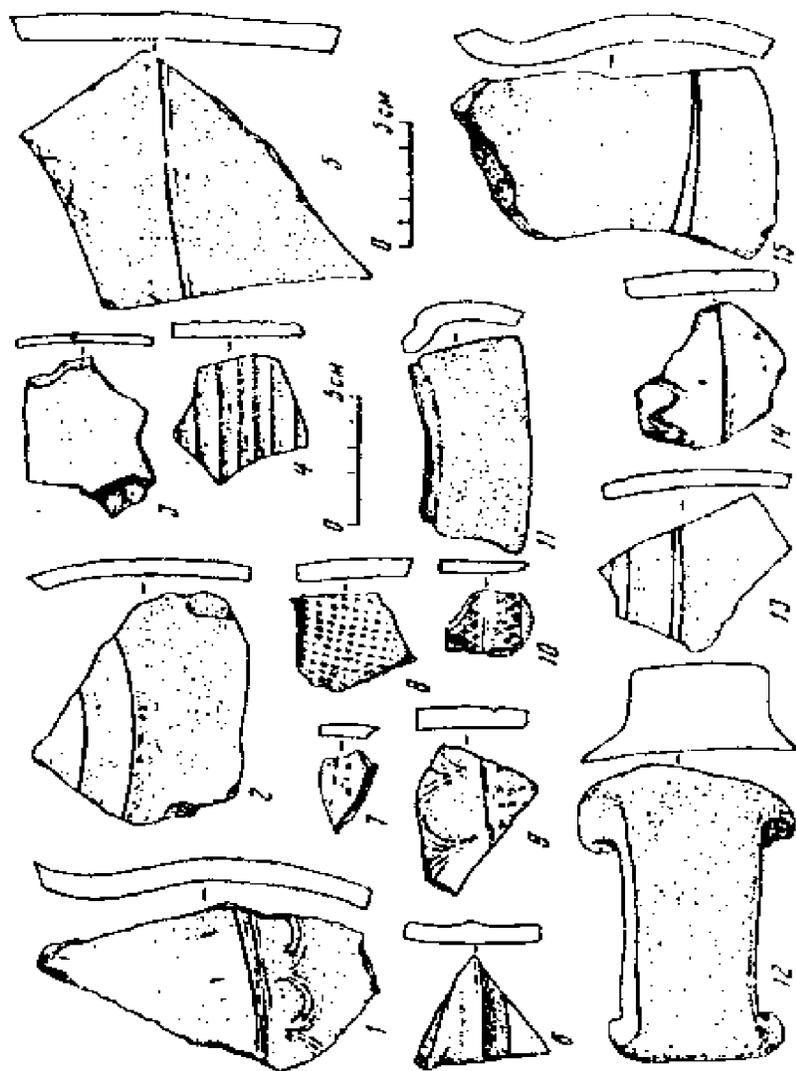
1—4，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5，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

端、颈部、肩部。施纹方式有三种类型：嵌入纹、凸出纹、平面纹。

嵌入纹 见有刻划纹和模压纹。刻划纹见于器物的两个部位：口沿突棱上、肩部。刻划纹均是在转盘完成的，为水平封闭且相互平行的凹纹，凹纹的宽度不超过0.3厘米，这样的凹纹见于器物口沿的外沿、肩部（图二七，12、17、18）；用1—4齿施纹工具在器物的肩部施有刻划的封闭、半封闭凹纹；由刻划线构成的纹饰带，纹饰带中央是波浪形凹纹；由相互套叠的弧线构成的拱形纹饰（图三三，1、9）。

施刻划纹的罐形器是渤海遗存中最常见的器类，它们见于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的中、上层建筑平面和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见于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三座相互叠压的房址之中；见于科尔萨科夫斯克城址等等。它们大量集中于中层、上层建筑平面，即存在的时间略晚。

大多数情况下，模压纹饰是用短而平的模具制成的，通过分



图三三 康士组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的渤海快轮加工陶器碎片

析器表上模压纹饰主题的施纹技术，可以指出的是，它们大多是在模仿树的螺纹。按其类型，模压纹饰属于直线几何形；而按其结构，模压纹饰可以分为花边形、花结形纹饰，纹饰主题本身是严格对称的。到目前为止，在渤海遗存中遇到的模压纹饰可以揭示出下列具体的纹饰主题：1. 纵向、斜向排布的相同高度的窄四边形构成的带纹，其彼此间距2毫米—3毫米，施纹模具在器表运动施纹时挤压出的泥浆构成了纹饰的上下边饰，其本身就是花边

形造型；2. 与上一种相近，纹饰的差异在于，四边形纹饰的上下边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中间的纹饰呈波浪形分布；3. 斜向网纹构成的纹饰带，网纹中央带有凹点纹；4. 由尖朝上的内接角构成的纹饰带；5. 由反向对应分布、内接锯齿纹构成的纹饰带，这些锯齿纹的交叉点形成菱形、长方形轮廓；6. 由尖朝上的斜向内接角构成的纹饰带，内接角内画有细线；7. 由反向对应分布的，内画细线的三角形构成的纹饰带；8. 由套叠、对角相隔的菱形构成的纹饰带。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模压纹饰可以归结为锯齿纹、三角形纹、正方形纹、长方形纹、纵向、横向、斜向凹纹，凹纹、角纹、三角纹是上述纹饰利用的基础。

大概，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一些施熊掌纹、人脚纹、叶脉纹、八角花结纹的陶片属于罐形器器片。按照Э.В. 沙弗库诺夫的观点，这些器片能够证明，它们是中亚移民制作的，其中包括索格狄亚那人（参考文献 205，第 100—105 页）。

模压纹饰主题均分布在器物的肩部和腹部，它们的数量不超过其他纹饰类型总量的 20%。带有模压纹饰的罐形器主要是出自渤海文化遗存——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的中、上层建筑平面。

某些模压纹饰主题，在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快轮加工陶器的纹饰中找到了相似性。

在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更早的中世纪文化遗存考古学材料没有为我们提供模压纹饰原型或模压纹饰的例证，模压纹饰和新的不见于以往文化的快轮加工陶器器型一起在渤海定型出现。也是这一时期，这样的纹饰主题见于高句丽遗存之中（参考文献 278，第 826—834 页，图 6，8—10）。

凸出纹 表现为附加的突棱和泥条；由器壁伸出的突棱；由器壁压出的突棱（图三三，6）。凸出纹有两个分布区域：罐形器

的口沿外部、肩部。40%—50%的凸出纹补充装饰有刻划的横向凸纹、锯齿纹、“X”形纹（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

平面纹 包括打磨纹饰、染黑处理。打磨纹饰主要分布于罐形器的颈部，表现为直径0.3厘米—0.4厘米的纵向磨光条带痕迹，条带的彼此间距为1厘米—3厘米。有的磨光条带略向左侧倾斜，有的磨光条带的中部横贯有水平的条带纹（图三二，2、3）。

在罐形器中见有极少量的染黑纹饰，在器表形成一层薄层，器物的内壁仍然是灰色。这种效果是器物在还复状态烧制时，往器表擦抹草木灰形成的。

有些渤海的罐形器涂有深红色、红色、橙黄色涂料（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但只有器表进行了这种涂色处理。在克拉斯基诺城址出现了一种情况，器物的红色涂层使用的是釉底料，釉底料涂层厚2毫米，极易剥落。

带有横桥状耳的罐形器（图三一，2、3；图三四，1、2）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有此类器物。其特点是，平底，有的器底带有一些穿孔，卵形腹身，没有明显的肩部，腹身过渡成宽矮颈，结束于侈口或普通的圆唇、或突棱形口沿。此类罐形器的尺寸不一，但腹径均大于器高（有的器物腹径是器高的2倍），腹身中部有桥状耳是此类罐形器的形制特征。通常，器耳是对称的一对，少数器物上有四个桥状耳（见于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器耳宽2厘米—5厘米，厚0.6厘米—1.5厘米，长3.5厘米—6厘米。

带有横桥状耳的罐形器，一般器表光滑，没有纹饰。不过，约有15%的罐形器有某种形式的纹饰。纹饰大多位于腹身中部，包括器耳之上。这一区域里施有横向的纹饰带，纹饰带由1—4道凹纹、“X”形纹、角纹构成，是用打磨技术完成的。桥状耳上还见

有纵向、螺线的打磨带纹，条带分布的凹纹导致一种印象，腹身的这些纹饰似乎是为了固结桥状耳。

在渤海文化遗存中，见有类似形状和规格的无耳的罐形器（图三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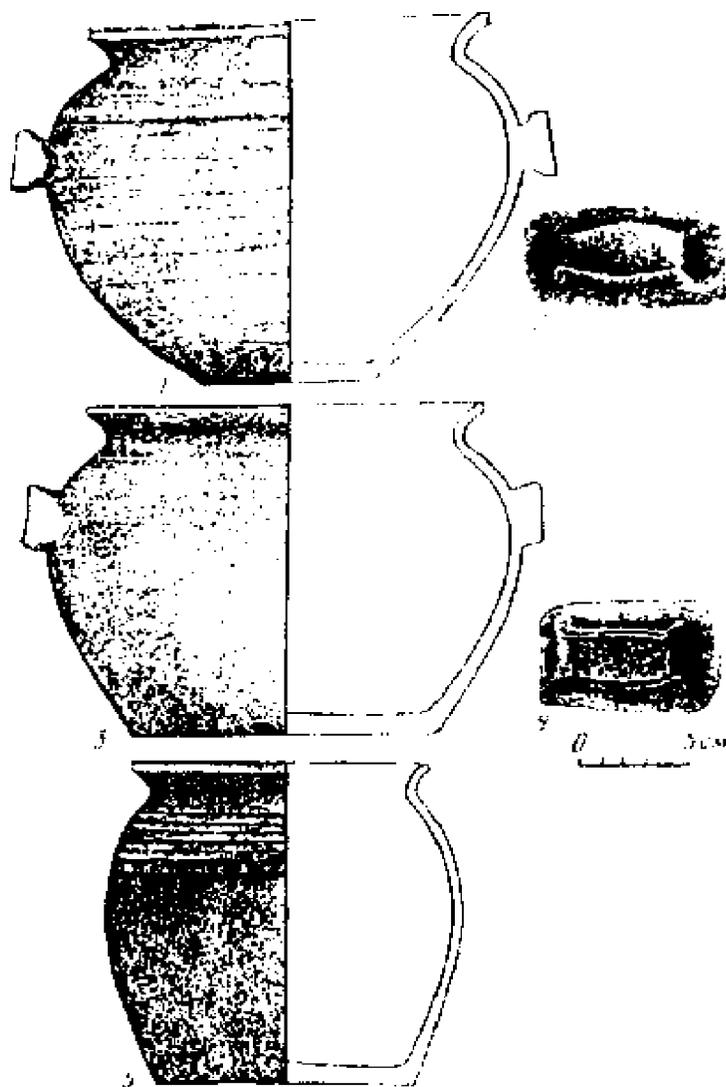
大体上，带有横桥状耳的罐形器是黑龙江沿岸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参考文献 133，第 206 页；图一五；参考文献 134，第 75 页）、满洲渤海遗存（参考文献 285，第 24 页，图 3）常见器物，这种器物的出土率使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文化的标识器，是文化的“脸面”。

瓶形器（图三五） 该类器物平底，鼓腹或弧腹，溜肩，矮颈，颈部明显收缩，侈口，普通的圆唇或檐状口沿。腹径与器高的比例关系是瓶形器主要的形制特征，腹径与器高的比值小于 1。瓶形器的颈部直径与底径接近或相同。瓶形器的出土物多是器片，因而它的规格一直未能得以确定，通过器物复原和图解法计算，可以认为瓶形器的器高介于 27 厘米—50 厘米之间。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出土的瓶形器中，约有 30% 的器物口部造型具有独特的形制，其中包括口沿内侧有一个独特的凹面（图三六）。凹面较大的，口部类似于碗形，凹面较小的，则口部近似于折沿的盘形。不过，在瓶形器中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口沿凹面为普通的水平封闭的凹槽所替代，凹槽的宽度一般不超过 3 毫米（图三六，8）。

毫无疑问，口部内侧有一个凹面与这种器物覆盖有器盖有关。凹槽形口沿，自然而然，不起承重作用，凹槽是在模仿凹面，凹槽是瓶形器形制发展过程中完成的环节之一。

瓶形器的器表一般光滑且有光泽，不施纹。同时，每一处遗存出土的瓶形器中，不少于 10% 的个体施纹。值得注意的是，瓶形器和罐形器的施纹部位不同，如果说罐形器惯用的施纹部位是肩部的话，瓶形器的纹饰带则位于器物腹身的中、下部，且常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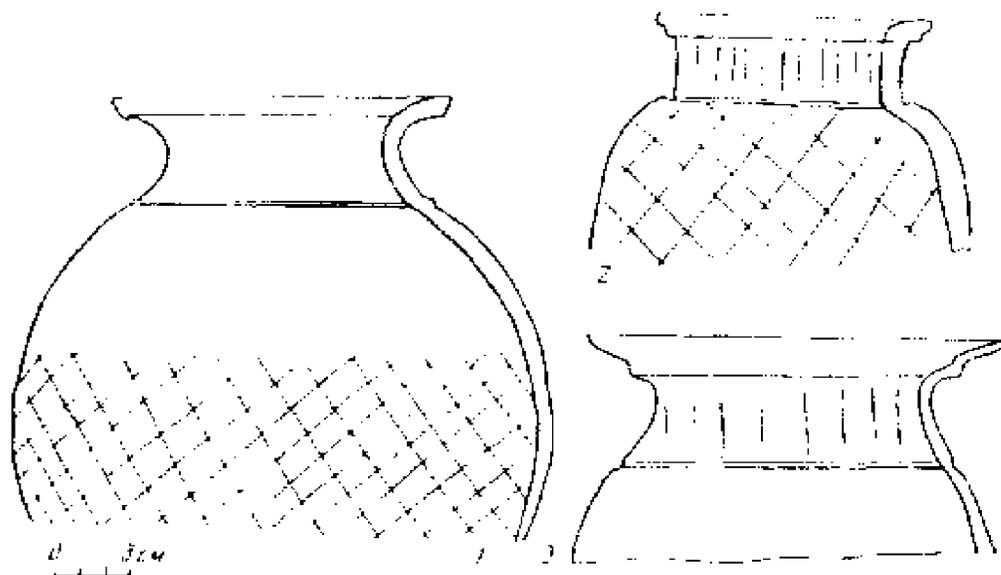
图三四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
快轮加工陶器

达到器底。瓶形器的纹饰有两种类型：嵌入纹、平面纹。嵌入纹是结构构图，水平凹纹似乎把器物的施纹部分和无纹部分分隔开。瓶形器所饰的平面纹饰包括：由菱形、方格形网纹构成，大的网纹达到 1 厘米—1.5 厘米；由 1—4 条水平封闭的条带纹构成，从条带纹往下悬垂有打磨的凹纹，彼此间距 0.4 厘米—0.6 厘米；由伸展的螺旋纹构成，螺旋纹的上下边环绕有打磨、刻划的凹纹；由打磨的纵向条带构成的，条带彼此的间距 4 厘米—6 厘米，它们是在模仿瓜棱。

看来，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带有拱形套叠纹饰的陶

片属于瓶形器器片。

根据其数量、质量指数，瓶形器可以视为渤海遗存的文化标识器，与其同一时期的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墓地出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器物，在契丹遗存中见有相近的器物（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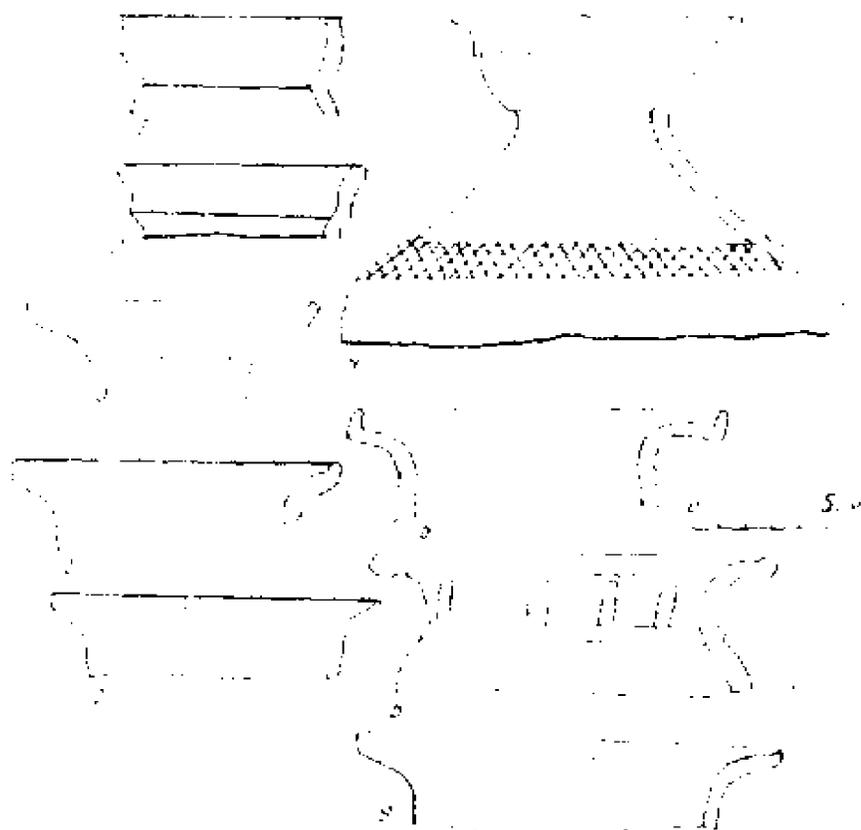
图三五 渤海快轮加工陶器

1, 3,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2,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文献 134, 第 75 页; 参考文献 294, 第 153—156 页)。

壶 (图三七, 2) 壶属于渤海遗存中出土数量不多的器类, 所有出土物均为器片。壶的形制为平底, 鼓腹, 有的器物接近球腹, 颈部较直, 贮存器形口沿, 颈部直径均小于底径, 壶的器高, 看来不超瓶形器的规格, 即 27 厘米—50 厘米。

大体上, 壶的纹饰特征与瓶形器的纹饰相近。大多数情况下, 壶的口部有瓶形器一样的碗形、盘形造型。双重碗形口是壶所特有的形制特征, 其侧面轮廓仿佛是两个相接的凹面。

壶的纹饰带位于颈部、肩部、腹身。壶的颈部多半装饰有漂亮的纵向打磨条带纹; 肩部装饰有水平封闭、半封闭的刻划凹纹, 有的器物肩部施有斜向打磨网纹或条带纹; 腹身施有纵向打磨条带纹, 条带纹的彼此间距 3 厘米—4 厘米, 模仿瓜棱纹器物, 有的器物腹身施纵向直线条带纹、波浪形条带纹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



图三六 渤海区的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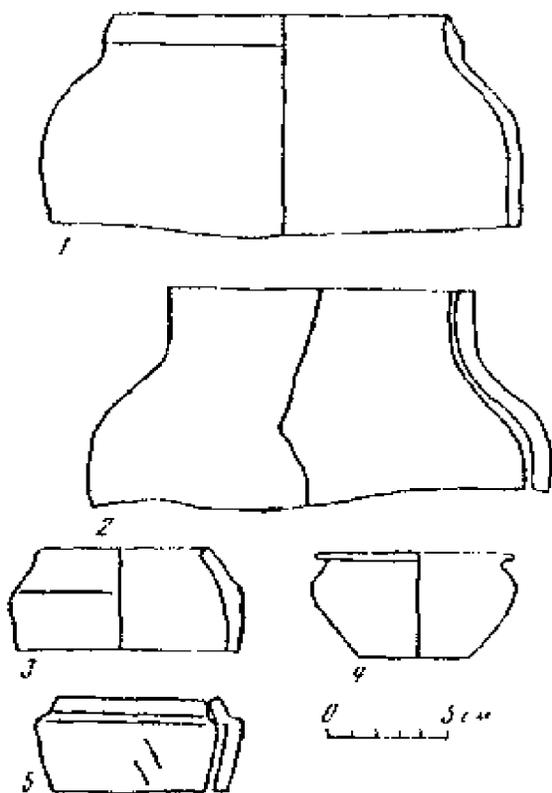
- 1,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 2, 4, 6,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2, 5, 7, 9,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8,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不过，超过 50% 的壶没有施纹，但它们的器表打磨得极有光泽。

看来，壶是从瓶形器派生出来的，但在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陶器组合中它们是同时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种想法，它们的形制产生于毗邻地区的更早时期。在滨海地区，它们出现时器物已经定型，在这里，同一类型系列器物的不同环节共存。

在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与渤海遗存的壶几乎完全相同的个体（参考文献 134，第 75、75 页）。

碗（图三八，8） 碗见于渤海文化所有遗存之中，其用途多



图三七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
出土的渤海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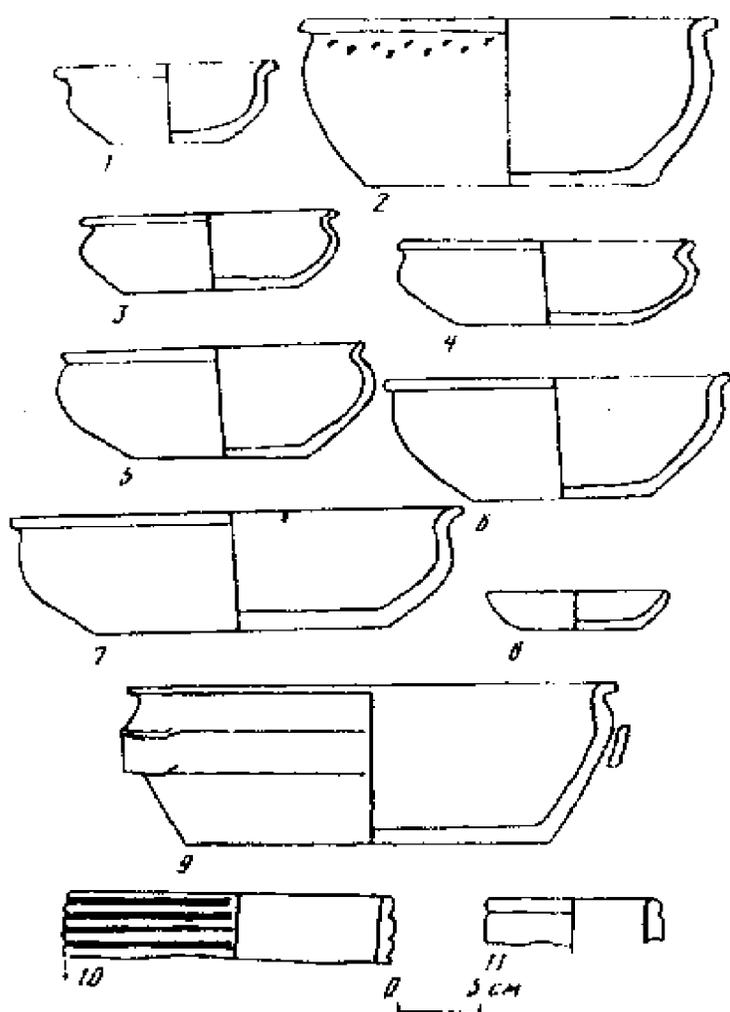
半是食具。碗有不高的圈足器底(0.3 厘米—0.6 厘米),器身接近直壁,圆唇或口沿内侧有凹口。大概,碗不仅仅是用于盛食物,也用于作器物的器盖,证明这一点的是,碗、瓶形器、壶的口径往往相同。一般,碗上不施纹。

球形器(图三九) 球形器是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的典型器物,该村落址出土了 11 件球形器个体。球形器的器片见于克拉斯基诺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球形器为平底或略显凹底,球形腹或锅形腹,由腹身过渡成缓肩或高肩。

球形器有四种变体:1. 由缓肩过渡成纵颈直切口(图三

九,1),该型变体赋有特征的形制,是有一对对称的球果形器耳,器耳的直径为 2.6 厘米,高 1.5 厘米,器耳穿孔的孔径为 0.4 厘米;2. 高肩直接到口,口沿低于肩的最高点(图三九,4);3. 肩、口分界明显,口沿内敛(图三九,3);4. 呈平直切口口沿(图三九,2)。

球形器一般不施纹,器表光滑。20%—25%的球形器施有嵌入的带形纹饰,水平凹线的纹饰带内填充有向右倾斜的梳状施纹工具印纹,有的器物上有不封闭的水平凹纹。球形器的器高 13 厘米—20 厘米,口径 11 厘米—13 厘米,腹径 18 厘米—22 厘米。



图三八 渤海区的快轮加工陶器

1-7, 9,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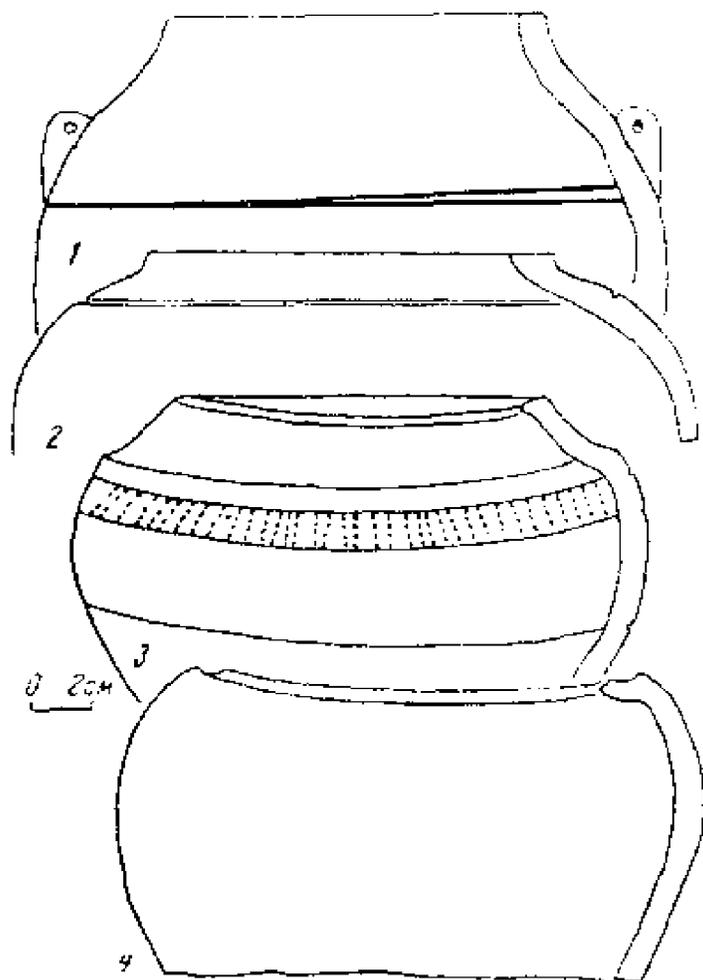
8,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10, 11,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纹带之间，有一个刻划的五角星，这个五角星显然应该是所有权的标志，而不是一种纹饰主题（图四一，1）。

2 类变体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制上的，也表现在纹饰方面。这种差异首先表现为在肩部纹饰带内使用压制、刻制模具形成的各种纹饰变体，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和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

罍（图四〇一四二）这种大型器物有几种变体：1. 器身接近直壁，普通的外侈口（图四一，1、2）；2. 宽底，鼓腹，檐状口沿（图四二）；3. 卷沿（图四一，3-8）。1 类变体是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的典型器物，有 2 件个体得以复原。1 类变体不全都施纹，常常保留有在转盘上仔细抚平的光泽。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有一件器物的腹身中部，在两组水平封闭凹



图三九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1号村落址出土的渤海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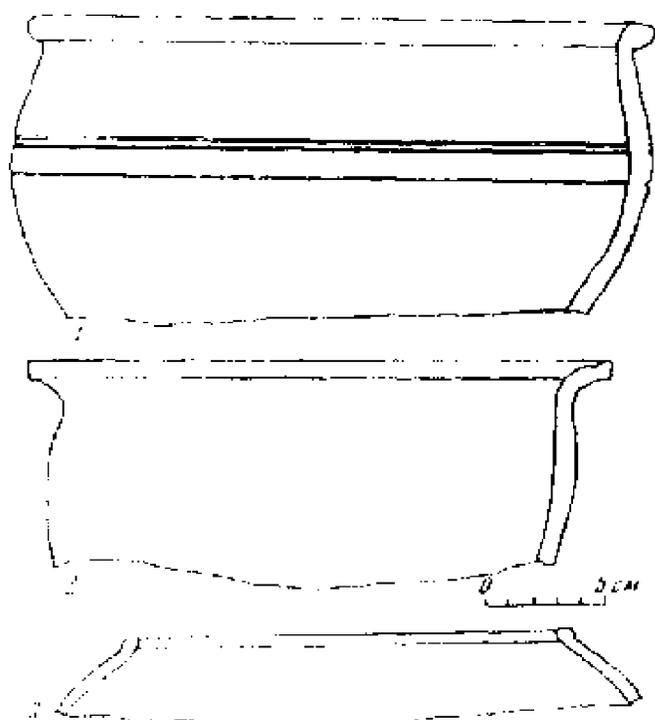
出土了施方格带纹的器片。

第3类变体大多出自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的上层建筑平面，以及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一般它们不施纹，器表打磨光滑。值得注意的是其打磨方式，打磨不是呈横向密实相接的连贯条带痕，而且带状分布的条纹或是单独的条带纹，造成一种印象，器表有波纹或条纹。

卷沿造型有不同的方式：普通的外折沿，折沿没有附贴到器壁上（活领形）；口

沿中部贴附到器壁上，下部卷起，从而形成檐状造型；口沿密实贴附在器壁之上，形成突棱形口沿；口沿边沿向内卷，形成筒形口沿（图四一，3—8）。70%的卷沿上不施任何纹饰，其余卷沿口沿上施水平封闭的1—4道刻划凹纹，纹饰位于口沿的表面。

罐的第1、第2类变体在远东中世纪考古学文化材料中没有找到完全相似的个体，但在黑龙江沿岸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中见有



图四〇 渤海的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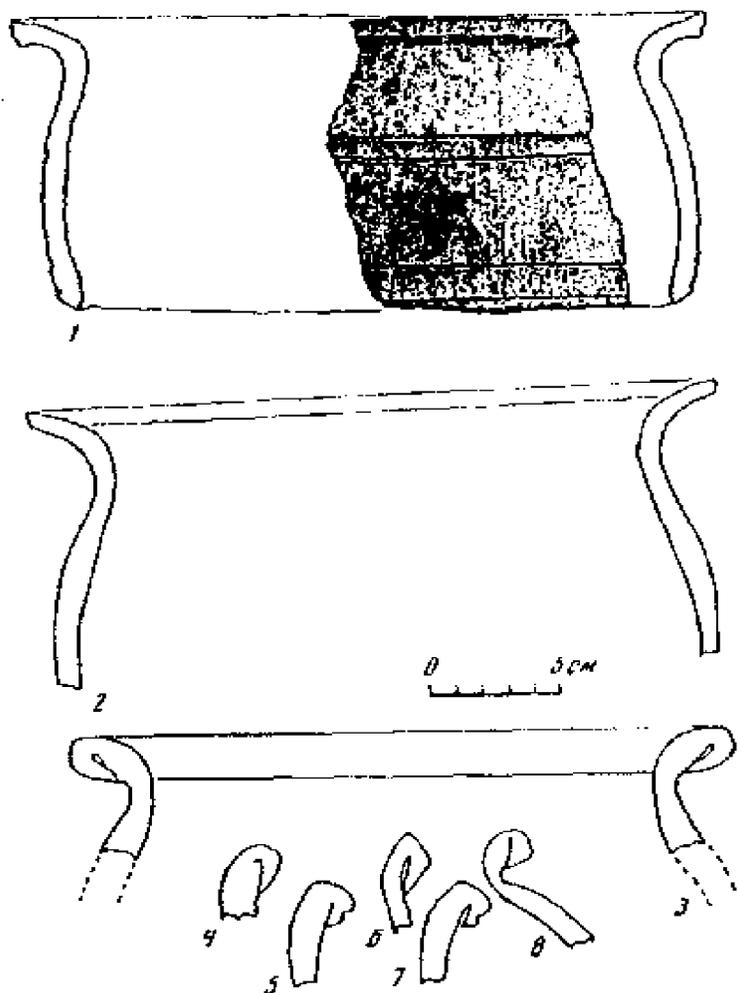
- 1, 2,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
3, 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

形制、纹饰相近的器物。第 3 类变体更符合于女真文化的罈（参考文献 75，第 131 页，图一，4），同时，与辽代契丹遗存的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参考文献 244，第 14 页；文献 245，第 32 页）。

锅（仿金属镬图九，1、2）在许多渤海文化遗存中见有锅的器片，锅的剖面呈抛物线轮廓，模仿铁镬。锅的形制特征是，口沿下环绕有尖棱形、椭圆形突棱（有的突棱是从器壁压制出来的），突棱的数量不一，1—6 条不等。锅见于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参考文献 134，第 79 页）。

器盖（图二〇、11—13；图二九，3、4）泥质陶器盖有三种类型：碗形器盖、顶部带有把手的碗形器盖、带有蒜头形把手的圆锥形（盔形）器盖（图二九，3）。碗形器盖上文已经介绍过，作为器盖它们适用于多种器物，是非常普及的器物。

顶部带有把手的碗形器盖有两种变体：带有嵌入器物用的边沿的器盖，没有这种边沿的器盖（图二三，4、5）。边沿的高度有所不同，0.5 厘米—2 厘米。把手的侧面轮廓接近长方形轮廓，或呈上宽下窄形状。把手的上端通常为平面，这种把手的上端常常见有纹饰，有的器盖表面装饰有水平封闭的凹纹。



图四一 渤海快轮加工陶器的器片

1—3，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

4—8，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一些带有球状把手的盔形器盖个体。器盖有不同的高度和直径，介于 5 厘米—32 厘米，大多数器盖没有纹饰。不过，有些器盖施有打磨的网纹、水平凹纹、“X”形标志。器盖下沿通常为椭圆形、平面形、斜面形，显然，这是由它们所覆盖的器物口沿形制所决定的。

类似的器盖见于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主要出自科尔萨科沃墓地（参考文献 133，第 201 页，图 41）。类似的器物也见于东京城（参考文献 317，图 67，1—7）。这种器物按其形制特征以及常见于遗存之中等情况判断，可以把它们视为文化的标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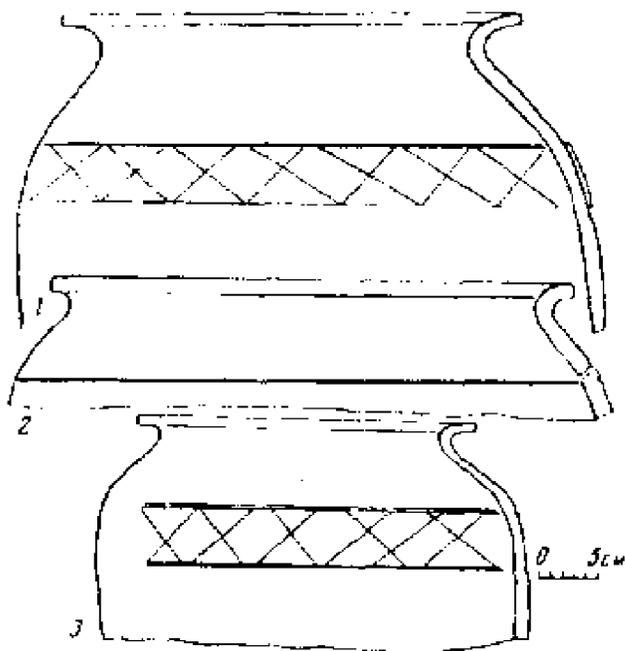
钵和盆（图三八，2、6、7、9） 这是一种宽颈平底器物，鼓

腹，缓肩，侈口，最大腹径位于腹身中部，底径超过器高的 1.5—2 倍，口径大于底径。钵和盆的差异在于，两种器物的尺寸不一，钵的口径 11.8 厘米—24 厘米，盆的口径为 30 厘米—51 厘米。大多数钵不施纹，不过，口沿内面往往有独特的凹面，用于扣合器盖。口沿的形制通常呈平坦的檐状棱，也见有普通的外侈口。

约有 40% 的盆施纹，并且施纹方式具有技术性，因为在器物的肩部、近底部、口部见有模仿编织纹的压印纹。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一些盆的个体带有对称的把手，把手上装饰有光滑的伸展开的螺旋纹。通常，这种形制的器物出自渤海遗存的上层建筑平面，如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克拉斯基诺城址，相近的器物见于滨海地区的女真遗存之中（参考文献 111，第 195 页，图 1—3；文献 181，第 69 页）。

小罇（图三七，3、5；图四三，1、3、4） 该类器物平底，高肩，短纵颈或无颈，普通的圆唇，器高大于底径，口径同于或接近底径，肩部腹径大于底径、口径。此类器物见于大多数的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之中，在满洲和黑龙江沿岸也见有相似器物（参考文献 285，图 2；文献 133，第 207 页，图 17，第 162 页，图 2）。通常，小罇的器表不施纹，不过，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 1 件小罇，肩下有两道斜向刻划的平行凹纹（图三七，5）。

滨海地区渤海文化遗存之中见有一些器片，器底有不同规格的透孔，尺寸 0.5 厘米—2.3 厘米，这种透孔是器物烧制前加工的，切口表面大多比较光滑，即加工时进行了抚平处理。少量的器底得以确定了具体的器物形制，因为器片大多比较破碎且缺少接近器底的器片。同时，见有一些器片，它们能够非常准确地确定器底的器型，它们属于罇、罐形器、盆、即宽底器物。带有透孔的器底多半出自上层建筑平面（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类似的器物见于阿穆尔州的戈梁兹努什卡遗址、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Ю.И. 瓦西里耶夫发掘



图四二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
出土的渤海快轮加工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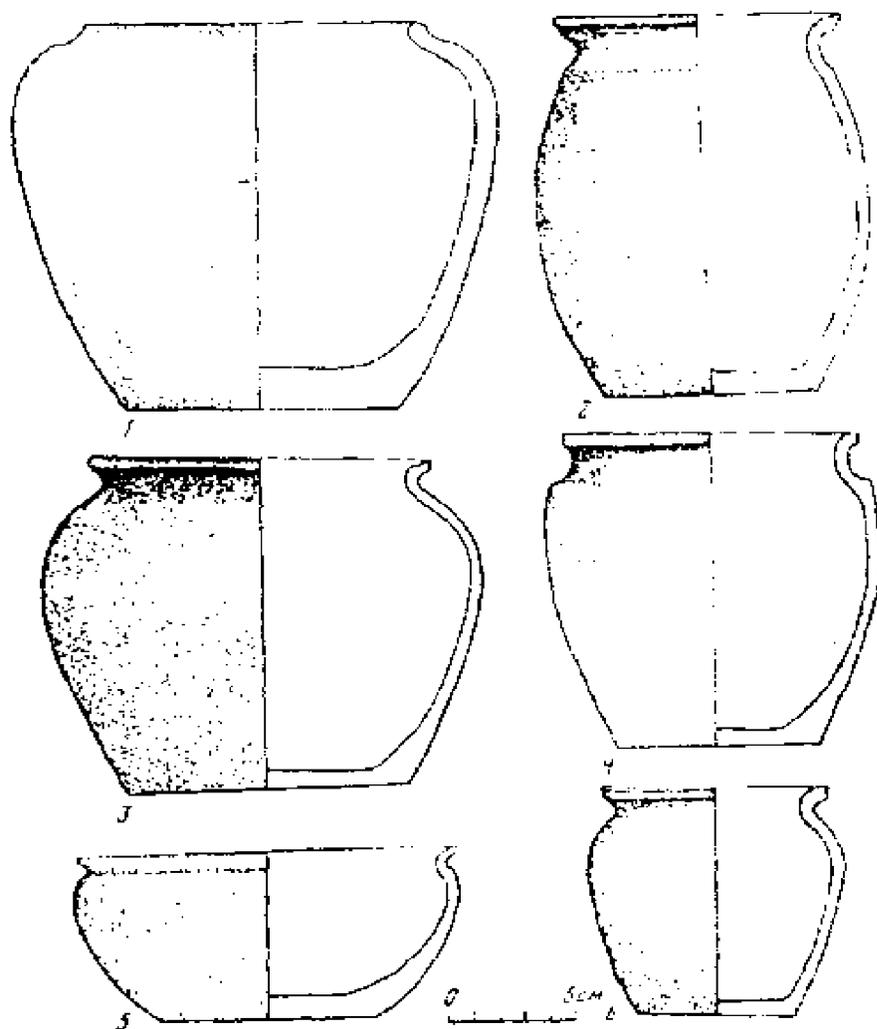
的纳扎伊契夫斯克墓地)，以及毗邻地区的其他文化之中。

在渤海遗存中，揭示了从陶土成分到器物的焙烧以及器物的运用——完整的制作快轮加工灰陶的生产方法和规则。

根据 И. Б. 扎里夏克、Н. В. 奥夫夏尼科夫进行的岩石学分析，瓶形器、部分罐形器、壶、钵、锅、球形器的陶质成分，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表现为：3—4 份的两种陶土（通常为水解云母土、高岭

土）；1—2 份的筛选过的石英粒、植物类补充物；罐、小罐、罐形器的陶质成分是，3—4 份的两种陶土；2 份的筛选过的石英粒（有的是熟土，有的是植物掺杂物）。

所有的器物均是盘辘式堆塑的，多半是从底开始堆塑，少量是从腹身起塑的。大型器物是分部位制作的：底、腹身、口部、颈部。也见有一些器物是分三部分制作的：带有部分腹身的器底、腹身中部、口和颈部。瓶形器、壶、罐形器的某些部位（通常是颈和口部）没有堆塑，是在转盘上用辘形带抻出来的。器物的内外壁则是需要在转盘上加工的，虽然器物的内壁常常留有堆塑、造型痕迹，以及工具（其中包括抹布）的拍痕，但器物的外壁则进行了仔细的抚平处理。此外，器物在干燥状态、半干燥状态均进行了磨光处理。焙烧是在还原状态下进行的，焙烧温度超过 800℃



图四三 渤海的快轮加工陶器

1. 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出土
2. 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
- 3, 4.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5. 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
6.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900℃，达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焙烧所使用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焙烧窑，还应有炉缸。炉缸的内外壁一般是纯净的，没有积碳。

综上所述，渤海遗存的陶器集合分为三种器类：手制器物、慢轮加工器物、快轮加工灰陶器物。手制器物的主要器型是瓶、器、

罐形器、罐头形器，它们的特征完全与黑龙江沿岸靺鞨文化特罗伊茨基类型、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手制器物相符。

慢轮加工器物的主要器型是罐形器的所有变体，它们在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满洲的渤海文化遗存中找到了与自己完全吻合和相近的器物。

快轮加工灰陶器物的主要器型是罐形器、瓶形器、罍、小罍、钵、器盖、球形器，它们的所有基本参数与满洲的渤海文化、某种程度的契丹文化、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的器物相符。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许多种类的渤海陶器，首先是在公元3—7世纪的高句丽陶器中找到了自己的相似物。这种情况使我们得以推测，高句丽国是一个陶器生产中心，这一中心在几百年的期间里给予俄罗斯远东南部、满洲即中国东北的古代部落的制陶生产以强烈的影响。

在滨海边疆区的渤海遗存中，除了快轮加工灰陶器外，还见有釉陶和瓷器，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器物群在色泽方面多种多样，遗憾的是，器物表现为器片。经过仔细研究的不多，约70余片。器片大多属于口径为9厘米—18厘米的碗，其他的器片能够区分出盘、器盖、带有附加装饰的大型球形器、圆形瓷盒的下部、一只小浇桶。除了小浇桶，所有器物均为快轮加工制作而成。除了瓷器，它们经历了两次焙烧：釉前焙烧、釉后焙烧。其中，普通的软性瓷土陶器的焙烧温度约950℃，细石性瓷土陶器的焙烧温度为不小于1100℃，硬性瓷器的焙烧温度超过1200℃（参考文献1，第214、234页；文献164，第55页）。

按照物理、化学性能，所有制品的特点是，存在两种釉：软质含铅釉、硬质高熔点釉即长石岩釉。软质含铅釉适用于软性的粘土质焙烧物或普通的陶器，硬质高熔点釉适用于硬性瓷土器、细石性陶器，以及半瓷器、瓷器（参考文献164，第54、55页）。

软质含铅釉包括单色釉、多色釉。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碗、器盖上施有单色绿釉，碗的口径约9厘米，壁厚达1厘米，器盖壁厚8毫米，器盖上装饰有环状凸出。这两件器物施深绿色釉，不透明，有小网状裂纹——“开片”，釉面保持较差（它们易于从焙烧物上剥落）。器盖只是器表施釉，而碗则是双面施釉，这一点和杏山寺庙址废墟出土的容器一样。该器物堆塑有动物或禽类造型，堆塑造型保存下来的只是不大的一块器片，容器有高而厚重的虎或狮爪状器足，出土物残存两足，大概，器足应该是三个或四个（参考文献197，第85页）。

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渤海文化层出土的小浇桶器片上，施有浅绿色釉，半透明，器表带有“开片”。

朝鲜境内平安北道的大城山宫殿址中，出土了大量施上述釉的器物：碗、壶、器盖，以及装饰有莲花纹饰的瓦当。此外，见有施黄釉、深红釉的瓦（参考文献304，第90、106页，图98）。

在中国境内牡丹江流域东京城发掘渤海都城址时，在宫殿、寺庙废墟中、在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的施绿釉的容器器片。许多世纪以前，在雄伟的寺庙、宫殿的屋顶上，瓦、鸱吻曾经闪耀着碧绿的光辉，立柱的柱座是绿釉陶质制品，有的柱座呈莲花瓣造型（参考文献136，第204、207、208、211页）。

多色的含铅釉即所谓的三彩，是黄色、绿色、褐色混合釉，使用这种釉的工匠以无色釉为基础，补充铁质氧化物以获得从浅黄到褐色的釉料，补充铜质氧化物以获得鲜艳的绿色。在克罗乌诺夫卡河谷地渤海寺庙址、克拉斯基诺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这种釉的器片（参考文献197，第85页）。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器片，对于确定器型提供了可能，有1片器片多半属于直径约14厘米的器盖，另外20余片器片属于口径约14厘米的大型厚壁球形器，器表有堆塑装饰痕迹。

公元6世纪后半期，含铅釉陶器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生产，此

期的釉陶是从汉代传统发展起来的（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至于多色釉陶，它们在中国运用的时间有限，唐朝（7 世纪末至 8 世纪前半期）是其众所周知的繁荣期。后来，公元 755 年安禄山率众起义后，国家经济遭到破坏，多色釉制品的使用明显走向衰落。同样地，这种情况导致了多色釉制品在邻近地区的逐渐消失，高温烧制施高熔点硬质釉的灰色密实焙烧器物替代了早唐釉陶（参考文献 54，第 55 页；文献 104，第 5 页；文献 308，第 47、50 页）。

唐代三彩制品的生产作坊址见于河南巩县、密县，河北涧磁村，四川邛崃地区（参考文献 318，第 47 页）。

渤海工匠借用了中国工匠的经验，并使之在自己的釉陶制作技艺中加以改进，特别是他们经常运用绿釉。尽管许多渤海器物看上去类似中国唐朝的制品，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它们是否全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东京城、大城山宫殿、寺庙覆盖的绿釉装饰物（瓦、立柱柱座），以及容器是当地或附近的作坊制作的，因为在形制上它们与当地的无釉制品相似（参考文献 304，第 96、116 页）。同时，Э.В. 沙弗库诺夫的文章以及日本考古学家的东京城发掘报告中，都从中国的编年史记载中援引了这样的信息：渤海人向中国输出了高质量的陶质容器，引起了唐人的极大惊奇（参考文献 197，第 112 页；文献 317，第 30 页）。

回到滨海地区渤海遗存材料的问题上，必须注意到上文提及的玛丽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的小浇桶，该小浇桶施半透明的绿釉，它是用粗糙的造型泥土手工制作的，存在烧断裂口痕迹。与该器物共出有另外一些相同形制但规格不一的小浇桶，它们是用同样的材料制作的，但没有施釉。所有这些小浇桶显然是当地制作的，并直接加以利用。

在玛丽亚诺夫斯克城址，还出土了四片密实融结的（即石性

的)焙烧物快轮加工器片,断口呈灰色、褐色。它们均有釉疵,即所谓的干点,器表不光滑,呈模糊灰白色,这种效果是釉料焙烧温度过高造成的(参考文献2,第159页)。1片器片是碗片,碗的尺寸不大,外侈口,断口呈灰色,器物内壁装饰有四道毛笔画的黑圈纹。

另外2片器片是褐色断口的圈足器底残片和球形器口沿残片,球形器器片与唐代贮水器形制相近(参考文献319,第727、728页)。第4片器片由于高温而变形,断口明显烧熔,这未必是火灾的结果。这片器片属于细石性制品其焙烧温度超过 1000° ,需要专门的窑烧制。大概,城址内有这样的窑存在。为了公正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中国唐朝,含铅釉的快轮加工制品,主要是用于隆重的场合(参考文献318,第46页)。应该想到,在渤海国它们具有同样的意义。因此,渤海人利用高质量精美样式的陶质艺术品的同时,使用了低质量的制品。

除了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类似的器片,如口径15.9厘米、高5.7厘米的碗的器片,它属于灰色密实(石性的)焙烧物,“干”灰白色釉。焙烧时,碗相互叠放,因为器底的内外壁上有粘土块痕迹,粘土块是器底之间的托垫,以防止器物彼此粘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花瓣状造型的器片,它们多半是盘的残片,在密实的石性焙烧物上,施有无光泽不透明的淡白色釉层,每一片“花瓣”不仅仅是按口沿造型的,而且是按器壁的内外侧轮廓造型,因此,赋予器物特别优美的造型。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还出土了与上述盘相同质地的个体,口径13.8厘米,器高2.9厘米。该盘在转盘上成型、旋光,然后经过仔细打磨,赋予光泽。同时,它没有施釉。完全可能,我们所叙述的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的制品是当地制作的,尤其是城址中发现了陶器作坊遗址,作坊内贮存有白色陶土(参

考文献 164, 第 47 页)。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 以及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 出土了褐色或灰色等不同色度的制品器片, 由于器片较碎, 能够区分出器型的只有碗的器片, 色度的不同取决于焙烧条件和陶质成分。它们施有薄薄的一层高熔点釉料, 釉面保持极佳, 没有“开片”, 有的器片上见有小气泡。大多数情况下器物施褐色釉, 有些呈灰白色, 也见有灰绿色(沼泽色)。按照焙烧物、釉料的质量, 这组器物优于上文所述器物, 它们器壁的厚度不超过 3 毫米—5 毫米, 器表一般光滑, 没有装饰, 只有 1 片器片呈瓜棱形器壁。

中国唐朝制作这种器物并输往各国, 在文献中, 有时称之为褐瓷(参考文献 54, 第 55 页)。

可能, 满洲辽代城市里也制作这种褐色密实焙烧物施褐釉的器物。

另外一组数量不多的器片包括瓷碗残片, 碗施灰白釉, 为灰白色或淡黄褐色瓷土焙烧物, 器表光滑。它们大多具有中国唐时的形制特征: 口沿外侧加厚。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了 1 片盘的残片, 呈花瓣状造型, 这也是唐代器物的特征。中国许多省的陶窑生产这种器物, 如浙江省、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 本文的器片是中国唐代瓷的变体(参考文献 318, 第 57 页)。在克拉斯基诺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了一些高质量的白瓷片, 不透光, 乳白釉。它们大多是碗的残片, 口沿加厚。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 1 片器片得以复原了器型, 是精致的瓷盒, 口径 8.6 厘米, 器高 2.5 厘米, 圈足直径 5.9 厘米, 足上有凝结的撒落物小砂粒的痕迹。口沿下 4 毫米处有扣盖器盖的凸出, 这种盒用于保存不同的调料、香料或化妆品。

某些研究者认为, 除了河北省邢州窑, 中国的其他地区也能生产上述制品, 其中包括现在的江西省景德镇, 它是南宋以及元

代最重要的瓷器产品生产中心之一（参考文献 318，第 57 页）。

大体上，被分析研究的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存出土的陶器证明了制陶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水平。渤海工匠掌握了新的技术和工艺方式，并在自己的作坊中加以完善。毫无疑问，他们接受了中国的影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自身具备相当发达的制陶生产业，这种影响才能成为可能。

我们所论述的材料表明，渤海国与中国唐朝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同时，也证实了编年史的记载。

第四节 交通工具与对外联系

没有良好的井然有序的交通道路系统，手工业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借助于便利的交通条件实现了不同地区、不同居民点之间，以及手工业中心与原料基地之间，国内、国外市场之间的稳固联系。说到这里应该联想到，还是在渤海国建国以前，姆克利首领之一谨行为了保障与中国通畅的经济贸易、使团联系，修筑了“石路”（参考文献 197，第 37 页）。想必，渤海时期也修建了这样的道路。在各种情况下，文献史籍中提及了一些大型交通道路干线，每一条道路有自己的名称：新罗道、契丹道、营州道、日本道，以及“朝贡道”（参考文献 197，第 62 页）。这些道路贯穿国内的不同方向，它们不仅联系着渤海国最边远的地区，并且在实现与外界经贸、政治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渤海政权允许与渤海相邻的部落利用这些道路实现类似的目的（参考文献 197，第 49、64 页）。

根据已有的材料判断，渤海某些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与邻近国家的联系，是借助于陆路、河流、海路实现的。

在文献史籍中，直接记载有渤海存在陆路交通道（参考文献 197，第 69 页）。在渤海遗存的发掘过程中，经常出土的生铁质销

栓、轮毂可以作为陆路交通道的间接证明，同时这些器物也证明了在渤海国中广泛使用畜力交通工具运送不同用途的货物。

正如文献史籍所记载的，河流是渤海人广泛利用的最便利的天然交通道路。在这方面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即几乎所有的渤海村落址均分布在比较适宜于船只航行的河流岸边，并且在同一条河流上往往见有一些这样的居民点，自然而然，这些居民点之间保持着各种联系。

由于河流水系直接贯穿渤海全境，渤海人有了通往黑龙江沿岸、东部蒙古、外贝加尔地区的出口。并且，通过分析众多的文献史籍，可以得出结论，渤海同中亚民族保持着非常活跃的经济贸易联系，这种联系是沿着索格狄亚那人于公元一千纪中期也可能是前半期开辟的貂皮之路实现的。貂皮之路的东段途经黑龙江，然后转向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沿着这条路线索格狄亚那商人可能到达了渤海国最边远的角落（参考文献 203，第 146—155 页）。在渤海国境内索格狄亚那人建立了专门的移民区，在那里他们挑选、保存、筹备运往故乡的当地居民的产品，移民区里分布着不同的手工业作坊，手工业的产品即满足自身的需要，又用于同当地的渤海居民进行交换。在滨海边疆区阿努奇地区发现了一处这样的移民区，这就是在团山与渤海人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并排分布的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参考文献 205，第 100—105 页）。索格狄亚那人移民区没有位于城内，而是与城址并排而立，显然，应该解释为，索格狄亚那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排除来自渤海人方面的任何障碍，按照自己遥远故乡的规则和习俗生活。

由于貂皮之路的存在，渤海人得以保持与南西伯利亚民族的经贸联系，其中包括与回纥汗国的联系。公元 840 年，叶尼塞河的黠戛斯人灭亡回纥汗国以后，为了摆脱征服者的残暴行为，许多回纥人沿着貂皮之路跑到了远东，其中包括渤海国境内，这些人对当地部落、民族的文化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参考文献 58，第

146 页；文献 201，第 87—89 页）。

根据文献史籍记载，渤海国是一个海上强国，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和商船船队。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公元 733 年，即渤海国成立 35 年以后，按照渤海王大武艺的命令，渤海向山东半岛派遣了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对当时中国唐朝的大型海港——登州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登州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恰恰是从登州开始了中国通往渤海的海上商道。这条商道“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东傍海，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自鸭绿江口……得渤海之境。……至渤海王城”（参考文献 187，第 41、42 页）。

“日本道”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交通道，实际上它是貂皮之路的海上延续，这条交通道想必至少是在公元 6 世纪时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在各种情况下，根据日本中世纪文献史籍的记载，此时姆克利部落已经乘坐自己的船完成了到日本岛以及北海道的航行。文献史籍还记载有，公元 7 世纪时期日本人向滨海地区海岸进行了专门的航行，以获得（往往是通过强迫方式）姆克利人的活熊或熊皮（参考文献 153，第 10、11 页）。

渤海国存国时期，貂皮之路的海上部分称为“日本道”，海上部分发端于滨海地区南部海岸，其中包括拉兹多利纳亚河（绥芬河）沿岸分布的大量的渤海遗存，这里面有率宾府的治所，作为其遗迹的南乌苏里斯克城址位于现今乌苏里斯克市的南部城区。另外，还有渤海国的盐州海港，其遗址克拉斯基诺城址位于埃克斯佩季齐亚湾楚卡诺夫卡河河口的克拉斯基诺村附近。总的看来，这里分布着一个渤海人的造船中心，公元 778 年返回祖国的日本大使高丽殿嗣向朝廷提供的报告间接证明了造船中心的存在。根据高丽殿嗣的报告，他的船驶往渤海途中遇到风暴遭受了严重损坏，基于此，渤海人为他建造了两只新船（参考文献 129，第 25

页)。

渤海船队从盐州出发(克拉斯基诺城址),沿着朝鲜半岛东岸航行,然后从朝鲜半岛的东南端转向对马岛、壹岐,一般说来,从这里到日本已经近在咫尺。

派往日本的渤海使团的人数达到100人,有的使团超过了300人。完全可能,为了航行,想必还带有大批的仆人和武装卫队,这就要求有大型的船只,以及完备的小型船队。据公元798年日本国王递交给渤海国国王的国书内容判断,鉴于小型船队在海上航行常常遇到风暴是很危险的,日本国王建议大量减少派往日本的渤海使团的数量,可以推断,渤海人的海船多半是不大的帆船,它们适宜于近海岸航行。

在这方面,公元776年派往日本的渤海使团的某些详情很有意义,渤海船队向对马岛航行时遇到了风暴,当时风暴毁坏了他们的帆,冲走了他们的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渤海的船只除了帆,还装备有橹,这是完成近海岸航行所必需的,特别是风平浪静的时候。

派往日本的渤海使团的主要使命在于,通过交换礼物为朝廷获取异域的、稀奇的商品,换话说,交换日常用品。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渤海人从日本运回了野生麻织的布匹、丝绸、半棉织物、白色的花纹丝绸、塔夫绸、锦缎、白色印花布、麻线、绦、以及铜、水银、松香、海石榴油、槟榔扇、水晶念珠。渤海人输往日本的是熊皮、貂皮、斧、蜜(参考文献129,第21—23页)。

源自渤海的产品在中国得到了声誉,显然,这也是两国商品交换的结果。这一点,见于中国的文献记载,渤海的产品包括:铁、铜、麻布、稻米、棉花、李子、梨、海带、鼓、绸、马、鹿、水牛、虎皮、豹皮、海豹皮、熊皮、野狸皮、白兔皮、犴皮、犴皮、青鼠皮、银鼠皮、苍鹰、鸽、鲸鱼睛、大马哈鱼、鲑、鲤鱼干、鲫鱼干、人参、白附子根、松子、麝香、蜜、蟹、雕羽、雉尾。黑

水靺鞨并入渤海国以后，他们以产细布、六十综布、鸣镝而驰名（参考文献 197，第 63、64 页）。

援引的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渤海国在自己存国的整个期间，与自己的周邻甚至于非常遥远的国家，保持着强烈的政治、经贸、文化联系，自然而然，这种联系不能不给渤海国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

第五节 武器

一般性的军事事物其中包括武器在渤海人的生活中远远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屡屡被迫卷入与自己周邻的各种军事冲突。外族的侵略威胁，以及大武艺及其继任者在位期间控制纳入渤海国组成部分的周邻部落的需要，其中包括对好战的黑水靺鞨部落的控制，迫使渤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海上舰队。渤海的军队由一些较大的卫构成，其中包括左右猛贲、熊卫、黑卫、南左卫、南右卫、北左卫、北右卫，各由大将军、将军统帅（参考文献 197，第 72 页）。此外，如果确信滨海边疆区帕尔季赞斯克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青铜信符上的题铭，则渤海国还设有左骁卫（可能还有右骁卫）（参考文献 206，第 267—270 页）。

至于渤海国的舰队，文献史籍中对一件事件的记载证明了它的存在。当时，渤海人被迫利用海军舰队去攻打中国唐朝最大的海军基地和港口——山东半岛的登州（参考文献 197，第 50 页）。

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渤海统治者特别注重经常训练和提高未来军人的军事技巧。本着这一目的，渤海国甚至颁布了专门的法令，法令规定成年的青年在未掌握识字和射箭本领之前禁止结婚。射箭其中包括骑马射箭，它成为渤海人最喜欢的竞技项目，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情。在日本朝廷召见渤海使团时，使团成员表

演了这种竞技（参考文献 129，第 22—23、26—27 页）。渤海人的骑马技能在他们国家的马球竞技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渤海人的勇猛和军事技巧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流行这样一句俗语：“三人渤海当一虎”（参考文献 197，第 55、111 页）。

综上所述，在发掘渤海遗存时，为什么经常出土不同的武器遗物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毫无疑问，弓和箭是渤海人中最重要、最普及的武器，至少，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镞比其他任何一种武器种类要出土得多。镞的多样化可以证明在渤海人中弓和箭的重要性，目前已知有 20 种铁镞（每一种镞中又往往可以分出变体）、9 种骨镞（含变体）。

所有的铁镞均为柄形镞（图一六，1—9；图一七），其中大多数镞属于扁平镞，即截面呈明显扁平的长方形、菱形，单面刃或双面凸刃。最常见的是截铲形镞（图一六，8），狩猎时用其猎取中型动物，战争时用其射向没有披护铠甲的敌人和他的战马。抛物线形镞也是常见的器型，显然，此型镞有广泛的用途。有时，在渤海人镞平坦的翼上见有穿孔（图一七，5），穿孔的用途，一些情况下，穿孔是用于系结易燃材料以致导致敌方发生火灾；另一些情况下，是为了镞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发生声响。出土了一些更加简洁截面的穿甲铁镞，在数量上，它们明显少于扁平镞（图一六，1—3），这种镞的用途，首先是针对披护有铠甲的敌人，显然这可以解释为，渤海时期铠甲尚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只有最显贵、最富有的军人才能装备铠甲。一些扁平镞、穿甲镞呈阶梯状截面（图一六，4、7），按照 Д. Н. 阿努奇的观点，这种形制能够对飞行中的镞产生旋转影响（参考文献 10，第 378 页）。渤海的武器中，还发现有非常少的三叶形镞，然而不排除一点，这种镞是作为战利品从西域流入滨海地区的，或是西域商人随身携带的，用于途中保护自己的商队，由此而落入滨海地区的（图一七，5）。

渤海骨镞的出土数量，尚不足铁镞的三分之一（图一五，1—

6、8—13），其中只有1件镞是呈管状尾端（图一五，2），其他的镞均为柄形镞。绝大多数的镞呈菱形截面，只有2件镞为三角形截面，接近圆形截面（其中之一为套管形尾端）。最流行的骨镞形制是柳叶形、叶形。

渤海骨镞翼下常常见有雕出的空心哨孔（图一五，13），一些箭的末端有专门的骨质、铁质、青铜质的尾羽，尾羽上带有绷弦切口（图一五，17；十六，12），这样的尾羽上有用于安插箭杆的小套管。

关于渤海人的弓，可以谈及的话题要少得多，因为出土的遗物只是一些骨质的衬板（图一五，14、15、18）。其中有一件出自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该衬板较窄，弯成弧线形，长18.3厘米，宽端形制接近小锹形。大概，这种衬板是弓的弓骹。既然弓骹只发现了一片，况且又是出自城址中，则现在是无法推测弓上还有什么部件残留于城中的。唯一可以讲的是，带有这种弓骹的弓广泛流行于9—10世纪时期的南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地区，并沿用到蒙古时期（参考文献156，第159、161页）。另有一件骨质弓骹出自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该弓骹更厚重一些，长24.6厘米，但很显然，它还没有加工完。除了呈小锹形末端的弓骹，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一件不大的长方形末端的弓骹，其一端有刻划而成的横向支点，用于固结弦，弓骹长10厘米。带有这种弓骹的弓，见于6—7世纪时期的南西伯利亚（参考文献156，第152页）。除了弓骹，滨海地区出土了骨质的轴衬，其规格为7厘米×1.6厘米，其中一个长面较厚（约3毫米），另一面则削尖，如此，这件轴衬的截面类似一个明显伸长的三角形。公元一千纪末期，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弓使用这样的轴衬（参考文献156，第151页）。综上所述，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存中出土的所有的弓的骨质弓骹、轴衬，与同一时期流行于南西伯利亚地区不同结构弓的构件具有相似性，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推测，渤海人也

有不同结构的弓。

渤海军人的武器中，进攻性武器有矛、剑。矛只出土了一只（图一七，10），铁质，套管形，有相当窄的棱翼，矛的通长40.5厘米，翼长24厘米。翼的中部有明显的收缩，翼的最宽处位于翼的上部，距矛尖约3厘米，此处翼宽2.4厘米。翼中部的宽度为2厘米，接近套管处翼宽扩展到2.3厘米。该矛翼身与套管分隔明显，翼身明显收缩并过渡成锥体的套管，套管长16.5厘米，套管的口径为2.5厘米。这样的矛完全可能是用于穿透金属铠甲。

在滨海地区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中，出土了3把单刃剑（图一七，10）。尽管剑的保存情况不同，但显然它们属于同一类型。残存最长的1件个体，长75厘米，该剑柄端残断，剑的通长，大概约有77厘米，刃身长66厘米，直刃，刃身宽2.7厘米—3.2厘米，直背，背厚0.6厘米—0.8厘米。刃身的截面呈明显伸长的等腰三角形，尖部呈斜直面，从背部延向刃部，斜面长3.6厘米，显然，斜面和刃部一样，是削成的。与刃身相比，渤海剑的柄部有所变窄，但大体上延续了刃身的直线。第2把剑刃身残断，但其柄部是完整的，剑残长10.5厘米，其柄部有所变窄。柄部有一个不大的透孔，用于固结把手。这把剑的刃身较宽，2.8厘米—3.7厘米。有一把剑柄部保存有铁质固定环，渤海的剑上有什么样的护手，显然，这是无法推测的。

为了防护身体，渤海人使用了铠甲、盔甲。在东京城发掘渤海上京时，出土了1件盔甲，B. B. 波诺索夫对其有详细论述。这件盔甲呈半球形，为四片宽铁片组合而成，借助于铆钉用细铁条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细铁条的边沿装饰成火焰形。盔甲的下沿也环绕有一周细铁条。额头上部的盔甲处固结有末端朝上的马蹄形铁饰件。盔甲装饰有某种装饰品，出土时失落了（参考文献317，第9、68页，图65）。

另有1件铁盔甲与上文所述大体相似，它呈球锥体形状，根

据出土时的情形，该盔甲也是用四条细铁条把四片铁片连接在一起的。盔甲的下沿也是用一条波纹上沿的细铁条包边。盔甲的全部构件，显然是用铆钉固结的（参考文献 241，图 13）。

有关渤海人铠甲的信息要少得多，尽管它们遗物的出土量要比盔甲多得多，不过，它们全是不配套的铁铠甲片（图一七，13—15），非常像似鳞片。甲片的尺寸、穿孔的分布各种各样，甲片近似于长方形形状，但总有一面较短或变圆或明显切角，后一种情况的甲片形状像似前端宽的器械。渤海铠甲片的宽、长的比值介于 1:2 或 1:3。很显然，渤海人有鳞片形铠甲，这种类型的防护铠甲必须有皮革的、毡子的或布质的衬里。除了铁质铠甲外，渤海人多半有皮革的、毡子的防护铠甲。有关渤海人甲冑的尺寸和式样，目前无法进行任何推测。

论述渤海人的武器，不能不注意这样一种情况，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中，目前尚没有发现一把军用斧。然而，大体上渤海之后的欧亚大陆民族中（参考文献 184，第 63 页），其中包括女真人（参考文献 189，第 109—111 页），斧已经成为最普及的武器种类之一。在渤海人中，没有见到那些普及于女真人中的军事技术形式，如掷石机、攻城机。所有这一切，显然应该解释为是武装力量性质的原因，故而，渤海人军事行动运用的战术，不同于其替代者女真人。

第四章 渤海文化

第一节 渤海文化的总体特征

19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方学家B. 戈爾斯基已经注意到:“渤海国是东海岸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其崇尚教育和学者”(参考文献55,第23页)。对渤海国的这种评价,既符合文献史籍的记载,又与考古学材料相印证。古代编年史的作者称渤海国为“海东盛国”,显然不是偶然的,可能,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称呼的(参考文献290)。根据文献史籍的记载,渤海国甚至颁布了一条朝廷旨令,按照这一法令,已经成年的青年在学会识字和射箭之前禁止结婚(参考文献129,第8页)。想必,这一法令的效力仅仅适用于社会特权阶层的青年。不过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能够证明一点,在渤海国识字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普及。渤海向中国派遣大批学生去学习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参考文献197,第51—52页)。

根据文献史籍和考古学材料,显而易见,渤海人至少使用了三种文字,其中最普及的是汉字。目前已知的是一些中文的渤海文字遗存,其中包括渤海贞惠公主的墓志铭,墓志铭是按中国唐朝的文体撰写的。根据铭文得知,墓志铭制作于公元780年,即贞惠公主的父亲大钦茂执政期间。铭文的内容、文体、文中引用的一系列的比喻、寓意表明,公元8世纪时渤海已经非常熟悉了解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文化和神话(参考文献108,第225—230页)。

在滨海边疆区帕尔季赞斯克地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中,

出土了青铜质的鱼形信符（图一九，11），上面带有中文题铭（参考文献 206，第 267—270 页）。

上一世纪在滨海边疆区发现的带有中文题铭的青铜印、青铜盘，过去也曾被认为是渤海遗物（参考文献 191，第 114—120 页；文献 197，第 109 页），但现在看来，它们是 13 世纪初期在女真军事首领蒲鲜万奴创建的东夏国境内制作的。

第二种在渤海国得到使用的文字是古突厥文字，公元 8—9 世纪时期，与渤海为邻的回纥汗国使用这种文字。古突厥文字的使用，比如上一世纪在南乌苏里斯克城址（位于今乌苏里斯克市城区）出土的石碑，石碑现收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国立滨海方志学会博物馆，在石碑上能够释读出渤海国所设的府——率宾府的名称（参考文献 190，第 82—84 页）。在 10—12 世纪时期中国民间创作的作品《李谿仙醉草吓蛮书》中，可以找到渤海使用古突厥文字的间接证据。这一作品讲的是，中国皇帝玄宗收到了渤海国王的信，信是用莫名其妙的符号书写的，符号类似于动物或禽类爪子的印迹（参考文献 182，第 238—267 页）。作品中列举的信、事件、人物，与文献史籍的记载完全相符。故而，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作为这部作品的基础（参考文献 197，第 109 页）。如果考虑到突厥文字确实像似禽爪的印痕，那么，渤海王的这封信多半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

在中国东北东京城附近发掘渤海上京遗址时，发现了大量的屋顶瓦，瓦上的符号印记类似汉字或契丹大字（参考文献 317，第 45 页，图 46）。但正如所发现的，实际上它们与汉字或契丹大字没有任何共同点。这种情况使我们得以提出推测，即谈一谈第三种文字——渤海文字，显然这种渤海文字源于公元 6 世纪古朝鲜新罗国发明的“吏读文字”。中国汉字笔划的某些变化是“吏读”文字的基础，把中国汉字按自己的发音和意思记录成新罗语。想必是按照这一原则，新罗人的北部邻居渤海人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后来，多半是在渤海人的影响下，契丹人、女真人用相同的方法创造了称之为“大字”的自己的文字。正如女真“大字”的研究成果所展示的，它是一种音节文字，显然，渤海人的文字也是如此（参考文献 148，第 4 页）。

相对于中国汉字而言，后两种文字更适宜于渤海人语言的标准和语音特点，显然，它们被渤海城市居民的广大群众用于撰写契约、借据和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书。而汉语和汉字则主要是在宫廷贵族、官吏中使用，被用于撰写官方文件，其中包括外交文件、法律、命令，而且还是渤海上流社会诗歌、文学的用语（参考文献 197，第 110 页）。

除了宗教意识的传统形式，渤海受到了居住在其境内的高句丽人的影响，佛教在其特权阶层圈子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发掘中国东北东京城附近的上京址时，以及在滨海边疆区进行的发掘，发现的大量的佛教寺庙和庙宇证明了这一点。在乌苏里斯克地区发掘杏山脚下克罗乌诺夫卡河左岸的佛教寺庙址时，有趣的发现是，出土了一件椭圆形带有景教十字造型的陶质牌章（参考文献 197，第 111 页，图 X X X，2）。当然，根据这件目前唯一的一件遗物，很难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也不排除，在渤海国，与佛教一起还出现了景教。公元 7—8 世纪，景教在中央亚细亚、远东国家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包括与渤海毗邻的中国唐朝和回纥汗国。

佛教和景教在渤海的运用，自然，促进了与之相应的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毗邻国家的某些建筑、装饰造型法式在渤海的确立。所有这一切表明，渤海文化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渗透着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相互作用。

当时，马球在渤海人以及中国人中得到广泛流行也可以作为上文所述正确性的一个证据，一般认为，马球这种竞技是从伊朗传到远东的（参考文献 205，第 103 页）。

同样地，对于周邻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渤海国也给予了不少的影响。这方面可举日本为例，众所周知，公元822年，前往日本的渤海人参加了马球比赛，这种竞技游戏给日本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早春观打球”的诗，诗中详细描述了游戏的过程和观者的反应，诗文如下：

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乘时出前庭。
回杖飞空凝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
左拟右承当门竞，分行群踏虬雷声。
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

在渤海人的影响下，在日本形成了特殊的戏剧演出形式“渤海乐”，这种音乐本世纪仍在表演（参考文献98，第30页）。日本人还在渤海人那里借用了“耐茨盖”——这是一种被艺术化地雕塑成动物、人物、鸟禽、鱼、花朵形状的小型雕塑品坠饰，借助于它把荷包、装有文具、药品、火镰及其他日用品的盒子固定在腰带上（参考文献316，第26—36页）。

诗歌创作和音乐在渤海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前往日本的渤海使臣积极参加日本宫廷诗人和音乐家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敬而专门组织的竞赛会（参考文献197，第114页）。这种竞赛会的积极方面在于，相互丰富了两个国家的文化。

综上所述，根据保存在古代文献史籍中不多且零散的有关渤海的记载，及根据考古学考察成果对滨海地区居民物质文化总体水平的复原，显而易见，当时的渤海国拥有目前尚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的崇高、独具一格的文化。

第二节 装饰造型艺术、宗教观念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渤海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渤海境内除了通古斯语族部落外，居住有高句丽人、回纥人、室韦人、索格

狄亚那人及一些其他民族。这种情况自然而言会在渤海文化上留下一定的烙印，这在包括居住在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渤海人的装饰造型艺术中也得到体现。

和大多数的中世纪时代的欧亚大陆民族一样，有饰件的腰带是滨海地区渤海人服饰的重要因素之一。代表性的饰件是大量出土的青铜、铁、骨质的牌饰和扣环，根据造型特点可以把它们分为古突厥式的（图一九，2、8，14—19）和远东式的，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室韦式的带饰（图一二，35—40）。许多带饰，主要是室韦式的带饰，装饰有独特的纹饰。

此外，见有一些骨质的皮带上的镶贴物，其上装饰的主题纹饰图案不见于渤海境土之外，因此，它们在起源上应属于典型的渤海式器物。首先是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的双层长方形的骨质皮带镶贴物，该牌饰的边端有两个铆钉穿孔（残存有一个铁质铆钉）。在一片骨板上用锋利工具刻划出五只正在吸食灌木浆果的不清楚是凤凰还是雉的禽类造型图案，在第二片骨板上，骨板的中央用反向的两组套叠三角形图案把骨板分隔成两等份，一条纵线贯穿三角形的尖部。每一半面的骨板其下部有两对仿佛从洞穴中探出头来的蛇的造型，在每对蛇头之间的上部有尖朝上彼此套叠的三角形图案（图四四，15）。该片骨板的纹饰图案的施纹技术与上一片骨板相同，两片骨板均沿着四周刻有细轮廓线。

第二件骨质皮带镶贴物出自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形制接近长方形（图四四，13）。总的看来，这件镶贴物尚处于制作阶段，因为它的纹饰还远未全部完成，并且器物上没有铆钉穿孔。和马里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的第二片骨板一样，该镶贴物的中部也有把器物分隔成两等份的反向纹饰图案，下部是三角形，上部是三个套叠的半圆或弧线，它们的中部也贯穿有纵线。该图案的右侧有一个由两组平行线直角相交形成的十字图形，右侧的其他部分没有纹饰。在镶贴物左半面的端头刻划有一个拉丁字母“N”形

的记号，其内部空间填充有平行的刻划线，左侧的其他部分也没有纹饰。镶贴骨板的边缘环绕有一周细刻划线，该器物的施纹技术同于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的同类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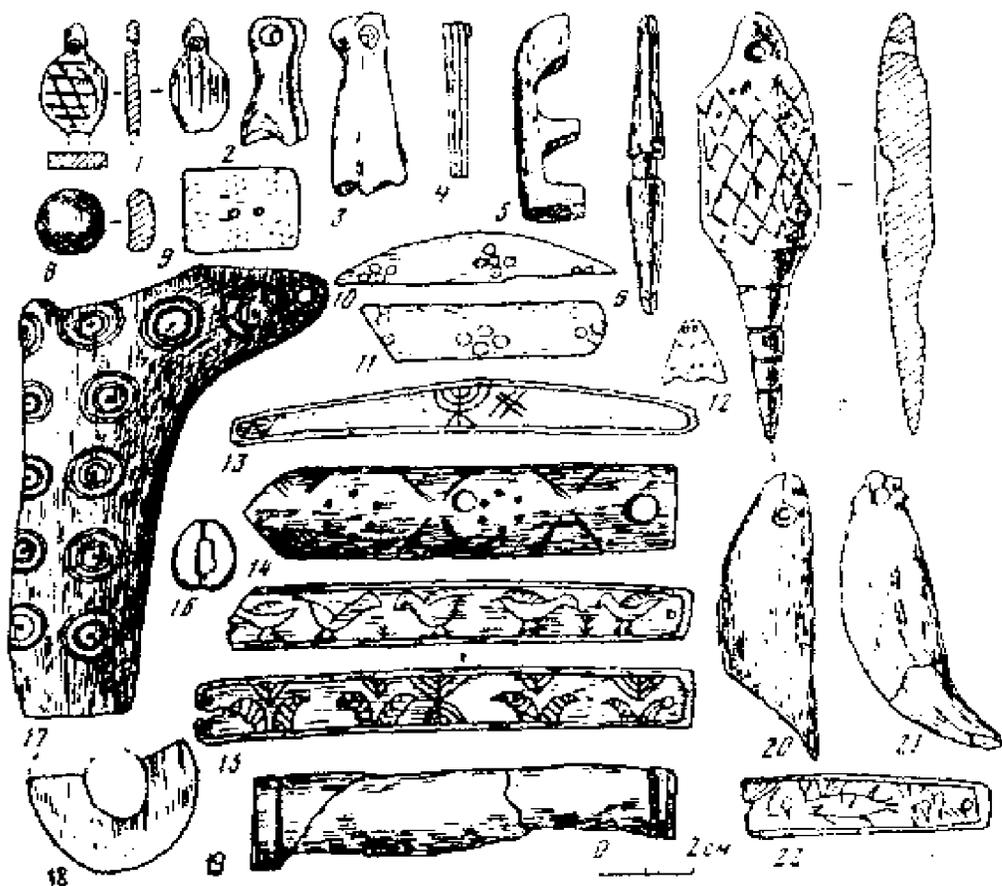
第三件骨质皮带的镶贴物的残片也是出于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之中，该器物仅残存了右半部分，并且断裂口正好处于器物的中部，该处残存类似上述器物的“分界”图案，不过，不见下部的三角形图案（图四四，22）。器物的残存部分见有两个铆钉穿孔：一个位于器物中部，一个位于器端。器物四周环绕有刻划轮廓线，然而器物本身的纹饰是无法“破译”的复杂图案，纹饰的施纹技术同于前两件镶贴物。

引人注目的一事实是，上述三件镶贴物尽管出自两个相距遥远的遗存之中，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细节：器物的中央有反向的套叠三角形或弧线的“分隔”图案，看来，可以把它作为这种器物源自渤海的特征之一。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中，还出土了两件长方形的骨质皮带镶贴物的残片。其中之一，总的看来，只残存有器身的一半，并且器物是沿着器身中部的纵向深凹纹折断的。残存部分的纵向外缘环绕有细刻划纹，纹饰为连续分布彼此并列的角尺形图案，器物的两个端面有铆钉穿孔。第二件残片仅残存下边缘部分，器物是沿着铆钉穿孔折断的，据其残存部分，该器物沿着两端和一侧纵向边缘装饰有细刻划线，器面刻有几乎是均分为两半的矩形图案。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接近长方形形状的骨质钝尾，也属于皮带饰件，其一端削尖，器物上有两个铆钉穿孔，借助于铆钉把它固结在皮带上。器表装饰有三对彼此反向分布的三角纹，三角形的底边座落在器物的横向边沿上，三角形是用刮平骨面表层的技术完成的。在反向对置的每组三角纹之间的器表空间里，有两组由六个圆窝纹环绕而成的圆圈形花结纹（图四四，

14)。



图四四 骨器

1—3, 7, 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

4—6, 10—14, 16, 19, 20,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8, 9, 17, 18, 21, 22,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

15,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发现了大量不明用途的骨板，其上装饰有圆圈形图案（图四四，10、11、17）。研究表明，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是公元 8—10 世纪时期索格狄亚那人移民的居民点遗迹（参考文献 205，第 100—105 页），因此该村落址发现的器物，其中包括骨器、多半是属于

索格狄亚那人移民的，尤其是圆圈形图案尚不见于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渤海以前的遗存之中，然而公元 8 世纪时期它们广泛流行于中亚，其中包括片治肯特（参考文献 205，第 103 页）。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存在带有圆圈形图案的骨器表明，这种纹饰图案，显然，是在索格狄亚那人的影响下在渤海人中得到传播的。

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骨器中，不能不注意一件不大的“耐茨盖”类型的坠子，坠子为扁平长方形的骨板，其上有两个系结穿孔，在一侧平面上装饰有六组花结形纹饰，花结由圆形分布的圆窝纹组合而成（图四四，9）。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的钝尾见有这种纹饰，不过两者间有不大的差异：坠子上的花结纹中央还有一个圆窝纹。过去曾经认为，坠子是渤海人的（参考文献 316，第 35 页），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明确在该村落址中居住的是索格狄亚那人移民，则不排除坠子是他们制作的，而不是渤海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说明坠子是源自渤海的证明只在于，坠子上的纹饰和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钝尾上的纹饰存在同一性。

饶有趣味的是，在发掘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时出土了两件用骨头雕刻的动物，其中之一多半是乌龟的平面造型，遗憾的是，它的尾部残断，妨碍了对其更准确地确认（图四四，1）。其背部装饰有斜向交叉的刻划纹，由此形成了菱形的网格纹，似乎是在模仿甲壳。头部不大，接近三角形轮廓。第二件雕刻品非常像无腿的蜥蜴（图四四，7），和龟形雕刻物一样，该器物的背部有相同方式的装饰，不过，在一些网格的内部还见有圆窝形凹坑。长锥形尾，头部接近三角形轮廓并见有一个穿孔，显然穿孔是系绳用的。完全可能，这件蜥蜴造型的雕刻品是枚悬挂式骨针。素面的骨质装饰品，代表性的是半球形皮带镶贴物，是用熊、麝的牙齿以及马鹿的牙齿制作的坠式避邪物。除此之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了珍珠贝制作的三角形轮廓、齿状下缘的

坠饰，坠饰上见有点状花纹。该城址中还出土了一组海生软体动物的贝壳，其中包括货贝的贝壳，经过加工，可以把它们缝合到服装或腰带上。

渤海人用青铜质的半球形小牌饰装饰自己的服装、腰带，这种牌饰往往镀金，其反面有一个扣眼，它和现在的某些纽扣相像，不过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渤海人的纽扣，是用骨头旋出的销钉形扣子（图四四，6）。

滨海地区渤海人最丰富的装饰造型艺术是不同种类的陶制品，首先是屋顶瓦。

只有用于镶砌屋顶正面前沿的覆瓦、仰瓦，才进行了美观的装饰。仰瓦上最常见的纹饰是沿其正面端沿连续分布的手指印纹，这种印纹的分布和方向具有随意性：一些印纹是沿着外沿分布，一些印纹是沿着内沿分布，另有一些印纹则同时见于内外沿之上。

第二类纹饰是沿仰瓦正面切口的中央分布的嵌入的、压印的圆圈纹，这种纹饰是借助于空心的苇秸杆完成的。代表性的纹饰是，根据链状分布的圆圈纹的边沿装饰造型特点形成的各种变体：边沿装饰表现为边沿两面链状的刻划线纹；边沿上有链状的刻划线纹，同时从该刻划线朝向外缘分布有斜向刻划线；边沿上有斜向刻划线，但链状纹已经不见了。另见有一些仰瓦个体，链状纹为彼此分组的三个圆圈纹构成的三角形图案。有些仰瓦个体，圆窝形印纹替代了圆圈纹（参考文献 197，图 VI、VII）。

马蹄山寺庙址、杏山寺庙址出土的仰瓦上，见有有趣的变体纹饰：仰瓦正面切口的中央装饰有第二种纹饰，在切口外侧凸面上补充有由两条平行的链状圆圈纹构成的纹饰带，两条链纹之间连接有斜向的嵌入线纹，或彼此交错的嵌入线纹（参考文献 197，第 80 页，图 X I X）。

第三种纹饰是由 X 形深嵌入线构成的链状纹（参考文献 197，第 80 页，图 VI、X VII，1）。

第四种纹饰是“人字形”分布的深嵌入线纹（参考文献 197，图 X VII，2）。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覆瓦的瓦当上有更复杂的纹饰，在构图方面它们属于花结纹，模仿莲花纹造型是其纹饰基础，莲花纹造型是借助于专门的模具在未干的陶胎上压印出来的。当面是单独制作的，然后把它固结到环形边框里，再和瓦身连接成一个完整的器物。

根据花结花瓣造型的特点，瓦当划分出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花结的中央有一个半球形凸体，连同环形边框形成一种幻觉，即独特的青铜镜的摹本。

最早的花结类型，见于马蹄山寺庙址出土的覆瓦当面上。该类型的花结，不大的半球形凸体环绕有两周同心圆凸线，由圆凸线向外绽放开 8 朵水珠形花瓣，其中 4 朵相间分布的花瓣环绕有树叶形状（桦树）的封闭凸线，整个花结环绕有 25 颗珍珠纹，珍珠纹的两侧环绕有凸体的同心圆线（参考文献 197，图 X，1）。

该类型花结的一件变体与上文所述的差异在于，在瓦当的环形边框上有借用于苇秸秆完成的链状印纹，类似于仰瓦正面切口上的链状纹。与渤海毗邻的远东国家的覆瓦瓦当上，目前尚不见这种补充纹饰。

该类型花结的另一件变体出自杏山寺庙址，它与前两者的差异在于，环绕半球形凸体的两条同心圆周线之间有 8 颗珍珠纹，这些珍珠纹也构成了一个圆周，而环绕花结的珍珠纹，数量达到了 28 颗（参考文献 197，第 X，2）。

第二种花结类型出自杏山寺庙址的覆瓦瓦当上，其特点是，花结中央的半球形凸体比第一种类型的凸体大得多，从该凸体向外绽放开的只是 4 朵叶形花瓣，花瓣呈封闭的凸线造型。每一朵花瓣的内部，从底线分离出一个箭头形状的直茎。花瓣之间分布有弧形图案，仿佛构成了花序（参考文献 197，图 XI，1）。

在杏山寺庙址出土了一件该类花结的变体，它与上者的差异在于，在弧形图案两端的上部分布有 8 颗珍珠纹，（参考文献 197，图 XI，2）。

第三种类型的花结见于克拉斯基诺城址，该类型的花结，中等尺寸的半球形凸体周围分布有 5 颗不大的珍珠纹，它们被环绕在凸纹圆周之内。从凸纹圆周向外绽放开 5 朵长在叶茎上的桦树叶形的幼芽或花瓣，幼芽内部的纵脉将其分隔成两小瓣，每一瓣内含有椭圆形凸体。幼芽之间，有椭圆菱形凸体（图七，1）。

第三种花结类型的变体见于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的覆瓦瓦当之上，花结上的幼芽由 5 朵变异成 6 朵，幼芽之间分别有一个半球形凸体或珍珠纹，总计 6 个（图七，2），同时，该花结半球形凸体的周围不见珍珠纹（参考文献 141，第 49—60 页，图十）。

第四种类型的花结出自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图四五），该类型花结与第三种类型的差异在于，第一，大型半球形凸体环绕的凸圆周线内没有珍珠纹；第二，花结里的幼芽不是 5 朵而是 4 朵；第三，幼芽纹之间分布有凤凰的浮雕造型，滨海地区境外的渤海瓦当上，甚至于不仅仅是渤海的瓦当，目前尚不见类似的浮雕造型。瓦当花结中的凤凰总共有四只，并且两只一组，每一组凤凰的头向相对，均朝向它们之间的幼芽，并且它们象似在啄食这些幼芽。凤凰的头部可见不大的粗糙压制而成的冠，厚喙，长颈，直尾略上翘，三趾或四趾的长爪呈展开状，伸展的翅膀略高于背部，给人的感觉是凤凰在跳舞（参考文献 209，第 269—271 页）。

说到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期成书的《山海经》里的中国古代传说，很久以前，丹水注入渤海湾（顺便说说，姆克利部落创建的国家根据这一地名得到了自己国家的名称（参考文献 197，第 47—48 页）），人们认为丹水流域及其谷地栖息着凤凰鸟，“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到天下安宁”



图四五 科尔萨科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
出土的瓦当

(参考文献 92, 第 32 页、149 页, 注释 103; 文献 140, 注释 57)。据说凤凰的起源和太阳、火有关, 凤凰是南方、温暖、夏天、好收成的化身 (参考文献 169, 第 44 页), 是生命、幸福、安宁的象征 (参考文献 92, 第 140 页, 注释 59)。除此之外, 过去的人们认为, 凤凰只现身于德政时期, 由于雌、雄凤凰非常温柔地相互依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凤凰成为夫妻间爱情、忠诚的象征

(参考文献 43, 第 408 页), 凤凰还是皇后、新娘的代名词。

凤凰以竹笋为食 (参考文献 169, 第 44 页), 由此可以断定, 渤海瓦当上的幼芽造型, 多半是从地下长出的竹的嫩芽。竹是“外表强健、内心宽容的刚毅之人”高风亮节的象征 (参考文献 3, 第 22 页; 文献 175, 第 126 页)。

回到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带有凤凰造型的瓦当的问题上来, 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 可以推定, 作为青铜镜的模仿品, 这种当面的使命, 既是宗教信仰神圣性、纯洁性独特的避邪符咒, 也是寺庙、佛塔本身以及寺庙里信徒的避邪符咒。公元 11—12 世纪时期在女真人、契丹人中间存在的, 在第二层佛塔的墙壁上安置有模仿青铜镜的镶嵌物的习俗 (参考文献 49, 第 186 页), 正如以往所推测的那样, 寓意着青铜镜的模仿品和真正的青铜镜一样, 能够反射足以导致所有魔鬼毁灭的太阳光。类似的使房屋

免遭各种灾害的习俗，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东北的居民之中，在当地，在寺庙的屋顶专门固置有赋予这种使命的青铜镜（参考文献 174，第 58 页，图 20）。同时，过去的人们认为，凭借镜子背面表现美好祝愿的图画标记，镜子的神圣性可以得到明显增强。显然，也可以同样地评说渤海的瓦当。通过分析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的瓦当上的纹饰，有理由推测，它是佛教信仰中表现世界祥和、幸福生活、爱情、安宁的象征。

至于滨海地区渤海居民陶质容器上的纹饰，需要指出的是，纹饰比较单一并且不很常见，其施纹技术可以分为刻划，打磨、模压、堆塑、凹凸纹等等。

刻划纹饰代表性的主要是沿着腹身分布的 1—8 条数量不等的横向直线纹、波浪线纹以及波浪线纹的各种变体；拱形纹饰；连续分布的短斜线纹或彼此交叉分布的斜短线纹构成的带状纹饰。

打磨纹饰代表性的是波浪线纹图案构成的带状纹，以及伸长的弹簧形锯齿纹纹饰带，纵向短斜条纹，由彼此交叉的斜条纹构成的菱形网格纹。

模压纹饰首先是梳状、维夫饼干形纹饰图案，梳状纹饰由一条或多条纹饰带构成。至于维夫饼干形纹饰，有的布满器物的腹身，有的呈带状图案，并且，维夫饼干形图案的窝眼呈方形、菱形、三角形。有极少量的模压纹是中心有坑点的环状纹，以及圆圈纹、花结纹等等。容器上常常见到的带状纹饰带，是借助于带滑轮的模具在器物上压印出来的。

凹凸纹通常为一条或多条的水平突棱线纹，或一条或多条的沟槽纹，见有由不同数量的突棱，沟槽构成的复合纹饰。有些器物的腹身由于存在纵向的沟槽而被分隔成瓣状轮廓，这就是所谓的瓜棱形器。

杏山寺庙址出土的釉陶器上带有堆塑纹饰，器身堆塑有某种鸟的造型，可能是凤凰（参考文献 197，第 85 页）。克拉斯基诺城

址出土的焙烧炉的陶管上装饰有堆塑纹饰，为花结状圆形颈饰（参考文献 205，第 103 页，图一五）。克拉斯基诺城址、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 1 号村落址出土的陶器上，见有堆塑纹饰的有趣变体，器物的腹身之上贴有较宽的横向泥条，一种情况，泥条上施有嵌入的斜线纹；另一种情况是，泥条上施有彼此交叉的嵌入斜线纹。

滨海地区渤海人最复杂的纹饰被用于佛像的陶质台座上、饰面陶砖上、寺庙的墙壁上，马蹄山寺庙址、杏山寺庙址的发掘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马蹄山寺庙址的发掘过程中，沿着寺庙墙体的四周发现了陶质饰面砖的残块，其上装饰有涡形末端的斜向直线纹（参考文献 197，第 75 页，图 X VI，1）。在杏山寺庙址的废墟中，发现了在导致寺庙毁灭的火灾中凝结住的墙壁灰泥，灰泥上残存有极小部分的墙壁画，根据墙壁画的残部判断，寺庙的墙体上涂有象牙色染料，涂色后的墙体的某些部位，多半是房檐下装饰有曲线几何形图案，图案下面环绕有暗红色细条纹（参考文献 197，第 83 页，图 X X XI）。

在杏山寺庙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堆塑装饰品，它们曾经装饰在陶质佛像的台座上，遗憾的是，它们都只是一些不大的残块。其中，首先是花结形圆框的残块，圆框呈截球形轮廓，其上环绕有珍珠纹，上文提到的克拉斯基诺城址中出土的焙烧炉的陶管上，有这种类型的花结形圆框。不妨指出的是，公元一千纪上半叶至下半叶初期，这种纹饰因素广泛传播于中亚和东突厥斯坦的民族之中（参考文献 205，第 103—104 页），看来，后来见于渤海人中的这种纹饰是从那里传入的。

杏山寺庙址区域内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堆塑的陶质装饰品，其中包括珍珠形装饰品（参考文献 197，图 X X XI，1）。

渤海人的装饰品尽管数量不多，但制品多种多样。其中优势的是玻璃、陶质、石质串珠。在杏山寺庙址附近对渤海墓葬进行了发掘，在 2 号墓葬中得以清理出散布开的一整条项链的石质串

珠，串珠中形状特别独特的是所谓的斧形串珠（参考文献 197，第 92 页，图 X X XI V）。滨海边疆区奥利加地区的青石崖遗址出土过这样的串珠，该遗址的上层堆积被 К. В. 安德列耶娃断代为 8—9 世纪，即渤海国存国时期（参考文献 8，第 169、174、204—205 页）。据此显而易见，斧形串珠是渤海文化民族标识性特征之一，目前这种串珠还未见于滨海地区更早的遗存之中。

坠饰装饰品是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中常见的遗物，其中包括用动物骨头、牙齿制成的别致的护身符（图四四，2、3、20、21）；复合式耳环上的骨圈（图四四，18）；货贝贝壳，对其进行磨薄处理后形成平环（图四四，16），根据平环上专门切开的凹口判断，它们是被缝合在长袍的下摆上。不久以前，黑龙江沿岸的现代通古斯语族民族还在这样使用贝壳。

在数量方面，金属的皮带饰件是其次种类的装饰品，它们是铁质、青铜质的四边形、椭圆形突厥类型腰带镶贴物，器物的下部有裂缝形透孔（图一四，1—4；图一八，2、8、10、14—17）。如果不考虑青石崖遗址上层渤海时期堆积中出土的两件青铜镶贴物带有装饰纹饰，其他的镶贴物均不施纹（参考文献 8，第 160 页，图 14）。不过，见有较少的花样腰带镶贴物（图一八，3、4、6、19）。在渤海人中比较普及的是青铜质且多半镀金的半球形镶贴物（图一八，9）。在有些遗存中，发现了一些缝在面上的长方形、带有托板的圆形透花牌饰，它们有相当复杂的透花纹饰，并配有嵌入纹（图一二，35—40）。带有托板的圆形透花牌饰大量见于黑龙江沿岸的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即所谓的黑龙江女真文化的遗存之中（参考文献 134，第 112—123 页，图四七一四九，五四—五五）。在渤海遗存中这种类型的牌饰见到的比较少，基于此，它们应该是巴克罗夫斯卡亚文化体现者的民族标识特征之一。蒙古语系的室韦人是这一文化的体现者，它们落入渤海人的手中多半是由于商品交换的结果。

青铜铃铛是渤海人非常流行的装饰品种类，铃铛主要是球形轮廓，器身中部环绕有断开的突棱，并带有两个明显外凸的“眼睛”，根据这一点，铃铛和蝌蚪有所相像。

在克拉斯基诺城址、青石崖遗址发现了两件青铜质带有“眼睛”的十字形坠饰（图一九，21），形状类似某种鸟类的头部（参考文献197，第94页，图X X X V，3；文献78，图二、图五）类似的坠饰见于乌苏里江下游的科尔萨科沃墓地（参考文献134，图五〇、27），阿穆尔州特罗伊茨基墓地出土的坠饰多少有点勉强地可以归入其中（参考文献63，图X XII，15；图X X IV，22；图X X VI，15）。

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出土的镞，多数残断，其中占优势的是青铜镞，一小部分是铁镞。大多数镞为片状器身，半封闭形圆端。有些镞片上有圆形透孔，用于连接镞的另外一半。镞中施纹个体很少，其中，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的镞装饰有两道纵向的窄凹纹，这一点非常接近于女真人镞的特点。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镞则装饰有彼此交叉的嵌入斜线纹，类似于陶器上的纹饰。有些镞是用圆形截面的青铜线制作的。

目前见有三种类型的耳环：1. 环形，用青铜线弯成或卷成的环（图一二，31—33）；2. 复合式耳环，青铜质、银质的环圈上垂挂有石质的，且多半为玉、光玉髓的圆盘，环圈的直径要大于第一种类型，借助于圆盘上的专门穿孔把圆盘穿挂起来（图一二，30）；3. 铸造的，侧面带有凸出的耳环（图一二，34）。

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落址出土了另一种类型的个人装饰品，青铜质颈饰，颈饰椭圆形截面，末端未封口并带有透孔（图一八，13）。在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出土了普通类型的青铜质发簪，为深深弯曲的青铜线。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了铸造的青铜质发簪的上半部分，其制作工艺有高度的艺术审美水准，发簪的上部定型为三叉的仙人掌花干，每一分叉的尖部带有花朵，共两层六瓣，

即上层花瓣萌生自下层（图一八，5）。

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出土了一件不大的青铜质的六瓣花造型的镶贴物属于不明用途的装饰品，制作工艺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水准，器身中央带有透孔，花瓣上的纹理象似雄蕊，嵌金（图一八，20）。

目前，在滨海边疆区境内收集到一些渤海人的非常富于感染力的造型艺术品。它们大部分是用陶土制作的，一小部分是用青铜制作的，极少部分是用铜、石头制作的。在发掘杏山寺庙址废墟时，发现的造型艺术品数量最多，寺庙址中发现了陶质的龙头雕塑造型，遗憾的是，明显破碎。龙头型雕塑用于装饰佛教寺庙、庙宇的屋顶横脊端头，在中国这种装饰品被称之为鸱吻，而在日本则被称为 *subi*（汉语拼音，写法为汉字鸱吻——译者）。在器物的修复过程中，并未能使杏山鸱吻的所有器片均得以粘接在一起，其中包括悬在龙头上部的波纹喙状尾巴（参考文献 197，第 87 页，图 X X VI）。

在滨海边疆区哈桑地区维佳兹海湾舒利查岬，即西距克拉斯基诺城址约 70 公里处偶然发现了一件青铜浮雕牌饰，该牌饰现收藏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国立滨海方志学会博物馆，即以 B. K. 阿尔谢尼耶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该牌饰上有杏山鸱吻最接近的相似物。牌饰曾经由三部分构成，现在残存的是其中间部分，其上有佛教寺庙的平面浮雕造型，庙内有佛像造型（图十）。牌饰通高 10.2 厘米，最宽点位于底部，4.6 厘米。在底边和正面屋檐上，即两个侧面的上下两个端点处有前凸且相互叠压的活动合叶。在牌饰底面的中央有一根长 1.2 厘米的插脚，借助于该插脚可以使牌饰固定在土中或任何专门的台架之上。

佛像造型是用浅浮雕铸造技术完成的，佛盘腿端坐于莲花之上，手掌叠合放在脚踝上面。佛为圆脸，典型的蒙古人种特点：双眼宽而略斜，鼻子扁平，厚唇，耳垂明显下坠，头部环绕有褶皱

的矮帽。佛身着宽袖长袍，衣襟镶有宽边，胸部见有某种纤带。

总的看来，我们分析的牌饰是家庭供台上的佛教圣像。类似的圣像见于中世纪的朝鲜（参考文献 313，图 232；文献 185，第 86 页图），其圣像带有两扇安装在专门的凹口或插脚环扣中的旋转式小门。本文的渤海牌饰也曾经有两扇这样的小门，牌饰侧面存在的合叶可以证明这一点。

牌饰上的佛的肖像和克拉斯基诺城址出土的青铜铸佛有许多共同点（图八；图九，9），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其他方面，如器物底部的插脚。另外两件断代为渤海时期的佛像也有这样的插脚，它们是在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地区发掘鲍里索夫卡村附近的佛教寺庙址时发现的（参考文献 141，第 50—52 页，图 2、3），看来，可以认为插脚是渤海制作的佛像的标志特征之一。

在我们所分析的牌饰上，庙宇的屋顶是最有意义的部位，庙宇是瓦顶的，屋顶彼此相互交替的椭圆形凹槽和突起的棱线强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它们是在模仿上排的覆瓦和下排的仰瓦。在屋脊的两端安装有远东地区、中央亚细亚中世纪时期佛教建筑特点的建筑装饰物，即头向相对的龙头形堆塑造型。遗憾的是，左侧屋脊的龙头古时已经局部残损，不过，右面的龙头保存完好，并且所有细部相当清楚。

两只龙头呲牙咧嘴状支撑着屋脊，面部可见模仿龙须的凹纹，阔目、短鼻。头上悬垂有弯成弓形的喙状尾，尾部从后面环绕有波纹棱线。

中世纪时期的中国类似的屋顶装饰物有两种基本种类，最早出现的称之为蚩尾（鸱尾），“猫头鹰的尾巴”；后来改称为鸱吻，“猫头鹰的喙”。需要指出的是，鸱吻与鸱尾的区别在于，鸱吻下部的造型是龙头。牌饰上面庙宇屋脊的装饰物是龙头造型，它应该是鸱吻，不过按其轮廓它更象是同时代中国唐朝的鸱尾。值得注意的是，牌饰上鸱吻的波纹棱线没有到达喙形尾的末端，这是

唐代鸱尾的特点，如敦煌 148 号窟、172 号窟壁画上的鸱吻造型（参考文献 265，第 390 页，图四、图五），同时这即是平壤高句丽皇宫安鹤宫出土的鸱尾的特点（参考文献 185，第 30 页图 69、71；文献 87、图 180、图 200），也是东京城渤海上京址鸱尾的特点（参考文献 249，第 42—43 页）。牌饰上的鸱吻与中国唐朝、高句丽、渤海鸱尾的这种相似性表明了它们毋庸置疑的年代相近性。可以认为本文牌饰上的鸱吻是早期鸱吻的变体，因为 11—19 世纪时期的鸱吻已经不见这种形式的波纹棱线，常见的形制上见有一些新补充的细节：龙头上面是分成两叉的鱼尾，鳍上有波纹棱线（参考文献 287，第 49 页图 6；文献 251，第 68—69 页）。

辜其一认为，最早的鸱吻出现于中国唐朝的中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援引了《旧唐书·明皇纪》的记载：“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 年），六月戊午，大风拔木发屋，毁端门鸱吻，都城门等及寺观鸱吻，落者殆半”（参考文献 251，第 69 页）。综上，类似牌饰上的鸱吻是早期的鸱吻，存在于 8—10 世纪。

至于断代为 9—10 世纪时期的杏山寺庙址出土的鸱吻，观其所有肖像指数。均接近于牌饰上的鸱吻，归根到底，有理由认为该牌饰是渤海时期的，其断代也当为 9—10 世纪。

目前，在同一种类的器物中，维佳兹湾牌饰是第一件断代为渤海时期的佛教圣像，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渤海人不大的村镇类型的佛教寺庙建筑的直观印象，同时，这件牌饰也是体现渤海金属浮雕工匠高超的职业技能的证据之一，尽管牌饰中某些细节存在一些公式化作风，但仍可以看出他们客观反映周围世界的渴求。

目前已知的渤海的佛教塑像分为陶质、石质、青铜质。

杏山寺庙址发现了一些赤土佛像的残块，其中最小巧精致的一件多半是菩萨造型，由于焙烧质量差，各个部位的泥土明显剥落。菩萨坐式造型，盘脚，双手交合于腿上。背面有叶形护板，但

护板仅残存下一小块（参考文献 197，第 86 页，图 X X VII，1）。在中国东北现今东京城附近发掘渤海上京遗址时，大量出土了类似的菩萨像（参考文献 317，图 C VII—C X）。

第二件比较小的佛像保存下来的只是一块不大的左侧面颊残块，但制作质量比较好（参考文献 197，第 186 页，图 X X VII，2）。

杏山寺庙址中还发现了另外 2—3 个赤土佛像的残块，这是一些全身佛像。残块包括，带有一点耳垂残痕的左侧面颊残块；下颊残块；带有明显下垂的耳垂的左耳残块；右耳残块；右手小指残块；右脚部分脚趾残块；两块螺旋状的卷发残块等等（参考文献 197，第 86 页，图 X X VII）。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用大粒粗砂陶塑造的凶悍容貌的堆塑造型的高浮雕圣像，塑造的多半是护法神像。塑像残存头部，护法咧着大嘴，露出稀疏的利牙，牙床好像曾经镶嵌有骨头或软体动物的贝壳，阔鼻、斜眼，瞳孔处镶嵌有一颗深褐色小石子，鼻子上部的前额处安嵌有一颗不大的粉红色小石子，从该石子向两侧额部散射出一些线条分明的皱纹凹线（参考文献 197，第 86 页，图 X X VII，1）。

在发掘克拉斯基诺城址的佛教寺庙址时，出土了有趣的砂岩浮雕的佛像造型。其中之一，仅残存下佛像的上半部分，即残缺腿部（图九，8）。显然，佛像是在寺庙因火灾而倒塌时残损的，佛端坐于三角形护板或光环的背景中，双手交合放于腹部，身体上部披有袈裟，袈裟的边缘镶有宽边。长圆脸，耳垂明显下坠，线条分明的嘴部轮廓略呈张开状态，眼睛微睁，头发用束带绷紧如同截去上部的锥体。佛像的面部表情冷漠平静，如此静止状态表明，他深深地沉浸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自省之中。这件目前独一无二的佛像，其鲜明的特点是，细部加工精心雕琢，体现出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且对佛像内在情绪的刻化体现出现实主义风格。根

据这些特点，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件中世纪时期整个远东地区国家特别是渤海国的艺术杰作。

克拉斯基诺寺庙址中发现了另一些用这种浅灰黄色砂岩旋制的浮雕残块（图九，10—12），其中之一，其左边环绕有宽带边框和珍珠纹，保存下来的是两个叠坐的佛像造型，其中上部的佛像头部残断，下面的佛像腿部残缺。这块浮雕上到底有多少个佛像造型，它的主题和结构等等，据现有残存部分无法确定（图九，10）。

第二件浮雕残块也是同样的坐佛造型，制作方法更加抽象图式化。根据残存部分，无法推测其任何相对明确的内容，尤其是它的用途（图九，11）。

在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中，发现了三件青铜佛像，一件出自克拉斯基诺寺庙址，两件出自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

克拉斯基诺寺庙址出土的青铜佛像（图八；图九，9），镀金，至今仍可见其表面的锈蚀痕迹。佛的肖像很接近舒利查岬出土的青铜牌饰上的佛的造型，即佛端坐于莲花之上，呈相同的发式，具有北方蒙古人种体质类型的脸部特征——圆脸，细长的斜眼，眼睛上面低垂有上眼皮褶皱，鼻子宽而扁平。源自中国、印度——西藏的佛像不见这样的面部类型（参考文献 197，第 101 页；文献 296，第 152 页），这是地方性证据之一，即我们所分析的渤海遗存中出土的青铜佛像是渤海人制作的，和其他更晚的渤海青铜佛像一样，器身底部有一根长长的插杆，这也是克拉斯基诺城址寺庙址出土的青铜佛像的特征，借助地插杆把佛像固定在供台上。

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出土的青铜佛像为全身造型，身着长襟衣衫，双手交合于胸前。佛像保存情况不好，表层严重锈蚀。第一件佛像的发式和上文所述佛像相同，佛像的底部有插脚，但保存下来的只是不大的凸出，胸前的条带上挂有某种流苏一类的东西（参考文献 141，第 50—51 页，图 2）。第二件青铜佛像头部、

插脚残断，赤脚（参考文献 161，第 51—52 页，图三）。

还有一件典型渤海人制作的青铜塑像，它发现于断代为 12 世纪下半期至 13 世纪上半期的赛加城址的 154 号房址（图四六，3）。该青铜铸像也明显锈蚀，从肖像学的角度看，它与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出土的佛像相象。同时，该佛像也显现出许多不同点，例如，其发式由三缕垂附于额头之上的卷发构成，发尖束成一小缕，形成一个环扣，借助于这个环扣可以把该佛像垂挂于人的胸前或腰带上。眼睛造型呈卵形凸出，中央有细细的透口。嘴为长圆形的凹窝，嘴唇微凸。胸前的项链上垂挂有三个流苏。交合在胸部的双手持有上部连接在一起的某种锥体物品。既然该铸像是垂挂的坠饰，因此它的底部没有预见性的插脚，然而底部有脚掌。

大体上，无论是从肖像学的一般观点出发，还是考虑到铸像严重的锈蚀情况，赛加城址中出土的这件铸像未能在 12—13 世纪的同样制品中找到自己的类似物。同时，按其所有指数，它非常接近于上文论述的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出土的铸像，据此可以把它断代为渤海时期。牵扯到一个问题，它是怎么落入女真人的城址中的？解答它很简单，在赛加城址中发现了更多更早时期的遗物，赛加城址是一个单层堆积遗存，表明，女真人经常随身携带有一些他们偶然发现的古代制品，特别是如果它是青铜制品，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对这样的制品进行回炉改铸。

在克拉斯基诺村附近，曾出土过官吏形象的青铜铸像（图四六，1、2），考虑到出土地点与克拉斯基诺城址的毗邻关系，况且克拉斯基诺城址是当时该地区唯一已知的中世纪时代遗存，这尊铸像便断代为渤海时期（参考文献 197，第 97 页，图 X X X VI）。由于当时没有已知的渤海时期的青铜制品，因此，这件铸像没有可资比较的器物。现在可以指出的是，这件制品与渤海青铜制品的差别在于，它保存得较好，这是绝大多数更晚时期青铜制品的特点，如源自女真的制品。不过，关于它是渤海制品的问题，至少可以认为现在还无法加以证实。



图四六 1、2，克拉斯基诺出土的青铜铸像（1为背面，2为正面） 3，赛加城址出土的青铜铸像

滨海边疆区帕尔季赞斯克地区多层堆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中，偶然发现了一件青铜铸造的鱼形信符（图一八，11），有充分的理由把它视为渤海人的造型艺术制品。这种信符，是授予特别有权势之人的政府委托书（参考文献 206，第 267—270 页）。与上文所述的大多数青铜制品不同，这件信符保存得非常好。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信符应该有一个和它相同的另一件个体。信符的造型呈单侧凸面的特点，在其平面一侧刻有证明信符拥有者身份的中文题铭，凸面上雕刻有中央带有瞳孔的圆眼，鳃裂呈两条大弧线形，鳞片为一连串的小弧线纹，用连贯的刻划直线表现背部、尾部的鳍，唇部为凸形造型。大体上，尽管有些细节图式化，但鱼的造型还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总之，能够确认这是渤海

人造型艺术的特点。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方志学会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有趣的马上骑士的铜质铸像，它尚是革命以前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今乌苏里斯克市）附近的砖厂发现的（参考文献 202，第 136 页，图三，3）。铸像通高 13.5 厘米，马没有表现鬃毛造型，前后腿连铸在一起，厚实的尾巴约有一半已残断。骑士坐在靠近马肩隆的长方形的低矮马鞍之上，骑士的头部呈直杆形造型，沿其侧面有略微突出的双手，头上有尖顶的类似盔甲或帽子一类的东西。该铸像采用了象征性——图式化的艺术制作手法，几乎无异于东京城渤海上京遗址出土的马上骑士铸像（参考文献 317，图 C X XI，图二）。考虑到该铸像明显区别于女真人的同类铸像，因此上可以把它断代为渤海时期（参考文献 202，第 132 页，图一）。

显然，上文所述的铜质的马上骑士铸像和位于杏山寺庙址附近的渤海村落址中出土的陶质人像有直接的联系（图九，13）。该陶质人像高 4 厘米，采用的也是象征性——图式化的制作手法。遗憾的是，该陶像的头部和右手残断，但根据其左手的曲线和叉开的短腿的姿势来看，该陶像很像女真人的铜质骑士铸像。大概，这件陶人塑像也曾端坐于单独制作的陶马之上。和其他同一种类的制品一样，显然它也是祭祀用品（参考文献 202，第 131—143 页）。

赛加城址出土的女真人的铜质骑士铸像，经研究表明它们均是古代突厥人乌尔盖尼类型或那乃人恩杜里类型的最高太阳神的象征，它们被广泛利用于萨满神秘的宗教仪式之中（参考文献 202，第 136—139 页）。毫无疑问，渤海的骑士塑像具有相同的使命，据此可以断定，渤海的普遍居民信奉萨满教。

拉佐地区基什涅夫卡村附近发现的滑石质的浅灰蓝色面孔形器属于萨满宗教仪式用品（图四七，参考文献 207，第 113—119 页），现在几乎其整个器表均长有浅灰褐色的锈斑，只是前半部更

发黑一些，有些地方几乎成乌黑色，通常这是石头长时间承受火和烟作用的结果。器物造型近似于底朝上的梯形，高 8.5 厘米。器物其中一侧器表有镌刻的平面人头造型，眼睛位置处表现为两个圆形的钻孔，每一只眼睛环绕有深深嵌入的环形线纹。借助于眼窝上部嵌入的宽宽的弧形凹槽，表现厚厚的眉弓。鼻子长长的，下端变宽，但此处略有残损，破裂口是更晚的时期形成的，然而仍清晰可见两个不大的钻制的鼻孔凹窝。明显可见上排可齿，但无法弄清下排牙齿的情况，因为该处和下颈部有更晚时期形成的裂口。在右侧颧骨上刻划有八条辐射线构成的花结纹，花结纹呈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十字图形。在左侧颧骨后面的乳突区，刻划有一个斜向的十字标记。



图四七 基什涅夫卡出土的石质颅骨面孔形器端

在后脑勺一面其两个眼睛钻孔的周围，只是用嵌入的细线粗略地勾勒出环形边框。形成一种感觉，在后脑勺一面，古代的雕刻家抑或是准备雕刻人的头部造型，并且已经勾勒出眼眶周围的边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他改变了主意；抑或是他有意这样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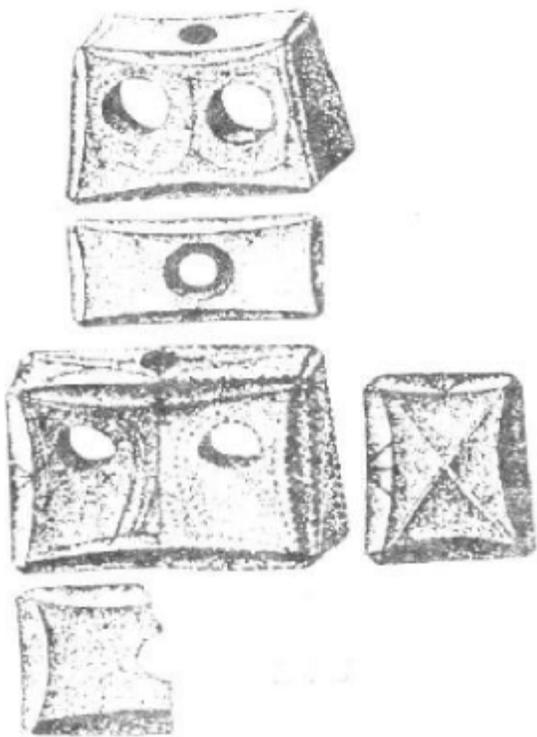
表现器物的这一面存在眼眶。后一种情况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在该面的中央，略低于眼眶有两条粗糙刻划的底部尖角相交的斜线，形成某种鸟喙造型。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背面，则可以发现此面有说不清是人头还是某种鸟头的图形。在结束背面的描述之前，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在眼眶之间的器表上，保存有相当清晰的浅红褐色颜料痕迹。

在器物纵向器面的中央还有一个钻孔，钻孔在两个眼眶穿孔的中间穿过，并且没有破坏眼眶的穿孔壁面。需要强调的是，器物底面的纵向钻孔口要宽于钻孔的上口，基于此，钻孔呈截锥形体，总的看来，钻孔用于插某种枢轴，也可能是插测签。

众所周知，面孔形器上的花结纹和斜十字纹是太阳或纯洁之火的象征，器物背面的红色颜料痕迹想必是模仿祭祀时的供血，这一切表明，该器用于某种宗教仪式目的。眼眶上部存在的熏黑痕迹也有利于证明这一推测，可能，曾往眼眶里插放饱浸油脂的粗灯芯，通过点燃灯芯，用火吓跑附近的妖孽、恶魔。

在这种情况下，总的看来我们遇到的是人头祭祀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不久以前其残存形式还流传于那乃人中间。特别是，那乃人认为，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死者没有进入阴间，那么人头是其灵魂的储藏所。在这种情况下，那乃人把最敬重的同族人的人头保存在大型陶器内，这些器物的器底用笕草修筑有专门的鸟巢（参考文献 82，第 180 页）。在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民族中有类似的习俗，他们也认为人头是死者灵魂的储藏所，是死者精神力量的神秘载体，基于此，人头被放置在专门的贮藏处，只是在某些宗教仪式场合才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众所周知的习俗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了各种模仿品替代人头。毫无疑问，我们论述的石质面孔形器属于这种模仿品，可能，还包括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经常遇到的陶质器端（图四八），陶质器端有一系列特征与基什涅夫卡出土的面孔形器相吻合（参考文献

207, 第 114—115 页)。



图四八 陶质器端

1. 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出土
2. 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出土

象(参考文献 172, 第 107—111 页), 那乃人这样认为, 人死后灵魂鸟很快离开他的躯体, 飞向灵魂世界, 那里生长的巨大的氏族树是它的栖息地。嗣后, 这种灵魂鸟降临人间, 落入妇女怀中, 以新生儿的形式重新转化为人(参考文献 82, 第 164—165 页)。类似的观念也存在于 12 世纪的女真人之中, 这一点可以根据赛加城址出土的浇铸的青铜器来加以判断, 该青铜器是枝头栖落有鸟的氏族树的铸像(参考文献 208, 第 164 页, 图四八, 图二二)。

如此, 上文所述不仅证实了人头祭祀与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鸟是人的灵魂的神秘载体, 而且补充说明了渤海人的宗教观念。

位于阿尔谢尼耶夫卡河谷地团山之上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中出土了立体人头造型的陶“耐茨盖”坠子, 表明渤海人中存在人头祭祀(参考文献 316, 第 35 页, 图二五)。

重新回到面孔形器的问题上来, 应该谈一谈有关其背面存在的人头或某种鸟头图形的问题, 尤其是如果联想到那乃人中存在的, 把他们敬重的同族人的大头放置在专门修筑有鸟巢的容器中的习俗, 则无疑该器背面图型表明了人头祭祀和鸟的形象存在某种联系。

事实上, 根据曾经广泛流传于世界上一些民族中的观念, 人的灵魂被想象为鸟的形象,

显然，渤海人可能和他们的继承者女真人一样，把人的灵魂想象为神话鸟的形式，认为头颅是人活着的时候甚至死后一段时间里灵魂的固定活动场所。其实，上文所述的情况已解释了为什么为敬重的同族人的人头修筑了某种类似鸟巢的设置。人死后不久，他的灵魂以鸟的形式飞离头颅，飞向灵魂的王国，它暂时栖息在灵魂王国中同族的氏族树上。同时，显然过去的人们认为，起初，灵魂鸟软弱无力很难飞行，它栖息于氏族树的低枝上，然而，随着力量的积蓄它强壮了，逐渐开始从低枝飞向高枝，再由高枝飞往人间，并且一定是飞向同族的领地，投胎妇女腹中，灵魂鸟重新转化为人身。按照渤海人的观念，人类灵魂的这种循环和一年四季的交替一样，可以不间断地进行，从而使每一个氏族成员获得希望，其死后不定什么时候他还可以由游魂重新恢复生命，回到自己的氏族部落。据此可以理解渤海人为何特别关心死者的灵魂，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氏族的延续。顺便说说，佛教信仰者中间存在类似的观念。正如考古学材料所证明的，在渤海人中间，佛教和萨满教和睦地共同存在。

鉴于上文提及的渤海人宗教信仰观念的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目前至少可以确定，在渤海人中存在三种宗教意识形态：佛教、景教、萨满教。在一个民族社会机体范围内存在如此数量的宗教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因为渤海国的多民族性，还不如说是由于渤海社会的多种结构。在渤海国，一方面一部分渤海居民已经达到了阶级社会程度，即本质上的对抗关系；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渤海居民仍然处于原始公社关系阶段或处于阶级形成的过程中。

在第一种情况下，渤海国发育成熟的社会封建贵族阶层开始更加强烈地渴求一种能够维护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宗教意识形态，佛教、景教则完全符合他们的这种要求。

在第二种情况下，渤海的大多数居民由于阶级关系发育不成熟，不愿接受对于他们来说属于陌生的宗教意识形态，如佛教，特

别是景教，继续保持传统的宗教信仰——萨满教。

同时，如果认为佛教和其他的阶级社会的宗教意识形态只为渤海的上层社会所信奉（想必还包括另一些民族共同体如高句丽人、索格狄亚那人移民），佛教没有对萨满教造成影响，萨满教也没有影响到佛教，显然，这是一个大的认识错误。

原则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大体上，渤海文化形成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渤海社会的多种结构和多民族性。

例如，在创建国家机构及其相关的标志物的进程中，渤海人大量效法了在其毗邻的阶级社会（高句丽王国、东突厥汗国、回纥汗国、中国唐朝）早已实行的模式。这种情况表现为，佛教和阶级社会其他形式的宗教意识形态在社会统治阶层中得到传播；渤海人遵循了雄伟的宫殿、寺庙建筑的某些法式；使用中国汉字和文学，以及古突厥文字、新罗的音节吏读文字；借用高句丽人、中国人的宫廷仪式和上层政权的外表标志物；渤海上京的平面布局的整体特征仿造了中国唐朝的长安京城（参考文献 317，第 4 页）。

特别是，渤海人大量借用了高句丽人的经验，渤海国南部地区特别是作为渤海国组成部分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相当大比例数量的居民是由高句丽人构成的。经研究表明，高句丽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制瓦生产方面，在纹饰上渤海瓦和高句丽瓦有许多吻合之处（参考文献 197，第 103 页，第 113—114 页）。高句丽人的影响还见于制陶业，渤海见有与高句丽相同形制的陶器，特别是呈半管状剖面口沿，施横桥状耳的罐，在陶器装饰纹饰方面，两者均见有波浪形或波浪线形纹饰。在镞的制作方面，高句丽人也明显地影响了渤海人（参考文献 162，第 104、106、108 页）。正如上文已经注意到的，高句丽人的影响还表现在农耕业生产的发展方面。

同时，分析考古学材料表明，在渤海文化中，有很多古突厥

人、回纥人以及索格狄亚那人、伊朗人、契丹人、室韦人所固有的文化因素（参考文献 161，第 88—98 页；文献 162，第 100—110 页；文献 205，第 100—105 页，文献 196，第 148 页）。这一切，用中国研究者张钧的话来表达，即渤海文化的“开放性”，它易于吸收利用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参考文献 296，第 146 页）。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接触和利用存在相互性，例如，众所周知，渤海的音乐在中国、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并得以广泛流传，不但如此，日本人甚至于专门赴渤海学习渤海音乐（参考文献 296，第 149—150 页），扎根于日本至今仍为人所知的独特的舞台演出“渤海乐”，可以视为其成果之一（参考文献 98，第 30 页；文献 99，第 43 页）。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在渤海人的影响下，独特的“耐茨盖”类型的坠物在日本得到传播。在渤海人的中介下，公元 862 年，唐代历法“宣明历”运用于日本，并延续使用了 800 年，直至沿用到德川幕府时代（参考文献 296，第 150 页）。在日本的历史文献中保存有渤海人韵文的佛教祈祷词，表明渤海佛教徒在日本进行过传教活动（参考文献 296，第 151 页）。

现在，尚很难充分全面地评价渤海人对室韦人、契丹人及渤海的继承者女真人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以及通过他们对远东地区、中央亚细亚地区现代蒙古语系、通古斯语族民族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正如实际材料所证明的，在各种情况下，这种贡献是非常显著而有益的。例如，最初的契丹人，随后的女真人借用了渤海人的五京制度，按另一种方式笔法创造了音节文字，渤海人在农业技术，制陶业，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手工业生产方面的影响，可以根据他们之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工具、武器的相似性来加以判断。

结 语

公元一千纪下半期，通古斯语族的姆克利人（靺鞨）与中国、古代朝鲜的高句丽国、第二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他们原始社会公社关系瓦解、早期阶级关系形成的进程。中国唐朝针对高句丽实施的扩张政策，使姆克利部落成为高句丽的同盟者，而后唐朝直接针对姆克利部落的扩张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是，姆克利人集结了强大的军事政治同盟，最后，姆克利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众所周知，这一国家在历史文献中称之为渤海国。渤海国国土的组成部分包括中国东北、滨海边疆区、北朝鲜的大部分地区，渤海国是早期阶级社会政体，其主要剥削方式是向普通村民征税。

对于滨海边疆区的居民来说，渤海时代是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是确定当地部落的历史文化进一步发展进程的时期。没有渤海国就不可能有渤海人血亲——女真人金帝国的强盛，这不是夸张的说法。不但如此，主权国家渤海出现在远东政治舞台上的时期，对东亚总体政治环境的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后果是，导致这样一些主权国家的出现或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朝鲜半岛的新罗联盟（公元676—936年）、高丽国（公元918—1392年）；中央亚细亚的回纥汗国（公元847—1369年）；甘肃的回纥国（公元847—1036年）；党项人的西夏国（公元962—1227年）；契丹人的辽帝国（公元907—1125年）。

通古斯语族姆克利人是渤海国居民的基础，然而渤海国毕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渤海国从许多居住在渤海国境内的民族诸如高句丽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室韦人、索格狄

亚那人以及中国人身上吸取了文化营养。这种情况和在国内推行阶级社会所固有的高层统治机构外在标志的需要，促使渤海国乐于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财富和成就，因此，渤海国的文化大体上具有混合性。

借用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同时，渤海人往往对它们进行了同化处理。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借用不是按比例等量均匀分配的，例如，如果说地域与渤海毗邻的高句丽人给予了渤海人最大的文化影响（顺便说说，这一点成为当代朝鲜的某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继承者的依据），那么，其他的民族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且是不同涵义的影响。综合从其它文化借用的因素，造就了渤海文化的独特性。

拥有同时代的高度文明，渤海对于日本、朝鲜、甚至于中国等国家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渤海人还在很大程度上对契丹人、女真人文化、政治制度的发展给予了自己的影响，众所周知，契丹人、女真人在欧亚大陆许多民族的历史事件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烙印。显然，其中有很大的功劳应当归功于渤海。

不可忽视的是，在长时间的存国期间内渤海人与索格狄亚那人，可能还包括伊朗人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自然，这种联系促进了远东、中亚民族文化的共同向前发展和相互间的借用充实。

从分析研究的考古学材料中得出结论，渤海国拥有成分众多的、多部门的经济，渤海居民除了从事农耕地、饲养业外（它们是食品来源的基础），还从事狩猎业、捕鱼业、海洋捕捞业、森林采掘业，它们使得渤海人不仅非常必要地补充、丰富了自己的食物，而且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产品，如从植物、动物身上获取药材；毛皮、动物皮、鱼皮被用于做衣服、鞋、皮带、马具、军用甲冑；桦树皮、动物的角、筋、骨头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动物被用于制作各种油膏，用作灯的油料；动物的蹄子、鱼鳞用于制作特殊的强力胶；荨麻、野生大麻的纤维用于制作亚麻布。

不难发现，渤海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家庭手工业方式获得的。同时，在阶级社会里，为了供养朝廷、大量的官吏统治机构、佛教寺庙、军队、海军，迫切需要大批生产各种各样的制品，其中包括武器，不同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冶金业、金属加工业、制瓦业、木工生产、造船业、制陶业。遗憾的是，目前的渤海手工业生产研究状态，尚很难说明渤海各种手工业者明确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行业组织，同样不清楚的是，不知道手工业作坊是私人经营的还是国家注册的。

渤海国与自己周邻的政治关系史存在大量的模糊成分，其中包括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对此文献史籍中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信的记载。然而，如果留意一个事实，“日本道”基本上是沿着朝鲜半岛海岸通过，那么，渤海的船队途中必然会停留于新罗的港口，特别是在近海岸航行时。只有在渤海和新罗保持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近海航行才能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渤海与新罗之间密切的政治、经贸、文化联系，应该到考古学材料中去寻找。

除此之外，公元8世纪70年代，日本朝廷决定减少前往日本的渤海使团的数量（参考文献197，第52页），从而导致了渤海方面明显消极的反应，过去只能猜测其中的缘由，现在已经把问题弄清楚，日本的这种举动最接近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当时的首都奈良正在修建大佛。这项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导致了国内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完全可能，由于国内形成的紧张局势使日本统治者担心，渤海使团到奈良会缺少安全感。不过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日本人只是出于担心渤海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时机，干预其国内事务。不管怎样，只是到了公元794年日本迁都京都后，国内局势才终于稳定下来，于是于公元796年，渤海使团才再次来到日本并带来了渤海王充满善意的信，渤海使团的这次出访是适宜时机

的礼仪。

渤海与回纥汗国的关系始终是悬而未解的问题，目前能够推测的只是，它们基本上具有友善关系。例如，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被叶尼赛河的黠戛斯人灭亡以后，许多回纥居民恰恰是在渤海国内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参考文献201，第87—89页；文献208，第41—42、165—168、187页）。虽说回纥移民到达了渤海境内，看来沿途不都是安全的，即使如此，回纥迁徙之人的数量，大概仍然非常多。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下面的情况来加以判断，在断代为9世纪下半期至10世纪初期的渤海遗存中，有大量的源自南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的人工制品。

公元755年唐朝将领安禄山起义反唐，渤海国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总的看来，对于这一事件渤海国的态度不可能是漠不关心的，问题在于，渤海国支持哪一方，是安禄山还是唐玄宗。

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渤海王大钦茂在安禄山起兵这一年把自己的国都由上京迁至东京，如果考虑到，起义以前安禄山是与渤海毗邻的中国幽州、营州的军事首领，同时安禄山还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参考文献197，第52页），则大钦茂迁都东京应该看作是一种间接的证明，即起义的发源地直接毗邻渤海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基于此，大钦茂被迫采取行动，以便于在安禄山侵扰其境时，保障自己国家的安全。上述诸方面因素看来有利于证明渤海没有站在安禄山一面。

不过，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一事实，公元763年平定安禄山起义不久（安禄山本人757年被杀），渤海国与中国唐朝的关系急剧恶化，这多半是中国对渤海在这一事件中采取的态度回报反应。

为了理解中国责难渤海的原因，应该想到，安禄山又叫轧萃山，换句话说叫鲁斯达姆·萨马尔罕茨基（俄文 Рустан

Самаркандский 的音译——译者), 族系是中世纪时期中国人称之为胡的索格狄亚那人, 安禄山举行起义, 自然而然言, 需要对抗的是数量多、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 这就要求有相应的武装力量, 同时, 为了顺利地进行军事战役, 起义者所必需的定期供给需要有可靠的来源。考虑到丝绸之路东部的大部分地段为中国人所控制, 只有貂皮之路可能成为供给之源。凭借貂皮之路安禄山经常得到来自中亚供应的武器、食品、饲料、马、运输工具, 大概, 甚至还有军队。但貂皮之路的东段沿松花江、乌苏里江及其支流穿过, 换句话说就是沿渤海境内穿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渤海国决没有阻碍这种供给, 大概, 渤海由此而引起了中国唐朝统治者的不满。

应该寄希望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今后的考察研究能够找到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

至此, 前文所述表明, 在欧亚大陆许多民族的历史事件中, 以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 渤海国不属于次要角色。在这方面可归结为, 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渤海国这个中世纪国家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而另一个事实是, 目前特别关注渤海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不仅仅是在我国, 而且还包括中国、日本、北朝鲜、韩国的学者。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性,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吸取和留意国外研究者的最新发现和观点, 或许还应该吸收他们作为未来大规模的集体著作的合作者, 这一著作所包容的将是有关渤海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以及有关渤海国分布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中国东北、北朝鲜境内的居民的研究。

文献索引

一、俄文文献

- ① А. И. 阿弗库斯季尼克:《陶器》,莫斯科,1957年,488页。
- ② Л. Ф. 阿库诺娃、С. З. 布利波露娃:《优美的陶器制品生产的材料学与工艺学》,莫斯科,1979年,216页。
- ③ В. М. 阿列克谢耶夫:《中国的民族绘画,旧中国民族图画中的精神生活》,莫斯科,1966年,260页。
- ④ Э. В. 阿列克谢耶娃、В. И. 鲍日金:《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 2 号城址渤海居民狩猎业、饲养业材料》,《苏联远东地区古代生产考古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学术著述汇编》,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 77—85 页。
- ⑤ Э. В. 阿列克谢耶娃、Э. В. 沙弗库诺夫:《赛加城址的野生、家养动物》,《远东南部及其毗邻地区古代、中世纪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3年,第 3—11 页。
- ⑥ Ж. В. 安德列耶娃:《古代的滨海地区,铁器时代》,莫斯科,1970年,147页。
- ⑦ 作者同上:《滨海地区铁器时代的耕作业、养畜业》,《远东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南萨哈林斯克,1973年,第 233—242 页。
- ⑧ 作者同上:《原始公社制度时代的滨海地区,铁器时代(公元前一千纪至公元 8 世纪)》,莫斯科,1977年,240页。
- ⑨ Э. Э. 阿涅尔特:《论满洲矿业史》,《自然科学和地理学俱乐部通讯》,哈尔滨,1941年。
- ⑩ Д. Н. 阿努奇:《古代的弓与箭》,《1881 年梯弗里斯考古学大会丛刊》,莫斯科,1887年,第 337—411 页。
- ⑪ Ю. В. 阿尔库嘉耶娃:《В. К. 阿尔谢尼耶夫未发表的滨海地区日本海东海岸中世纪遗存资料》,《远东第三次历史、考古、民族学术会议:十

- 月革命以前远东考古、民族史报告与报导》，符拉迪沃斯托克，1962年，第13—15年。
- ⑫B. K.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古代史资料》，《东方学帝国全国学会阿穆尔分部会刊》，哈巴罗夫斯克，1912年1辑，第15—66页。
- ⑬作者同上：《乌苏里斯克边疆区古代史资料》，《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47年第四卷，第313—318页。
- ⑭作者同上：《乌苏里斯克边疆区、满洲的古老遗存》，《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47年，第四卷，第313—318页。
- ⑮作者同上：《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采参人》，《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47年，第四卷，第229—245页。
- ⑯H. Г. 阿尔杰米耶娃：《滨海地区早期中世纪时代的房址》，《苏联考古学》，1987年1期，第84—90页。
- ⑰E. A. 阿谢布科夫：《中国建筑（纲要）》，莫斯科，1966年，368页。
- ⑱H. Я. 比丘林：《古代中亚地区民族资料汇编》，莫斯科，1950年，第一卷，390页。
- ⑲同上，第二卷，335页。
- ⑳作者同上：《东亚、中亚历史地理资料汇编》，契博克萨雷，1960年，758页。
- ㉑B. И. 鲍日金：《赛加城址出土的农业工具评述》，《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1976年，第129—135页。
- ㉒作者同上：《滨海地区渤海人、女真人的耕作工具》，《阿尔谢尼耶夫纪念文集》，乌苏里斯克，1985年，第96—97页。
- ㉓作者同上：《滨海地区渤海人、女真人的耕作业、饲养业（根据考古学考察材料）》，《历史学副博士论文摘要》，新西伯利亚，1986年，17页。
- ㉔作者同上：《滨海地区渤海人、女真人农业经济方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第十五次远东学术会议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四辑，第36—38页。
- ㉕作者同上：《克拉斯基诺城址佛教寺庙址发掘》，《西伯利亚、远东古代文化遗存研究学术著述汇编》，新西伯利亚，1987年，第189—190页。
- ㉖作者同上：《1986年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发掘》，《远东中世纪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新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7年，第17—21页。

- ⑳В.И. 鲍日金、Ю.Е. 沃斯特列佐夫、И.С. 茹希霍夫斯卡娅：《公元前一千纪至公元一千纪时期滨海地区居民的经济与地理》，《从古至今历史研究中的综合方法学术会议文集》，莫斯科，1984年，第84—87页。
- ㉑В.И. 鲍日金、О.В. 吉亚科娃、Е.В. 希多列科：《作为滨海地区文化分期资料的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地层学》，《远东考古学问题：文化的起源、断代、分期》，待刊。
- ㉒В.И. 鲍日金、А.Л. 伊夫里耶夫：《渤海的制瓦生产（根据克拉斯基诺城址发掘材料）》，《西伯利亚南部、远东考古学》，新西伯利亚，1984年，第142—151页。
- ㉓В.И. 鲍日金、Л.Е. 谢缅尼契科：《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发掘》，《1975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76年，第219—220页。
- ㉔作者同上：《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考察》，《1976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77年，第193—194页。
- ㉕作者同上：《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地层学与滨海地区渤海文化分期》，《苏联远东古代史的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78年，第57—63页。
- ㉖В.И. 鲍日金、Э.В. 沙弗库诺夫：《赛加城址居民经济中耕作业的性质与作用》，《苏联民族学》，1979年6期，第122—130页。
- ㉗С.Н. 勃拉伊洛夫斯基：《鞑子或乌德海人》，圣彼得堡，1901年，第三—四辑，219页。
- ㉘Д.Л. 勃罗江斯基：《从滨海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新材料看南部通古斯语族民族的起源问题》，《史料学与历史编纂学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74年，第三辑。
- ㉙作者同上：《论滨海地区两种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古代的西伯利亚第四辑，新西伯利亚，1974年，第113—119页。
- ㉚作者同上：《黑龙江沿岸、滨海地区民族住房史的考古学资料》，《史料学与历史编纂学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75年第四辑，第65—80页。
- ㉛作者同上：《克罗乌诺夫卡—匈奴可参照现象》，《古代的外贝加尔地区及其文化联系》，新西伯利亚，1985年，第46—50页。
- ㉜作者同上：《远东考古学纲要》，符拉迪沃斯托克，1987年，274页。

- ④Ф.Ф. 布谢:《勒富河、刀毕河、乌拉河谷地的古代遗存》,《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论丛》,符拉迪沃斯托克,1908年,第一卷,第1—28页。
- ⑤Ф.Ф. 布谢、Л.А. 克罗帕特金:《阿穆尔边疆区的古代遗存》,《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论丛》,符拉迪沃斯托克,1908年,第十二卷,第1—66页。
- ⑥В.П. 瓦西里耶夫:《10—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附有关契丹、女真、蒙古鞑靼人的中国文献资料》,《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分会文集》,1857年,235页。
- ⑦Л.С. 瓦西里耶夫:《中国的祭祀、宗教、习俗》,莫斯科,1970年,484页。
- ⑧作者同上:《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莫斯科,1983年,326页。
- ⑨М.И. 维纽科夫:《黑龙江沿岸、中国、日本游记》。
- ⑩С.В. 沃日科夫:《朝鲜早期历史中的官吏与贵族》,莫斯科,1987年。
- ⑪М.В. 沃罗比耶夫:《作为筑城工事设施的女真城址》,《苏联地理学会分会报告集》,列宁格勒,1968年5辑,第60—73页。
- ⑫作者同上:《女真人与金国(10世纪至1234年)历史纲要》,莫斯科,1975年,444页。
- ⑬作者同上:《女真文化与金国(10世纪至1234年)》,莫斯科,1983年,367页。
- ⑭М.В. 沃罗比耶夫、Г.А. 索科洛娃:《日本的科学、技术、手工业史纲要》,莫斯科,1976年,231页。
- ⑮Ю.Е. 沃斯特列佐夫:《滨海地区基辅卡遗址克罗乌诺夫卡文化房址发掘》,《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讯》,1985年第184辑,第60—63页。
- ⑯《世界史》,莫斯科,1957年,第三卷,895页。
- ⑰《世界建筑史》,莫斯科,1971年,第9卷,644页。
- ⑱О. 戈鲁哈列娃、В. 杰尼盖:《中国艺术简史》,莫斯科,1948年,210页。
- ⑲В. 戈尔斯基:《满洲王朝的发端与初始》,《俄罗斯驻北京教士团著作集》,1852年,圣彼得堡,112页。
- ⑳А.В. 戈列别什科夫:《依据考古学资料对阿穆尔边疆区的研究》,《“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博物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符拉迪沃

- 斯托克, 1916年, 第50—75页。
- ⑤7 Л. Н. 库米列夫: 《古代的突厥》, 莫斯科, 1967年, 504页。
- ⑤8 Л. Н. 库谢娃、Э. В. 沙弗库诺夫: 《关于女真人的一种装饰图案的起源》, 《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研究》,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76年, 第143—147页。
- ⑤9 А. В. 达维多娃: 《伊沃尔加城址 (关于外贝加尔地区匈奴遗址的问题)》, 《苏联考古学》, 1956年第廿五期, 第261—300页。
- ⑥0 作者同上: 《伊沃尔加集合 (城址与墓地) —— 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遗存》, 列宁格勒, 1985年, 112页。
- ⑥1 А. П. 杰列维扬科: 《黑龙江沿岸 (公元前一千纪)》, 新西伯利亚, 1975年, 250页。
- ⑥2 Е. И. 杰列维扬科: 《黑龙江中游的遗存》, 新西伯利亚, 1975年, 250页。
- ⑥3 作者同上: 《特罗伊茨基墓地》, 新西伯利亚, 1977年, 224页。
- ⑥4 作者同上: 《黑龙江沿岸的部落: 公元一千纪 (民族史与文化纲要)》, 新西伯利亚, 1981年, 333页。
- ⑥5 作者同上: 《带炕的房址史 (根据黑龙江材料)》, 《西伯利亚南部、远东考古学》, 新西伯利亚, 1984年, 第152—161页。
- ⑥6 作者同上: 《中世纪时代的苏联远东》, 《从古至今东亚、中央亚细亚民族史》, 莫斯科, 1986年, 第287—293页。
- ⑥7 作者同上: 《黑龙江沿岸部落军事纲要》, 新西伯利亚, 1987年, 225页。
- ⑥8 Р. Ш. 德雅雷日加西诺娃: 《古代的高句丽人》, 莫斯科, 1972年, 202页。
- ⑥9 А. П. 杜里卓: 《西伯利亚南部的天神崇拜区》, 《东方地名学》, 莫斯科, 1962年, 第22—31页。
- ⑦0 О. В. 吉亚科娃: 《作为4至10世纪历史资料的苏联远东早期中世纪时代陶器》, 莫斯科, 1984年, 203页。
- ⑦1 作者同上: 《苏联远东早期中世纪时代的房址》, 《苏联远东考古学问题》,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87年, 第51—66页。
- ⑦2 О. В. 吉亚科娃、В. И. 鲍日金: 《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轮制陶器纹饰分类》, 《古代的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 1979年, 第114—118页。

- ⑦③ О. В. 吉亚科娃、Е. И. 杰列维扬科:《类于“鞣鞣类型”陶器》,《苏联远东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1年,第61—70页。
- ⑦④ О. В. 吉亚科娃、П. Б. 科诺瓦洛夫:《苏联远东中世纪时代制陶业中的汉人传统》,《中世纪时代远东民族民族文化联系资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8年,第16—32页。
- ⑦⑤ О. В. 吉亚科娃、В. Д. 列尼科夫:《作为滨海地区女真人手工业生产研究资料的拉佐城址陶器的技术工艺特征》,《苏联远东地区古代生产考古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学术著述汇编》,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130—141页。
- ⑦⑥ О. В. 吉亚科娃、Э. В. 沙弗库诺夫:《黑龙江下游铁器时代新遗存》,《苏联考古学》,1975年3期,第158—170页。
- ⑦⑦ 叶隆礼:《契丹国志》,莫斯科,1979年,607页。
- ⑦⑧ В. Е. 叶尔马科夫:《滨海地区奥利加考古学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制品》,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年,37页。
- ⑦⑨ И. С. 茹希霍夫斯卡娅、В. Л. 扎里夏克:《古代陶器研究中的岩石学方法(根据滨海地区新石器—中世纪文化材料)》,《苏联远东地区古代生产考古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学术著述汇编》,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55—67页。
- ⑦⑩ Н. Н. 扎别丽娜:《1954年远东考古考察团在伏罗希洛夫市的发掘》,《苏联的滨海地区》,符拉迪沃斯拉克,1955年第19辑,第273—280页。
- ⑦⑪ 伊阿金夫(Н. Я. 比丘林):《古代中亚民族史料汇编》,圣彼得堡,1851年,一至三卷。
- ⑦⑫ С. В. 伊万诺夫:《那乃人的人生与生命轮回观念》,《西伯利亚与北方民族宗教观念中的人与自然(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列宁格勒,1976年,第161—188页。
- ⑦⑬ Л. Н. 伊万尼耶夫:《滨海边疆区古代的丘古耶夫卡村》,《苏联考古学》,1951年15期,第296—298页。
- ⑦⑭ В. П. 伊留谢奇金:《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起源学说与当代科学资料》,《哲学科学》,1984年6期,第17—23页。
- ⑦⑮ 作者同上:《中国历史中的等级阶级社会》,莫斯科,1986年,396页。
- ⑦⑯ Ю. В. 伊奥诺娃:《朝鲜人的宗教观点》,《国外亚洲与太平洋民族文化

——苏联科学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汇编》，列宁格勒，1969年，第二十五卷，第158—194页。

⑧⑦ 《朝鲜历史遗存》，平壤，1980年，227页。

⑧⑧ 《朝鲜史》，莫斯科，1960年，第一卷，418页。

⑧⑨ 《西伯利亚史》，列宁格勒，1968年，第一卷，《古代的西伯利亚》，第308—343页。

⑧⑩ 《朝鲜史（从古代到当代）》，莫斯科，1974年第一卷，470页。

⑧⑪ 《原始社会阶级形成时代史》，莫斯科，第三卷，1988年，565页。

⑧⑫ 《山海经》，莫斯科，1977年，235页。

⑧⑬ П. 卡法罗夫：《1870年9月15日帕拉季修士大司祭的信》，《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通讯》，1871年，第七卷，第91、92、94—96、124、326、364页。

⑧⑭ Г. С. 基谢列夫：《蒙古人，19世纪前的民族、社会、政治史纲要》，莫斯科，1981年，224页。

⑧⑮ E. M. 科季娜：《中国唐朝（公元618—907年）非自由人的个人法律地位》，《历史学副博士论文摘要》，列宁格勒，1983年，16页。

⑧⑯ 作者同上：《中国唐朝自由平民的社会法律地位》，《中世纪时代东方国家的奴隶》，莫斯科，1986年，第36—79页。

⑧⑰ B. A. 科日奇：《古代露西（蒙古时期以前）的黑色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业》，《苏联考古学材料与研究》，1953年，第32辑，208页，附录209—257页。

⑧⑱ Н. И. 孔拉德：《7—8世纪时期日本的戏剧艺术》，《日本的戏剧与戏剧作品》，莫斯科，1965年，第7—33页。

⑧⑲ 作者同上：《7—14世纪时期中世纪时代日本的文化史纲要》，莫斯科，1980年，143年。

⑧⑳ П. В. 科尼科娃：《远东中世纪的青铜器（根据光谱学、金相学分析结果）》，《远东民族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符拉迪沃斯托克，1984年，第51—55页。

⑧㉑ 作者同上：《滨海地区渤海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制品的工艺学考察》，《第十五次远东学术会议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四辑，第40—41页。

- ⑩²Н. В. 科恰科娃:《非洲文明的起源(伊费、奥伊奥、别尼、达戈米亚)》,莫斯科,1986年,303页。
- ⑩³Н. Н. 克拉基:《公元一千纪时期苏联远东民族的社会制度》,符拉迪沃斯托克,1989年,43页。
- ⑩⁴М. Н. 克列契托娃、Э. X. 维斯特法列:《中国瓷器》,列宁格勒,1947年,54页。
- ⑩⁵Р. А. 克谢诺福托娃:《19—20世纪初期日本的传统制陶业》,莫斯科,1980年,192页。
- ⑩⁶Л. Е. 库别利:《巴杰斯达尔—政治民族学概要》,莫斯科,1988年。
- ⑩⁷И. Р. 肯兹拉索夫:《中世纪时代的图瓦史》,莫斯科,1969年,211页。
- ⑩⁸С. И. 肯恰诺夫:《渤海的第一件文字石碑》,《苏联考古学材料与研究》,第86辑,莫斯科,1960年,第225—230页。
- ⑩⁹Н. В. 丘涅尔:《有关南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远东民族的中国史料》,莫斯科,1961年,392页。
- ⑩¹⁰В. Г. 拉利金:《苏维埃政权确立前乌德改人的经济与交通工具》,《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分部文集·历史丛书》,萨兰斯托克,1959年,第一卷,第126—153页。
- ⑩¹¹В. Д. 列尼科夫:《关于赛加城址陶器的分类》,《十月革命以前的苏联远东民族》,符拉迪沃斯克,1968年,第192—195页。
- ⑩¹²作者同上:《十二世纪时期女真人的冶金业与金属加工业(根据赛加城址考察资料)》,新西伯利亚,1974年,172页。
- ⑩¹³作者同上:《斯卡里斯特城址冶金遗址综合体考察成果》,《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研究》,符拉迪沃斯托克,1975年,第71—82页。
- ⑩¹⁴作者同上:《12—13世纪时期女真手工业者生铁制品评述》,《西伯利亚与太平洋地区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79年,第182—191页。
- ⑩¹⁵作者同上:《拉佐城址生活、生产客体研究的几点总结》,《中世纪时代远东民族文化、经济的新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7年,第21—26页。
- ⑩¹⁶В. Д. 列尼科夫、Л. Е. 谢缙尼契科、В. А. 霍列夫:《阿尔谢尼耶夫卡河谷地早期中世纪遗址冶金生产迹象》,《远东民族历史与文化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74年二辑,第96—103页。

- ①7 B. Д. 列尼科夫、С. А. 夏卡：《根据物理化学分析揭示女真人冶金业原料基地的尝试》，《苏联考古学》，1982年1期，第195—203页。
- ①8 《朝鲜文化纲要》，平壤，1980年，164页。
- ①9 B. H. 雷索夫：《滨海边疆区条件下的粟与黍》，《西伯利亚考古学汇编·古代的西伯利亚》，第二期，新西伯利亚，1966年，第148—150页。
- ②0 A. Г. 马雅夫金：《金史》，哈尔滨，1942年，第一章，第41—58页。
- ②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 ②2 同上，第21卷。
- ②3 同上，第23卷。
- ②4 A. С. 马尔特诺夫：《中国传统的对外态度》，《东方的国家与民族》第二十期，《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民族》，莫斯科，第230—243页。
- ②5 H. Э. 马萨诺夫：《哈萨克人游牧社会的社会机构》，《哈萨克科学院通报》，1984年4期，第45—55页。
- ②6 作者同上：《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社会机构的结构基础》，《西伯利亚民族文化：进化与交流问题》，新西伯利亚，1986年，第20—26页。
- ②7 B. M. 马索：《古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列宁格勒，1976年，191页。
- ②8 作者同上：《文明的初期阶段》，《历史问题》，1986年3期，第49—63页。
- ②9 B. H. 马特维耶夫：《渤海（东亚史8—10世纪）》，《远东国立大学丛刊》，第六辑，符拉迪沃斯托克，1929年8期，34页。
- ③0 B. E. 麦德维杰夫：《肯楚河、大柞树河谷地的城址》，《1968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69年，第237页。
- ③1 作者同上：《大柞树河流域肯楚河2号中世纪时代城址》，《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通讯》第三辑，新西伯利亚，1969年11期，第124—120页。
- ③2 作者同上：《10世纪末至11世纪黑龙江女真文化》，新西伯利亚，1977年，224页。
- ③3 作者同上：《乌苏里岛中世纪遗存》，新西伯利亚，1982年。
- ③4 作者同上：《公元一千纪末至两千纪初的黑龙江沿岸·女真时代》，新西伯利亚，1986年，305页。

- ⑬⁵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黑龙江大杜拉尔山谷的古代遗址》,《苏联考古学》,1951年,第15卷,第299—301页。
- ⑬⁶作者同上:《牡丹江流域东京城渤海上京遗址》,《苏联考古学》,1957年3期,第198—214页。
- ⑬⁷作者同上:《滨海遥远的过去——滨海边疆区古代史、中世纪史纲要》,符拉迪沃斯托克,1959年,292页。
- ⑬⁸作者同上:《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砂磧半岛的古代遗址》,《苏联考古学材料与研究》,第112期,列宁格勒,1963年,326页。
- ⑬⁹作者同上:《苏联远东最新考古学成就》,《苏联考古学》,1964年1期,第44—57页。
- ⑬¹⁰作者同上:《西伯利亚考古学——昨天、今天、明天》,《历史问题》,1968年5期,第158—174页。
- ⑬¹¹作者同上:《滨海地区出土的两件渤海时期青铜像》,《中世纪时代的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东亚》,新西伯利亚,《东亚历史与文化》第三卷,1975年,第47—52页。
- ⑬¹²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П. Л. 勃罗江斯基:《远东古代耕作业的起源地》,《苏联民族学》,1969年2期,第3—14页。
- ⑬¹³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A. П. 杰列维扬科:《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遥远的过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图书出版社,1973年,440页。
- ⑬¹⁴O. B. 巴夫列科:《“社会机构”的种类及其在历史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根据针对于铁器时代乌克兰森林草原居民研究的早期阶级社会材料)》,《历史学副博士论文》,基辅,1984年,208页。
- ⑬¹⁵作者同上:《K. 列弗留的文明起源原则与早期阶级社会机构的确立问题》,《考古学与历史构拟方法》,基辅,1985年,第119—136页。
- ⑬¹⁶帕拉季·卡法罗夫:《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民族考察》,《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通讯》,圣彼得堡,1872年第七卷第二部第二辑第91—97页,第三辑第123—124页,第六辑第325—327页,第七辑第364—366页。
- ⑬¹⁷B. 巴诺夫:《日本与渤海的外交文件》,《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1892年4期。
- ⑬¹⁸A. M. 巴夫诺夫:《女真语的发音音律》,符拉迪沃斯托克,1988年,100页。

- ④9 В. К. 别卡夫斯基:《雅库茨克语字典》,1959年,第二卷,第1281—2508页。
- ⑤0 《地理学上的伟大发现前阶级社会的初级地方机关》,莫斯科,1978年,301页。
- ⑤1 Л. С. 别列洛莫夫、С. Н. 戈恰罗夫、Э. В. 尼科戈索夫:《“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大汉主义实质》,《远东问题》,1981年4期,第41—55页。
- ⑤2 А. И. 别尔什、А. М. 哈扎诺夫:《游牧养畜者的公社》,《亚洲、非洲民族》,1979年2期,第51—60页。
- ⑤3 Л. 帕兹德涅耶夫:《北部日本史及其与亚洲大陆、俄罗斯的关系资料》,东京,1909,第二卷第一章,181页。
- ⑤4 Н. Г. 鲁别连科:《滨海地区中世纪的纺轮》,《苏联远东南部及其毗邻地区古代、中世纪考古学资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3年,第98—106页。
- ⑤5 作者同上:《中国“炕”类型取暖设施的起源》,《第十六次“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会议文集》,莫斯科,1985年,第二部,第51—53页。
- ⑤6 Л. Г. 萨维诺夫:《有关南西伯利亚地区复合式弓的历史及其进化的某些问题的材料》,《西伯利亚及其中央亚细亚古代部落的军事》,新西伯利亚,1981年,第146—162页。
- ⑤7 《民族概念、术语汇编·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标准文化》,莫斯科,1986年,239页。
- ⑤8 Л. Е. 谢缅尼契科:《滨海地区团山附近的早期中世纪时代遗址》,《1972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73年,第238—239页。
- ⑤9 作者同上:《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存考察》,《1973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74年,第222—223页。
- ⑥0 作者同上:《关于滨海地区团山上的城址、马利亚诺夫斯克城址文化层的断代问题》,《远东民族历史与文化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74年,第二辑,第112—124页。
- ⑥1 作者同上:《鞞鞞——渤海人文化联系问题(根据考古学考察材料)》,《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研究》,符拉迪沃斯托克,1976年,第88—89页。

- ⑥2 作者同上:《8--10世纪时期滨海地区出土的镞的评述》,《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研究》,符拉迪沃斯托克,1976年,第98—111页。
- ⑥3 作者同上:《渤海国时期(8—10世纪)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历史学副博士论文摘要》,新西伯利亚,1981年,24页。
- ⑥4 作者同上:《论滨海地区渤海人的制陶业》,《苏联远东南部及其毗邻地区古代、中世纪考古学资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3年,第47—57页。
- ⑥5 Л. Е. 谢缅尼契科、В. И. 鲍日金:《滨海地区渤海人农业经济的新材料》,《苏联远东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1年,第66—70页。
- ⑥6 Л. Е. 谢缅尼契科、Э. В. 沙弗库诺夫:《团山发掘》,《1971年考古发现》,莫斯科,1972年,第301—302页。
- ⑥7 С. А. 谢缅诺夫:《耕作业的起源》,列宁格勒,1974年,317页。
- ⑥8 Ю. И. 谢缅诺夫:《术语学与理论》,《苏联民族学》,1983年5期,第81—85页。
- ⑥9 В. Я. 希基赫缅诺夫:《中国:过去的一页》,莫斯科,1987年,448页。
- ⑦0 Г. Л. 希兰季耶夫:《中世纪时期远东南部地区出土的玻璃串珠的制作工艺》,《苏联远东地区古代生产考古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学术著述汇编》,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116—129页。
- ⑦1 作者同上:《苏联远东南部地区中世纪时期玻璃加工生产的发展水平》,《第十五次远东学术会议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四辑,第41—42页。
- ⑦2 В. П. 索科洛娃:《宗教中的动物祭祀》,莫斯科,1970年,215页。
- ⑦3 В. С. 斯塔里科夫:《北满东部人参采掘研究资料》,《哈巴罗夫斯克自然科学家、民族学家学会丛刊》,哈尔滨,1946年1期,第40—48页。
- ⑦4 作者同上:《中国东北地区汉人文化材料》,莫斯科,1967年,255页。
- ⑦5 Л. П. 塞契夫、В. Л. 塞契夫:《中国服装,在文学、艺术中的象征意义、历史、处理》,莫斯科,1975年,132页。
- ⑦6 В. С. 达斯金:《有关匈奴史资料(根据中国文献史料)》,莫斯科,1968年,177页。
- ⑦7 作者同上:《有关古代东胡游牧民族史资料》,莫斯科,1984年,486页。
- ⑦8 В. А. 达达尔尼科夫:《滨海地区洞穴的考古学研究史》,《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1976年,第32—37页。

- ①79 《东南亚、东亚、中央亚细亚民族乡村房址的传统类型》，莫斯科，1979年，286页。
- ①80 В. Я. 托尔马契夫：《满洲古迹·白城废墟》，《哈尔滨满洲通报》，1925年，丛书A，1/2期，第9辑。
- ①81 С. М. 图比金娜：《12—13世纪初期女真人的陶器及其分类》，《苏联远东古代史的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78年，第64—72页。
- ①82 《我们时代及古代令人惊奇的历史（17世纪“今古奇观”故事选集）》，莫斯科，1954年，第238—267页。
- ①83 А. З. 弗多罗夫：《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市及其周邻地区的古代遗存》，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1916年。
- ①84 О. С. 胡加科夫：《6至12世纪时期叶尼塞河黠戛斯人的武器》，新西伯利亚，1980年，176页。
- ①85 《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平壤，1979年，118页。
- ①86 Г. 柴尔德：《考古学的进步》，莫斯科，1949年，194页。
- ①87 张轩：《中国古代的航海术》，莫斯科，1960年，71页。
- ①88 全永律：《北朝鲜的朝鲜史研究》，《亚洲民族》，1989年4期，第155—160页。
- ①89 В. Б. 沙弗库诺夫：《女真人的砍伐工具》，《阿尔谢尼耶夫纪念文集》，乌苏里斯克，1985年，第109—111页。
- ①90 作者同上：《关于渤海的文字》，《苏联东方学》，1958年6期，第82—84页。
- ①91 作者同上：《滨海边疆区发现的青铜盘、青铜印的断代问题》，《东方题铭学》，第14辑，1961年，第114—120页。
- ①92 作者同上：《1958年斯拉维扬斯克地区考古考察成果》，《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分部文集·历史丛书》第二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61年，第173—186页。
- ①93 作者同上：《渤海国及其滨海地区文化遗存》，《历史学副博士论文摘要》，新西伯利亚，1962年，18页。
- ①94 作者同上：《滨海地区的渤海遗存（根据1960年考察材料）》，《远东考古学与民族学》新西伯利亚，1964年第一辑，第84—105页。
- ①95 作者同上：《滨海地区克拉斯基诺村附近的渤海城址》，《苏联地理学会

- 滨海分部丛刊》，第25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66年，第141—144页。
- ①96 作者同上：《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发掘（1960—1962）》，《西伯利亚历史资料·古代的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1966年第2辑，第286—296页。
- ①97 作者同上：《渤海国及其滨海地区文化遗存》，列宁格勒，1968年，128页。
- ①98 作者同上：《关于滨海地区中世纪遗存的分期与分类》，《十月革命以前的苏联远东民族》，符拉迪沃斯托克，1968年，第186—191页。
- ①99 作者同上：《根据1963—1966年的考古学考察材料对女真人房址的评述》，《远东历史资料（历史、考古、民族、语文）》，符拉迪沃斯托克，1973年，第72—89页。
- ②00 作者同上：《对汉文史籍中一些古代族名的构拟尝试》，《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学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1976年，第51—70页。
- ②01 作者同上：《女真艺术中“兽形艺术风格”的具体表现》，《苏联远东古代史的考古学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78年，第83、89页。
- ②02 作者同上：《赛加城址出土的铜质骑士铸像及其用途》，《古代文化的雕塑品与图画》，新西伯利亚，1983年，第131—143页。
- ②03 作者同上：《渤海文化、女真文化中的索格狄亚那人——伊朗人因素》，《西伯利亚古代史问题》，新西伯利亚，1985年，第146—155页。
- ②04 作者同上：《黑水的地理定位与“黑龙江女真”的民族属性问题》，《苏联远东地区考古学考察问题》，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51—62页。
- ②05 作者同上：《8—10世纪时期滨海地区的索格狄亚那人移民》，《中世纪时代远东民族民族文化联系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8年，第100—105页。
- ②06 作者同上：《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苏联考古学》，1989年1期，第267—270页。
- ②07 作者同上：《基什涅夫卡村出土的石质面孔形器端》，《苏联远东中世纪考古学新材料》，符拉迪沃斯托克，1989年，第113—119页。
- ②08 作者同上：《12—13世纪女真——兀的改文化与远东通古斯民族起源问题》，莫斯科，1990年，282页。
- ②09 作者同上：《带有兽形主题的渤海屋顶瓦》，《苏联考古学》，1991年1期，第269—271页。

- ①⑨ В. 沙弗库诺夫、В. Н. 鲍日金：《女真人加工谷物的工具及其谷物的贮藏方式》，《苏联民族学》，1976年2期，第118—124页。

二、俄文档案资料

- ①⑩ Г. И. 安德列耶夫：《1958年远东考察团沿岸队在拉佐地区、奥利加地区、哈桑地区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770号，第38—40页。
- ①⑪ В. И. 鲍日金、Л. Е. 谢缅尼契科：《1975年滨海边疆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5646号，121页。
- ①⑫ В. И. 鲍日金：《1976年滨海边疆区米哈伊洛夫斯克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6316号，75页。
- ①⑬ 作者同上：《1977年滨海边疆区米哈伊洛夫斯克地区尼古拉耶夫斯克1号城址、尼古拉耶夫斯克2号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6748号，177页。
- ①⑭ 作者同上：《1980年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7775号，97页。
- ①⑮ 作者同上：《1981年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地区科尔萨科夫斯科耶村落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8560号，50页。
- ①⑯ 作者同上：《1983年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9827号，47页。
- ①⑰ 作者同上：《1986年滨海边疆区新戈尔杰耶夫斯克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1515号，228页。
- ①⑱ 作者同上：《1989年滨海边疆区康士坦丁诺夫斯科耶村落址发掘报告》，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的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档案库，全宗一、2册343号。
- ①⑲ А. И. 洛巴金：《关于阿穆尔地区49处古迹的一些资料》，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库，1869年1单元34号，32页。

- ②21) M. E. 谢缅尼契科:《1972年阿尔谢尼耶夫卡河谷地考古学调查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4843号。
- ②22) 作者同上:《1973年滨海边疆区阿努奇地区团山、新戈尔杰耶夫斯科耶遗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5040号,84页。
- ②23) 作者同上:《1974、1975年滨海边疆区阿努奇、卡瓦列罗沃地区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5762号,38页。
- ②24) 作者同上:《1982年滨海边疆区斯塔罗列契斯克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0373号,57页。
- ②25) 作者同上:《渤海国时期(8—10世纪)滨海地区居民物质文化》,完整的学术报告,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的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档案库,全宗一,2册229号,185页。
- ②26) B. A. 霍列夫:《1983年滨海边疆区克拉斯诺雅罗夫斯克城址、阿纳尼耶夫斯克城址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0005号,101页。
- ②27) B. B. 沙弗库诺夫:《1955—1956年滨海边疆区境内田野考察成果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316号,43页。
- ②28) 作者同上:《1958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分部考古发掘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719号,44页。
- ②29) 作者同上:《1959年夹皮沟河谷地考古发掘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1877号,25页。
- ②30) 作者同上:《1960年滨海地区夹皮沟河谷地渤海遗存发掘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2230号,36页。
- ②31) 作者同上:《1965年滨海边疆区境内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3050号,117页。
- ②32) 作者同上:《1966年滨海边疆区境内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库3243号,89页。
- ②33) B. B. 沙弗库诺夫、B. Д. 列尼科夫:《1968年滨海边疆区境内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3652号,71页。
- ②34) B. B. 沙弗库诺夫、B. Д. 列尼科夫、O. C. 加拉克基奥诺娃:《1969年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境内考古学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3950号，114页。

- ②35 В. Б. 沙弗库诺夫、О. С. 加拉克基奥诺娃、Л. Е. 谢缅尼契科、Ю. И. 瓦西里耶夫：《1971年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境内田野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4537号，235页。
- ②36 В. Б. 沙弗库诺夫、В. Д. 列尼科夫、Ю. И. 瓦西里耶夫、Л. Е. 谢缅尼契科：《1972年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境内田野考古考察报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档案库，1单元4785号，239页。

三、中文、日文、朝文文献

- ②37 相枕：《火炕小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1期，第98—99页。
- ②38 《渤海国志》，香港大华印书馆，655页。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
- ②39 王承礼：《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1962年11期。
- ②40 作者同上：《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3期。
- ②41 作者同上：《渤海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34页。
- ②42 作者同上：《记唐代渤海国咸和十一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北方文物》，1988年3期。
- ②43 王承礼、张忠培、林运、方起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北京，1982年。
- ②44 汪宇平：《内蒙古昭乌达盟印纹陶的时代问题》，《考古通讯》，1955年4期。
- ②45 作者同上：《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辽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2期。
- ②46 王永祥、吕遵禄、李陈奇：《黑龙江海林北站渤海墓发掘》，《北方文物》，1987年1期。
- ②47 魏存成：《渤海城址的发现与分期》，《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北京，1982年1期。
- ②48 作者同上：《黑龙江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3期。

- ②49 作者同上：《渤海建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4期。
- ②50 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1期。
- ②51 辜其一：《四川唐代摩崖中反映的建筑形式》，《文物》，1961年11期。
- ②52 丹化沙、孙秀仁：《牡丹江中下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4期。
- ②53 单庆麟：《渤海旧京城址调查》，《文物》，1960年6期。
- ②54 张相烈：《我国保暖土炕的起源与进化》，《考古与民俗》，1966年4期。
- ②55 董万岩：《白山靺鞨五考》，《北方文物》，1986年2期。
- ②56 《东北文物工作队1954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 ②57 《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五典，1939年，（日文）。
- ②58 江谷宽：《渤海时期的杏山寺》，《古生物学》，1966年第13卷第二期。
- ②59 小川裕人：《所谓渤海靺鞨》，《史林》，1939年1期，第24辑。
- ②60 李殿福：《渤海上京永兴殿考》，《北方文物》，1988年4期。
- ②61 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敦化县“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年3期。
- ②62 刘晓东：《渤海国涇沱湖考》，《北方文物》，1985年2期。
- ②63 刘晓东、罗葆森、陶刚：《渤海国渤海州考》，《北方文物》，1987年1期。
- ②64 刘晓东、祖延龄：《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北方文物》，1988年3期。
- ②65 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7期。
- ②66 吕遵禄：《黑龙江宁安大牡丹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10期。
- ②67 作者同上：《黑龙江宁安、林口发现的古墓葬群》，《考古》，1962年11期。
- ②68 作者同上：《镜泊湖周围山城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1989年1期。
- ②69 《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526页。
- ②70 斋藤甚兵卫：《关于满洲国间岛省琿春县半拉城》，《考古学杂志》，1942年第32卷5期。
- ②71 斋藤优：《间岛省海兰平原的渤海遗迹》，《考古学杂志》，1954年40卷1期。
- ②72 孙秀仁：《黑龙江历史考古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2期。
- ②73 作者同上：《对渤海史三个问题的探索》，《学习与探索》，1987年5期。

- ⑧74 孙进己：《渤海疆域考》，《北方论丛》，1982年4期。
- ⑧75 孙正甲：《镜泊湖即涿沱湖说置疑》，《北方文物》，1986年1期。
- ⑧76 孙玉良：《渤海史料概论》，《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1期。
- ⑧77 《四川西昌高枳唐代瓦窑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 ⑧78 许玉林：《辽宁地区花纹砖墓和花纹砖》，《考古》，1987年9期。
- ⑧79 《朝鲜史》第一编第三卷，汉城，567页。
- ⑧80 乌居龙藏：《满蒙调查》，东京，万里阁书房，1928年，546页。
- ⑧81 乌山喜一：《满洲国间岛省古迹调查略报》，《考古学杂志》，1937年第27卷8期。
- ⑧82 作者同上：《渤海国小史》，新京（长春），1939年。
- ⑧83 作者同上：《渤海中京考》，《考古学杂志》，1944年第34卷1期。
- ⑧84 乌山喜一、藤田亮策：《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
- ⑧85 董长富：《吉林集安发现一处渤海时期遗址》，《北方文物》，1985年4期。
- ⑧86 樊万象：《牡丹江边墙调查简报》，《北方文物》，1986年3期。
- ⑧87 傅熹年：《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年11期。
- ⑧88 黄维翰：《渤海国记》，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一卷，第143—202页。
- ⑧89 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4卷，第2243—2268页。
- ⑧90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阳，1943年。
- ⑧91 姜华昌：《东北三省渤海史学术讨论会在黑龙江省宁安召开》，《北方文物》，1987年1期。
- ⑧92 作者同上：《渤海上京龙泉府与唐长安城建筑布局的比较》，《北方文物》，1988年2期。
- ⑧93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弗里：《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考古学报》，1978年3期。
- ⑧94 张柏忠：《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2期。
- ⑧95 张泰湘：《大城子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4期。
- ⑧96 张钧：《渤海文化发展的特点》，《北方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二辑。

- ⑨7 赵虹光：《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1期。
- ⑨8 作者同上：《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调查发掘工作的回顾》，《北方文物》，1988年2期。
- ⑨9 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哈尔滨，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1984年，288页。
- ⑩0 朱国忱、赵虹光：《渤海砖瓦窑址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86年2期。
- ⑩1 《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卷。
- ⑩2 郑英德：《室韦地理新探》，《社会科学》，1983年4期。
- ⑩3 郑永振：《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2期。
- ⑩4 朱荣宪：《渤海文化》，平壤，1971年。
- ⑩5 《陕西铜川耀州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94页。
- ⑩6 于汇历：《黑龙江海林二道河子渤海墓葬》，《北方文物》，1987年1期。
- ⑩7 杨原：《云南元谋直林的慢轮制陶工艺》，《考古》，1987年9期。
- ⑩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发掘清理简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 ⑩9 作者同上：《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东北考古与历史》，北京，1982年第一辑。
- ⑪0 H. J. M. 克拉埃森、P. 斯卡尼科：《早期的国家：理论与假说》，《早期的国家》，海牙，1978年第3—28页。
- ⑪1 埃德姆：《早期的国家：原型与实际》，《早期的国家》，海牙，1978年第637—650页。
- ⑪2 佩特罗斯佩克特国家研究讨论年会：《国家研究》，海牙，1981年第469—510页。
- ⑪3 Eckardt P. A. : Geschichte der Koreanischen Kunst . Leipzig, 1929.
- ⑪4 K. 瑞弗沃：《公元前三千纪基克拉迪群岛和爱琴海文明的出现》，1972年。
- ⑪5 Senow .I: Genetile und 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im prozeb der Staatentstehung: Tatsachen und Theorien // Ethnographische—Archaologische àùeitschrift . Jg . 24 . 1983 . N₂ . S . 48 .
- ⑪6 B. 沙弗库诺夫：《女真人的坠饰》，国际坠饰收藏协会杂志，1975年3卷2号，第26—36页。

-
- ①7《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报告》，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五卷，1939年。
- ①8S. Y. 瓦伦斯坦因：《一本中国陶瓷手册》，《首都美术博物馆》，N. Y. ——波士顿，1975年，251页。
- ①9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水盂和水注》，《考古》，1984年8期，第726—729页。

后 记

1994年10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远东研究所）学术代表团访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期间，将该所刚刚出版的学术著作《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以下简称《渤海国》）赠送给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国》一书的学术价值受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所里决定将翻译此书列入吉林省高句丽、渤海专项研究计划，并委托我完成具体的翻译工作。

我把翻译出版中文本《渤海国》的构想写信告知了原作者之一——远东研究所副所长А.Л.伊夫里耶夫副博士，得到了他的首肯。А.Л.伊夫里耶夫副博士代表所有原作者无偿授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中文本《渤海国》，并把此举视为该所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的具体体现。

渤海史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渤海国》一书是现阶段俄罗斯学者渤海研究学术成果的综合体现。阅读此书可以洞察俄罗斯学者渤海研究的学术思想，了解俄罗斯学者渤海研究的学术动态。《渤海国》是一部建立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学术著作，书中所叙述的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境内揭露的渤海考古遗存，是进行渤海研究不容忽视的实物资料，对于我国学者而言，多是认识上的空白点，弥足珍贵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翻译出版此书的初衷所在。

《渤海国》一书的翻译工作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脱稿之时一本崭新的《大俄汉词典》已变得面目全非，它默默地伴我度过了翻译过程的始终，成为其中甘苦的最好见证。

翻译过程中,许多困难的解决有赖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诸位我所敬仰的师长的热心帮助,本书得以脱稿和他们的关心鼓励是分不开的。尤使我感动的是,病榻上饱受疾病折磨的王承礼先生曾探询有关《渤海国》一书翻译情况,如今书将问世,王先生却已溘然长逝……

《渤海国》一书部分章节的译文已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为此该书的引言部分曾得到《北方文物》杂志社王德厚先生的校正。令我深感负疚的是,吉林大学教授林耘先生因为为我看稿而突发脑血栓,疾病使林先生卧床多日,至今仍在恢复之中,此时此刻衷心祈望林先生早日康愈。

困于自己的学识所限,译文中会有许多纰漏之处,恳请能够阅读原著的学者们点破译者的谬误所在,以警示他人。

作为吉林省高句丽、渤海专项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渤海国》一书的翻译工作一直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在国家文物局、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大力促成下,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感谢出版此书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译者 1991年4月于长春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